

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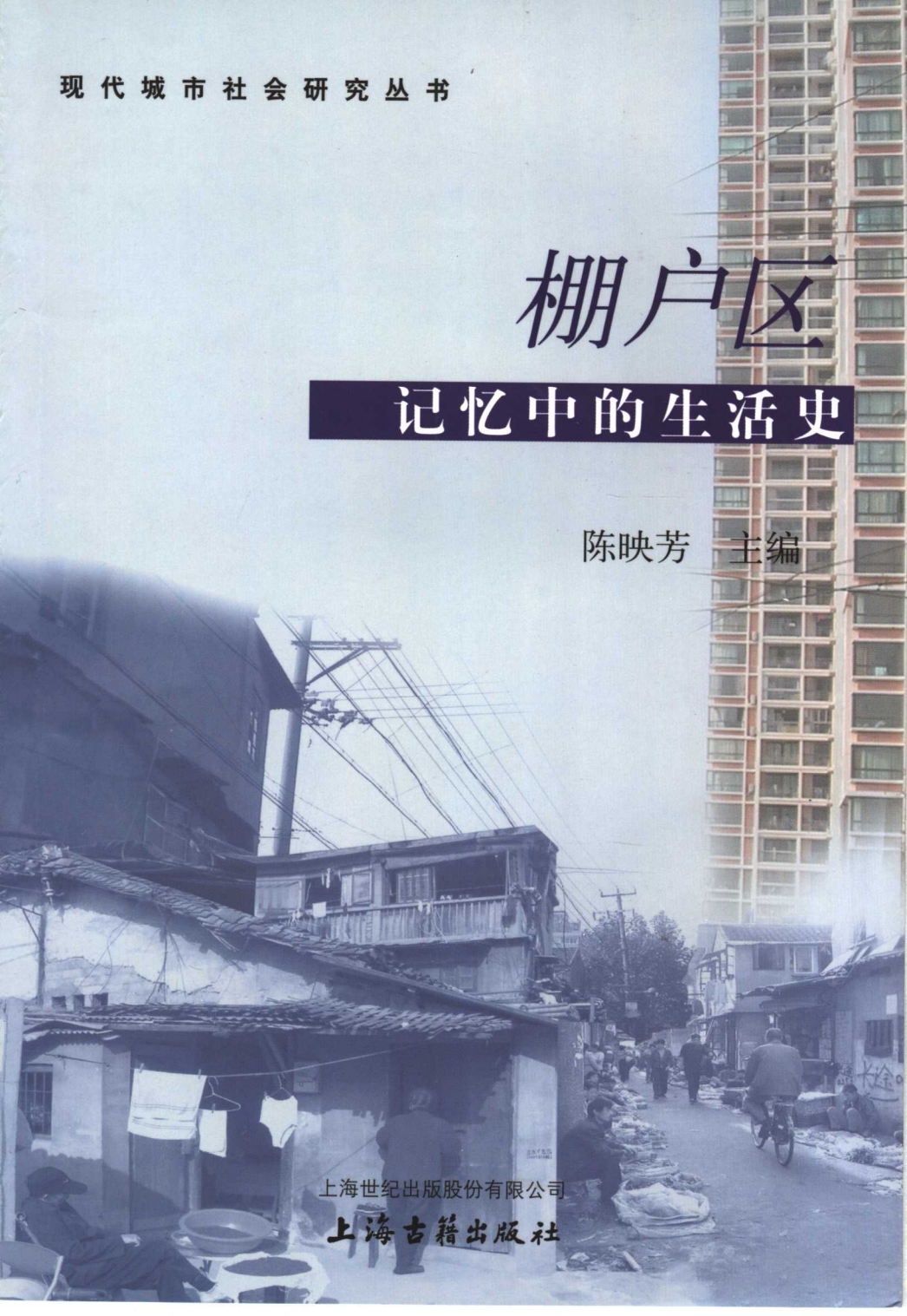
棚户区

记忆中的生活史

陈映芳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世纪出版

K·818 定价：28.00元

ISBN 7-5325-4315-3



9 787532 543151 >

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丛书

陈映芳 主编

棚户区

记忆中的生活史

陈映芳 主编

研究助理 江建军 王磊 安钊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棚户区: 记忆中的生活史/陈映芳主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5
(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丛书)
ISBN 7-5325-4315-3

I. 棚... II. 陈... III. 居住区—社会生活—研究
—上海市—现代 IV. 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3817号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

合作项目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丛书
棚户区: 记忆中的生活史
陈映芳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4 字数 294,000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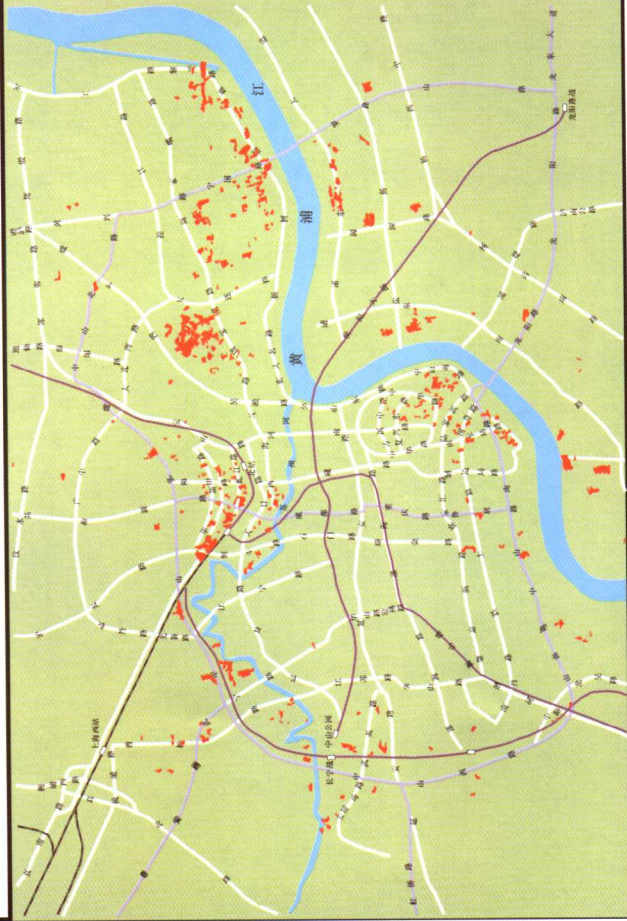
ISBN 7-5325-4315-3

K·818 定价: 28.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上海市棚户区分布示意图(2000年)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城市居民生活研究”课题组制作



上海市棚户区分布示意图(2000年)



解放前上海棚户分布示意图



董家渡



元和弄

总 序

本丛书的宗旨,是希望对跨学科的、经验实证的城市社会研究有所贡献、有所推动。

在这套丛书中,我们所要描述和分析的,是作为社会的城市。城市社会的转型及其扩充、发展,是当今中国社会演变的最重要、最深刻的内容之一。如何记录、描述这样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并对其作出相应的解释、阐述,是需要各门学科从事城市社会研究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的艰巨工作。由于城市社会研究的内容涉及到从人口生态、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社会意识以及人的行为、心理等各个层面,还涉及到全球化的背景以及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跨地域、跨文化的共通性,所以,其研究的艰巨性不仅在于这项工作需要有实证性的调查研究,需要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更需要有各种形式、各种层面的比较研究,包括国际间的、城市间的对照和比较。

自2003年开始,出于对我国城市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特殊性的思考,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与一批研究城市社会、人文地理、城市生态、城市管理等的同仁组建起了跨学科的城市研究团队,并成立了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几年来,团队成员们一方面持续多年地坚持综合调查和共同研究,另一方面围绕相关的主题,与校

内外、国内外的同行以及其他从事城市研究的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特别是文化研究等的学者们建立了广泛而有益的合作、交流关系。

在这样一种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我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编集，能将大家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来，一方面期望获得相应的学术批评，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为我国的城市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学术性的参照文本。

本丛书的课题研究及成果出版，得到了相关研究机构的支持，在此诚致谢意。

谨此为序。

陈映芳

目 录

序 关于这项调查.....	1
上海市棚户区的历史和现状	江建军 赵晔琴 15
家庭生活史口述实录	25
(一) 元和弄	25
(二) 董家湾	242
附录: 访问提纲、整理框架	397
后记.....	399

序 关于这项调查

陈映芳

一、听他们叙述：初衷与方法

“棚户区”，在近代以来的上海历史中，一直是规模庞大、形态独特的城市贫民区（详见后面介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这里居住的主要是 50 年代中期以前自全国各地迁徙来沪的下层移民，也有小部分是原来即居住于此的“本地人”和 50 年代中期以后零星搬入的居民。

这几年来，因为教学和社会调研活动的需要，我曾一次次到棚户区，听居民讲他们的生活。隐隐然就有了想把他们的叙述内容记录下来的冲动。但我深知此事的不易：采集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记忆，为何又何为？让他们讲什么、怎么让他们讲、能听到什么……在在都可能成为问题，都需要认真的考虑和准备。

可是形势不等人。“城市更新”的势头迅猛异常，有关上海内城的棚户区将在 2005 年前全部消失的传闻迫使我们尽快行动——在这类社区消逝之前，我们必须有所作为。首先只为了记录下我们还能看到、听到的，有关这个社区普通居民们的日常生

活，他们的过去和现在。2003年秋，我和我的几位研究生一起，动员、培训了社会学系近百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组织他们来到董家湾和元和弄（均为假名），展开了为期近一个月的棚户区居民生活史调查。

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我们着重考虑了社区形态及其对象群体的典型特征。这两个社区被我们选择为调查点，一是因为它们地处上海市棚户区最集中的苏州河北的闸北区和普陀区。同时还因为在调查的当时，这两个社区还保留有较完整的整体规模。在所在社区居委会干部的热忱配合和帮助下，调查组在两个调查点以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近百户访问对象。随后，同学们进入到居民家中，对受访居民作了访问式调查。

怎么问？如何记录？这些曾是我思索再三的问题。想做的与能做的，需有一个大致的平衡。作为访员，我们的学生与棚户区居民有着太多的隔阂，包括社会文化的、时代历史的，还有个人生命周期体验的等等。而面对受访者，我们还必须恪守基本的调查伦理，居高临下的访贫问苦或刨根究底的隐私窥探都有违这项调查的本意，也与社会学教学实践的宗旨不符。最后，我们确定了结构式访谈的基本方案，要求访问员参照访谈提纲（参见附录），结合具体情景，以聊天对谈的方式提问并倾听。为了尽可能减少访问员对受访者叙述内容的主观选择，我们给每位访员配备了录音器材，要求他们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留下录音记录，随后依据声音资料整理出原始的对话内容，并记述下在访问现场的所见所感。

现在大家看到的，即是我们按受访者叙述内容及其时间顺序等稍作整理后的叙述记录稿。为了避免对受访者个人隐私的暴露，我们隐去了调查点、受访者住址以及受访者及其家属的真实姓

名,并酌情遮蔽了一些个人相关信息。这儿的“棚户区居民”,主要是目前居住在棚户区、具有本市户籍的老居民,没有包括 80 年代以来入住其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

二、“第四种文本”的建构

有关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样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描述。除了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者的一些经验实证研究的成果外,我们还可以从既往的各种文字和图像中搜寻出有关棚户区的记录来,这些记录在各个时期、以各种方式向我们描述了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情景。

第一种文本:棚户区改造与穷人翻身

首先要提到 1949 年以来由党政传媒机构及其各种宣传渠道传递给社会的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故事。这类故事的内容大致涉及旧上海棚户区悲惨万状的环境及生活,1949 年以后新政府的棚户区改造、工人新村建设,一直到 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的城市大改造、棚户区居民“喜迁新居”。

棚户区的改造和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改善,自 1949 年至今,一直是城市新闻传媒中主题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类报道无疑是政权合法性和政策正当性提供明证的有效方式。在这一种文本被建构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抑或被动地,生活者自身也参与了故事的叙述。像上海市 50 年代的东新村改造、肇家浜水上棚户区改造、“两万户工程”、曹阳新村规划,60 年代的蕃瓜弄改造,80 年代的药水弄改造,直到 90 年代的“365 工程”、“两湾一村”动迁工程等等,几乎在所有的相关报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棚户区居民怀着激动、感恩的心情讲述的今昔对比的生活故事。我

们不清楚这样一些被传递到公众社会的叙述具体是如何被安排、被编辑的，却可以看到，让缺乏公共话语权力与能力的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对于政治是多么重要。在这样一种文本的话语框架中，他们的叙述是被规定的意义的注脚。

第二种文本：作为城市之耻的“下只角”

与前一种文本迥异的，是一般社会的棚户区像——作为城市之耻、上海之羞的特殊的城市贫民区。这类文本在非棚户区的市民中口口相传，在各种类型的上海故事中也若隐若现。

可以说，旧上海其实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华界、外国租界（法租界和英美共同租界，广义的还包括越界筑路地段和虹口地区日本人居留地），还有城市周边的棚户区。而在许多人的上海记忆中，棚户区是不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棚户区的居民自己，也会把进城叫做“到上海去”。1949年后，虽然随着行政区划的重组和城市工业区、住宅区的外扩，上海的城市地图和城市概念不断变化。但一般社会的棚户区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长期以来，棚户区被侮称为上海的“下只角”（以此相对照的是旧租界高档住宅区和繁华地段的“上只角”）。作为设施落后、拥挤肮脏的贫民住宅区，它是城市羞于示人的角落。

在这同时，棚户区的居民，被社会地、历史地建构为一个特殊的族群。对这个族群的社会性歧视曾长久蔓延于这座城市。棚户区居民几乎成为贫穷、粗鲁、“档次低”等等的同义词。这种歧视甚至超出了一般的阶级/阶层歧视：住宅地段、祖籍所在地以及家乡口音，成了族群身份的识别标志，这种族群身份多少构成了社会交往及通婚的障碍。

这样一种棚户区像，在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中有直白或隐晦的描述。它既可能是描写旧上海贫困与罪恶的空间元素，也可能

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社会不公或平民艰难的典型题材。当然,在大多数有关“大上海”的文字描述或视觉表象中,棚户区会被当作非城市、非上海的区域而被忽略、被屏蔽。

第三种文本:“我的底层”

90年代开始,有关“底层”的叙述在中国文化知识界重新复活,近年来更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在相关的议论中,笔者注意到,区别于一般社会学者所使用的“社会下层”概念,“底层”话题的叙述者们正致力于通过“底层”概念寻回在“阶层”概念中可能缺失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含义。这显示了知识分子试图从“底层”的意义世界中寻找思想资源的努力,甚或也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对社会深处革命力量的想象和向往。

与此同时,“底层的表述”作为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①。如何接近、了解真实的底层世界?人们开始探讨途径的可能。但是,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了“在现代社会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底层’始终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底层难于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因为在知识分子看来,底层既没有表达的能力和权力,也缺乏自主性的话语和清晰的思想。可另一方面,不少讨论者依然坚持“底层的表述”或“表述底层”的必需和可能。

带着价值的关怀和实际困惑,一些学者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叙述,以底层社会一员的身份,或以底层生活曾经的亲历者的身份。在这样一些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别于上述第一种文本的棚户区:那里没有空泛的政治激情,虽然工人们有对生活的知足和对

^① 《天涯》杂志2004年第6期和之后的几期专门推出了题为“底层与底层的表述”的专题。

党的感恩，但叙述者们道破了，那所谓的平等其实只是一种幻觉。棚户区居民所以能安于物质艰苦的非城市的生活状况，多少是阶层隔离（城市生活区隔），以及他们习惯于以另一种“底层”——乡村农民为参照的结果。

在这些文本中，我们还能读到另一种全然不同于上述第二种文本的棚户区：在叙述者们对“我的底层”的记忆中，棚户区的居民不仅对国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忠诚，那里的人们还恪守着传统的道德信条，淳朴善良而又疾恶如仇，邻里间洋溢着浓浓的亲情，社区有“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安全……

在这样一种叙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对底层的天然情感，以及试图改变底层被表述、被扭曲的命运的努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叙述者与实际的底层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距离。这种距离既存在于他们主观上的“底层认同”与他们实际生活中“非底层的社会地位”之间，也存在于历史想象与现实之间。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叙述者对今天现实中的棚户区和底层人表现出了深深的隔膜和失望。

第四种文本：共同建构“他们的叙述”

在一些学者看来，“一切在苦难中的底层，他们的话语、情感都应该得到疏通、表达，形成底层自身真实、质朴的话语空间”^①。以此为理念，有的学者倡导将教育送民间，培植下层民众的叙述能力。也有的学者身体力行，致力于民间叙述的记录。还有不少史学工作者致力于以口述史的形式将民间的记忆传递到公共话语空间和知识领域，就像汤普逊所认为的那样，“口述史正是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

^① 徐林刚《我的底层》，《天涯》2005年第1期。

人民自己动手去建构自己的未来”^①。当然,对于执着于“纯粹的”底层话语的人来说,问题依然存在:到底哪些才是底层自己的话语,“底层的真正的思想”是否存在?

“让他们自己叙述”,出于对记录社会的意义理解和自身的研究需要,几年来,我自己曾尝试过让研究对象自述,也曾多次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对话、倾听并记录。在着手计划这项对棚户区居民生活史的调查时,“共同建构”已经成为我对这类调查的方法上的一种自觉。在我看来,“他们的叙述”的“纯粹性”,应该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但不是这项工作的性质要求。仅从形式上讲,起码有三部分人会共同参与这一个文本的建构:① 作为调查策划者、组织者和成果编辑者的本人(以及协助我工作的几位研究生);② 作为访问员、记录者的学生;③ 作为叙述人的受访者。这样的共同参与,是这一类调查、叙述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在这种前提下,对“他们的叙述”的“纯粹性”的追求,不应表现为对共同参与这一事实的淡化,或对其意义的否定,而恰恰需要对这种共同建构性质的明了,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对叙述者话语空间和叙述内容的尽可能的尊重和保留。

毋庸讳言,从调查计划和访谈提纲的确立,到这本实录的最后定稿,“我们的”的意图和视角贯穿始终。此外,学生们会以他们的方式展开调查,有的是我担心的(他们对调查宗旨的可能的理解偏差,对棚户区居民生活史的挖掘、理解的能力,以及实际的对话可能),也有的是我希冀的(很多情况下,访问员的话语权与受访者的话语空间是成反比的,学生访问员可能听到研究者无法听到的叙述)。但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能给予受访者尽可能多的、自由的叙

^① 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7页。

述空间，并在记录、编辑的过程中自觉地减少“他们的叙述”被扭曲的可能。

三、他们的记忆和生活

历史与现实的经纬之中

棚户区居民的生活，应该不缺少丰富的内容，他们中很多人是早年从农村逃难来到上海谋生的老一代移民，有过扛码头、拉黄包车、当童工、在日资纱厂做包身工、在荒地里搭棚栖身、为地下党送情报等等的经历，1949年后又多成为正式的工厂职工，是响当当的“上海工人”。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出过大力，有的曾当过劳模，有的还经历了60年代的支援新疆、支援内地“三线”建设……他们原是上海滩苦难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这个大都市风云沧桑的见证人。但是如今，在他们这里，在不少受访者的记忆中，这些似乎只剩下了轮廓模糊的线条，缺少我们期待的细节，也缺少我们想象的激情。

当然有访问员与受访者之间互动的问题，也有叙述者记忆力或表述能力的问题。但是，细听他们的讲述，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有着讲述者的某种选择。作为他们的生活史的共同建构者，他们的参与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面对我们的访问员，他们会有疑问：“为什么要讲？”“讲什么？”“跟你们讲又有什么用？！”

是的，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叙述行为和自己的叙述内容赋予意义。而这些，恰恰是我们难能设计和达到的。

人们的记忆和叙述，不可避免地会被镶嵌在由历史和现实交织成的意义世界里。我们曾经听到过老工人老贫农们声泪俱下、细节详尽的“忆苦思甜”，也曾经听过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报告”、

“文革”受迫害者的血泪控诉，今天我们更可以看到各种虚虚实实的个人传记和家族史。我们都不难为每一种倾诉行为找到其个人动机与时代的/社会的因素之间的联系，也很容易为他们的叙述内容找到相应的历史的/现实的意义。而在我们所作的这一类对社会下层生活史的调查(深度采访)中，叙述者同样需要为自己的叙述寻找意义。即使我们可以成功地取得他们的理解，即他们愿意配合我们，为社会、也为他们自己的所属群体留下一份文化资料。可是，他们还需要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

在叙述中，他们常常会说：“不说了，说这些有什么意思?!”“你们不懂的，说了你们也不理解……”是的，他们当初逃难来沪的果敢、艰辛，在上海立住脚的不易，在旧上海受的苦，后来被视作“国家主人”的骄傲，为国家、集体作的贡献，在政治运动中付出的热情，为哺养子女吃的千辛万苦(他们一般都是多子女)，他们节衣缩食存款借债在棚户区搭的棚、造的屋……所有这些，在工人重又跌入下层，贫穷被视作为耻的今天，还能有多少意义?他们凭什么、又怎么能去细细地回味、热情地叙述?

人们的记忆和记忆叙述，是主观过滤的结果，也是个人与时代、与社会对话的产物。在这里，“他们的叙述”作为这个社区中这个群体的生活史记忆和生活现状描述，较之于他们对生活事实的复原程度，其客观性、真实性更存在于他们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的关系之中。

他们身处的现实情景

在叙述中，棚户区的老人们常常提到他们今天享受到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他们有知足的一面，对政府和共产党怀有一定的感恩之心。但是，听他们回忆过去的生活，我们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那一个“苦”字——在农村没法活下去的苦，来上海做苦工的苦，

工厂里三班倒的苦，车间里潮湿闷热的苦，家里住破阁楼的苦，孩子下乡插队的苦……“那时候苦啊”，“苦透苦透！”

与记忆中的辛酸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们目前的困厄现状。

(1) 中年一代的下岗，是棚户区绝大部分家庭遭遇的生活困境。这里的老一代居民基本上都是原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工人。而他们的子女，无论是直接分配工作的还是下乡后回城的，职业的继承率极高（不少人是通过顶替父母进入工厂的）。在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企业转轨的过程中，他们首当其冲，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如今，下岗的中年人或者自寻出路找活干，或者就干脆吃低保、吃父母的退休金。这种状况是许多棚户区居民感到生活无望的最直接的原因。

(2) 外来人员的大量进入构成了棚户区居民现实烦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棚户区中一些有能力在外面购房的居民走了。他们的搬迁给留在那里的居民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分化中感到的失落（“我们买不起房，走不掉啊”），还有新的外来者的进入（搬走的居民往往将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如今，上海的棚户区里，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的比率普遍在一比一左右。新的外来者给老住户们造成了很大的不适，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秩序、自己的社区环境被打乱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3) 对房屋动迁的担忧，是棚户区居民对生活感到不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90年代以来的城市更新运动，早已经触及到了棚户区，这两个调查点的居民们也经历了由盼动迁到担心动迁的过程。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接受经济补偿，他们能得到的钱是无法买得起他们需要的住房的。而如果接受现房安置，他们就必须离开城区到郊外去生活，那样的话，对中年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

是无法找到工作。对老年人来说,则意味着会遇到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是他们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的最起码的条件。

面对这一切,受访者们普遍流露出了他们的苦楚与困惑:他们依然有着较明显的与国家一体化的倾向,但是他们感到了不信和不安——我们一直是相信国家的啊,国家不会不管我们的吧,可是现在这个样子,叫我们怎么办?!

需要讨论的问题

近几年来,关于社会贫困层的问题,社会学界和其他文化知识界都曾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和讨论。可以看到,在社会学界的“社会分层状况”研究和“贫困问题”研究中,问题的指向主要在于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机制,学者们关注的是社会分层制度中的公平原则、社会流动渠道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等。而在文化知识界的“底层”问题讨论中,问题的触角更多地涉及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以及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的关系。笔者注意到,除了源于价值维度和学科背景的种种不同外,导致大家关注点不同、话题分叉的,还有对概念的理解和使用的差异。

关于“下层”和“底层”,虽然,不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脉络里自有不同的意义,在不同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所指,似乎不必统一或细细甄别^①。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就概念所指的对象及其含意作一定的说明。如果说,这两个概念都是指的具体社会中的某个阶级或阶层,那么,我们需要对这个社会的社会分层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有相应的了解,据此我们才可能确认这个社

^① 学者们虽然也介绍了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但各种翻译文本中显然并没有形成较严格的概念对应和区分,如英文的 subclass 在不同的文本中被译为“底层”和“下层”的都有。

会的“下层”或“底层”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们的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问题。

所谓社会分层制度，在社会学中通常被区分为奴隶制度、种姓制度、身份制度、阶级制度等几类。这其中，阶级制度与其他各种制度的最大区别，是社会成员自由改变个人社会地位的制度上的可能，即人们不会因为种族、民族、种姓、宗教、家族身份等各种先天的因素而在制度上受到社会流动（水平的横向流动和纵向的社会地位流动）的限制。在非阶级制度的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尤其是底层与非底层之间，个体的自由流动会受到种种制度的限制，而且不同阶层在社会领域（包括职业、交往、婚姻等）和社会文化（包括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有各种制度屏障来实施隔离。而在阶级制度的社会中，人们具有在阶级/阶层之间自由流动的可能，上层的人可能降入下层，下层的人也可能步入上层。而且不同的阶级/阶层会有文化（包括宗教）的共享，在各种社会流动渠道中（包括职业、教育、军队、婚姻、政治团体等各种途径），也不存在身份歧视的制度。当然，即使在阶级制度的社会，社会分层制度的实际情形也会因不同的阶级文化传统以及社会流动渠道的实际开放程度等而不同。

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分层制度下，“下层”、“底层”概念会有不同的意义。我们不能拿一般的“社会下层”概念去说明印度的底层社会（尽管印度已经在法律上取消了种姓制），我们也无法拿“底层”概念去涵盖日本社会中普通的低收入群体^①。同样，今天中国社会中两极分化的社会分层状况，以及庞大的贫困层的存在，

^① 在日本另有一个被视作为贱民的“部落民”群体存在，还存在一个被称为“在日”的、受到种种制度性歧视的韩国/朝鲜人群体。

既不同于美国的阶级/阶层差异,也不同于印度的贫困问题。不仅如此,即使在中国,我们今天的情况也与1949年前的情况,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情况有着性质的不同。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不同社会/时代的、不同分层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中的“下层”或“底层”,视为普遍的意义相同的存在与问题来看待和分析,那在有些层面上,很可能会遗漏或模糊了真正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较之一般的、相对中性的“下层”概念,我们对“底层”概念的使用应该有更明确的意义界定和问题指向,譬如,由社会分层制度而被隔离的、被规定的“无望的下层”、“作为贱民的下层”。据此,当我们今天关注中国的“下层”、“底层”问题时,我们的讨论或许需要从中国的“社会下层如何被底层化”的问题开始。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制度性身份歧视、社会关闭(上升流动渠道被堵)的问题。当然,我们还需要追究制度及其理念被空置的问题,这涉及到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社会公平原则和社会保障制度空洞化的问题,以及贫困层陷于无业、无望,生活秩序遭破坏,城市贫民区被边缘化、再度贫民窟化,社会支持/社会管理系统弱化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

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许多,例如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记忆”的问题。在国家主义尚没有得到清理的今天,笔者不希望本书的意义被误读、曲解。我们可以相信中国曾经有过底层的政治翻身和阶层间的相对平等,但那是以另一些阶层沦为政治贱民为前提的,同时社会也没能避免另一种特权等级系统的产生。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的城市里(包括贫民区)曾有过安宁和谐的生活秩序,但我们应该知道,那是政府强制推行身份制的结果,那代价是数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公民的社会流动自由(包括迁徙的自由和改变社

会身份、社会地位的自由)的被剥夺、被限制。

本书中的叙述者——棚户区的老居民群体，很快就将消逝于城市的历史中了，连同他们的社区一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搬到城市的各种老公房或外城区的新建安置房中。他们终于要告别棚户区，告别过去的生活了。但他们的生活还将继续，他们的困厄依然是城市的问题，我们社会的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批下层新移民正从全国各地的农村进入城市，他们不能自搭棚户——今天在城市不会有无主地或荒地供外来人栖身了。无钱购房的外来务工者们除了在工地、工厂宿舍或菜市场里搭铺寄宿外，大多租住在棚户区或城乡结合部的廉价住房里。那些地方正在成为新的城市贫民区。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生活，已经是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我们的这项调查并没有将他们纳入其中，但我希望，我们的这一个“他们的叙述”的文本，能有助于大家对另一个“他们”的群体及其生活的了解。

上海市棚户区的历史和现状

江建军 赵晔琴

一、历史

1. 形成

上海棚户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黄浦江两岸陆续建造了许多码头,与此同时,在各码头附近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棚户区,居民大多是附近码头上扛大包的工人。此后近一个世纪,由于战争和上海诱人的机会,许多来自苏北、安徽、山东等地农村的难民纷纷从水陆进入上海,在沿江地带搭起简易房屋或直接住在船上,这一时期是上海棚户区出现的主要时期。最初出现在黄浦江畔及吴淞江(今苏州河)两岸,继而向工厂周围空隙地及铁路两旁蔓延,最后遍布全市。“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日军烧毁了闸北、虹口、南市等区的大量民房,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涌入棚户区。抗战胜利后,由于内战,战区农村的大量破产农民进入上海,棚户区进一步膨胀,抗战前后是棚户区形成的高峰期。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全市200户以上的棚户区共有322处,其中2000户以上的4处,1000户以上的39处,500

户以上的 36 处,300 户以上的 150 处,200 户以上的 93 处。棚户
区占地面积 1 109 万平方米,棚户简屋 197 500 间,建筑面积 322.8
万平方米,住着 115 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旱船”、“草棚”、“水
上阁楼”,星罗棋布地分散在上海的各个角落。

2. 棚户的主要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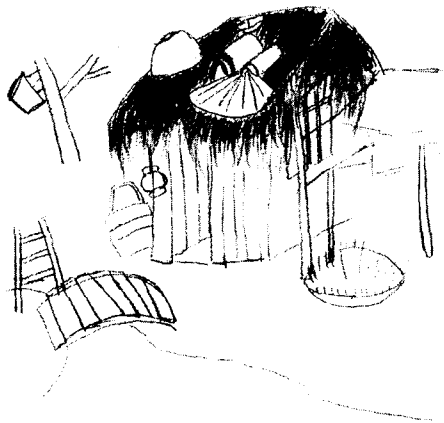
解放前,上海的棚户区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滚地龙、草棚、
水上阁楼和简屋等四种。

1) “滚地龙”棚户

“滚地龙”棚户,是用几根毛竹烘烤成弓形,插入地下固定为棚
架,盖上芦席,搭起“人”字型或半圆型的窝棚。半圆型的“滚地龙”,
高度仅及成年男子的胸部,人要深弯腰方能进出,棚屋没有窗,挂块
草帘当门,棚内面积又小又低,只好铺些稻草或破棉絮席地而卧。
还有一种“人”字型的“滚地龙”,它是用两片篾披搭成棚顶,上铺茅
草,门框成“人”字型。比前面半圆型窝棚略高一些,棚内面积差不
多。“滚地龙”的草顶、席顶经不起日晒雨淋和风吹霜打,居民一次

次修补,覆盖诸如稻草、麻
袋、破布、铁皮等五花八门
的材料。

“滚地龙”式的棚屋,
全市各个棚户区都有,以
闸北区蕃瓜弄最多。蕃瓜
弄,位于新民路(今天目中
路)749 弄,坐落在天目中
路北侧,大统路西侧,东邻
共和新路,北靠铁路的三
角形基地上,占地面积



滚地龙

61 146平方米。

2) 草棚

草棚建筑结构简陋,棚内阴暗、潮湿,布局杂乱无章。上海有草棚 30 万平方米,占全市棚户总数的 9.23%。地处吴淞江(今苏州河)的药水弄就是其中一个。药水弄,位于小沙渡路(今西康路)1371、1501 弄。坐落在西康路西侧,南接赫德路(今常德路)和上棉一厂,西北临吴淞江(今苏州河)沿岸的三角形地块上,占地面积 7.67 万平方米。药水弄棚户区的草棚为竹木泥草混合搭建的“介”字式棚屋。它是用几根毛竹或木料做承重柱,上盖茅草,立面泥巴墙,用草帘或破布当门,在泥巴墙上开个洞做窗,有的连个洞窗也没有(据有关部门 1951 年调查统计,在药水弄的 4 191 间棚户中,无洞窗的有 1 020 间,占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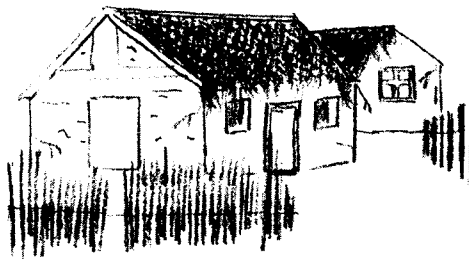


草棚

3) “水上阁楼”

“水上阁楼”是棚户中的一种特殊结构形式的房子,大都分布和建造在沿河浜两岸,其中最典型的要算徐汇区的肇嘉浜水上棚户区。肇嘉浜水上棚屋,有的是架设在浜岸的“水上阁楼”。它是一种“尸”字型的水上棚舍,一半架设在河岸边挖成的土窖上,另一

半则凌空悬架在浜面上，用几根毛竹或木头插入浜底作支撑柱，用旧木板拼成壁墙或用竹笆抹上泥土形成泥笆墙，多数盖稻草顶，在支架上铺上旧木板，成为“水上阁楼”。还有一种“水旁地室”。即在浜岸浅水斜坡上挖个地洞，在朝浜水的一边用泥土叠高作“堤坝”，留出入口，形成“L”型地洞，在洞上面盖上芦席茅草顶，就成为棚舍，这种“水旁地室”更低矮，人只能爬进爬出。再有一种“旱船”，它是贫苦农民从家乡摇到上海来的小木船，开始住在船上，后来由于船破不能住人，便将船拖上河岸，加盖芦席成为“旱船”，以此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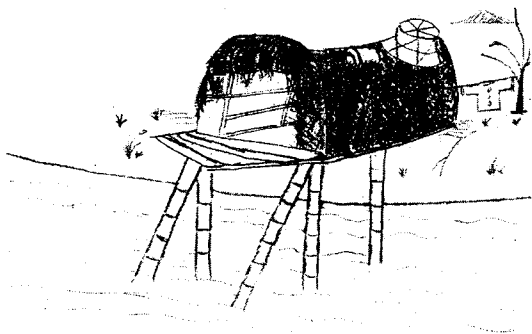
简屋

4) 简屋

上海的简屋大都分布在棚户区内和零星散落在市区边缘地带，其建筑结构较棚户稍好，大体分为三种：简楼房、矮楼房和平房，一般均采用立柱单墙和木屋架或竹木混合结构，其总体布局杂乱无章，排列密集；人行通道，狭窄弯曲，无下水阴沟，时常积水，污秽四溢，道路泥泞不堪。这类简屋中较典型的有普陀区的东新村。东新村位于吴淞江（今苏州河）畔，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

3. 分布

旧上海的棚户主要散落在闸北、普陀、长宁、徐汇、常熟、卢湾、



水上阁楼

嵩山、蓬莱、邑庙、提篮桥、榆林、杨树浦和浦东等地区,形成了对市区密密麻麻的包围圈。其中规模较大的棚户区有:沪东杨树浦区境内杨树浦路、麦特拉司路(今平凉路)一带的引翔港、小木桥、陈家头、茭白园、姚家桥、方子桥、定海桥、中联村、明园村、吴家浜等棚户区;浦东沿江码头的十八间、烂泥渡、洋泾港、老白渡、苏鲁村、白莲泾一带的棚户区;沪西普陀区境内的潭子湾、潘家湾、朱家湾、药水弄的棚户区,以及苏州河北岸东新村的棚户区;常熟区(今静安区)境内的南村、北村棚户区;徐汇区境内的肇嘉浜水上棚户区;南市境内西凌家宅、董家渡以南的棚户区;沪北闸北区境内的蕃瓜弄及中兴路、止园路、新民路、广肇路、大统路一带的棚户区解放前,上海较大的棚户区有:普陀区的药水弄,闸北区的蕃瓜弄和苏家港,沪东的杨树浦路、平凉路棚户区,苏州河北岸的东新村,常熟区(今静安区)外的北村,以及最大的水上棚户区肇家浜等。(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市政交通, 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7页)

4. 居民构成

职业构成：居住的分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分层，经济地位决定了居住条件。居住在棚户区的居民，大多数从事的职业层次比较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移民，原来家庭条件就很差，缺乏社会关系，受教育程度很低，这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大多以技术含量很低的简单体力劳动为主，或是大众化的服务性行业，如人力车、餐饮、理发、沐浴和环卫等等。

籍贯：棚户区居民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的难民，一类是来自外地的移民。从总体看，外来移民占了大多数，在外来移民中，大多来自苏北地区，其次是来自安徽、山东等地农村的难民。

二、棚户区的改造

解放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海政府曾对局部地区尤其是劳动人民聚居地区进行了一些规划改造，其重点之一就是棚户简屋的改造^①。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针对棚户的“居住改善”和“自建公助”方式；60 年代以“蕃瓜弄”为典型的对棚户简屋的成组改造方式；70 年代以漕溪北路沿线等为代表的规划成组改造；80 年代的“相对集中、成片改造”与“旧房利用、内部改造”以及 90 年代“365 危棚简”政策^②的出台，进一步加快了棚户区改造的力

^① 参见《上海建设(1949—1985)》，上海科技文献技术出版社，1989 年版。

^② 经资料汇总，到 1990 年底，市区还有 1500 多万平方米二级旧式里弄以下旧住房，其中成片危、简房 365 万平方米以及 30 余户人均居住面积 4 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365 危棚简”的概念由此而来。1992 年底，市政府确立了 20 世纪末上海的居住目标，其中之一就是“365 万平方米成片危棚简屋”的改造。（参见徐明前著：《城市的文脉——上海中心城旧住区发展方式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度和速度。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旧城改造进程后,如今大规模的棚户区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在高楼大厦背后,仍然还零星隐藏着小规模棚户区。上海棚户区的分布在解放前就已经基本定型,目前剩余棚户区的分布与原来棚户区的分布趋势大体一致,主要分布在老城区的边缘,苏州河、黄浦江两岸和铁路线沿线地带。尽管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完成了许多棚户区的改造任务,但是,在改造原有棚户区的同时,新的棚户区又不断涌现,到1979年,市区及市郊周边主要棚简屋还有450.4万平方米,超过了解放初期市区棚户简屋的面积,它们分布在市区的各个角落,就是在被市民称作“上只角”的地段,也出现了一些棚户,如徐汇区的兴国路、武康路一带,是上海花园住宅和公寓比较集中的地段,但在那里同样有一大片近万平方米的棚户简屋,直到近年才被完全拆除。(熊月之主编,承载著:《上海通史》第十三卷《当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75页)

据1949年的统计,市区住宅总面积为2359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为3.9平方米,其中棚户简屋占了14%。10年之后,这一比例下降为13.8%,再过10年,下降到11.8%,直到80年代以后,棚户简屋的面积才以较快的速度减少。

解放初期到1957年,棚户简屋的数量起初基本维持在解放时的水平,1954年后以每年不到100万平方米的速度在增加,但在每年新建住宅面积的总量中所占比例略有下降。1958年到1964年这一时期,棚户简屋的比例急剧上升,虽然以后得到控制,但其平均数还是高于解放初。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间,棚户简屋的增长率与新建住宅面积的增长率基本持平。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棚户简屋的总面积始终在400余万平方米上下浮动。80年代以后,上海棚户简屋的数量才真正开始出现迅速减少的趋势。

(熊月之主编, 承载著:《上海通史》第十三卷《当代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第 277 页) 整个 80 年代, 棚户简屋减少了一半以上, 90 年代以来, 每年都在减少, 到 2001 年, 上海市棚户简屋的数量为 59 万平方米。

主要年份各类房屋构成情况 (单位: 万平方米)

指 标	1978	1980	1990	1995	2000	2001
居住房屋	4 117	4 403	8 901	11 906	20 865	23 475
花园住宅	128	134	158	179	250	443
公 寓	90	92	118	111	206	412
职工住宅	1 140	1 402	4 884	7 998	17 939	20 316
新式里弄	433	434	474	454	428	420
旧式里弄	1 777	1 822	3 067	3 004	1 896	1 763
简 屋	464	437	123	85	84	59
其 他	85	82	77	75	62	62

(资料来源: 上海市统计局:《2002 年上海市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年)

三、现 状

经过大规模的旧城改造, 大规模的棚户区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 但是, 在高楼大厦背后, 往往隐藏着小规模棚户区。上海棚户区的分布在解放前就已经基本定型, 目前剩余棚户区的分布与

原来棚户区的分布趋势大致一致,主要分布在老城区的周边,苏州河、黄浦江两岸和铁路沿线地带。分区看,2001年上海棚户区绝对面积最大的是浦东新区,还有19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未完成改造,主要分布在黄浦江沿岸地带。杨浦区其次,还有11万平方米的棚户区。闸北区还有8万平方米的棚户区,主要分布在轻轨明珠线沿线、交通路附近和老北站周边地区。黄浦区的棚户区主要分布在原来属南市区管辖的近黄浦江的老市区。

2001年各区各类住房分布情况(单位:万平方米)

地区	居住房屋	花园住宅	公寓	一类职工住宅	二类职工住宅	三类职工住宅	新式里弄	旧式里弄		简屋	其他
								一等	二等		
总计	23 475	443	412	4 715	14 824	777	420	636	1 127	59	62
黄浦区	750	1	3	244	138	12	34	149	129	4	37
卢湾区	604	15	30	206	151	8	78	98	15	1	3
徐汇区	2 557	69	81	796	1 419	12	86	22	69		
长宁区	1 366	43	11	375	813	11	23	2	83	2	2
静安区	642	22	36	255	123	4	110	52	35		5
普陀区	2 026	3	20	477	1 390	35	5	6	82	3	6
闸北区	1 111	1		223	628	40	1	70	138	8	1
虹口区	1 430	9	16	404	706	15	70	127	71	5	7
杨浦区	2 218	3	1	446	1 522	45	8	52	129	11	1
浦东新区	4 203	40	6	974	2 997	85	2	44	36	19	

续 表

地 区	居住 房屋	花园 住宅	公寓	一类 职工 住宅	二类 职工 住宅	三类 职工 住宅	新式 里弄	旧式里弄		简屋	其他
								一等	二等		
闵行区	2 301	69	207	159	1 499	263			102	3	
宝山区	2 038	3	1	102	1 872	13		4	42		
嘉定区	821	18		17	608	100	2	4	72	1	
金山区	526			32	363	82	1	2	45	1	
松江区	505	122		3	320	19			41	1	
青浦区	377	25		2	275	33		4	38		

(本文插图制作：章雯)

家庭生活史口述实录

(一) 元和弄

元和弄总体概貌

一、元和弄的由来和地理位置

元和弄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境内,南临苏州河,西南面与某大学为邻,东面原为上海较大的棉纺织厂,现已建成新式住宅小区。元和弄的历史始于解放前。20世纪初,元和弄附近流域两岸兴建工厂,其北岸逐渐形成市集,居民渐增。20年代末建造了元和桥,稍后又在境内辟筑几条大路。由此,元和桥北面一带,工商业逐渐兴盛,大批劳动人民聚居,居民住宅为砖木结构简屋和棚户。

元和弄原为荒地,上个世纪40年代仅有少数人居住,当时周围主要是菜地,房子也均为草房。那时大量的江浙农民由于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大量涌入上海谋生,他们用毛竹、藤条等在苏州河沿岸搭起了简易的棚户。元和弄的形成是持续移民的结果,其发展模式呈树型结构。最先到的一批人充当种子,在本地安家后,从

各自家乡带来新的移民，绝大多数为同乡、亲戚。新来的这些人安定下来后，同样充当种子作用，从家乡带来更多的同乡、亲戚，以这种模式繁衍发展，加上已来居民的繁衍，元和弄很快地发展聚合起来。至一定规模后，形成动态平衡。

目前，元和弄主要由C村（居委会所在地）、S坊和F村三个部分组成。其住户主要是解放前的江浙移民及其后代，同时还有数千租房而居的外来者。C村占地约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住房多为平房简屋，其居民籍贯以江苏省为主。C村的户数、人口占到整个棚户区的三分之二，同时C村也是社区市场和行政力量的所在地。F村原为荒地，1945年后由江苏省南通、海门等县农民逃难来此居住，取名通海新村。随着居民人数的增多，1952年更名为F村。S坊是建国初因一批浙江绍兴籍人在此定居而得名。占地约453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380平方米^①。

二、元和弄本地居民的状况

据元和弄居委会2003年统计，元和弄共有本地住户1622户，总人数4689人，其中男2283人，女2406人，60岁以上为794人，45—60岁之间的占60%—70%^②。失业人数657人，其中协保247人^③。2001—2003年期间，共搬出去382户（人户分离^④），至2003年，实际居住为1261户^⑤。在这些本地居民中，退休工人

① 元和弄居委会提供。

② 2003年9月16日于B派出所取得的最新数据，源于2003年4月“非典”时期的普查。

③ 2003年1月20日最新统计。

④ 近年来，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及元和弄拆迁问题的一度升温，越来越多的本地居民在外购房搬离元和弄，把老房子出租给外来者，造成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的分离，给居委会的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

⑤ 2003年8月统计。

1021人,老年人数852人,独居老人4人,退休孤老3人,离休干部11人,退休党员人数145人,残疾人68人,两劳释放人员31人。全居委会分成48个小组,拆迁搬出2个小组^①。元和弄的本地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初中文化占绝大多数,其次是高中、中专文化。

元和弄本地居民的籍贯分布以苏北最多,其次为苏南、浙江和上海本地人,此外还有部分来自山东、安徽等地。元和弄虽然有姓氏杂处的现象,但是仍可以比较分明地依原籍地划分聚落。例如,C村主要是以江南移民为主,S坊是浙江绍兴籍移民,F村则以苏北移民居多。解放后元和弄居民的籍贯构成情况就和今天差不多。江浙移民不仅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而且把相当多的同乡、亲戚也带来了。元和弄的第一代移民首先是围绕家族组织起来的,其次是按照同乡的系统扩散。这些人在元和弄以血缘、地缘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生活圈子,血缘和地缘成了元和弄形成的一个基础。以至于虽然处于上海内城区,采用的是街道一居委会的城市管理体系,但是元和弄却依旧保留着某些传统的“乡土本色”。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的眼里周围的人都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时至今日,人们还可以按照居民们的祖籍地划分出元和弄的居住分区。不过这些区域的界限随着年轻一代元和弄人的成长正在慢慢消失。

三、元和弄的历史演变

元和弄形成之初地处郊区,少数人在此修建草房并定居,同时开辟出一些菜地。居民中男子大多在码头干苦力活或者是拉黄包

^① 元和弄居委会提供。

车，女性大多在附近的纺织厂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元和弄居民逐渐增多，但是整个社区只有一两个水龙头，居民用水必须排队购买，有的甚至饮用苏州河水，除了饮用以外的日常用水，则完全来自苏州河水。1949年以后，防疫龙头改为零售给水站，以普通水价折半收费，并实施自来水集体用户装表办法。1953年元和弄开设了免费供水点，直到80年代初（一说1982年），给水站被每户独用的自来水龙头代替，自来水公司还上门为居民装表入户，原给水站逐步淘汰。解放前，居民用电并未普及，因此，元和弄居民只好用蜡烛和煤油灯照明。解放后不久，政府指令供电单位在棚户区树电杆，设架空线，安装电灯。到1954年，诸如元和弄等棚户区居民都开始用电灯照明了。

元和弄内部排水不畅，雨天常常污水横流，许多地势比较低的房子，一旦碰到大雨，必须在家里进行人工排水。有的道路比室内地面要高了许多，因此，许多居民在家门口筑坝拦水。1952年，元和弄所在辖区建成排水管道，使社区积水问题得到部分解决。解放前，沿元和弄附近流域及其支流的道路、田岸没有防汛设施，仅沿江的部分工厂在江边筑有围墙，以阻挡高潮。因此，每次遭到台风、暴雨袭击，都会给元和弄造成严重的损失。1950至1956年，元和弄的防汛设施主要以土为主，分散围建，采取“围起来、打出去”的方针，将元和弄围起来，遇到潮水倒灌和暴雨时，由各工厂为主，将潮水或雨水抽出去，以保障汛期工厂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安全。1956至1962年，按统一规划建造了防汛墙，之后又对防汛墙进行了多次加固和改造。

据元和弄的老人介绍，元和弄的住房以本地居民的自建房（私房）为主，最初都是逃难到上海来的难民搭建的草棚，后来渐渐形成了成片的私房，大部分是解放前三四十年代建成的，50年代政

府开始以“居住改善”和“自建公助”方式对棚户进行改造,因此,在元和弄也建造了一部分公房以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70年代中期以后,大部分私房进行了翻修并使用至今。从总体上来看,因为是自建房的缘故,整个社区的居住格局显得高低错落。

元和弄内部道路狭窄,坑坑洼洼,机动车难以通行,交通不便,土地的利用率极高,凡是有空的地方都搭上了简易房屋,房屋之间的间距十分小,“一线天”、“贴面楼”随处可见。元和弄的街道形同“地道”,整个社区除了两条所谓的主干道超过3米外,其余的只有1.5米左右,最窄的走道1米也不到,两人迎面走来必须侧身才能通过。由于路窄,所以采光很不理想,大部分住宅白天屋里也要靠电灯照明,很多房子人一伸手就可以触到天花板。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社区的人气和商业气氛却很旺,紧挨着街道的一边,排满了各式各样的小饭店、杂货店、五金店、理发店、牙医诊所、皮鞋店等等,而且每天早晚时分,社区主干道的中间地段也摆置着约20米长的数十个菜摊,这些都充任了社区的日常服务中心。在社区居住的人除了上千本地居民之外,还有几千租房而居的外来打工者,有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有卖菜的、有开店做生意的、有卖羊肉串的、有什么也不干专门走黑道的,也有外地来上海读书的大学生。

元和弄是上海棚户区的一个缩影,在今天,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大片的棚户区正在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元和弄却依旧保持着昔日的风貌,以其厚重的历史枷锁向世人述说着其半个多世纪的辛酸与血泪。

调查、整理、撰写 江建军 赵晔琴

土生土长的纺织工人

姓名：吴阿福

性别：男

年龄：83岁

籍贯：江苏盐城

文化程度：小学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结构：本人、小儿子一家四口

居住时长：50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吴阿福家中，2003年11月21日，11月26日上午

进入这家2层楼的老房子(每层楼里一间外一间)，听到的是蔡琴的歌声，看到了嘴里含着烟的老人。我们在一楼外面的一间屋子里，一人坐在靠墙的位子上，他又给另一人拖来了一把藤椅。这间房间既是厨房，又是客厅。

问：请问你老家是上海的吗？

吴：我姓吴，叫吴阿福。1920年生，今年已经83岁了。我是上海的。我老家在苏北，苏北盐城。我的父亲啊，后来户口迁到上海来了。他当初来上海，是因为那边(苏北)干旱、水灾，民国10年干旱，民国20年大水，一家人就都到上海来了。我祖父

三十几岁到上海,我父亲 15 岁来的。后来就扎根在上海,我也就生在上海了。小的时候我住在闸北。“八一三”战争了,逃难嘛,就住到康定路万村斋(音)。53 年、54 年的时候才搬到这里来的。跟我父亲他们家里有矛盾嘛,就分出来了。总归是经济问题喽,还能有什么东西啊。

问:您在上海做过些什么工作?

吴:19 岁的时候在五和针织厂,就在康定路万村斋,静安区,是叔叔介绍的。后来日本人冲租界,这个厂就关门了。日本人本来不能冲租界的。那时珍珠港战争啊,日本人就冲租界,厂就关掉了。后来,二十几岁,做过的工作多了。亲戚介绍,先去办公大楼开电梯,一直开到解放。解放以后,国家把我分到现在的杨浦棉纺织印染厂。每天我乘电车上上班,以前南京路上不是有有轨电车吗?坐电车(上班)的,也就是电视上看到的那种老式电车。当时在厂里供销科工作的。早上 8 点钟上班,晚上 5 点钟下班。(笑)解放前工作很苦的,晚上要加班到 9 点钟。66 年,服从国家需要,支内,我到江西去了。江西一个县的银山(铅锌)矿,66 年上海不是有三线基地嘛?有一个是江西新余。我当时在那边做机械材料,在机械厂做管理工作。一直做到 81 年退休,在江西呆了 20 年。86 年回来的,到现在在家里。在江西的时候碰到自然灾害,那时没东西吃啊,不过还是得过啊。倒是“文革”的时候,我家庭背景好,没有遭殃。

问:您是怎么认识您老伴的,她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吴:我老伴和我是在一个厂工作的,都在五和针织厂。我叔叔做的媒人。找工作是靠我叔叔,做媒人也是我叔叔。日本人后来不是冲租界嘛,她也就到处做。在国棉一厂也做过的。后

来又回到五和针织厂做了。解放后一直在这家厂做，一直做到退休。我们19岁结婚的，生第一个小孩时23岁。不过她现在已经去世了，99年6月29日。（神情中有些忧伤）她本来有糖尿病，后来又摔了一跤，骨头都摔碎了，在床上睡了4年。我们是同乡，她也是盐城人。她父母也是乡下遭灾到上海来的。有房子就留在上海，没房子就回去。乡下来打工的都是这样子嘛。赚够了钱呢就可以在上海落脚了。我和老伴都没有好好读过书。我以前读过，但从小脑子不行，还留过级，小学没读完就不读了。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读书，干脆不读了。我们那时小学读书不要钱的，是邮政局办的学校，不要学费。不过我脑子好笨啊！老伴她也不识字，脑子也不行的，读不下去的。我们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扫盲班。

问：您的子女现今生活状况如何？

吴：我有七个子女，两个儿子，五朵花（五个女儿）。哈哈。现在都成家了，小孩都有了。我几个子女统统读过书的，但也不多。大女儿初中毕业，分到无线电厂，后来这个厂关闭了，就跑到亚明灯泡厂，今年60岁了，已经退休了。二女儿小学毕业，半工半读，以前在绢纺厂工作，也退休了。老三是儿子，大儿子，小学毕业，也是读到初一就不读了。在上海橡胶厂，现在退休了，厂也关闭了。老四就是小儿子，在东方书报亭工作，他初中毕业到江西去插队，后来被弄残疾了，一只脚瘸了。在江西没工作，生病了没能看好，到上海来只能在报亭卖报。下面一个是女儿了，三女儿插队落户在安徽合肥，也退休了。她没有回来，不过她的女儿回来了。她是知青嘛，家人可以有一个回上海，她女儿就回上海。具体她什么时候回的海，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不在上海，当时我有回来探亲，但十几天以后又

回江西去了。这个情况，老太婆在世她知道，现在她不在了。三女儿的女儿是在做服装设计的一所大学读书，光新路上。搞美术啊、画画啊，搞服装的。现在她大学毕业，出来找了工作。老六也是女儿，初中毕业分到冶金局。老七过去在纺织厂工作，当时要插队落户她没去，就留在家里。在上海做裁缝，给人家做衣服。后来找了一个对象有工作的，就跟着对象走了。以前一家子都住在一起的，后来子女都陆续搬出去了，大儿子也搬出去了，单位分的房子。有房子分干嘛不要呢？厂里让他出去的，后来厂都关闭了。我现在和小儿子住在一起。

问：和小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相处得还好吗？

吴：我不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他们早出晚归，我自己吃，他们也自己烧。只有过年在一起吃饭。双休日也不在一起吃饭。我跟他们分开住，他们住上面。有时他们也会烧点菜给我。我现在的退休金 600 块钱不到，江西那边工资不高的，没上海这里高。但平时我也不向小儿子要钱的，他给我，我也就收下。他们有子女的，也有负担的。他们一家也一般性，儿媳妇在商务印书馆，属于第三产业。孙女现在读初中二年级，读书蛮好的，小姑娘蛮聪明的。子女读书，花费也大啊。他们早出晚归，媳妇一般 5 点钟左右回来，儿子要到 8 点钟左右才能回来，他在报亭嘛，自然回来得晚。孙女回来得早，5 点不到一般就能回来。就在这里的中学读书。有时我也给孙女一些零花钱，给个一块两块。孙子不给的，他都 20 多岁了，可以给我钱了（笑，随即从衣袋中掏出一支香烟，用操作台上的火柴点了火，抽了起来）。我其他的几个孩子条件好，就这个（卖报）儿子条件差，小孙女还穿几个姐姐穿过的衣服。出去的条件

都好，有时候也会买些礼物给我。她们出去的几个也会帮一点小儿子，年末总归买点东西给他。大女儿的女儿到日本去了，嫁给日本人，生了两个小“鬼子”，一男一女。有一次日本地震，他们就回来了。我第四个女儿的女儿也到日本去了，现在在东京。她们去日本赚钱，上海赚不到钱啊。初中毕业就出去了。没有去多久，就两三年。飞机票就要 2 000 块。

问：那么其他搬出去的子女经常回来看你吗？

吴：老太婆在世时经常来，现在老太婆没了，他们就不太来了，我不会烧给他们吃的。过节的时候也会来来，平时也有打打电话。哎，平时寂寞也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天的。我现在做纸钱，冬至快到了，可以派上用场。（一只猫从里屋进来）我们家既养猫又养狗，狗被我儿子带出去溜了，猫我留在家里，好陪陪我。猫住在底下陪着我，狗住在二楼，他们（儿、媳）管，一般见不到面，有时见面就会吵。

问：您一个人生活，那您的日常的生活开支情况怎样？

吴：一个月五六百，吃饭要二三百块钱吧。日子现在还很好过，江西那里苦啊。我退休工资拿的还是江西的，比上海少拿 200 块钱呢。房子大我们也不出租，不方便，大家都不方便。平时，我吃的方面嘛，素的荤的，鸡、鱼、肉、蔬菜都吃。每天早上喝牛奶，晚上看电视时吃点心。水果不吃的，只吃饭。我抽烟，前门牌香烟。每个月我要抽 6 条香烟，每天要吃两包，一个月要 100 来块钱。多下的钱就买些生活用品。用的液化气我自己换的，（换液化气罐的地方）离这里只有 5 分钟路。小儿子太忙了，没时间换。现在用的微波炉是九几年女儿送的。冰箱是大儿子买的，去年底买的，原来的冰箱坏了。孩子们很孝敬，补品啊都是他们送的，我从来不用买的。不过我现在是

没有医保的。那边的矿山关掉了，医保讨厌了，要回原单位报销，可矿山都已经关掉了。小毛病不去看的，自己在外买点药。大病嘛，96年胃病(穿孔)开刀去区中心医院的，花了4000多块，当时在单位报销的。现在怎么办？基本上不看，自己去药房买点药。

问：您住的这房子以前修过吗？

吴：(这房子是)是自己造的，84年退休回来造的，私房。本来只有里面一间的。这间屋子(厨房兼会客室)原来是天井。夏天还好，冬天很冷，这外面一间没有太阳的。现在住在这里的外地人很多，他们都在这里租房子的，隔壁就租给外地人的。不过这里倒不大有小偷，白天我这房门都一直开着的。那么多年，在这里我也住得习惯了，搬出去还不习惯呢。不过他们(子女)都搬出去了，房子都有卫生间的。

问：跟这里的街坊邻居关系怎么样？平时有没有一起打打麻将之类的？

吴：都认识的。不过不打麻将，我不喜欢打麻将的。我跟他们基本没有走动，我这一代的人都已经死光了，我和他们小辈也没有什么好走动的。附近也没有朋友，以前的同事现在都住得很远，浦东啦，杨浦啦。平时在家里听听歌，抽抽香烟。我只听老歌。外面五块、十块一张的CD，碰到好的就在VCD机上放，只听不唱的。下午去外面转转。晚上在家看看电视。(笑)电视新闻、电视连续剧、中央6套、8套、20频道、安徽台。南朝鲜的片子我是看了还要看。美国、意大利的片子也要看。爱情片很好看。一般看到12点钟才睡觉。年纪大睡觉睡得少。这里的居委会也很照顾我的，他们补贴我每月50元。一个季度拿一次，150元。80岁以上的还要(拿)多一点。半年

再补贴 150。上海退休的都要拿七八百呢。不过居委会的活动我不参加的，居委会没有实质内容的。

问：房子假使拆了，你有什么打算？

吴：有钱自己走，没有钱能往哪搬？没有钱只能跟小儿子走了，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也或许跟我三女儿，安徽那个女儿。这要看情况了。拆迁要是给钱，也不清楚能给多少，这里拆迁是卖破烂的，买新房子是用金子去买的。现在这里有钱的都搬掉了，没钱的都留在这里。如果迁的地方不满意就再想办法。居委会前面黑板上贴出来了，明年上半年就要拆迁。孩子（小儿子）没有条件，肯定要房子的。也不能太远了，得先解决工作，毕竟他腿不方便，现在书报亭就不一定能做了。郊区只要条件好，方便就可以了，但还是希望离这里越近越好。拆迁费和房价要平衡啊。

问：您和苏北的老乡还有联系吗？

吴：他们不来的。我父母到乡下安葬时去了苏北一趟，后来就一直不来往了。我去江西了那么多年，好像他们和我也不亲。

采访人/陈博华 张昱辰

国棉厂的退休纺织工

姓名：冯宝根

性别：男

年龄：83岁

籍贯：江苏海门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结构：本人、大儿子及妻子、小儿子及妻子

居住时长：六七十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冯宝根家，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上海话

冯宝根住的房子有两层，门口进去的一间屋子用作自己开的小商铺，卖些吃的、用的。房子呈长方形，门口进去左边是走廊，右边是一排房间，再进去有客厅、孩子的房间、厨房和卫生间。冯宝根自己住在楼上的房子。

问：您从小就在上海吗？

冯：我从小就在上海长大，开天辟地就在这，我爱人是江阴的。

问：您以前在哪儿工作？

冯：国棉一厂，国家厂。那时工钱还算大，我53年三十几岁时进厂的，我们纺织厂有三道流水线。之前我在罗店，日本人的时候，在一家私人老板厂，资本家合股开的。因为纺的纱卖不出去，后来我又转到嘉定的纺织厂，又是资本家拼的股，不过又不是很好。嘉定厂的老板给我开失业证明，那时有失业站，我就去登记。我还是失业小组组长，有事情我就去联系，有什么厂要工人就去失业站登记，我就负责调动工人。我也巧，正好国棉一厂有人意外出事情，着火了，那人被开除，我就顶替上去了。在那里一直做到退休。后来我第三个儿子顶替我，我就提早一年退休。我小儿子顶替到国棉六厂，退休工资有800多元一个月。

问：您有几个小孩？他们的现状如何？

冯：五个。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几个小孩也没能多读书，读不起，那么多小孩就我一个人怎么养得起。我第一个儿子，今年快 50 岁了。第二个是女儿，第三个又是女儿，第四个儿子，41、42 岁。最小的是女儿，30 多岁。他们都结婚了，三个女儿搬出去了，两个儿子还在这里。两个儿子到江西和崇明插队落户过。大儿子大约是 72 年走的，68、69 届我记不清楚了。他妻子是我隔壁邻居的女儿，他们已经有小孩了。小儿子他现在在打工，他老婆原来在公交公司，卖票的，现在无人售票么，她就下岗了。她身体不好，没找到工作，站柜台 8 小时吃不消。小女儿她初中毕业，她开车的，身体不好，暂时在超市里收货。收入还可以，就是多个超市跑，人蛮辛苦的。她老公是炼钢的，还可以。她的儿子在打乒乓，打得蛮好的，还拿奖。我总共有两个孙子，两个外孙女，一个外孙。

问：家里有人是党员吗？

冯：没有，具体我也不清楚。

问：几个女儿都搬出去了，小女儿怎么会在这里又搭了三楼？

冯：她也想拆迁时好拿点钱。女儿都是嫁到丈夫家，人家的房子。第二个女儿本来和公婆住在一起，后来公婆死了，房子又拆迁，他们就拿了钱买了房子。

问：这房子什么时候造的？

冯：日本人时候，三几年就造了，草棚棚，然后自己翻，百多平方，三层楼。我结婚的时候房子本来就一间，一楼这里就这间小房间，后来下雨，横梁断了没办法，我的阿叔就帮我出点子，买材料翻了一翻，他是木匠。现在一楼就是店铺和这房间，店铺做做生意，这间吃吃饭，没有卫生间。二楼两间，三楼是女儿

造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住二楼的两间。

问：您的大儿子工作了有贴钱给家里吗？

冯：没，他自己有家庭了，要管家里了，我爱人如果不死，那我就不会那么辛苦，我53年72.8元，工钱蛮大，我爱人也那么大工钱。现在都是各人管各人。女儿看你还可以么，就没贴，每次来买点东西给你吃吃，八月半送月饼来。我和小儿子住，贴点钱给他，饭钱总归一个月给他500元，小儿子的老婆没工作，小孩要读书，就他一个人，工作压力大。我总归自己也留一点，总归要零用零用，人情来往。

问：大儿子回家讲上海话吗？会有江西口音吗？

冯：他听得懂江西话，也会讲，回上海么就讲上海话，大儿子回来在建筑工地帮工做木工，现在做买办，单位需要东西他去买。

问：您的小店是自己开的吗？

冯：最近刚开，在家里没事做，就想想办法。现在平时就看看电视，看看店，以前搓搓小麻将。

问：你们家两个儿子都一起吃吗？

冯：没有，大儿子有媳妇、儿子了，没一起吃，总归有自己的家庭了。他的儿子、媳妇也都住这儿，就住我们家对面，他自己搭的。我和小儿子一起吃。家里关系还可以，大家气量都大点么好了，菜好吃就多吃点。你要是话多么当然媳妇就不开心了。女儿都还可以，过年过节都到这里，小孩一小桌，我们就放在厨房间吃，能放下一个圆台面。

问：您觉得小区方便吗？

冯：交通有些不方便，公共车站走过去10分钟，不过逐步发展起来。医院这里有两个。这里听说新房子里还要再造一个。学校也蛮方便的。居委会很少组织活动，有些小区有活动，唱唱

歌，跳跳舞，这里少，没有地方。这里的治安不好，本来这里有些钱的人都房子买好搬出去了，借给外地人后就变得一塌糊涂。以前还可以的！以前这里烧煤球炉，苦死。六七年前有了煤气，就是抽水马桶没有。

问：这房子要拆了吧？

冯：等拆呀，就好分配房子了。自己买不起房子，四五千。分房子想和小孩住一起，我的兄弟也和我讲，总归靠近一个，生病也好有人照顾一下，对我热心一点。我不要钱，总归要房子住。听说要搬到江桥，我想还可以吧！买房子我是买不起，凭户口一人拿钱大概只有2.8万元，就算和小孩住一起，凭户口也拿不到多少钱，现在用这点钱也买不了房子。

采访人/朱韵珊 徐青

来自江苏宜兴的面粉厂工人

姓名：汪金才

性别：男

年龄：82岁

籍贯：江苏宜兴

文化程度：小学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妻子(大儿子的户口在这)

居住时长：50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汪金才家中，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上海话

住房描述：两层楼，屋后有楼梯上二楼

问：您什么时候到上海的？今年高寿？

汪：我从小父母带我出来，3岁。现在82岁，虚年龄。我老家是江苏宜兴，当初父母来这里打工。我后来在面粉厂工作，一直干到退休。公私合营啊！我是58岁退休的。那个，顶替啊！就是那时候国家号召啊，我的小女儿六几年插队到我们老家，七几年回来啊，她就顶替我。以前啊，我们什么都做的。打工啊什么，做小生意。

（此时，他在外面买菜的老伴回来了）

问：阿姨是哪里人？今年多大年纪了？

妻子：75岁，南京下关人。不过在南京已经没有人了（指亲戚），早就没有人了。我父母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我也不清楚，但我从小养在上海的。年纪轻的时候我换过很多工作，那时候做得多啦！在糖果厂也做过的。（此时，她的丈夫说“那个时候随便的随便的”）后来就在国棉五厂工作，做了30年，50岁退休的。

问：你们念过书吗？

妻子：我没有读过。厂里面扫过盲。

汪：我读过小学。我在念小学五年级。那个时候“八·一三”，打仗了，日本侵略我们。我们就回乡去了，16岁，回乡以后呢也没有再念。再后来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又回上海来打工了。在乡下种地也没有地了，没有地就没得活了。在上海打工，什么都做。做小工啊，进什么厂啊。那个时候，只要有工作做，什

么地方都去。

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有几个孩子？

汪：我26岁，她18岁，我比她大8岁。我们有4个孩子，两个男两个女，他们都在上海。大女儿今年58，退休了，以前在变压器厂。大儿子今年大概48岁，以前是在纺织厂工作的，现在他到美国去了，他的户口还在这里。小儿子今年46吧，他很多年前就搬出去了，以前在植物园里做，拍照的。后来不做了，现在在一个超市里面。小女儿51，还是52？属兔的。老早在面粉厂做的，现在也退休了。我有两个外孙两个孙女。大外孙工作啦，搞计算机。小外孙在上海宾馆，烹调。两个孙女，一个孙女读大学，浦东的世博学校，它是属于大专性质的，今年第一年进去。还有一个孙女在读高中。我几个孩子，大儿子读的高中，小儿子念纺织学校，在长宁路，那是专科学校。大女儿也是高中。小女儿不是高中（后来经老人的确认，他所说的高中是指的初中）。

问：孩子们现在都住什么地方？

汪：以前一家子都住在这里的，现在一个住在宁夏路，一个住在东安新村，一个住在中山公园前门一直下去，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还有一个在光新路。

问：他们都是结了婚才搬出去的吗？

汪：哎……这个我都搞不清楚了。这个，（二女儿）没上来（回上海）的时候就结婚了。女婿也是插队的，他不要上来，没有回来，还在这个乡下。

问：现在你们的退休金有多少？生活上还够用吗？

汪：退休金，都差不多。800块钱。我们两个人，够了啊！平时孩子们也不给补贴，我们也不要。我们这就够了，何必再去增加

他们的压力呢！平时他们也会来看看我们，会买点给我们吃吃。我们平常看病啊也有医保。这个是共产党的功劳。我也感谢共产党啊，没有共产党，我们没有这么享受的，没有这个样子的。没有劳动力了，就会一脚把你踢掉了。

问：您这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

汪：这个房子是自己造的，53年。那个时候就是一千多块钱。来这里之前，我们就住在长宁区延安西路。房子造好以后也没有翻新过。这上面还有一层，后面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去。

问：你们平常出去逛逛吗？在家做些什么？

汪：脑子好，精神好，出去。有的人他脑子也不好，稀里糊涂的。我到现在还没有。平时就看看电视，较喜欢看新闻。

问：您在宜兴那边还有亲戚吗？

汪：堂兄弟，叔伯兄弟。我们家我是独生子。和老家的亲戚还有来往的，他们都会来的。他们在上海也有别的兄弟，有一个来得早一些，已经死掉了，后来的是到了汪精卫做汉奸的时候来的。他们之间是亲兄弟，跟我是堂兄弟。

采访人/刘 镠 徐振宁

这里别的还好，就是没有卫生设备

姓名：陈汉大

性别：男

年龄：81岁

籍贯：江苏海门

文化程度：文盲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妻子，女儿一家三口，二儿子一家三口（孙子平时住校）

居住时长：50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陈汉大家中，2003年11月14日、11月21日

语言交流：有时是普通话，有时是上海话。

1974年自行建造了约130平方米的房屋，共两层楼，楼下有2间客厅、2间卧室、2间厨房，楼上有2间卧室、1间书房、1间浴室、1个阳台。家里住了3户人家，一共7人。即陈老先生和妻子（2人）住在楼下的卧室，有空调；女儿一家（3人）住在楼下的卧室，有空调；二儿子一家（2人）住在楼上的卧室，有空调，他们的儿子在浦东读大专，平时住校；大儿子一家三口已经买房出去，但是仍然留着二楼的一间卧室。3户人家经济独立，装有3个电表，各自做饭，除了年夜饭一起吃之外，平时很少一起吃饭，甚至很少交流。

问：您祖籍是上海的吗？

陈：不是。我是乡下的，原来是江苏省海门市的。我5岁就死了爸爸，18岁就出来了。那时候，东洋人（日本人）要把年轻人拉去做苦力，很吓人的，我就逃出来了。乡下以前老苦的，书也没读的！穷来兮的。我们家6个小孩，我是最小的，哪里来钱读书呢？旧社会里没有钱读书的。出来的时候，我是一个人。那时家里没什么人了，爹娘都死了呀，哥哥在上海。来这

里以后，我在厂里做，做做小生意，后来在国棉（纺织）厂，做了30年。（得知我们是华东师大的学生，就呵呵地笑）我在华师大做过第五宿舍的管理员，后来我身体不好，中风、脑梗塞就不做了。做了13年，60多岁以后去那里做的。华师大的领导我也认识好几个呢。（神情自豪地说）现在我也可以进华师大，我有卡的。

问：您是党员吗？

陈：（很自豪的神情）是。我们每个月的10号开会的。讲讲国家大事，读读报纸。早在56年，在国棉二十五厂的时候就入党了。以前入党看工作表现，积极吗，态度怎么样，历史是不是“清爽”。祖宗三代不查的，但是要看你个人情况。就是看看你爸爸妈妈是什么，你的出身怎么样？出身么，有地主、贫农、富农，一般么，贫农是没什么问题的。总归要问问你。他们还要下去调查呢。入党不是瞎来的。他们到乡下去调查，看你是什么地方人，江苏海门具体哪个村的。看看你过去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没有的话组织再上来讨论。入党不是马马虎虎的，你可以入党，他也可以入党，强盗小偷也可以入党，不可能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入党的。先是预备党员，然后才是正式党员，上面正式批下来了，再开党员大会。党员么，会开得多一点，党员大会经常开。组织生活每周一次，党课每个月一次。我们街道有一百三十几个老头，只有二十几个是党员。党员们总归比一般群众要求要高一点。为什么入党？这个，思想问题呀。你看看旧社会是什么样的，新社会又是什么样。共产党，总归是好的呀。党员么，先进一点，以身作则，自己不要做坏事情呀，工作卖力一点。党员么，总归比别人觉悟高一点，自我要求要严格一点。比如，单位加工资，

那么党员就要(把机会)让给别人,先人后己,随便什么都是自己吃亏一点。

问：那您是怎么看现在社会上的腐败的呢？

陈：腐败,这个中央里不是一直在处理的吗？撤职的撤职,下台的下台。共产党员么,自己不要做坏事,要以身作则。自己总归要做得好,人家差一点。

问：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被评到过劳模、先进呢？

陈：有的。评到了,还有奖状哦。

问：您的妻子是什么地方人？她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陈：哦,我老婆啊,她是湖南长沙的,毛主席的家乡。她过来之前,姐姐在上海,生了两个小孩,双胞胎,不好带,那么就叫妹妹出来,帮她照顾,一人带一个。她22岁过来的。我比她大6岁,当时我28岁。以前饼干厂的老板介绍我们认识的。她以前国营纺织厂的。

问：您的孩子情况如何？

陈：女儿50岁,原来的纺织厂退休了。退休以后,人家介绍去了超市做,远哦。一个月七八百元工资,还有900元的退休金。饭是有得吃了(大家都笑,似乎够吃饭就能来衡量生活水平)。女婿是修机器的,还在厂里做,还没退休。两个儿子嘛,大儿子现在也退休了,以前在文风钢铁厂。二儿子还在工作,是标准铅二厂的,还没退休。大媳妇退休了,她是常州人。小媳妇还在做,她是上海本地人。他们都还好,平时自己的工作很忙,所以来看我们的时间也少。我的外孙女25岁了,已经工作了,她过节的时候会来看我们。大孙子住在学校,快毕业了,要当海军的。小孙子也上初三了,不过功课很忙。他们和我们亲的(很自豪的样子)。

问：您一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您怎么看待这段历史？

陈：这怎么讲呢？都是上面贯彻下来的，中央贯彻下来的。当时么，工厂就停产。思想好的同志么，停产以后自己还是劳动。思想不太好的同志，就是停产，出去闹，造反——和地主、资本家斗争。当时很混乱，你们华东师大里面，也有好多学生出去游行了。最闹猛的时候，我们还在厂里。厂里那时候有组织的，去闹革命了，出去斗地主啊什么的。我嘛，看情况的，组织需要么就去。“文化大革命”时候，我是50岁左右，小孩在读初中。后来，大儿子去了北京、南京串联了。有些家庭成分不好的，反革命什么不能去的，也是有老师组织的。串联以后，回来就读书。再后来技校毕业以后就去了文风钢铁厂，生活就稳定了，工作稳定么生活怎么会不稳定呢。后来他没有换过工作，一直做到现在。今年53岁了，一直在钢铁厂做。我的女儿刚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去安徽插队。上面派她去哪里就要去哪里，派去江西就要到江西，派去南京就要去南京，你不去，他们也会下来做思想工作。我们女儿是去了安徽农村种田。去了两三年，她那时身体不好，病退回来的。回来以后就被介绍到厂里了，也有些姑娘不回来的。有些人关系搞得不好，有条件好的么，他们在乡下谈了对象，结婚成家以后就不回来了。没有谈的么就回来安排工作。去的时候，还自己带了被子、衣服、箱子。她在那里，没有好好的东西可吃……农民吃山芋干，他们也吃山芋干。

问：您在这里住了多久？

陈：住了50年了，自己建的房子呀。以前是借的房子，在大木桥。74年造的，那时候改造老房子，（政府）借给你地契，自己造房子，一年付50元地房税。那时候，三个小孩都还在读书，没有赚

钱。现在上下楼总共 130 个平方。大儿子搬掉了。哪个区，我也讲不上。他们钢铁厂，单位好，所以房子是单位分的。平时不过去，他们住在六楼了，走不动。儿子工作忙，没事情不来的。平时顶多来个电话。过年过节，也会来的。现在二儿子和女儿住在这里。现在住了三户人家，一共 7 个人。就是二儿子一家，三个人，二儿子、儿媳妇和孙子。女儿一家，三个人，女儿、女婿和外孙。我的孙子读大专了，平时住在学校里。

问：你们三户人家一起吃饭的吗？

陈：我们分开来烧的。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吃。女儿他们里面有吃饭的地方。儿子么，他们三个人，回来也在这里吃。分开来吃的。以前一起吃的，10 年前女婿提出来要分开吃。人多，天天我们买、烧，吃不消啊。（看到桌上的电费单）电费也分开付的，有一个大火表（电表），下面有 3 个小火表。收费的时候就分开，大家付。水费也一样。

问：以后你们这里要是拆迁，会和你们女儿、儿子分开住吗？

陈：拆迁了么，国家分房子，分开住。动迁组进来过，他们没有讲房子会分到哪里去。现在的房子还可以，旧是旧了点，但是冬天开空调，夏天有电扇，住得可以了。

问：那您平时的生活怎样？一天的日子怎么过的？

陈：一样也不干。早上 5 点钟起床，出去早锻炼呀。回来，吃早饭，随便吃点，糍饭、大饼、油条。中午么，阿婆（指他的妻子）烧饭。下午就看看电视，睡一觉。到了晚上再看电视，我 8 点钟就睡觉了。阿婆她还要出去搓麻将，她去人家家里，出门就到了，很近的。老年活动室要 3 元一个下午。要收费的，不过有供应茶的。

问：你们这里出行方便吗？

陈：不大方便，要过一个红绿灯，才到公交车站。

问：你们退休金有多少？平时吃些什么？

陈：（语气很坚定）有的。劳保是国家给的。现在都是银行里拿的，原来的纺织厂已经没有了。劳保工资有 800 元，吃饭是够吃了。阿婆也有的，700 块。呵，吃么，很平常的呀。自己烧。中午做饭，一荤两素，还有一个汤。晚上么，也是这样。有时候熟食店买白斩鸡、爆鱼。女儿、儿子他们烧了好的小菜，会带过来。我们也不要吃他们的，自己要吃什么就自己买。

问：您身体好吗？要是生病的话，医疗费怎么解决？

陈：身体么，我老早中风了，跑不动了。看病的话，有医疗保险，100 元钱自己要付 10 元。现在涨了，100 元要自己付 20 元，市级医院的话要付 30 元。区级、街道医院，就是自己付 20%。就是说医保调整，调整么就是涨价了。有规定的，每个月只可以看病十次，超过的就自己来出。4 年前，脑梗塞，就中风的，这个右手就弯不过来了。她（妻子）照顾的，我们请了个护工，晚上守守夜，自己出钱，要是全天的话就是 24 元。（抬头看到他们家里摆着观音像，我们有些好奇）平时烧香用的。初一、月半家里烧，外面也烧。年纪轻一点的时候，她（妻子）跑到外面去烧香的。乘火车也去，哪里都可以去呀。以前“文化大革命”不允许烧香的，现在可以的。都相信菩萨了，总是希望保佑自己身体好一点。

问：还有两个月就要过年了，你们会怎么过？一起吃年夜饭吗？

陈：过年吃年夜饭，小孩子（子女）都会回来的。年夜饭的伙食开销我们自己来。过年就是跑亲戚，现在年纪大了，跑得少了。像以前，我们这里吃年夜饭要有 3 圆桌的人。她（妻子）的亲戚多，她姐姐有 6 个小孩，很多人呢。那个时候，阿婆年纪还轻了，大家也一起帮忙做饭。吃年夜饭么，之前都准备好的，

只要烧烧热菜就好了，冷菜都已经准备好的。

问：那过年的时候街道这边有没有什么活动？街道对你们老人关心吗？

陈：没有的。重阳节，街道里发些新衣裳，吃两块糕，重阳糕什么。街道里平时没怎么过来。现在的街道不比以前咯！以前，也就是来看看我们。现在街道合并了。以前近点，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方便一点。

问：附近的邻居都熟悉吗？你们这个小区治安怎么样？

陈：不怎么来往的，认识都认识。平时也很少串门。治安还好。偷东西么，都是外地人居多。上海人偷上海人的东西，少来兮的。一般来讲，情况还可以。

问：你们这里弄堂挺窄的，如果停几辆车子，很容易就阻塞了。

陈：是啊，不过这个没办法的。以前弄堂里很干净的，现在乡下人多了。都是外地过来做生意的。什么都有，卖大饼油条，卖蔬菜的。他们人，哎……他们，有的人很可疑，东看看，西望望。我们家里有两个老人，所以还好。

问：你们这里以前不用液化气的吧？

陈：以前烧煤球。那时候，也没有自来水，就是用河水。还有给水站呢，后来么，就通自来水了。现在么，别的都还好，就是没有卫生设备，还用痰盂罐。

问：现在，您老家那里还有什么亲人吗？

陈：哥哥姐姐全死了，就剩我一个了。和江苏那边没什么联系了。亲戚倒是有，哥哥的两个女儿在江西，但是不来去，他们也不来，我也不去。

因难舍邻里情，独自留守的老人

姓名：于凤娣

性别：女

年龄：81岁

籍贯：江苏海门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结构：本人、儿子公司的一个帮工

居住时长：53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于凤娣家中，2003年11月18日和11月23日

老太太的家里一共有两层。楼下有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一个卧室和一个卫生间。楼上有两间小的卧室、一个储藏室和一个阳台。房子以前是一个平房，有一个小阁楼，1979年儿子结婚以后重新翻修，虽然后来儿子和女儿都搬出去住了，但是为了能让老太太住得更加舒服，7年前，儿子又对房子进行了装修，在客厅安装了一个立式空调，在楼上卧室安装了一个窗式空调。房屋一共有120—130平方，而且只有两人住，这样的居住条件在元和弄可以算是相当不错，老人完全可以搬到外面和女儿一块居住，但是由于在元和弄有许多老乡，而且生活相当方便，再加上不习惯高层住宅的寂寞，所以老人仍然留在这里。老太太已81岁高龄，但是看上去精神矍铄。

问：您是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因为什么缘故来这呢？

于：1950年我经嫂子介绍到上海结婚，嫂子当时在国棉二十五厂工作，在厂里认识我的丈夫，就将我介绍到上海来。那年我28岁，丈夫48岁。他有两个孩子，儿子8岁，女儿18岁。来上海后，我没有去工作，就在家里做家务。空闲的时候，帮人家带孩子，洗衣服。1958年解放劳动力之后，经居委会介绍在托儿所工作，到了1966年元和弄托儿所关闭，我被调到另外一家托儿所工作，一直做到79年。退休的时候工资只有二十多元，这样的工资水平只有当时一般工人的一半。退休后我担任居民小组长。

问：结婚时，丈夫当时是做什么的？

于：结婚的时候，丈夫当时在纺织二十五厂做机修工，工资在当时算相当高的，所以一个人就可以承担起家庭的开支。后来由于一次维修事故弄伤了手，机修工的工作不能做了，工资少了不少。因为女儿早早就出嫁了，而我也有一些收入，所以生活还算过得去。在儿子读大学的前一年申请早退（62年）。我丈夫也是江苏海门人，在10年前，93年1月份91岁的时候去世。

问：您有几个子女，他们的情况怎样？

于：我的儿女并不是我亲生的，大女儿是丈夫和第一个妻子领养的，后来妻子私奔，丈夫又娶了一个妻子，在生下儿子之后，妻子去世，我是他第三个妻子。家里没有人参加过上山下乡，所以家庭生活并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家里人也没人参加什么政治团体。我儿子今年61岁，女儿71岁。儿子是66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毕业之后在中学教书，后来被调到部队任参谋（69年），在部队工作6年，在参军的时候结的婚（74

年)。后来因为他父亲的身体不好,妻子又要生孩子,所以他申请复员。复员之后在上海进出口公司工作,工作了将近十年。12年前(92年)他辞职开办自己的贸易公司,一直做到现在。现在在日本也有一个分公司。儿媳是江苏启东人,初中文化。他们是经人介绍的,儿子的干爹(过房爷)是在上钢二厂工作,当年媳妇的邻居也是在那里工作,所以就介绍他们认识结婚。结婚以后,儿媳从浦东的国棉十七厂调到离家很近的国棉二十五厂。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她申请病退在家照顾女儿和做家务,现在大多数的时间在日本居住。儿子在开公司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就买了两辆轿车,现在有3部车。现在的生意比前几年差,主要是因为松江开的一家服装厂倒闭,亏损了几百万。女儿19岁时,也就是我嫁到元和弄第二年时就出嫁了。她小学文化程度,当年在纺织厂做织布工,她的丈夫当时在杨浦做公交售票员,以后做到场长直到退休。女儿结婚后从国棉二十五厂调到在杨树浦的国棉三十一厂。

问:孙辈们会常常来看望你吗?他们的生活怎么样?

于:大孙女今年28岁,小孙女25岁,两个孙女在中学读书,儿媳妇就每天为她们烧饭,之后她们先后考入外国语大学。大孙女毕业以后,到了澳大利亚,在那里定了居。小孙女在日本工作。

问:您那么大年纪了,可精神看上去依旧很好。您还有兄弟姐妹在世的吗?

于:我现在有一个大哥在浦东崂山新村居住,有一个哥哥在老家江苏海门。

问:您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于：我每天早上6点左右起床，然后出去锻炼身体，7点多钟回家，在路上顺便买一些小菜。回来之后我一般就呆在家里不太出去，偶尔吃过饭会和一些退了休的老人打打麻将，不过机会不多，运气不好或者好的话，就赢40—50元或者输40—50元。晚上8点到9点左右睡觉。

问：当初儿子结婚后还是住在元和弄的？

于：是的，儿子结婚之后住在元和弄的，10年前他们在外面买了房子，就搬走了。他在仙霞路买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但是一个房间很小，两个孙女住在一起比较挤，4年前就将那套房子卖了，在虹古路上又重新买了一套三房两厅。儿子的公司原来在七宝，在那里也有一套房子，后来由于业务的发展，面积就显得比较小，就将房子卖了，来到青浦。青浦那是自己买下土地的，他就在那自己造了一套房子。儿子因为在日本也有公司，工作忙，经常上海和日本两边跑。媳妇现在比较多的时间住在日本，小孙女现在也在日本。

问：女儿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状况怎样？

于：女儿在1950年结婚，之后就搬到在杨树浦借的房子住。虽然后来由于住房问题她回到元和弄住过，但是总的来说出嫁后，她在这里的时间不多。和儿子相比，女儿的住房条件也不错，女婿现在75岁，原来是公交公司的场长，退休以后分到一室户，女儿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大外孙在儿子的公司里面工作，我的儿子为他在杨树浦那里买了一套房子。以前我女儿是和她的二女儿和大儿子住在延吉路上，二女儿后来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回来以后和丈夫与我的女儿女婿住在一起，但是二女儿的丈夫和我的女儿经常会有口角。这样我得不到儿子照顾，也不能在女儿家里安心居住，所以又回到自己的住处。

之后女婿的单位又分配给他一套房子,原来的房子就让二女儿付4万元买下。我过年会到女儿家过年。

问:您对周围的环境还满意吗?

于:我觉得周围卫生条件不太如人意,很多居民在外面买了房子,搬出元和弄了,就将自己的房子借给外地打工的,所以环境越来越差,但是邻里之间关系还是相当不错,周围很多邻居都是海门人,这样大家也就有个照应。我们还是挺小心陌生人的,不过盗窃的事不是很多。

问:您日常的生活费用有哪些来源?

于:儿子每个月补贴给我800元,我和儿子公司里面的帮工住在一起,我负责买菜。中午自己吃得很随便,烧一些,吃前一天的剩菜。儿子的帮工住在楼上,我就住在楼下的卧室里,这样出入比较方便。儿子现在忙生意,很少来看望我,不过经常会打电话来问候,媳妇每个月也会来看望我一两次。

我们的访谈一共进行了2次,都是在早上9点左右。从访谈中可以看出,老太太是一个相当乐观和随和的人,从以下的实例可以得知:一、老太太是第三任妻子,但是她并不因此有什么怨言,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所以虽然儿子和女儿不是她亲生的,但是仍然对她很孝顺。二、老太太待人十分宽容,虽然和儿子的帮工住在一起,但是并没有因为他是打工的而对他刻薄,相反尽量会考虑到人家。三、在我们访谈中,不断有人到老太太家来,有的是和她聊天,有的是和她一起看电视,有的是借用她家的阳台和储藏室。所以老太太的人缘相当不错。

老太太虽然在上海居住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仍然带有海门口音(海门话与上海话很接近),而且在提到自己的老家的时候,并没

有说是苏南，而只说是海门。

采访人/吴 同 黄素梅

这里是我们的“家”

姓名：王伟兴

性别：男

年龄：80 多岁

籍贯：江苏常州

文化程度：文盲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妻子

居住时长：40 多年

访问时间与地点：王伟兴家中，2003 年

语言交流：被访者与访员之间交流的语言，主要是上海方言，辅以普通话。家庭内部交流的语言全部是上海方言。

居委会的负责人把我们领到位于居委会附近的老人家门口，为我们向老人（被访者）作了大概介绍，由于他本人并不十分了解情况，所以似乎有些许疑虑。

这间屋子十分陈旧，有两层，开门后就是客厅兼厨房，约十余个平方。客厅，即厨房，坐北朝南，采光比较充足。另有一间房间经一条较短的、正对大门的过道与之相连，显然过道旁有储物用的

隔间。可能是因为该房间朝北，故光线太暗看不清里面的情况。厅中大门所在的一侧，靠墙角处，有一个两眼的液化气灶台，灶台的对面是一张正方的黑色木桌，也是靠墙角。所有厅中的家什由于厨房的关系都明显地蒙着一层油灰。

(我们进屋时，老人正坐在门边的小竹靠椅上晒太阳。)

问：请问，您和妻子是上海本地人，还是(从外面)迁过来的？

王：江苏，江苏常州。到这大概要将近四十多年了。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来上海学生意。伊(她)13岁就到上海工厂来做了，在织布厂里做。一直做到退休。那个厂在余姚路。

问：您一来上海就住到这里了吗？

王：你听我讲，情况是这样的。刚刚到这么，我是学徒，住厂里。后来解放了，我进国家的厂里，和老太婆都住在厂里的宿舍里，因为房子没有呀。后来么，想办法买了一间……草屋。阿拉自己就搬进去了，以后就住在这。买好之后过一段时间就翻了，翻好后么就心定了，否则草屋里面虫啊什么的很多的，又是烂泥地，下雨时滴滴嗒嗒(漏水)，所以就翻了，一直住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就是这样个情况。

问：那么，您来上海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王：来上海前么，你要是问我做活做过几个，那就多了，钢锅厂里做学徒，小生意也做过，拉车也做过。逃难的时候，讨饭也讨过的。刚来时在资本家厂里做学徒，后来……找了个印刷机械二厂，一直做到退休为止。大概1986年退休的。

问：那您们去上班乘车还是走路？工资怎么样？

王：她走的，这里到余姚路跑跑也没多少路，又没车子的。我嘛，

脚踏车，一个多钟头了，厂在徐家汇。工资少，六十几块。退休工资打七折。

问：您是党员吗？在厂里工作时，得过什么荣誉吗？

王：我啊，群众，普通老百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荣誉嘛，给你们看看好不好？我么是出版局局里的先进。要评先进么，自己的厂里么总有单位，单位上头有公司，公司上头么有局。我是局里的，局级的先进。（很自豪）坐在长讲台上，戴着大红花。我还做过五好工人。要做局级先进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局范围大了。我上台，戴了大红花，对哦？局级先进是荣誉蛮高的。那时候还是毛泽东时代。能这样，我也就心里满足。没有物质奖励的……（不语）我是不要什么东西的，买两本书啊，就这点花头。帮我戴一朵大红花啊，那朵大红花还在呢。

问：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王：结婚啊？我们结婚不早……年纪大了，脑子不灵光了。结婚么，我结婚时已经 39 岁了，老太婆也已 35 了。晚结婚么，条件也有关系的。后来么想，终归要成个家的，就是这回事。

问：那您的儿女现在怎么样了？

王：现在有一个女儿，今年 43 岁。已经下岗了。现在她到照相馆里，为别人像临时工一样照顾照顾，别的也没有花头。当时读到高中，因为经济问题么就没读了。我们到底是穷苦出身的。女儿现在已经搬到浦东去了，结婚的时候就搬去了。搬去啥地方么，我也喊不出，反正就是借别人的房子住。一开始，借临时房子，后来么又自己找了一幢房子。地段也不清楚，夫妻俩的事情，我也管不着，他们现在的房子我还没去过。女婿的

工作么,我也,怎么讲呢,帮人家公司里做做。啥公司我也喊不出。职位嘛,我不会去问他,他也不会对我讲,大致就这么个情况。

问:那你们现在还回去吗,回老家常州那里?

王:现在还去什么?家里头两个人呆着可以了,跑不动了。以前也不大去的,就在上海么好了。要么过年去看看,现在年纪大了,谁跑得动啦?不去了。过去么,过年的时候到她老家去看看。老家有是有人,但是平常不联系了。

问:您在这住了几十年,对现在的居住环境满意吗?周围的邻居,街道居委会,生活设施各方面?

王:邻居啊?邻里关系相当好!住了几十年啦,四十几年啦!都是老邻居,大家么,相互照顾的,说说话什么的,相当好!我对你说,对这我还蛮满意呢。许多年住下来了,还想啥啦?不想啥嘞!差不多嘞,我蛮满意的。

(阿婆从里间走出来)

问:这里马上就要动迁了,您们对动迁有什么想法吗?

王:我们不去想它的。想什么啦?国家都会安排好的。

妻子:这事完全是看他们怎么安排,他们要是叫我们都搬到郊区去么,我们这么大年纪了,肯定是不大会搬过去。这种情况现在是很普遍的。要买,我们退休工人是没钱的,对吧?你说要靠小孩,小孩自己现在也没办法了。别人要办啥大事,工资啊、奖金啊还好有点钞票靠靠。我们就只好这个样子。我们老人就只好吃苦。长江新村里头老年人在家里呆着,蛮多的。年纪轻有钞票么,买幢房子到别的地方去住,到热闹地方去,好地方去。我们假使要拆迁么,就只好等,等他们拆迁的方案拿出来。但是,我们还有要求的,不能随随便

便安排的！我们在这里蛮好的，你叫我们走？不走（坚决）！这是我们的家啊，这是我们的“家”！（普通话）（激动）一个人么总是要有一个“家”，狗啊，猫啊，都要有一个家啊！我们人么，更要有一个家。没家怎么办？在外头跑啊？不可能的呀！这么大年纪了。我们在这很多年了，五六十年来了！小妹妹啊，我跟你说，年纪轻的时候，我们是一样都不用想！现在老了，各种各样事情都要想想嘞！社会上的情况，大家都差不多，年纪大的人么，总归要顾到今后的生活。要顾到小孩，他们是不是能够生活，工作么又怎样，房子又怎样？我们这一辈人啊……都是苦大的，真真叫苦哦！到现在这把岁数了……（叹气）

王：现在啊，我来个总结。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靠中国共产党！49年，上海解放，毛主席之后宣布，宣布什么呢？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啊！光荣啊！正确的！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将三座大山推倒！这是伟大吧？这就是伟大啊！靠谁？就是靠毛主席！毛主席是谁？毛主席就是党！没毛主席领导的话，没共产党领导的话，这还是旧社会。

妻子：哎！共产党来了么，心定点、十分心定。让我们穷人都能够活起来，不受欺压……他是正确领导！老百姓就服贴！就欢迎！对不对啊？一个人做领导，要受人欢迎，靠他自己说他是大官，有用吗？要他自己做得好！

问：那您觉得哪里变化最大？

王：变化么，不是一下子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来的。新民主革命成功了，今后是社会主义社会，就这么回事。目标么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么，就要和世界联系起来。总归一句，党是正确、伟大的，它把三座大山推翻了！是不简单的。

现在,开放么,阿拉老百姓就真的站起来了!你要叫我具体说,是说不完的,对哦?工作么,每个人都有工作了,稳定了。房子么,有了。成家了,生活还稳定了。就是这么回事,这已经不得了了!

问:您们平常有什么娱乐活动吗?

王:娱乐活动么?看看电视,和别人聊天。早晨出去走走,散散步。锻炼是锻炼不动的,年纪大了,能走走,蛮好了。她也一样,散散步,买买菜,烧烧饭。晚上么,看看电视,睡觉。我们睡得早。年纪大了,睡了太晚吃不消。眼睛不好了,电视还看不大清楚,看不动了。

采访人/张卓琳

住了 50 多年,这里和以前也没多大变化

姓名:沈贵和

性别:男

年龄:80岁

籍贯:江苏江阴

文化程度:文盲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妻子,大儿子一家

居住时长:50余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沈贵和家中,2003年11月21日

语言交流：上海话

问：您和您老伴今年高寿呀？

沈：80，老太婆和我差不多，属鼠，1924年生的。讲普通话不太听得懂，讲上海话就好了。

问：还记得你们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吗？

沈：解放前，48年。在乡下结婚以后过来的。49年解放，48年以前在乡下。我老家是江阴，来上海之前在乡下种田。老太婆也是江阴的，她的娘家么，一般性，也是种田的，乡下都是种田的。我和老太婆后来就一起来上海了。当初来这边打工，乡下地少人多，家里不太好，到这里是想能过得好一些，乡下贫困。我们就坐着火车来上海。一共要6个小时，1个小时汽车，5个小时火车。来以后，一直住在这里，这里也和以前没有多大变化。

问：你们来之后做什么工作？

沈：刚到上海的时候在厂里做事情。我们两个人两个地方的。中华第一针织厂和第五织布厂。以前工资很少的，每年加的。刚来的时候么一个礼拜三五块。以前三五块还是蛮值钱的。我单位在江宁路、康定路。每天都走着去的。半个钟头、三刻钟。以前做十个钟头，十到十二个钟头，做十个钟头是最起码的。也不算加班，一般都是这样的。工作嘛，是介绍的，厂里有人认识么就介绍去了。一直在那里，没有换过工作。现在，老早就退休了。

问：您子女的情况如何，包括他们的工作、住房等等？

沈：我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儿子都结婚了，女儿也都出嫁了，最大的60岁，最小的49岁。二儿子是医生，在地段医院。一个

女儿在阀门厂。大儿子和还有一个女儿是毕业后插队回来顶替我的。他们都是初中毕业。一个女儿读师范，做老师，退休了。我们家现在一共有四代人了，第四代最小的2岁，最大的17岁。以前支内，我大女儿去云南。后来又去了江西，现在虚岁60了，17岁的外孙就是在江西。儿子女儿他们全都很好，工作也很好的。两个儿子是党员。几个孩子全有自己的房子了。他们没有结婚前都住在这里，现在我们就和大儿子住在一起，小儿子买好房子出去了，小女儿也嫁出去了。就大儿子在身边，其他都出去了。不过他们经常会回来看望我们。孙子、儿子都很好的。

问：“文革”时，您和家人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波折？

沈：没什么。“文革”你们不知道懂不懂？我是厂里的平反委员，我们为那些被造反派揪出来的人，为他们平反。斗啊，这事情也要平反的。我们自己家里没有什么。

问：您的房子有没有翻修过？

沈：有的，来的时候是隔壁的低房子。当时花一百多元钱买了下来。大概80年，自己翻起来，把矮房子拆掉。现在这里讲平方有100多，讲地皮只有50多一点。都是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出租。

问：您是党员吗？

沈：不是，老太婆是党员，单位里入的。她是劳模，上海市的劳模。

问：你们与周围邻居的关系怎么样？

沈：蛮好，不和人家吵。平时相互帮帮忙，叫我吵架吵都吵不动。都很好的。和单位的同事我们也蛮好的。不过现在没有什么好的老朋友。

问：现在和乡下还有联系吗？

沈：乡下都很好的，亲戚都很好。乡下还有阿弟、阿姐、外孙、侄子。现在年纪大了，都不回去了，以前每年过年都要回去。走不动了。

问：你们老两口的退休工资多少，平时生活开销够用吗？

沈：我700多，老太婆800多。可以了，现在退休工人很好了，有工资可以拿。子女们也有给我们补贴。过年过节，平常经常买东西。很好的，还给我买香烟。现在的生活一般，蛮好。身体还可以，早晨锻炼，自己的生活自己还是能够打理的。平时在家里就烧烧吃吃玩玩，走也走不动了，看看电视。饭是老太婆烧的，我也烧不动。

问：你们觉得小区环境怎么样？

沈：环境还可以，我们这里又没有什么小区的。很多人已经搬掉了，还有一部分人。很多房子都借掉了。我们这个弄堂搬了好多人家，外地人也还好，不出什么事。小区里平时也会搞些活动，重阳节就有的。我们居委会蛮好的，组织组织有的，到苏州。

问：有没有准备买房？

沈：没钱啊，等拆迁啊，登记也登记过了，户口簿也好了，动迁组进来我们就走了，就等动迁组。搬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总归很远的，江桥。又怎么办？没钱么只好等他们分了。有钱的都走了。家里也有人走了，出去了。他们搬到高层楼里去了。这里也在造平民房，新房子买不起，这个要卖六七千。动迁能补贴多少，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问：希望以后搬到别的小区有些什么设施？

沈：想当然想，但要做得到的呀，它没有也没办法。他们说现在造的小区蛮好的，配套的，听说很好的。

问：现在对儿子女儿们的工作生活都很满意吗？

沈：是的，阿拉小儿子的孙女今年考到财大。

采访人/卞雅艳 邓晓梅

被外地人“包围”的老夫妇

姓名：李奇松(丈夫)、董雅萍(妻子)

年龄：丈夫 79 岁，妻子 80 岁

籍贯：丈夫江苏海门，妻子江苏南通

职业：退休

文化程度：丈夫小学，妻子文盲

家庭结构：老夫夫妇俩、大儿子夫妇俩、外孙女一家三口

居住时长：70 多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李奇松、董雅萍家中，2004 年 11 月、2005 年 5 月

语言交流：有时是普通话，有时是上海话。家庭内部一般讲上海话。

他们家的住房为上下两层，面积约有 70 平方米，老人一家实际住房面积约 50 平方米。家具很简陋，且看得出来用的时间比较长，只有一台 17 寸电视机。屋内还悬挂着“五好家庭”的奖状。

问：你们是怎么来到上海的？

李：我们生在上海的。她的父母在南通。南通到上海，介绍来的，

穷呀。乡下生活困难，到上海来打工，没有办法。我老头子（父亲）一共弟兄七个，他 17 岁就从江苏海门到上海来了，要是活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岁了。那个时候他在外国人办的圣约翰大学里做（校工），就是现在的华东政法学院。他就负责冲冲开水，打扫房间什么的。我记得他是管学校游泳池的，我的游泳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那时候学校提供宿舍，就住在学校里。后来他从苏州河的船上人家那里买了几块竹排，叫人家用烂泥糊一下在这里盖了几间草棚，平时就把工具什么的放在这里。再后来就搬过来住了。我父亲是老大，他到上海，把六个兄弟全都带出来了。我今年 79 岁，在北京的哥哥今年 84 岁了，还有一个哥哥在银川。北京的哥哥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解放后第一届毕业的，毕业以后派到北京，现在退休了。他一直在北京，是做老师的。我一共 5 个弟兄一个姐姐。姐姐在加拿大，是二姐。我算老三，男的当中算老二。家里弟兄多，也就念不起书。我初中没念，念到小学 6 年级就去厂里工作了。

董：我们在这里是开天辟地的，当时根本没有人的。我也是出生就在这里的。解放前，夜里强盗来打枪，吓死人的。（声音有些发抖）我记得我小时候这里除了几间草棚外，周围都是江阴人种的菜田和坟窟，晚上出门伸手不见五指，和乡下没什么区别的。我老头子兄弟几个基本上都是在大学里做校工，我老头子一直在学校里，认识的人多，我有个小叔叔是在华东师大做校工的，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那个时候，盘湾里也是一个坟窟，有钱的人家买棺材，穷人买不起棺材就把人埋在那里，有的干脆就往那里一扔了事。我老头子在圣约翰大学一边做校工，一边还在盘湾里找了块空地种田。我们两个从小就出

生在这,对这里的情况知道得比较多的。

问:那阿婆家有多少姊妹?

董:我3岁没爹娘,姐姐、姐夫负担我的。后来14岁到厂里做工,现在叫国棉五厂,老早叫纺纱厂。那个时候效益应该蛮好的了。有四五千个人呢,以前的棉纺织厂都是很大的,全是女工,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女工,男的占少数。我21岁就嫁到这里来了,29岁的时候已经有了6个小孩,没办法了,以前托儿所没有的,只能自己带。我一个阿姐老早死掉了,现在在的话80多岁了。

问:你们有六个子女?

董:以前有六个子女。现在还有五个,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得癌症死掉了,老五死了13年了,现在如果活着就是53岁。我们那个时候都生得多。

李:大女儿52岁,她现在900块钱一个月,退休了,养了一个女儿,外孙女结婚了,小孩也已经生好了,四世同堂。我有两个外孙女,三个孙女,一个孙子。孙子要去外国读大学了,新西兰,他是复旦大学出去的。现在没有一个不好的。我小的外孙女好像在延安中学,小女儿生的,她是卖票员,老卖票员了,住在仙霞新村。她还没有退休,今年47岁。

问:那么子女里面有上山下乡的吗?

董:三儿子插在西双版纳,69届的。大儿子工矿,老二到安徽。“三工三农”。三儿子现在搬出去了,自己买房子买在七宝,一年多了。本来住在二楼,就在这儿。

问:几个子女的收入怎样?

董:工资,西双版纳回来的那个很高的,他在日本人厂里,合资单位。他本来在二十一厂,周家桥那边,台湾人的(公司)。他赚

得稍微多一点，3000元一个月差不多。还有几个工资不高。大儿子工资不高，在街道。小儿子在废品公司，现在关掉了、卖掉了，就帮别人送飞机票，乘飞机的飞机票，也是一般，没赚什么大钱，一般工资。另一个在味精厂，退休了。

问：家里有没有党员，有没有劳模？

董：党员有，就大儿子，他在味精厂，是第二把手，现在退休了，被徐汇区一个街道聘为书记。我们嘛，以前是评先进，老头子一直被评到先进的，劳模没有。我们现在家庭是“五好家庭”，八年了，一直保持是五好家庭，里弄里评的。我们一直到现在，不吵不闹。到礼拜三有一份《家庭报》送来的。我的两条腿不太能走路，力气没有，一直坐在家里的，对面跑跑还行，远就不行了。出去老头子要推我的，我们有个车子，700多元。

问：那么子女中现在和你们一起住的有谁？

董：就是第三个（儿子），合资厂的，搬掉了，他现在的房子借出去了，把楼上的一间房间租给外地人。大概有16个平方，每个月房租400元，正好给孙女做生活费。我孙女要考大学，你也知道，现在读书很贵的，读不起，而且我三儿子的媳妇又生病死掉了，单亲的，所以家里也比较困难的。我们现在都等到拆迁再说了。现在一起住的有两个，大儿子，还有一个外孙女，大女儿不在，给外孙女住。我们已经四代了，第四代了，外孙女也养了孩子了。吃饭现在一共只有他们（大儿子夫妇）两个，外孙女一家三个，我们一共七个人吃饭。

问：现在和以前乡下的亲戚还联系吗？

李：完全不联系，老早就没什么人认识的，上面都没有人了。我们现在养的小孩都不知道，都在上海出生，我们也养在上海。

问：如果以后拆迁，你们有些什么期望呢？

李：我们要房子，我们又买不起房子。买得起房子我们早就走了。如果有钱，早就买房子了。我们在这都住了这么多年了，一直是平房。她(妻子)也说从来没有登过楼，上面都给儿子住了，自己没有登过楼，今后希望要二楼三楼过晚年生活。还要两个人能安静安静，以前一直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开始想要安静点的生活了。就这个要求，说出来，心里就这样的想法。

董：我们虽然大家不吵架挺开心，但总是觉得挺烦恼的。我现在身体不好，都是老头子做家务的。痰盂也是他倒的，洗头洗澡都是他帮我洗的。我们现在快金婚了。

问：“文革”时家里发生过什么事吗？

董：没有。解放到现在都挺顺利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没什么事情，一直过平常的日子。我们家没抄家，没东西抄。

问：阿婆你们有没有政府补贴？

董：没有，我们靠自己，子女贴一点，5个子女全贴，没拿国家钞票。

问：您觉得现在的日子怎么样？

董：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人家现在房子都好了，我们的房子最蹩脚的，老早是很好的。

(以下为第二次采访时有关动迁和周边环境的话题)

李：居委会已经好几次召集我们组长开会了，每次都说要拆迁了，叫大家做好准备。每次都说好聚好散，大家组织一起出去玩一趟，拍个照什么的。现在又没声音了。这个也不能怪居委会，她们也是到区里开会，传达上面的意思。我那个时候把开会的事情和隔壁几家人家都讲了，他们有钱的都买房子搬出去了，把空房子租给外地人，每个月的房租都是我替他们收的。他们也说，老李，房子借什么人你看着办，他们要是不好，

你就让他们走，这里都交给你了。两三年前这里根本没什么外地人的，现在走到哪里都是外地人。不说要拆迁，这里的人也不会要搬走的。我们退休拿千把块的退休工资怎么买得起房子，就只好等着国家来拆迁了。今年上半年又开会讲要拆迁，只听雷声不见雨点的，说话不算数的。（李老伯指着前前后的房子）你看看现在在这里前前后后都是外地人，有的一家住了十几个外地人，原来这里只有海门和江阴两个地方的人，现在全国各地的都有，连新疆的也有。原来我这里就像是个俱乐部，前前后的邻居都会过来讲讲，现在是被外地人包围了。日子不好过啊，以前我天热都是开门睡觉的，现在非但不开门，还要上插销。这些外地人进来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妨碍很大。老太婆每天起来要前前后后扫地的，有一天早上她就叫我出来看看，我出来就看到外地人的粪便弄得到处都是，现在煤灰也没有了，我就到人家家里去讨了一点，然后扫掉了。那天早上恶心得早饭也没吃。他们外地人随地大小便，乱吐痰，骑自行车往垃圾桶里扔垃圾像扔篮球一样的，中就中，不中就不中。有一次，有个外地人把鼻涕弄到我家墙上，我拉住他和他讲，他睬也不睬你的。平时好一点的衣服挂在外面要马上收掉，一会儿就会被拿走的，这些外地人除了袜子和内裤不要，其他都要拿的。助动车、自行车也经常被偷掉的。这里本地人和外地人小吵是经常有的，上海人总归讲点文明的，我也不是看不起他们外地人。

问：你们生活在这，感觉这里怎么样？

李：（说到目前的生活环境。老夫妻两个像变了脸一样，一下子严肃起来）现在这里5个人中间就有3个外地人，我还是少说的呢！我们和外地人不打交道，就是他们要问什么我就说给他

们听，比方说，房客没有关好水龙头，人走了，电风扇不关什么的，这个我要说的，不能这样的。要是经常这样，我就不把房子租给他们了。治安情况就不讲了，一塌糊涂。（老伯直摇头，他凑近我说）我大儿子住在楼上被偷了两次，一次是2200块，一次是500块，我想去居委会讲的，他说算了，说了也白说，还浪费时间。有一天早上，我正好站在门口，就听到楼上有声音，仔细听又没什么，后来看到一个剃平顶头的男青年从门口穿出去，本来我还以为是后面人家的房客路过的，后来借我儿子房子的房客就和我讲，房子里的几十块钱没了，裤子被扔在楼梯上，皮带也被抽走了。（李老伯很气愤）肯定是外地人，这里外地人实在太多了。公共厕所也是一塌糊涂，外地人随地大小便，晚上看不见就踩了一脚。我不瞒你说，一到晚上厕所里根本走不进去，到处都是，我就只能在家里用痰盂，要么就到附近的树荫下面方便一下。那些外地的女的，白天就在男厕所里，我撞见了好几次，她们就对我笑笑，实在没办法。这里卖淫的人也很多，都是湖南湖北来的，每天夜里就在弄堂里站了一排，有段时间公安局的人出来“挂倒钩”抓人（“挂倒钩”指的是地区联防队的人晚上充当嫖客抓卖淫的人，一般抓住一个奖100元，但是联防队员都不太愿意干，因为这些“鸡”都有鸡头的，说不定几个人就揍你一顿或者没人看见的时候捅你一刀。据说砍伤人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但没有致命），后来她们八九点钟不出来，到十点以后才出来。嫖客基本上都是外地民工，对面高楼搞装潢的，他们自己家里有女人的，不能带出来，所以就来找“鸡”，牺牲一两天做工的钞票。听说，前几天一个嫖客和“鸡”谈生意，“鸡”说50元，那个嫖客嫌贵，两个人吵起来，他还踢了那个女的一脚，这下还了得，现在

“鸡”都有手机的，她打电话给鸡头，几个男的过来给那个嫖客吃了一顿生活，好像还动了刀子，斩到了手，血一塌糊涂，后来那个嫖客也不敢报警。（摇头）

董：以前有两次有一两个女的来租房子，她们来的时候说在保姆介绍所登记了给人家做保姆的或者是哪里打工的，你又不知道的，一到晚上就不行了，就看到男的一个一个进进出出。后来我们知道她们是卖淫的，就对她们说，我儿子想把房子收回来，不租了。（老阿姨似乎想到了什么，她对着老伯说）我看这次租房的那个女的也不太对劲，好像是卖淫的，我们要找时间和她说说，让她搬走。不要租给这种人，我们都七八十岁的人了，想太平平，不要出什么事情。

李：这里“鸡”多，偷东西多，不讲卫生，我们住在这里心里也难过，实在没办法。你看那条弄堂里，原来干干净净的，现在外地人在路两边摆摊卖菜，自行车也骑不过去，要下来推。现在我们就望伊来拆迁，又不来，我们呆厌掉了，碰来碰去全是外地人。以前都是上海人，我从小住在这里，这里的人都认识的，现在到处是外地人。

第二次采访，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李老伯的心情变化，他觉得住在这里，人感到很不舒服。老邻居都陆陆续续搬走了，进来了很多外地人。按照他们的话说是被外地人包围了。临走时，他对我们说，像他们住的这样脏乱差的棚户区，国家应该早点来解决。

午后，我们路过李老伯家门口的时候，看见一群衣衫不整的小孩子在他们家房子周围嬉闹，乱窜。老阿姨在门口做事，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这些外地人，杀千刀的……”李老伯看到我们就说，“这些都是外地人的小孩，到我们家楼上楼下乱窜的，不管的，哎……”

说着，他朝几个小孩走过去，低声地说，“你们不要跑上去啊，到别的地方玩去。”

采访人/谢慧华 赵晔琴

开灯才能获取光线的一家

姓名：苏文娟

性别：女

年龄：79岁

籍贯：江苏江阴

文化程度：文盲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结构：独自一人

采访地点和时间：苏文娟家中，2004年

从窄小的弄堂走进，门口是炊具，还有水池，门的上方搭着雨篷。走进房间，显得比较昏暗，老太太见有客人来就打开日光灯，才把房间照亮。房屋格局为上下两层，楼下约18平方米，隔为里外间，外间做小客厅。家具很简单，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靠门外放着一台洗衣机，墙上打了一排很低的吊橱，还有一角摆放着供佛的物品，香火不断。里间一张单人沙发床和一排五斗橱，彩电、冰箱、电话等各种家用电器都很齐全。外间有一条狭窄的楼梯通向二楼，楼上略小，几乎空着，是因为前年儿

子搬家，有用的都搬走了，老太太一人住在楼下的里间。总的来说，房间虽然不大，但对于独身的老人来说，居住环境还算比较宽敞。但可想当年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住在这里时，是相当拥挤的。苏老太的丈夫3年前过世，儿子一家前年搬走后，她就一直独居。子女们节假日会来看她，但我们去的几次（包括周末时间）都未见到她的子女。

问：您是什么地方人，来上海后做什么工作？

苏：江苏江阴人，老早还在江苏的时候就在家种种田。21岁的时候，跟着人家坐着车一起来的，到上海来打工。那个时候没钱，就向人家租房子，苦嘛！还好，那个时候大家都这样的。老头子在造纸厂，造纸厂嘛，就是把稻草弄碎掉，压成一张张纸头。我呢在纺织厂，当时厂里要人呀，我就自己去报名，去上班了。那个时候工资是36块。厂不远，就在中山西路，走走就到了。我嘛，哎，现在耳朵不好，纺织厂里面机器轰隆隆，很吵的，现在耳朵也听不清了（摇摇头，无奈）。我没有换过单位，一直做到退休，我们厂从小厂并到大厂，我一直在里面做的。我是54岁的时候退休的。工资一开始嘛49块，后来涨到70块。现在嘛700块，够用的。

问：您家里其他人的情况如何？

苏：老伴他老早死了，死了三年了。他也是江苏江阴人，我们一道来上海的。我们是在江阴结的婚，49年没解放前结婚的，1950年的时候就来上海了。我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52岁，现在待退休在家，以前在造纸厂，顶替她爸。大女婿下岗，老早不做了，等着退休。他们平时就东做做西做做，没定规的。他们现在房子买在桃浦，还好。二女儿她

48岁，在嘉定的一个厂里，做拉铅丝，很辛苦的。二女婿在自来水公司，效益蛮好，铁饭碗。现在家里条件还好，房子是厂里分配的，在控江路，以前他们住在杨浦。第三个孩子是个儿子，今年46岁，以前是技校毕业，后来分配到冷气机厂。老早蛮好，现在不行了，厂子面临倒闭，没办法，工资现在大概是2000块，到时候可能要“拗断”，拿一笔钱，就没了。（无奈）小女儿在学校毕业后顶替到造纸厂，现在效益也很紧巴巴，有的时候做，有的时候不做，不做的时候550块，做的时候有1000多块。小女婿也在造纸厂。他们家离这里很近的。我的几个子女以前就在这后面读的小学。我外孙女现在读大专，快毕业工作了。外孙和她同年，读专科要升本了，他不肯出去工作，说还要继续读书。孙子嘛蛮好，是直升高中的。我还有一个外孙女，两人一样大（孙子与外孙女同为18岁），在外国投资的学校。现在小孩读书价钱贵得不得了。（抱怨）现在家里还好，前几年（三年前）买房子在桃浦，和大女儿买在一起，那个时候买便宜呀！两千多块一平方吧！卖到二十几万，现在房价不得了了！（激动）媳妇嘛也下岗了，要外面随便做做，也不太做，基本上就在家弄弄喽。（指做家务）

问：孩子当中有没有人下放过？现在怎么样？

苏：大女儿到云南下放，去的时候“一片红”，就是社会青年到乡下，在一个农村的厂，加工厂。到那边十年，回来的时候，分到嘉定的一个厂里，房子也是分配的，后来搬过几次。那边不好的，大不如上海了。你去看看，到现在还是那个样，苦得要命。（摇头，皱眉，鄙视中带着骄傲）

问：您这里的房子翻修过吗？

苏：嗯，以前是一层，后面小孩多了，就盖了两层。以前女儿没结婚之前都住在这里（楼上），女儿嫁人了嘛，就儿子一家住在楼上，蛮好的，不过以前老头子到外面做事，不常在家里住。

问：那您平时都做些什么？

苏：我信佛的，平时就念念佛，烧烧香，前几年还出去跑跑，四大佛山我都去过的。信佛好啊，老早我身体不好，现在从来没毛病。我不识字的，念佛经是跟着人家学着读的，以前参加过扫盲班，现在都忘了。

问：那要是房子动迁有什么打算呢？

苏：看他们（子女）怎么办喽。多数是拿钱，他们都有房子嘛，分的房子也太远不方便，我到时就去儿子那里住。现在么，还不太想去。我一个人自由，在这么烧烧吃吃，平时出去兜兜，蛮好。再说我信佛嘛，新房子里烧香也不好熏得一塌糊涂的。（笑着说，很轻松）

问：这里环境怎么样？

苏：还好，就是冬天没太阳，前面楼房高，弄堂又窄，光线不好，一天到晚要开灯。前几年，还常停电。治安么，前几年这后门开着，夏天嘛通风，凉快。老头子衣服挂在里面，有个小偷跑进来，把口袋里东西摸掉了，还好没多少钱，我现在一律不开那个门，封掉了。不过还好，现在好点了。

问：您觉得现在医保等都还可以吧？

苏：还好，我身体蛮好，不太生病的。身体好最重要。

问：您和以前江阴老家的人还联系吗？

苏：以前年轻的时候做事没时间，不经常去，差不多每年一次，后来母亲不在了，就不去了。自己年纪也大了，不方便。那边家

里也不需要我经济上进行补贴。姐姐以前种田,现在 80 多岁了,蛮好。

采访人/聂德芸

独居 10 平米的丧偶老妇

姓名: 陆美英

性别: 女

年龄: 78 岁

籍贯: 江苏海门

文化程度: 文盲

职业: 退休

婚姻状况: 丧偶

家庭结构: 本人, 大儿子一家三口

居住时长: 50 多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 陆美英家中, 2004 年 3 月 25 日

陆阿婆的房子不大, 大概有 10 平方米左右, 但由于家居设施简单且摆放得极有秩序, 所以总体布局并不显得拥挤。房间中最有特色最具情趣的细节是镜子极多, 每一件家具都嵌着明晃晃的镜子, 大概是时间久了, 镜子有点模糊。我们去的时候阳光很充足, 暖暖地洒进整个屋子, 原本冷清的房间顿时显得很温馨。一入门的左手位摆着一张四角方桌, 桌上摆着陆阿婆每天必喝的牛奶, 还有刚买的新鲜蔬菜, 可以看出, 这是阿婆平日里吃饭的桌子, 桌

子再外面是一台 21 英寸左右的电视，听阿婆说，看电视是她平时打发时光的主要方式，当然跟朋友聊天也是少不了的。电视机的上方挂着老伴的遗像。房间的最里面是张木质的床，床的右边是一面大大的落地镜。

房子的对面是厨房，厨房旁边有一个小水池，是平日里人们洗东西的地方。弄堂里很狭窄，两个人并排会很拥挤。邻里间经常走动，聚在一起做东西，聊聊天。

问：阿婆，请问您现在家里一共有多少人啊？

陆：四个人。老头子死掉了，早些年就走掉了。（手指着墙上老伴的遗像）我们结婚是解放的头一年吧，大概，我只记得是 26 岁。

问：您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来上海以后做些什么？

陆：我是江苏海门人，没读过什么书，以前在乡下种田的。后来就乘船来了上海，来这里没多久就结婚了。一开始也没到厂里做，就在家做做家务。老头子在外面做洗衣裳板，做做小生意。来上海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房子是自己砌的。刚来的时候（我们家的）情况一般，不算是最好的，后来好了以后又翻修的（面带满意的微笑）。后来我还出去做过事，就是做电灯泡里的螺丝，做得太累了，眼睛有些近视了，看不清了。那时候找工作是拿着图章去登记的，自己找，没人介绍。后来厂子合并成公私合营。我那时工资大概 50 块，也没换过工作，一直做到退休，退休后工资就多了，700 块吧。我大概是 51 岁退休的，72 年吧，年纪大了，忘了。（笑）我老伴也一直没换过工作，一直做到 60 岁退休，后来就死了，那个时候很困难的，小孩多啊！（皱眉）我一共有 5 个孩子，3 个儿子，2 个女儿。

大儿子 48(岁)了,现在已经下岗了。以前在纺织厂,纺织厂老早就关掉了,现在工作也没得做了。(情绪激动,略微皱眉)现在有什么做什么,就只能这样子了,随便做做。(这时来了位阿婆串门)大媳妇今年 47,比大儿子小 1 岁。大媳妇也下岗了,两个人都下岗了,(生气)现在的人啊,其他的方面都蛮好,就是下岗没办法,你说对哦?(反问我,情绪很激动)下岗以后也没有劳保,唉!大儿子和媳妇他们就住在这里楼上,三楼,现在下岗啊,没地方住,两个人住在这里。媳妇也是东做做西做做,没一个好好的工作。我总归还要给子女贴一点,孙子在这里吃吃饭,休息的时候就都过来一起吃饭,蛮好(笑),钱总是不贴的,也没大贴什么,就是吃吃饭啊。孙子在读高中。原来儿子读书也蛮好的,但那个时候“文革”也没好好读书,“文革”啊太乱了!(叹息)

问:那您其他的几个儿女呢?

陆:二儿子今年 47 了,他蛮好的,后来高中毕业后就参军了。参军回来后分到银行,他是蛮好的。(满意地笑)二儿媳也还可以,在药厂,给牲口打针的药厂。媳妇比儿子小一岁吧,孙子也是读高中。(开心地笑)他们现在住在江桥。房子是分配的,一般性(指房子的状况),没啥好。小儿子 42 岁,儿媳 41 岁。他原来在公安学校读书,后来分配到公安局。媳妇在香烟厂,她也蛮好。他们的孩子在读中学,是个女孩。他们的房子是自己买的,周家嘴路上。大女儿今年 51(岁)了。现在下岗了,东做做西做做。她以前下放的时候在海门做做小学老师,68 届插队落户在乡下呆了十年,后来的工作是顶替她爸爸的。女婿也下岗了,以前好像在锅炉厂烧大炉的。他们的孩子还在读大学,上海大学。他们房子是自己买的。小女儿

50了，退休了，以前好像是螺丝厂做的，现在厂也关掉了。女婿老早在科里做的，算是干部了。女婿家里条件不错。（满意地笑了起来）外孙女大学毕业了，在学校里写写弄弄。年纪大了，记不住了。她（小女儿）公公在部队里，房子分配的。

问：您家里有党员吗？

陆：两个儿子（二儿子和小儿子）都是党员。

问：现在和以前的海门老家还有联系吗？

陆：以前有的，爹娘死后就不大联系了。老家那边现在还有兄弟在家里种田。爸爸以前是教书的，妈妈一直种田，那个时候家里困难，小孩多，儿子总是要培养，让他们到学校读书，自己种种田算了。

问：您现在跟邻居相处得都很好的吧？您觉得这里的住房环境怎么样？

陆：蛮好，邻居都蛮好。比老早好了，以前总是停电，现在不停了。

问：医疗保险够吗？您对国家保障还满意吗？

陆：什么叫满意不满意，总有不满意的喽（略带抱怨的笑）。街道的医院蛮好，身体好嘛就好，有点病自己总是要贴的，我脚不好，就是不能走远路，走久了脚就疼。

问：阿婆闲的时候怎么打发呢？平时空的时候做什么呢？

陆：做做家务，电视看看，和邻居玩玩，不到外面去，脚不好。

问：这个房子如果拆迁了准备怎么办？

陆：总归是住分的房子，哪里来的钱买？没钱买啊！也没有钱回迁！

采访人/刘奇琦

40年代来上海做小生意的启东老移民

姓名：孙泽平

性别：男

年龄：78岁

籍贯：江苏启东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妻子

居住时长：48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孙泽平家中，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普通话加上海话

孙泽平家现在的房子，总面积60平方米，上下两层。进门是一个厨房连小厅，门左手是液化气灶，正对门是一个小方桌以及凳子。门右手对着阁楼的木梯。楼上曾是儿女的房子，现在租给外地人。小厅后面连着一个大房，摆着床。

问：您当初是怎么到上海来的？这几十年先后做了些什么工作？

孙：1947年国共冲突最厉害的时候，我坐船（比摆渡稍微大一点的船）来上海的。一开始做小贩。最开始是卖甘蔗，生意不好。然后在愚园路上卖油煎饼。因为物价上涨太厉害，油价飞涨，支撑不下去了，于是就没能再做。然后在华师大附近卖酱油。因为酱油原材料简单，是纯碱，盐酸，色素之类，所以赚

了不少钱。但1949年解放后，公司合营，小生意要收归国营，所以生意也被收走了。但是我没有进入国营企业，自己买了一辆劳动车，做运输。每天可以挣几十块钱，收入算是很好的。做了一年，劳动车也要收归国营，并入运输公司，我就到永兴路公兴路的运输公司做装箱工，一个月50元。收入不如原来，但有劳保，觉得很开心。在这个公司从1959年做到1981年退休。现在我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780元。

问：您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孙：1945年在乡下老家结婚的，是自由婚姻。她（老伴）今年82岁。也是江苏启东人，我们从小认识，一起来上海的。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表姐在纺织厂工作，于是介绍她也进去，她之后就没有再换过工作。但是她身体不好，长期病假，后来提前退休。现在退休工资700多元。

问：您有几个子女？可以说说他们的情况吗？

孙：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今年56岁，他生在上海，读书读到初中毕业。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他一开始做学徒，做钢模。现在是大众汽车厂的技术师，一个月4000元左右。儿媳妇是江苏江阴人，55岁，也读到初中毕业。他们两个因为都住在这里，后来就认识了。她在纺织厂工作。他们有一个儿子，今年26岁，在电力公司工作。我的女儿今年49岁，也是在上海出生的。初中毕业后就去苏北的农场劳动，81年回家到江南造纸厂工作，一直做到退休。女婿祖籍是山东的，但是生在上海，也是初中毕业。他们有一个女儿，17岁，小时候因为发高烧，不能讲话了，但听力还行。她读书读到初中，现在在学电脑，有国家补助300元。现在嘛，我们两个自己负责生活，不需要儿子女儿付生活费。他们平时买点保健品表达表

达孝心,我们就很满足了。

问:你们的住房变动过吗?

孙:刚到上海的时候,住在租的房子里。1955年搬到这的,买的现房,当时两个人工资几十元,买房子一次性要付700元。一部分靠我们两个人的积蓄,另一部分是东拼西凑,也问厂里借了钱。现在嘛,儿子一家现在在杨家桥,买了新房,两室两厅,三个人住。女儿是厂里分配的房子,一室户。

问:你们这个房子如果要动迁的话,你们有什么要求和希望吗?

孙:这个房子如果要拆迁,我们只有等国家分房。因为没有钱买房,我们不打算与儿女同住,只要够老两口住就可以了。我们并没有很高的要求,我们死后就把楼上分给儿子,把楼下分给女儿。

问:您觉得你们这个小区环境怎么样啊?

孙:小区环境太差了,人的素质也不一样。对我们老人不关心,这里没有老年活动室,平时我们也没有什么事好做。这里的违章建筑也没有人管。节假日的时候,小偷还特别多。

问:你们现在和老家还有联系吗?

孙:开始来上海时给老家汇钱的。我的父母都来过上海,解放前母亲到上海来做过保姆,但解放后他们都回去了。父母现在都去世了,所以和老家没有联系了。

采访人/王 洁

祖孙同住的隔代家庭

姓名:周全茹

性别：女

年龄：78岁

籍贯：浙江绍兴

文化程度：文盲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两度结婚，均丧偶

家庭结构：本人，大孙子和孙媳

居住时长：近50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周全茹家中，2003年11月21日

语言交流：以上海话为主、普通话为辅。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全部用上海话。

这是一幢两层(一楼一底)的棚屋。底楼是厨房,光线不好,比较阴暗,日光灯接触不好。有两个煤气灶,橱柜,一张四角桌,房屋四壁油腻。楼上一间房,面积只容一张床,一个高柜。高柜上放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该房间是老太太(被访者)孙子和其媳妇所住的房间。老太太住的地方在对面(一过道相隔),也是一楼一底结构。底楼只是过道。

问：您当时是怎么到上海来的？

周：老乡说上海这边招女工，我就从浙江绍兴坐船过来了。大概50年代吧。一直都是住在这里的，这是单位分的公房。来的时候在上海纺织厂工作，上海八一织布厂。就在这附近，每天走路过去，现在早没了。做工人呀，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三班倒，我一天要做两班。当时工资大概七八十块，在当时是很高的了。现在退休金有七八百元。我们纺织厂是国营的，当

然高呀。

问：您的老伴是哪里人？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周：他是宁波的。结婚，几十年前的事了，记不清了。（注：被访者结过两次婚，老伴都去世了。这里所说的老伴是指后来结婚的，大儿子是她与前夫生的。）

问：您是党员，劳模？

周：什么都不是，就是老百姓。

问：您有几个子女？

周：3个儿子，1个女儿。大儿子没工作的，90年才从新疆回来，他一辈子苦呀，64年就当知青去了新疆，支援国家嘛。现在才回来，又没安排工作，拿救济金过日子，还有自己儿子、女儿要照顾，老婆在新疆就死了。现在我还可以帮帮他们，你说我儿子为国家作了这么多年的贡献，政府总该安排工作吧，结果连户口都是最近才弄好的。你们也要帮我们反映一下的。他两个孩子现在也是做做临时工，他们被拖累了呀，从新疆回来，家里又困难，书也就不读了。二儿子还有女儿都下岗。女儿就在我原来工作的地方，自己找的。只有四儿子待遇还不错，在电力厂工作。以前我们一家人都住一起，很挤的。现在孙子和孙媳妇住楼上，大儿子住这附近。其他的，结婚、出嫁都搬走了。以前楼上是上儿子住的，现在他儿子结婚就住上面，他自己就出去借房子住。现在大儿子照顾我，其实我有七八百块，自己生活也够了，反正有病也可以报销的。他才300多块，有时看他们紧张，我还给他们一点。

问：您的子女的学历是什么呢？您呢？

周：都是初中，赶上“文化大革命”，哪有心思读书呀。我，我那时候哪有读什么书呀。

问：平时在家，你们都说上海话吗？

周：对，都说上海话的，我说得不好。（笑）

问：你平时都做些什么？

周：早上锻炼锻炼身体，去买买菜，做做饭，打扫一下卫生，和邻居聊聊天什么的。和邻居关系蛮好的，我平时就和邻居聊聊天，周围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

问：你知道这个地方要搬迁吗？

周：不会搬的吧，也说了好多年了，也不见动的（老人自己并不太清楚）。如果要搬，也买不起，现在的房子贵。如果搬，最好离菜场近，买菜方便，还要离医院近，老了身体经常出毛病的，最好就不要搬了，现在都是几十年的邻居，都认识，搬到哪里去，你怎么知道周围是什么人。

问：你觉得你周围的居住环境怎么样？

周：还可以的，离街道医院很近，很方便的。我身体大毛病倒没什么，就是腰酸腿疼的小毛病，去街道医院看看就可以了，贵的药又买不起。

问：周边卫生情况呢？

周：你看，我们门前还是挺干净的。我是很喜欢干净的，周围一脏，我就把它弄干净，前面那几家外地人就弄得脏死了。

问：和老家的人有联系吗？

周：还是联系的，老家亲戚不多了，过节的时候打打电话。

问：你对将来有什么希望？

周：也没什么的，就希望儿子、孙子好一点。

省吃俭用盖起了这四层楼房

姓名：阮新中

性别：男

年龄：77岁

籍贯：江苏海门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妻子，大儿子一家，小儿子一家

居住时长：50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阮新家中，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采访时大都用普通话，家庭成员之间惯用上海话。

现在的房子，是1979年4月造的，一到四楼都是自己买材料建成的，一共花了两三万，质量不错，房子盖好后，就没有维修过。

问：您是老上海吗？

阮：不是，我是江苏海门人，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来到上海学习手艺。在木材公司工作。老伴她也是江苏海门人。我们22岁时结的婚，后来就到上海来了。解放后第三年户口到了上海，除了大女儿外，我们其他子女都出生在上海。

问：来到上海后，住在什么地方？

阮：我1944年来的上海。在木材公司工作，之前一直是住厂里的。1949年解放后我结婚，1950年就搬到这里来了，开始租

房子,后来买下这里的房子。我在木材公司工作了44年,87年退休的,每个月退休工资800元,现在公司倒闭了。我老伴她么是在城建局工作,63年参加工作,也做过不少临时工,63年是因为解放妇女劳动力,她才工作的,之前在家里带孩子。她没有工作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出去做事,75元一个月,还要养两位老母亲,不过当时的钱还算够用。老伴她是1981年8月份退休的,退休工资嘛一个月750元。

问：您有几个子女？

阮：6个孩子,两男四女。我们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大女儿、二儿子、三女儿、四女儿、五女儿、六儿子。大女儿53岁,最小的儿子43岁。大女儿是安定仪表厂的,45岁就退休了。二女儿是公交公司售票员,待退休。二女婿在电影院的工会工作。三女儿是保健医生,三女婿在市公交公司开车,他们的女儿20岁了。第四个女儿在农工商做,她的儿子也20岁了,读大专,在南汇读书。小女儿夫妻俩是制药六厂的,都下岗了,不知生活怎么办,小女儿明年45岁可以退休了。小儿子的女儿6岁,他30岁才结婚,老婆是部队里军工厂工作的,工作的条件还不错。大媳妇从崇明农场回来了,有协保。住得最近的本来是大女儿,后来搬走了,现在大儿子最近。小儿子周末回来,平时上班不来,现在家里烧的还是液化气,我就自己买来换,55块一桶。

问：孩子读书情况呢？

阮：5个孩子都是初中毕业,小儿子高中毕业,三女儿初中毕业后读了3年医务工作,读完初中后由国家分配工作。孩子有工作后,家里的负担就小了,小儿子在二十五棉纺厂,现在买断了,不工作了,在外面修复印机,没有劳保。

问：平时儿女们多长时间来看你们一次？

阮：儿女们住的地方离这里都不远，但平时工作很忙，很少来。

问：您觉得是女儿好还是儿子好？

阮：还是女儿好，儿子嘛，只有媳妇好儿子才好。

问：您对现在的生活还满意吗？

阮：现在靠两人的退休金生活，生活挺好。房子是私房，自己与儿子盖起来的。我们刚住的时候还是草棚，57年买的这房子。现在的房子，是79年4月造的，都是自己买材料建成的，当时每天下班回来后就造房子，很辛苦。一共花了两三万，质量不错，房子盖好后，就没有维修过。以前锯木头，每天骑自行车到厂里就要1个小时，干起来真的很辛苦。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儿子，我要养他们，我老伴的父母也只有她一个女儿。那时的日子是上有老下有小，都过来了，不容易。现在的生活好了，我和老伴都有劳保，也不要孩子们的钱。我们也不给孩子钱。可是孙子读大专的钱要给的，孩子们送的礼品我们也不要，过节时回来吃吃饭，吃饭要开两桌，女儿的孩子都生小孩了，四代同堂，一家人共有23人，老大家五口人，老二家四口人，其他都是三口人。

问：您还有什么亲戚，有来往吗？

阮：在海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每年清明节看看，一块去扫墓。

采访人/刁 爽 苏布德玛

逃亡来沪的海门老妇

姓名：李玉蓉(奶奶)、毛伟锋(外孙)

年龄：奶奶 84 岁、外孙 24 岁

籍贯：奶奶江苏海门、外孙浙江

文化程度：奶奶初中、外孙大专

职业：奶奶退休、外孙计算机公司

婚姻状况：奶奶丧偶、外孙未婚

家庭结构：本人，女儿一家三口

居住时长：20 多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李玉蓉、毛伟锋家中，2003 年 11 月 11 日、11 月 21 日、11 月 27 日、12 月 3 日

语言交流：主要使用普通话，有时上海话，家庭成员之间交流的语言是上海话。

老人住在大约 20 平方的套间内，一间主卧房（里间）和既是厨房又是客厅的外间。主卧房空间不大，里面的东西放得整齐，但杂物很多，所以看上去还是很拥挤。房中的摆设也似乎都已带上久远的痕迹，主要摆设包括一台 12 寸黑白电视、老式衣柜以及四方古台桌。墙壁上挂着去世老伴的照片。从老人的主卧房走出来的外间，由于除了充当客厅之外还作为厨房，常年的烟火把房屋的四壁熏成烟灰色，不大的外间放置了待客的沙发、桌子和烧饭的锅碗瓢盆。

目前老人是和女儿住在一起，有一条走廊可以直通女儿所住的院子，包括上下两层楼，老人的女儿上班时所住的房屋都是锁着的，所以我们无法观察到老人女儿的房间。

在采访老太太的整个过程中，老人很热情，身体硬朗。给我们的感觉完全不像 84 岁，说话清晰，特别令我们吃惊的是，老人的普通话很好。

(初次见面,老人很热情,一看到大学生,就拉着我们要我们教她英语)

李:好多年了,我现在都忘记了,我们那个时候读英语,读音不好。我现在要 80 几岁了,那个时候是在中学,一个教会学校,不是在上海。那里老师也很喜欢我的。

问:您小的时候是在哪里生活?

李:我小的时候啊,爸爸是医生,他是院长,在南通,江苏南通县。那里不是有个张骞吗,他呢是个末代状元,这个地方是个教育很好的地方,所以我小的时候受的教育也是很好的。我父亲就是在张骞办的一个医院工作。我父亲是那个,现在叫做书馆医学院里出来的,我母亲也是那里出来的,他们都是医生,在南通学了 10 年工夫。我母亲很早就过世了,在我 9 岁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没有得到家庭太多的照顾。因为我父亲是做医生的,也没有什么时间来管我们,就把我们,我们三姊妹,我是最小的,送到学校里去了。我还记得,那个小学叫做总英小学(音)。我们那个时候蛮活泼,我到现在都很怀念小学时代的老师。那个时候,在南通读书,我们母亲没有了,一直是这个老师照顾我的。吃饭什么的,他们老师是老师的饭菜,我们是我们的饭菜,我们学生天天吃两荤两素,他们老师呢天天吃很好的小菜,这个老师总是叫我拿碗来,夹点虾、肉圆什么给我吃,这个老师真的对我好,现在回想起老师,嗯……所以想想呢,现在的老师不知道怎么样?(笑)在这个好老师的教育之下,我的琴弹得也很好,后来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每个礼拜天礼拜一要纪念总理孙中山先生,我总是帮他们弹琴,我们还要跳舞唱歌,那时候都是全面发展的,那个老师真的对我很

好。以后，我就到教会学校去了，也蛮好的。我们叫×××小姐，她会教我们唱歌，说我唱得好。

后来因为我是海门人，所以就回到海门去了。然后我去学医，后来日本人来了，打仗了，我们逃到这、逃到那……这个时候我的医学已经学好了，我跟我的父亲，他是医务工作者，我是医生。我二姐姐到台湾去了，我大姐姐到贵阳去了，本来也是在这里的，后来她女儿到那里去了，她也就……我大姐姐比我大4岁，现在我两个姐姐都没有了，我也很孤单的……我的子女他们都蛮好的，学业工作都蛮好，现在都被请出去了，在新开河工作，他们一定要他留在那里，每天早出晚归，很辛苦……因为他在那边做小领导。我现在一直都是一个人。

问：为什么会到上海来？

李：那我要工作的。乡下的工作太累了……我在南通受教育，我老伴是上海人，后来就到南通去了，我是海门人，我在海门没几年，大部分在南通，我6年小学，3年中学在那里，后来就出去了。去芜湖，去河口，后来去了……还有重庆，后来就到这里来了，来学眼科。在上海一个厂里的保健队。

问：那您是在哪里工作的？

李：我工作的地方多得很。有溧阳卫生院，国棉十七厂保健队，好多不记得了。在解放初，义务人员很需要，考上就派到溧阳卫生院，工作量很大，8小时工作，一个人要看100多个病人，晚上7点多还要去县政府，县长给我们开会，开会起码到10点。我身体不好，会吐血，后来我想这个工作我吃不消……那时候就30来岁。所以我来到上海，到上海后那时有3个地方请我，我想就选国棉厂，我身体不太好，在工厂里比较轻松。在保健队里，那里分工分不清楚的，医生也做，护士工作也做。

问：那到上海后是一直住在这里么？

李：没有哦。我们刚刚出来很艰苦，尤其是住房，住一个地方别人叫你搬就要搬了，后来就好了，我买了这里的房子，是破房子。这里的房子是我的私房。那没人叫我搬了，我可以安居乐业。上海原来住房是最困难的，早先那时我们一家有 10 个人。

问：您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什么时候？

李：我想想，我儿子现在 62 岁。那个时候不会有安居乐业的时候，日本人来了，我们就逃出去，东逃西逃，没有安宁，然后“12·8”日本人来到上海，这时候我们开始再逃难逃出去，和姐姐、爸爸，在重庆逃出去的时候，是从隧道逃出去，上面轰炸，死了很多人啊……逃到桂林以后还是逃飞机啊！我 23 岁在桂林生了小孩。

问：您几个孩子在哪儿工作？

李：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儿子啊……现在在大学教书。他现在是画家，是美术家协会的，现在在大学里也是搞这方面的，搞建筑，要画画的……本来是在中学的，后来提升上去做教授，已经十七八年了……唉，我家成分不是很好，能够出来很不容易的。我的儿子倒还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学里当老师，他们认为他是好老师，就把他推荐到大学那里，一直到现在，其实他已经退休了，但还是在那里。女儿是重点中学出来的，但那时不让她读书，那时候她成绩都很好，就是因为成分问题，高中出来就叫她工作，分配到最远的地方闵行，其他人都在上海。在那里人家还欺负她，一去就叫她写检查。我女儿那时生我气，去上夜大，说一定要把大学读出来。因为成分不好不肯给她学费，后来她读出来了，在工厂里面很好，现在也很好。

问：那他们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征求您的意见？你的女婿，儿媳妇？

李：这个我的子女都是很看重我的意见的。女婿、儿媳妇都是上海人。

问：听说您孙辈中有人去日本的是吗？

李：我的一个孙女，懂三国语言。分配到工程技术大学，那里有个日本人，她字写得好，然后那个日本人就叫她到日本，做报应的。她到那里就做翻译。还有我那个孙子，她姐姐叫他到日本去，我也没想到，他考进了日本帝国大学。刚到日本的时候很苦的，洗地毯。他很用功，早上洗地毯，晚上用功。然后在帝国大学读书，他们让他留下来，他就带研究生。还有他们一个什么研究小组好像研究出一个什么小东西。他们不放他回来。他现在结婚了，娶了个中国人，也是博士，小孩也有了。我的老爱人也在日本留学过，他是搞建筑的，自己去了日本。他们一起搞了孔陵。我老伴年轻的时候去过很多地方。他去年去世了！（老奶奶说到这里显然不愿意再进行下去）

问：你好，请问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毛：现在自己开了公司，我2001年大专毕业，是学电脑的。有点类似于开放式教育，就是全日制的。我自己选择的专业，就是完全自己路自己走咯。一毕业先给人家打工，后来认识一些人么就合伙了。现在上班也比较自由的，因为自己弄的嘛，只要事情做完就行。

问：那你父母现在是搞什么工作的？

毛：他们……不知道，搞机械的吧。现在我爸爸是……反正在闵行。我爸爸是本科毕业的，我妈妈大专。我爸爸是浙江人，上的是浙江大学。我妈妈是上海电大的。我爸爸是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的，以前是机械厂，也不知道齿轮厂什么的，后来工

作比较好,就把他调到研究所去了。我妈妈好像换过一次工作,是在杨浦区的吧,也是换到闵行。

(儿子对父母的工作情况不很清楚,而且大体知道的与老太太叙述的情况存在差异)

问:你们家亲戚之间有联系往来吗?

毛:嗯,舅舅昨天刚刚来过。原来他们一家也住在这里,后来搬出去了。他结婚也是在外面结的,他在杨浦区。舅舅的儿子在日本。我和他在网上一直联系的,他到日本去留学, he 现在是博士后,留在日本工作。有条件的话肯定回来,那边虽然收入高,可消费水平也比较高。

问:那你们家里平时的娱乐活动有吗?

毛:不太出去,一般都在家里,平时大家也忙,难得休息么睡觉,现在都挺紧张的。

问:那你们和老家还有联系吗?

毛:我爷爷的墓在浙江义乌。就是扫墓的时候去一次。有空么就大家去一次,没空么就清明时候去一次。

问:奶奶,平时家里人都在一起吃饭吗?

李:他们晚上回来,外孙也很孝顺我。他们现在都退休了,女儿女婿都退休了,不过现在又出去工作了。我有时候也到儿子家去,儿子也对我好。钱么,就比如煤气用了多少,我是四分之一的人,就出四分之一的钱,那他们也给我,我也经常买点吃的给他们。总之是有来有去,我们是公平交易。我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就我来用,他们也会孝顺我的。(老太太说到这里笑起来)

问:那您现在白天做些什么呢?

李:我白天就写写字,种种花,我最喜欢种花了,你来看,我门口种

了好多花啊！（说到这里，老人露出喜悦的笑容，一边拉着我去门外看她种的花）看！这是番茄，会结很多的果。这是玫瑰花，老香的！不过，我种的花，有好多被偷掉了！

问：这个社区的环境怎么样？治安呢？

李：这里周围外地人多，外地人都偷东西的，像我白天一个人在家有时候老怕的。那时候门口老是被人扔好多垃圾，老臭的！跟居委会反映，他们都不管的。我拿了扫把去扫，每次扫完第二天那些外地人又扔了好多！

问：那你们想不想搬出这个地方？

李：不可能。因为有外面人影响而导致我们自己搬迁掉不住，不可能，上海的房子就是这样，再老的房子也是值钱的……而且这里老房子方便一点，习惯了。这种么到哪里都有，日本也有偷东西。这个，以前我们工作大厦里都会有人混进来偷东西的，放在财务室里的钱包会没有的。

（说到动迁搬家）动迁啊……那你要叫我搬出去我就只好搬，但是你要给我房子啊。搬出去这个事情，你们年纪轻不会理解的，我84岁了，年纪那么大了，叫我搬到那么远的地方。（老太太露出不情愿的表情）

采访人/王艺璇

退休摆鞋摊的原社科院机要秘书

姓名：严本明

性别：男

年龄：76岁

籍贯：江苏泰州

职业：退休，搭了个修鞋铺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结构：本人，大女儿一家

采访地点和时间：严本明的修鞋摊、家里，2003年11月21日

语言交流：采访以上海话为主、普通话为辅。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全部用上海话。

老人的家在修鞋摊不远的弄堂里，要走上一段很长的阴暗的楼梯，在二楼。屋内光线很好，家具比较旧，空间很宽敞，有客厅、老人的房间、厨房，大女儿的房间分为两间。此外，还有客厅顶上的储物隔层，有梯子通上。

问：您是哪里人？

严：我是江苏泰州人。我13岁就到上海来了。小时候，父母死得早。我以前住在四平路，在虹口区搬了三次，以前的房子都是借的，后来才搬到这里，这是社科院分的。

问：你到上海以后做什么？

严：给人家当学徒，解放前，是地下党，就是给人传传情报、消息，那时候是危险的事。也没有工资，就给人做学徒糊口。那时候小蒋（蒋经国）在上海搞，乱。我1950年入的党，在中央团校华东分区工作，后来团校并入财经学院，财经学院又并到社科院，我就在社科院当机要，就是机要秘书。有时要工作到凌晨3点，没有休息时间的。那时候大家辛苦一点，为国家建设出力。“文革”的时候，干部要战高温，下放到长宁区的单位。

70年代落实回社科院，老了不要我了，就从单位退休了。（老人讲起经历滔滔不绝）我一开始退休金是92块，我是二十一级的干部，在当时是很高的钱了。现在退休金是800多。

问：你上班的时候是走路去，还是坐车？

严：有走路，骑自行车，坐公车（与老人工作的地点变化有关）。

问：您的老伴是哪里人？

严：也是我老家那边的人，是同乡同村的，后来在这边又碰到了。当时她家里穷，我家也很穷，才会13岁就到这边来。她老早就死了。

问：那您有几个子女？

严：3个女儿，1个儿子。大女儿中专69届的，就是刚才带你们来的人，她知青到黑龙江，79年才回来。小女儿知青到崇明，顶替我，一两年就回来了。儿子和另一个女儿没出去。他们几个都是初中毕业。大女儿今年有50多了，儿子大概45，小女儿44，还有一个48。

（中途，老人的摊上有人来修鞋，我们中止了采访，12:00左右采访继续。之后老人回去吃午饭，我们到他家里。）

问：那您读过几年书？

严：读过《百家姓》、《大学》、《中庸》，上私塾，后来，父母死了，就没上了。

问：您现在住的房子有出租过吗？

严：这是单位（社科院）分的。家里的孩子那么多，哪能出租。后来，大女儿知青，其他的结婚以后都搬走了。后来大女儿回来就和我一起住，房子还是比较宽的。现在就是大女儿照顾我，我也会出一两百块钱。

问：您平时一般做些什么？

严：摆个修鞋摊打发打发时间。

问：这里房子拆了，您有什么打算？

严：只能再找地方了，我是不希望搬的，但政府要搬，也只能听政府的。

问：您觉得住的周围环境怎么样？

严：还可以的。

问：您现在还和老家的人有联系吗？

严：老家也没什么人了。（其女儿告诉我们老家已经没什么人了，还有一个叔叔在南京，有联系。）

采访人/金晓燕 边 锐

守着动迁的一家七口

姓名：安小妹

性别：女

年龄：76岁

籍贯：浙江宁波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丈夫，二儿子一家五口

居住时长：56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安小妹家中，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受访者与访员之间绝大部分用上海话，少量普通话。

家庭成员之间用上海话交流。

他们的住房是上海解放初期建起的老式平房，生活环境较为简陋，类似旧区简屋。多为一层至三层的自建砖瓦房屋，样式不一但大体相似，内部以木质结构为主。屋内光线较暗，无单独卫生淋浴设施。采访过程中她的老伴偶尔插话。

问：您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安：我14岁过来的，现在76了。老伴77，他从小在上海，生在这里的，祖籍是崇明。当初我母亲在乡下死了，我父亲在上海，所以我大姨妈就把我送到上海来了。我是在宁波出生的。

问：那您父亲怎么会来上海呢？

安：父亲是旧社会到上海来教书的。是什么样的学堂我也不清楚啊，我那时也就六七岁，就是乡下教书的。

问：您好，您父母以前是崇明的对吗？

老伴：是啊，老祖宗是崇明的。我是在上海生的，父母很早就出来了，老祖宗也有的很早就出来了。我父母生在那里，但不是太清楚他们是怎么来上海的，很早了。当时基本是来做工的，都是来打工的，没有什么做生意的。

问：现在和崇明的亲戚还联系吗？

老伴：有个表姐妹以前联系，现在那儿都没人，都在上海。我就只有一个妹妹，现在住在桃浦那儿。我老伴她有个姐姐去世了，就没了，以前生下来多的，不少到后来就死了。

问：您和您老伴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安：我们一样啊，都是二十五厂的工人。刚参加工作时工资很少，我老头是80多，我60几元都没有（笑）。以前人工工资都很少的，但也维持了这么多人，还有个太婆（我的婆婆）都得负担呢，都靠我们这两个人，我们夫妻两个，还有小孩插队落户，后

来长大了,女儿儿子都结婚了……都是自己这些年来苦出来的。没有退休之前大约 700 多块钱的工资,现在都是 800 多。

问:您和老伴有没有获得先进或者党员?

安:没有,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不过人过团的。

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安:我们 18 岁结婚啊(大笑)。我们那时候都是旧社会啊(男方 19 岁)。我们是自己一起做活认识看见的,是一个厂里做活的(笑)。

问:您家里有几个子女?

安:子女很多,七个,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出去,都出去了。我就一个回来的,新疆回来的那个。现在这个家里住两个孙子,一个孙媳妇,他们夫妻两个,我们夫妻两个。我那个孙子结婚证开好了,没有房子啊。所以我们两个儿子出去了,他们正好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要是他们不出去孙子就没有地方住了。我大儿子今年 58,我 19 岁生的(笑),第二个儿子 56,我说不清,让老头子来说吧。(地老伴插话)第三个女儿 52、53 左右吧,还有一个女儿 51,后面的两个都是女儿,第五个 48 岁,又是儿子,还有个女儿 46,最后一个现在 43 岁,是儿子。他们都是回来结婚的,就是新疆的那个是在外地结婚的,他媳妇是他们这一批的啊,四川人,就是四川到新疆去的。

问:那现在几个子女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呢?

安:一个孙子开出租车的,一个小的(孙子)是在超市里做的,孙媳妇也是超市里做的,可是没有房子不能结婚,没有房子住。现在就大女儿退休了,退休之前她是顶替我的,在二十五厂做工,以前子女是可以顶替的。小女儿、小儿子都下岗了,但在外面自己找着做。之前小儿子是上钢一厂的,小女儿是螺帽

厂的。他们下岗工资现在有多少，这个我们现在也不去问他们的。二儿子那时动员去了新疆。都很多年了，我也记不清到底哪年去的，我那个儿子现在 50 多岁了啊，去新疆的时候才 15 岁，现在刚回来没多久。反正出去的都回来了，一个新疆的还有一个安徽的，安徽是大女儿，插队落户，落在人家家里的。新疆的那个是兵团，很苦的。还有两个没有去，生病所以没去。

问：那孙子孙女中还有在念书的吗？

安：我就两个大孙子，后面的都是孙女。孙女都还小，在念书。一个在她爸爸、也就是我大儿子的那个学校，我儿子是教书的，在中学里，孙女就在她爸爸这里念书。还有一个孙女，我儿子是倒插门到女方家的，那个孙女念大学，现在已经出去了，刚进大学没有多少时日。第三个儿子的女儿念大学出去了。最大的儿子养（孩子）得晚，现在还没念（大学）。小儿子的女儿也没有念大学。现在就两个孙子、一个外孙女工作了。孙女都在念书。一个外孙嘛，在工作，一直打电脑，搞电脑的，不稳定。

问：你们现在的这套房子是自己造的吗？

安：对啊，都是自己造的。47 年造的。那时我们结完婚，正好多余的一些钱拿来造房子啊。我们都是借的房子太小了，当时还有兄弟姐妹住在一起，还有我母亲，四代人都住在一起。只能借了钱造房子，之后再一点一点地还清。现在这个房子从 47 年到现在，也没有重新修建过，就孩子的房子简单的什么的内部弄过。房子现在就是这么一间，楼上楼下两层楼。住很多人啊！儿子、女儿不在，孙子在。

问：房子借出去了吗？

安：(激动)没有，自己都不够地方住呢。

问：子女们都搬出去了，他们住房情况现在怎么样？

安：他们都是贷款，每个月还钱。大儿子和小女儿买房子的，都是商品房。第三个儿子是结婚在人家家里的。大女儿是分房子的，是私房。户口在这里，所以就说是分的房子。小儿子还没有房子呢，现在户口也挂在这里，他住在丈母娘那儿，等这里房子拆了就回来。我们就等着国家给分配了啊！这个新疆回来的二儿子，他没有房子啊，只能呆在我这里，外地回来都没房子。

问：现在家里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安：我现在嘛就和新疆(儿子)在一起混着吃吃饭(埋怨)，拆房子的话大家分开，不拆的话就这样。那几个小的都没挣什么钱，买些衣服什么的，没什么钱的，依靠老的，有什么就大家一起吃点。有时候他们管他们，我们管我们烧，吃在一起吃，没有地方。(笑)

问：退休了平时在家没事情都干些什么呢？搓麻将吗？

安：不太打，就是在外边转转玩玩，花园里走走。女儿、孙子、孙女什么的来的话就买些菜大家一起烧烧吃。平时有空嘛，就到女儿、儿子家里坐坐……他们都出去了，房子都分好啦。

采访人/施文

拥挤却祥和的老年生活

姓名：张菊芬

性别：女

年龄：76岁

籍贯：江苏南通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丈夫，三儿子一家三口

采访地点和时间：张菊芬家中，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采访时大都用普通话，家庭成员之间惯用上海话。

约57、58年盖的房子，76年时翻新。现在的居住环境还可以，房子之间空地很小。前排房子突着，阳台很挤。老夫妇俩和三个儿子住在一起，但不与儿子一家一起吃饭，各做各的。

问：您是上海人吗？

张：从小就在这里，但不是上海的。家乡在乡下，南通的，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在我一周岁时来到上海。我弟弟妹妹都在上海。现在弟弟去世了。兄弟都去世了，只有我们姐妹二人在上海了。我家乡在海边，土地被海水淹掉了。我父母原想搬到外祖母家去的，后来我父亲说，不要靠别人，就来上海了。

问：请问您以前在哪里工作？

张：我在纺织厂，国棉十四厂，棉纺厂。12岁上的班，52岁退休。没有上过什么学。

问：您老伴在家么？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张：我老伴出去玩了，去公园了。他今年77岁，是江苏海门乡下的，我们两人是舅公舅母介绍的。他以前也是纺织厂的，先在杭州工作，后来调到浦东国棉六厂。我们两人结婚后还要养

老人,养两个老人。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那时的工资开始是1.4元,解放后涨到76.4元,拿76元时没有剩余,因为要养五个小孩,还请一个保姆。现在有退休工资,生活挺好的,两个人月收入都是800多元。年轻的时候带小孩很苦。以前把孩子带到厂里的幼儿园、托儿所,后来才请了保姆。那个时候老伴在浦东工作,每周四来一次,平时全靠自己生活。

问:您有几个子女?

张:2个女儿,3个儿子。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儿,老三是儿子,老四是女儿,老五是儿子。老大老二去过黑龙江,去黑龙江插队落户,老大68年去的,老二69年去的。回来后,老大顶替我的工作,他就回来了。女儿不能顶替了,读了书后在哈尔滨做老师,现在回来了。她一开始从黑龙江调到镇江,在农业银行工作。后来去了常州,在那里大学里工作,再后来嫁到了苏州,之后下岗,就回上海了。女儿她回来有四五年了,女婿是苏州人,在一个化纤厂工作,也下岗了。夫妻俩有一个男孩,18岁,不过这个外孙很早就回上海了。

问:您的子女都上过学吗?

张:老大初一时就去黑龙江了,二女儿是小学毕业。三儿子初中毕业,现在搞海运。老四是公交卖票员。老五原在友谊衬衫厂工作,现在饮食店工作。

问:您一直是住在这里的吗?

张:结婚后就住在这里了。房子是父母留下来的,以前这里都是农田,没有房子。这房子是57、58年盖的,76年时又翻新了。现在的居住环境还可以吧,房子之间空地太小。你看前面那排房子突着,我们家阳台太挤了。平时生活不方便。

问:现在和哪个孩子在一起住?

张：我们现在和三儿子住在一起，三儿子搞海运，现在在家中休假，三儿媳在里弄里工作，身体不好也下岗了。他们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做超市提货员。我们吃饭分开来的，各做各的，不与三儿子一家一起吃，我们老人和他们年轻人吃的口味不同，我们吃的饭较软。

问：您的子女之间会不会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呢？

张：会的，但是他们兄弟姐妹的情况都差不多，家中都有人下岗。大儿子大儿媳都在工作。大儿子在饮料公司工作，大媳妇在房产所。他们的女儿中专毕业后在德国留学，三年前出国的，今年要从德国回来了。在大学时，出国学习的费用由大儿子一家承担。他们家庭条件还不错。二儿子的女儿在中学读书。三儿子一年只工作几个月，三媳妇原先在国棉二十五厂工作，也下岗了。孩子学习的费用靠亲戚帮助。大女儿退休了。二女婿开出租车，收入还可以，二女儿的儿子在读书，在立信会计学校读书，18岁了，学校费用挺高的。

问：您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张：现在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我和老伴身体都好。过年过节儿女都会回来，平时也经常回来。总的来说还可以。

采访人/刁 爽 苏布德玛

一层楼一家人，一个联合大家庭

姓名：刘敏珍

性别：女

年龄：75岁

籍贯：浙江宁波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结构：本人，大儿子一家三口，二儿子一家三口，小儿子，女儿一家四口(住在对面)

居住时长：26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刘敏珍家中，2003年11月20日

语言交流：采访时大都用普通话，家庭成员之间惯用上海话。

房子共三层，一楼住着老人和她从小因生病而致残的小儿子，大儿子一家三口和二儿子一家三口住楼上，各一层。女儿住在对面，她有两个孩子。

问：您是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吗？

刘：老家是宁波的，我12岁到上海。当时哥哥在上海一家公司工作，就把我和嫂子带到上海来了。哥哥高中在上海读的，现在哥哥嫂子都死了。哥哥有六个子女，现在都在上海。爸爸妈妈也来过上海，来来去去，逛逛看看，后来都死掉了。他们死掉的时候我大概才47岁。我老伴去年也死了。

问：您那时候是做什么工作呢？

刘：做的工作多了。15岁在光复路别针厂做别针，做了两年就解放了，不工作，国家照顾，每个月发20斤米。工厂关掉啦，发了一个失业证。现在那个失业证还在我家里。后来我东做西做，做得多了，做到22岁结婚，是我同事介绍的。结婚之后么，肚子大啦，不方便。生了小孩，小孩又没人带(要自己带)，

就不好再做了。

问：那您的公婆呢，不帮你们带小孩？

刘：他们在苏州，他们还有5个儿子，还要种田。我妈妈没有事情嘛，就到我家来，帮我带。把孩子养到15岁，我就进了上海石粉厂。石粉厂工作苦啊，把那个石头放到机器里，碾成粉，装成袋。100斤一袋，用车推走。一块钱一天，做了十几年，那大概是七几年吧。

问：您先生，他在哪儿工作呢？

刘：他在上海皮鞋厂，在徐家汇那边。大概解放两年后进去的。他呀，苦，苦得不得了。四个子女，还有我，六个人靠他一个人。做到60岁退休，现在活着的话80岁了。那个时候他的收入33块钱一个月，一直都是。那个时候三十几块钱值钞票啊。那时候米才1角多一斤。三十几块嘛，我们还可以。小孩读书嘛，我再东做做，西做做，厂里补助一点，十块二十块。以前困难啊！

问：您四个孩子他们现在的情况怎样？

刘：三个儿子，一个姑娘。大儿子和二儿子住楼上，小儿子跟我住一起。女儿住在对面，有两个小孩。她51啦，我大儿子53岁。二儿子也结婚了，他比我女儿小3岁，大概48啦。最小的一个也是小三岁，45，属猪的。小儿子脑子不大好，就是7、8岁时一度高烧，抽筋，把脑子抽坏了。我那个时候在里弄里搞工作，没有空啊，是人家把他送到医院去的。没有办法，你想想看，四个子女，我生活又不富，靠一个人赚钱。现在他还是国家照顾的，每个月拿300多块钱。没有办法。

问：你们家一直是住在这里的吗？

刘：不是，我住过的地方多啦。老早结婚的时候住在曹家渡，那

是人家的房子，解放后人家就卖掉啦。然后我就搬到曹杨路，那是借的人家的房子，住了一年人家要用了，我就搬到这里来了。这里呢，地方小，我四个孩子嘛，加上两个老的，有六个呢。一个房间住不下，就买了这个房子，矮房子。一千块钱，这个房子不好，要倒。后来房产公司帮我造了这个房子。

问：您在这住了多少年啦？

刘：我49岁到这个房子，现在75岁，有25、26年了吧。这个房子我们自己造的。六个人造这个房子便宜，大概用了一万多块钱。开头是两层，后来又加的。第二个儿子要结婚呀，住不下。

问：您几个子女、媳妇、女婿他们现在还在工作吗？

刘：那个时候我大儿子读到初中毕业，就到乡下去插队啦。那个时候不是有顶替嘛，后来我退休了，大儿子就顶替我。他现在还没有退休，工资600多块。他困难啊，我们也不搭界（不常来往），他爸爸死他都没来的。他和他老婆到安徽插队的时候就一道了，后来就一起结婚了，上海结的。她爸爸是崇明的，妈妈是宁波的。上海地方大啦，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宁波人很多呢。我二儿子，让我想想。他的单位叫啥啦，忘掉啦。二儿媳是上海人，她就不要提了，一下又结婚，一下又离婚，进进出出，哪能搞得清楚啊。我女婿是环卫工。

问：那您有退休金吗？

刘：有啊。现在国家照顾，750一个月。一年一年加上来的啊。那时候我大儿子顶替，（退休金）只有29块。

问：你们住在这里对这个社区有什么感觉呢？

刘：没啥感觉。私房里面串门的多啊，公房里面就少了，大家门一

关,谁是谁都不晓得。

采访人/张继芳 岳小岭

移民数十年仍操家乡口音的江阴人

姓名：高宝良

年龄：75岁

籍贯：江苏张家港

职业：退休

家庭结构：本人、妻子，小儿子夫妇俩

居住时长：数十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高宝良家中，2003年11月19日，11月25日，
12月2日

语言交流：受访者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致使访谈无法正常地进行而不得不频繁转换话题。在家庭成员内部尤其是被访者夫妻之间仍用家乡话沟通。

现在这间自造的三层楼的木结构房子里一共住着四个人：高老先生和老伴住在一、二两层，最上面那一层住的是他们的小儿子。底层是厨房、饭厅和客厅，面积不大，进门右手边靠墙的是楼梯，不过是从墙角那里上楼的。左手边是一个自来水槽，墙角是一个煤气灶，灶旁边还放了一个类似于橱的东西，对着门的墙靠放着一张圆桌。第二层是他们的卧室，最上面一层是小儿子的卧室。

问：您来上海之前是做什么的？

高：以前在家务农的，14岁到了常熟，然后娘舅介绍做了商店店员。结婚之后就来了上海，1951年，结婚前家里都是农村种地的，村里都算中等水平。

问：谈一下您在上海的工作经历好吗？

高：我最早是在里弄工作的，在居委会工作了大概五六年。上班时挺近的，就在新房子后面，走着去就行。后来工厂招人，我就报名，录取了，做了纺织业技术工人，在工厂呆了34年左右。先是国棉一厂，然后是在三十六棉，最后是国棉二厂。我1987年退休的，现在退休工资一个月750元。

问：阿婆您在哪里出生的呢？

妻子：江苏江阴，也改成张家港了。现在户口在此地。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解放以后有了小孩也读不进书了，身体不好，扫盲扫不掉。我13周岁来了上海，我比他（高老先生）早来。

问：您是在哪里工作？

妻子：最早在马路桥由申厂（音）里，那时14岁，在静安寺附近。后来在江宁路，再后来到第五织布厂，是私人的。我的工龄加起来总共有34年。待遇和福利都还可以，公私合营后，工资还好，但福利下降了。现在我的退休工资一个月800元。

问：您有几个小孩？

高：儿子三个，女儿是老二。一个52，一个50岁，一个49，最小的46。大儿子结婚搬出去的，大概十六七年了，现在在静安寺那边。第二个儿子大概1995年买了房子搬出去的，现在住在松江九亭。女儿结婚搬出去的。小儿子一家还和我们住一起。

问：您的小孩读书读到什么程度呢？

高：老大读到初中，后来到乡下去插队了。那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其他小孩也都是读到初中。

问：家里有没有党员、劳模？

高：大儿子是党员。他1969年起在江苏张家港插队插了5年，然后在江苏南京参军5年。回来以后做了司机，棉纺公司开车子的。2003年下岗了，现在还没找到新工作。（低沉）媳妇也下岗三四年了。去房地产开发商那做生意，五六百块一个月。

问：那么还有三个是做什么的呢？

高：第二个儿子是老师，在工大做外语教师，二儿媳在小学做教师。女儿在江湾镇一家饭店做配菜员，一个月工资、奖金共1000块（缺勤一次扣100，老人家对此颇有微辞），她现在住的是公房。女婿身体不好，煤气公司仓库里看看门。小儿子是大众三汽的公交司机，和小儿媳一个单位。

问：你们的子女多久来看你们一趟？

高：不一定的，路太远了。有时候是一家来的，有时候是约好了来的。算是经常来的。过年过节一般性都一道来。

问：如果这里房子以后要动迁，你们希望提出些什么要求呢？

高：到周围点，乡下不去，要方便。不接受郊区，因为两个人身体全不好。

问：你们对子女还有他们的子女有什么要求吗？

高：他们的小孩看他们自己的本领了，第二个儿子的小孩上海大学今年刚考进。

问：那搬到这里来以后嘛，和老家的人还联系吗？

高：没啥联系。我们很少去，去一趟要钱的，好几百块。

妻子：我们年纪大吃不消到那里去。我们的儿子又不开口。

采访人/司徒丹东 徐慧丽

靠卖臭豆腐为生的夫妇俩

姓名：王洪儒(丈夫)、周成秀(妻子)

年龄：丈夫 75 岁、妻子 74 岁

籍贯：江苏阜宁

文化程度：丈夫小学、妻子文盲

职业：退休

家庭结构：老夫妻俩

居住时长：50 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 年 11 月 25 日

语言交流：王洪儒讲上海话，大部分能听懂，但乡音很重；周成秀不会讲上海话，也听不太懂上海话和普通话。两人之间用家乡话交流。

受访者在—边的平房里自产自销臭豆腐。那是非常旧的房子了，里面潮湿阴暗，各种做臭豆腐的器具和杂物堆积在一起，空间极其狭小。在房子门口，受访者摆了一个小摊，用来炸豆腐。在对面的两层旧房子中，二楼有一间是受访夫妇起居用的。—共九个半平方。里面的家具都很破旧，四周的墙壁也纷纷泛黄剥落。没有厕所，在门外的—个阴暗角落里放了—只马桶。

问：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好吗？

王：我今年 75 岁，祖籍在江苏阜宁，父亲是中医，母亲在家务农。曾在老家读过几年书，与妻子一起到上海，做工人。我曾做过中共地下党，后来还被升为站长。我原来在北新泾尼龙厂（音）工作，现在每月的劳保工资 800 元就是由这家单位发的。1953 年我在江苏阜宁与周成秀结婚，共生了三个子女。我们大概 53 年来上海的，刚刚 50 年了。

问：那您的妻子的经历呢？

王：她今年 74 岁，祖籍也是江苏阜宁。父母在家务农。她没读过书，来到上海后也没工作过，一直就在家做家务。我们一起住的，房子 9.5 平方米左右。

问：你们子女现在怎么样？

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今年 39 岁，初中文化程度，在浦东当驾驶员。大媳妇今年 37 岁，祖籍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上海长大，初中文化程度，现做临时工。他们的儿子今年 6 岁，在幼儿园读书。他们住的是公房，面积是 13 平方米。二儿子今年 37 岁，初中文化程度，在做临时工。房子是借的，十几个平方米，每月房租 300 元。儿媳妇今年 35 岁，祖籍江苏，小学文化程度，也做临时工。他们有一个女儿，9 岁，在读小学。小女儿今年 35 岁，小学文化程度，在做临时工。女婿今年 38 岁，祖籍绍兴，做修理工。

问：那您平时都主要干些什么？

王：老夫夫妻俩卖卖臭豆腐（访谈时，王正在洗臭豆腐，周在一旁看着，并带我参观他们的房子），平时再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

问：如果要买房子的话，您有些什么打算？

王：也就是离医院、菜场近一点，没有太多要求。

采访人/郭素琴

这里都没上海人了，年轻一辈都走掉了

姓名：贾冬梅

性别：女

年龄：74岁

籍贯：江苏常州

文化程度：文盲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结构：本人独居

居住时长：40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贾冬梅家中，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夹杂着方言的上海话

住房描述：自家木板隔置的两层小楼

问：您以前是哪儿的？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贾：我是常州人，今年74岁。16岁出来的，以前在乡下种地啊！后来就一个人出来，跟着人家邻居。一到这里嘛，就在这个（指着屋子后面）厂里面做纺工，一直做到退休。我就是那时候大批退休的呐，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是提早退休的，大概是49岁。厂现在已经拆掉了，在曹家渡，叫个什么厂啊……

就是曹家渡啊！名字我也忘掉了。我的哥哥还是我领出来的，我先出来，借了房子，哥哥又出来的！他在上海锅炉厂，现在已经去世了。脑溢血！

问：您以前在厂里面做过什么干部吗？

贾：干部，我们这种小人物还做干部呢！像我们又没有读过书！夜书（大概指的是夜校之类的扫盲班）读过一年，字也识得，不过也忘记了！年纪大了，脑子也不好了。

问：老伴以前也是常州人吗？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贾：他是江阴人，他什么时候到上海的，我也不知道。我们是29岁结婚的，他比我小3岁。

问：现在家里除了您自己还有别人吗？

贾：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头子嘛，54岁的时候跑掉了（去世了），不在了，17年了。我现在一个人住在这里！平常一个人烧点吃饭啊什么的，还好的。我儿子女儿嘛，两个住在丰庄。平常他们也会过来看看我。

问：您几个孩子今年多大了？他们的工作、生活怎样？

贾：大儿子44，女儿45，小儿子大概是41，还是多少啦……大儿子是在面粉厂当电工，小儿子在制药二厂，女儿已经退休了，在家里。他们都念过书的，后来插队落户啊，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我女儿原来读书读得老好的，以前都是考第一名第二名的，可后来没有上大学啊，插队落户了。插到上海的那个郊区叫个什么……后来我退休了，她就顶上来了，做纺工。那个时候大儿子去参军了，在部队里面。我有一个孙女、一个外孙。大儿子是一个女儿，在读职校，她读书不大好的。外孙在读大学了，自己考上的，他在那个什么地方我还叫不出来呢……小儿子没小孩！没有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种事

情我不知道的。

问：您现在在常州、上海还有什么亲戚吗？

贾：常州啊？我没了，一个都没了！有一个妹妹在乡下，去年也去世了，还有一个妹妹到新疆去了，很多年了。上海也没什么亲戚了，有一个侄子，一个侄女。侄女出嫁了，也退休了，她结婚结得早啊！侄子侄女啊什么，都隔代了也不亲了啊！侄子在什么地方，你们晓得吧，在那个什么的，乘地铁到终点的，我年纪大了，也不想跑了。他现在在上海锅炉厂，顶替他爸爸。哥哥去世了嘛，他就顶替啊！因为我有妈妈爸爸，他们在乡下，年纪大了，要人抚养啊，我哥哥 16 岁就到厂里去做工了。我老头子那边嘛，他是独生儿子。他的姐姐嘛，年纪大了，80 多岁了，都不走动了。她的乡下嘛，还有一个妹妹，没有小孩子，领养了一个。这边嘛，有一个在吴淞，这么远，也不去了呀！要么就是这回结婚我去了。老一辈的嘛，我娘家没人了，婆家嘛，我也不大去。我老头子是独养儿子啊！

问：您和老伴结婚的时候住在什么地方啊？

贾：结婚时候，借房子借了一年，现在也已经拆掉了。现在住的这个 is 买的。买不少年了，有 40 多年了。没有 41 年也有 40 年了。1380 块啊！我还记得的啊！买回来后自己也装修过的，这些都是后来装的。上面的那个“顶”（老人的家是用木板隔起来的二层楼，“顶”就是指二楼）是我们自己搭的，老早没有的。这上面一层就作房间。上面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下面的屋子是纵向的，所以她比划着横向的样子）要比下面大！老早一家人都住在一起，老早还有一个婆婆咧！婆婆 80 多岁去世的。我老头子先跑的（去世）咧，这婆婆也跑咧！

问：您住在这里，邻居间的关系还好吗？

贾：邻居啊，蛮好的。他们……（此时，老人手指着对门的一户人家，小声地示意，也许对门大概是老人认为不怎么好的一家）（然后又提高声音）邻居都很好的。我们平常都阿弥陀佛！（此时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我们看见碗柜上方供奉着一尊佛像）老早也出去打打牌，现在不打了，年纪也大了，也不出去打了。我看见有很多老人家没事情聚在一起打打牌的。

（突然电话声响了，不过好像只是一个打错的电话）

问：这边有不少人家买了新房子都搬掉了？

贾：哎！基本上都搬了，这里没什么人了！很多房子都出租了，租给什么人，反正随便他是什么地方的。我一个人嘛，年纪大了，一般7点钟，就把门关上去了。

问：晚上这里不很安全？

贾：怎么说呢，这都没有上海人了，年轻一辈的都走掉了。

问：您对面的房子都已经拆掉了，你们这里的房子什么时候拆呢？

贾：谁知道啊！拆了，这个房子是儿子的嘛，那就跟着儿子跑了。反正随便儿子了！

问：您身体和精神还好吗？

贾：精神啊，怎么说呢，我一个人在这里，开心一点，别的也没什么。年纪大了，自己开心点，家里面烧点吃吃，外面走走，只好这样子了，是吧？平常就看看电视，我小儿子给我买了个29吋的，在上头，楼上头！我也不大出去，就在这个门口跑跑。买点豆腐吃啊，买点什么吃吃啊，自己一个人吃吃好了啊！喏，（老人指着桌上的面条）中午一个人烧点面，青菜嘛烧烧，一天嘛，好了，是吧！（哈哈哈哈哈……）真的，年纪大了，也吃不多了。吃好一点！你看（指着桌上的虾），买个虾！好吃个两天了。把这个炖炖了，好吃！炖炖黑木耳了，只好这样子了，

你说怎么办呢!

问: 您的生活费是儿子女儿一起分担吗?

贾: 自己劳保啊! 我不需要啊, 我自己有这么多劳保! 800 块。但要是身体有个毛病什么的用起来就不行了。看毛病有医保, 有一张小卡的。怎么说呢, 总归要去看的嘛, 总归有是好一点的。像我们身体不好, 去看毛病, 一次也要出一百多块的, 那么, 国家也要出一些的。哎! 我血压高! 还有心脏不好。我人不舒服了, 就打电话给他们(孩子), 他们就会过来的。他们给我装了个电话。怎么说呢, 我自己一个人过过还可以了。

采访人/刘 缪 徐振宁

同一屋檐下的隔阂两代

姓名: 秦玉莲

性别: 女

年龄: 73 岁

籍贯: 江苏海门

文化程度: 文盲

职业: 退休

婚姻状况: 丧偶

家庭结构: 本人, 小儿子一家人

采访地点和时间: 秦玉莲家中, 2003 年 11 月 25 日

语言交流: 受访者与访员之间用上海话交流, 与家庭成员之间交

流也用上海话。

秦玉莲与儿子一家人住在这里众多旧房子的二楼。楼梯是木制的，通道的地方光线非常阴暗。一共有两间房，一间大的一间小的。大的秦玉莲儿子一家人住，小的秦玉莲自己住。二楼的进门口是厨房，放了炉子、锅和一个碗柜。大房间里有一张大床，家具很少，有一台比较旧的电视机，还有一些小孩用的东西。小房间比较整洁。

问：您祖籍是哪里的？能说说您的一些情况吗？

秦：我是江苏海门人，老伴是江苏扬州人。我是由同乡带到上海来学工的，在织布厂工作。我没有读过书，老伴小时候在老人堂里念书，他小学毕业。我和老伴是五几年结的婚，他的爸爸以前在南京花行里做。我家人以前都是农民。我有兄弟姐妹三个。12岁时我父亲去世，14岁时母亲去世，现在我的一个兄弟也过世了。与老家我几乎没什么联系，乡下也没有亲戚了，只有两间瓦房，是平房不是楼房。

问：您当初来上海之后的工作情况怎样？

秦：到上海第一份工作在华光电机厂，生产电熨斗。后来因为单位效益滑坡，83、84年到爱德工业公司（街道领导）劳动服务所工作，干杂务活。那时候上班全都是自己走过去的。以前老伴在机器厂做泡桶，这个厂原来在陕西北路1399弄，私营的。

问：您没有上过学，是否参加了那时的扫盲班？

秦：参加过，我还拿到过毕业证书呢。那个时候我觉得读书有劲，那时我读得很好。以前在乡下根本不读书，到上海来参加扫

盲班，读得蛮好的。不过老伴他没有参加。

问：那您孩子中，“文化大革命”时有出去插队落户的吗？

秦：儿子没有，就我那小姑娘，死了的那个。如果还在的话 52 岁了，她是 28 岁死的。68、69 年一片红，她插队落户在江西。她以前在中学读书，还是干部，成绩很好。插队落户是她自己报的名，就到江西去了。在江西生了病，一开始说是阑尾炎，后来上海来看病，在第六人民医院，医生帮她检查出来说有一个像球一样大的肿瘤。后来说是恶性的，我求医生救救她，我们有劳保，好药尽管用，可用到后来好药也没用了，用掉不少钱。女儿大概是 25 岁回上海的，在上海呆了两三年就死了。她没有结过婚，连朋友也不谈的。以前在江西插队时也不谈的。有人和她一起插队去的，有一个男生对她挺好，她也不谈。女儿 77 年过世的，77 年 8 月几号走的。有一个阿姨干部很伤心呢。她住院的时候在医院绣了九对枕头。做衣服、枕头，我年轻的时候也会做的。我从小没爹娘，那个时候就向婆婆（邻居）学习，就这样会做了。嫁了老公就在家做衣服，做了穿出去，在单位里洗澡，人家问哪个裁缝做的，我说不是的，自己做的，别人都说做得好。后来生小孩后，小孩的衣服也是我做的。还有做拖鞋，绣拖鞋上的鸟，嘴巴很难绣，但我也做得很好。我手挺巧的，但我命蛮苦的。（用手抹眼泪）自己想想也蛮苦，小辈对我不好，真伤心。想想就蛮气的。我自己坟墓也买好了，只要他们安葬就好了，我自己想想真气啊！（又开始哭）一个娘养十个子女好养，十个子女养一个娘不好养。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像做小辈一样，倒过来了。想到这点我就很气。现在我到他们房间，小孩子就会说，你走啊，走啊。肯定是他们妈妈教的。他们在我这里吃饭，小孙女已经虚岁

3岁了。

问：您这间房子面积有多大？

秦：21.8个平方，这间房子是我吃饭和睡觉的地方，我要了间小间，明年就拆掉了。房间以前我拖得很干净。今后嘛，房子等国家统一分配，我也没要求。对老人来说，医院要近点，离菜场要近点，别的也没什么。买房子不谈，根本就没钱。

问：那您现在平时都做些什么呢？打打麻将？

秦：是啊，也没其他什么。现在有哮喘，哮喘不断根的。我大媳妇买被子给我，我也不太盖的。我大儿子一开始在国棉一厂工作，后来插队落户在金山，后来他们一家就住在金山。以前我眼睛看得很清楚，现在不行了，有白内障。一个开刀了，还有一个没动它。现在两个眼睛都是0.2。

问：您觉得这儿交通方便吗？

秦：这怎么说呢，我也不出去的。

采访人/张 红

同外地人和睦相处的老夫妇

姓名：杨建云

性别：女

年龄：73岁

籍贯：江苏江阴

文化程度：文盲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丈夫，大儿子一家三口，小儿子一家三口

居住时长：27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杨建云家中，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上海话

住房描述：里弄两层式

问：今年多大年纪了？现在有多少人住在这里？

杨：我和老伴都是江阴人。我73啦，58岁退休的。两个儿子，老头子都住在这里，这边是大儿子，那边是二儿子，我们住里边。

问：您是哪里人？您和您爱人是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还记得吗？

杨：我老头子旧社会就来上海啦！我是解放后来上海的，我14岁的时候是在南京工作，后来解放了，51年来上海的。来了上海后，我们就结婚了，好像是52年的时候，记不清了。哈哈哈哈哈……老头子先来的，他家里苦，到上海华东橡胶厂，那时候做童工。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因为没有原料，都关掉啦。后来就改称劳监总厂，老头子81年退休的。

问：你们一开始是不是就住在这里？

杨：不是，一开始是住在美丽园，在橡胶厂工作。后来买在曹杨路，76年3月20日搬到这里的，因为小孩大了，一开始时是比较小的房子，后来贴了钱跟人家换了大的。我一共5个小孩，两个女儿出嫁了。小儿子也是住在别人家里的，春节就大家一起回来。

问：孙辈们的情况怎样？

杨：大儿子的儿子今年初三，明年要考高中。大女儿的女儿今年高三，准备考大学了。小女儿的女儿也是初二，和小儿子的儿

子一样，都是初二。他们都挺好的，小孙子还在这住过一段时间，照顾他。几个小孩读书都还可以，就是以后开销还要大了……现在是两极分化，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很穷。大人吃穿都省给孩子了，我们那一辈人最苦了，有这么多小孩，又要养老的，生活很苦的。我那时候乡下还有一个弟弟，我每月寄钱给他，现在他在县里当干部，过年过节还来看我，对我很感激，我告诉他这是毛主席的恩情。

问：子女中有没有下乡过？

杨：两个去了农场，崇明农场。大女儿在纺织厂，算是考上技术学校，分配时到了农场。大儿子高中，没上大学，也是毕业后分过去的。小儿子考了华东理工专科学校，厂里让他读了两年大专。后来去了日本，去了两年就回来了，现在在公司专门负责接待日本人。两个农场的回来后就顶替，一个顶替我，一个顶替他爸。老头子是在劳监总厂。儿子顶替的那个厂现在已经关门了，当时他是车间支部书记，也没什么技术，下岗工资很低，儿子读书是个问题。我大媳妇老早是在一个做飞机零件的厂，他们的工资比不上人家一个人。现在嘛，有工作的时候就干，反正是做一天休一天。小女儿以前摆摆地摊，卖卖书，后来开了一个书亭。哎，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工作也真是搞不懂，以前是国营最好，现在是事业最好，以前不好的单位现在都好啦，什么教师啊……

问：那您和老伴有没有劳保工资？

杨：都有的，原来单位工资很少的。现在退休工资 800 块不到，加到现在没到 800 块！

问：您和您爱人都是党员？

杨：是吧。

问：你们平时都参加小区里的活动吗？

杨：就是每个月开会，我们是拆迁户，没去。像我们这样的退休工人根本买不起房子。我们有吃有穿，但买不起房子，我们希望有一室一厅。那肯定是要分的呀。以前人家拆迁就是三个人两室一厅。你想我大儿子一家失业，怎么买得起房子啊！而且房价又那么高。以前不拆，我们在这里挺好的，现在拆了，大家都不去整修了，但是拆了又停，烦死了。现在有钱人都去买房子了，我们没贷款，买不起房子。

问：和邻居关系怎么样？

杨：还可以，蛮好的。从76年开始有20多年啦，由于拆迁的原因，一些老邻居都搬走了，现在和新邻居相处也不错，隔壁租给乡下人，和他们相处还可以。

采访人/曲战英 万佳

和邻里不打交道的退休工人

姓名：朱秀怡

性别：女

年龄：73岁

籍贯：上海崇明

文化程度：小学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丈夫和两个儿子

居住时长：33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朱秀怡家中，2003年11月23日、11月24日

语言交流：家庭内部一般以上海话为交流，老人说话还带有崇明口音。我们的访谈用上海话进行。

朱秀怡老人与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上下两层，面积约有70平方米，老人一家实际住房面积约50平方米，其中楼下两间房子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家具很简陋，且看得出来用的时间比较长，只有一台17寸电视机。

问：请讲讲你们当初来上海的经历吧！

朱：我和老头子都是1953年来上海的。之前，我在崇明种田。他是湖北武昌人，14岁开始做生意，后来69年转业，才到上海来的。

问：请问您和您老伴当时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朱：刚来上海时，是我们一个堂房阿哥给我介绍工作的。那个厂子现在改名字了，以前是金门手帕厂，后来又改叫曙光手帕厂。我老伴当时也和我一样在那个厂里做挡车工。刚开始来的那年，我每天都要走到厂里，做12个钟头，六进六出，早上六点钟就上班了，累得很！我还上过夜班，七个夜班做下来，好像是一直在打仗。后来63年从浦东调到浦西，在五角场“五和针织厂”的旁边。上班時間も稍微短了一些，八个小时。那时候待遇倒还可以，90块一个月。老伴也差不多的，还稍稍多一些。但是退休早了，现在退休工资只有800块。

问：那你们当时的住房是怎样解决的呢？

朱：刚开始的时候就住厂里的宿舍，结婚后在浦东借房子住。63

年调到浦西后,就在太平里(现在已经拆掉了)借房子,住了大概有七八年。刚开始的宿舍房子倒还可以,后来在浦东借的房子面积只有十多个(平方米),就一间房,两个人住。后来浦西借的那间房子,也还是觉得小了一点点。以前租这么小的房子也要十块钱,其他的还都不包。所以后来干脆就买了这间房子。69年买的,花了两千多块。买好后,自己后来还曾经翻修过。这房子解放前就已经造好了,买之前就有两个人住,夫妻两个是退休工人,他们响应“动员回乡”的号召,就回乡了。现在这间房子正间是一上一下,各两个房间,大概有70多个平方。上面我们住,下面的两间借给别人住。现在借房子的是两个在饭店里做的。两间房,一间才刚刚借了两个月左右,另一间已经借了10年了,每间每个月才200块。

问:讲讲您和老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好吗?

朱:我们是在一个厂里上班的,所以就认识了。我们结婚是在1957年,那年我已经27岁了,当时像我这样的年龄算晚的了。我老伴比我大一岁。小时候,在乡下小的时候,人家就给我介绍,我要哭的。后来么叫一个算命瞎子算算命,他说我要晚点好,不要早早给了别人,以前人家小的一点点就给掉了。那么后来我就大了呀,人家来给我介绍,我要哭的。(笑)所以说后来上海来么,谈也要谈几年。我和老伴谈了三四年了。

问:那您的儿女们现在怎么样了?

朱:我么,有两个儿子。大的今年45岁;小的今年42岁。但是我们两个儿子和人家两样的,他们就是不要结婚。岁数大了呀,不要结婚怎么办?人家给他们介绍就是不要呀。他们都这样,不是心里面的就不要。后来就成了“低不成高不应”,就僵到了现在。我们大儿子算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之后又去读了

两年技校，学了土建班泥水工、白铁工、电工，后来厂房关掉了，就只好到工厂去做。又在国棉廿五厂做电工做了大概十几年，当时工资也就大概 300 块。后来厂子倒闭了，就下岗了，到现在大概已经有 6 年了。现在么，他在街道里做保安，工资只有 600 块。小的七九届中学毕业的，后来考了上海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中学做老师了。当时的工资还是蛮多的，有 1 000 多块呢！现在么，自由职业，自管自。两个小孩都还蛮听我话的。我们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相互扶持，基本上我们不斤斤计较。

问：那您现在主要还和哪些人保持较多的联系呢？

朱：湖北（指其丈夫亲戚一边）那面基本上已经断掉了。崇明这里我有联系的，主要是和我兄弟、阿哥、阿嫂。平常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打打电话聊聊。有时候还会去一个堂房阿哥那里，他也在上海，已经 80 岁了。有时也还会与现在还住在上海的老同事通电话。但和周围的邻居是不大说话的。你看，我这人没空的呀。聊得合得来的人已经搬掉了，他们买了房子了。和隔壁这家人家啱，我就合不来。

问：您是共产党吗？

朱：我和老伴都不是党员。

问：您平时都比较喜欢干什么？

朱：我是信佛的，但不入迷。开始我去庙里的，但现在我读书读了知道了，我不去了，我就呆在家里了。呆在家里自己自修，看佛经。庙里现在我也不大去了，基本上一年只去一趟，每年正月初九。平时也比较懒得出去活动，像儿子就比较喜欢去公园里锻炼身体。

问：您来这里有多长时间了？这些年这里的变化大吗？

朱：以前我们一点点搬过来的时候，这里人还很少。那个时候，要买一点东西，比如吃个西瓜，就要到老远拎回来。不像现在，样样有了，对吧？只要有钱……交通啦，实在是不方便，你看，要到五角场或者到曹杨路，都乘不到车子，车子站头离了太远了。其他的，像住房，我们年纪大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建个厕所吧，也办不到啊！我们痰盂用惯了……这里的治安也还可以。如果动迁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分两套房子。户口分开，房产簿分开，总归有两套房子的。地段么，最好近点。像我们年纪大了，有什么伤风、咳嗽，看病不方便是吧？不知道办得到办不到，这现在不能由我自己的。退休工资么，只要年年加给我就可以了。我也就蛮满足了。有点担心的是儿子的婚事。现在的小姑娘要求高……像我们这种老老实实的人，就是说中等的人，上也挨不着，下也挨不着。儿子的婚姻大事暂时还很难解决。实际上，虽然我们在随随便便过日子，我觉得我们还是过得很开心的，穷有穷开心……

采访人/叶琼亚 张婷芳

15岁离乡做童工的宁波人

姓名：万超群(丈夫)、林菊香(妻子)

年龄：丈夫72岁、妻子73岁

籍贯：丈夫浙江宁波、妻子上海浦东

职业：退休

家庭结构：老夫妇俩，小儿子一家三口

居住时长：37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万超群、林菊香家中，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访问时夫妇两人都讲上海话。家庭成员间，老夫妇俩和儿子讲上海话。他们三人和儿媳妇讲普通话。小孙女上海话和普通话都会讲。

万超群的房子上下两层，总为30平方米。顶层小间，15平米。进房正对着吃饭用的方桌，凳子和橱柜。门左边为煤气炉，以及其他厨房用品。方桌左边有一小间是楼梯间，放杂物。楼上两层是老两口及小孙女的卧室。大卧室放有床和电视，但家具比较陈旧。顶楼为小儿子夫妇的房间。装修稍微新一些，有沙发。

问：请问你们老家是哪里？又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呢？

万：我是浙江宁波人。以前是农村的，那时候生活不好过，我15岁的时候（1946年），亲戚就介绍我来上海讨生活了。

问：那么刚来的时候住在哪里呢？是亲戚的房子还是自己租的？

万：刚刚来的时候年纪小，没什么好工作可以做，就在火柴厂做童工，所以厂里就管饭吃管地方住。都是工房，条件不怎么好，但是总算是有了地方住了。

问：住在那里多久？后来又搬了地方吗？

万：在厂里住了三年多吧，到1949年的时候，解放了，很多工厂就停工了，工人们都等上海总工会安排，一直到了50年的时候复工，我还是被安排在火柴厂做工人。不过那时候就有了工资了，4毛钱一天，一个月就12块。就当时的水平来说，还算比较好了。那时候也是住在工房里面的，8个人一间。那个厂是个私营企业，到56年的时候，厂里生意不好，做不下去

了,就转了厂。当时的火柴厂是属于轻工业局的,分配都是同系统内的分,我就转到纺织局,做了生产毛巾的工人。厂里实行的是多劳多得,按照每个人做的量发工资。我差不多平均一个月100多块。因为我刚刚进去的,不是劳资户,是劳资户的话,一个月就150块了。那时候还是住在当时的纺织局的房子里的。纺织局开始是公私合营的,58年以后就转为国营了。后来有了点钱,就在中山公园附近租了房子住的,到66年的时候,就买了现在的房子,有了自己的房子了。那时候房子很小,就30平米。买的是1000多块钱,差不多是10个月的工资。房子开始很矮,我儿子1米8的个头,进门的时候还要低头。后来就加盖了一层,上面也是30平米的。到儿子要结婚的时候没房子住,就又申请翻修了。在上面又加了一个小房间,15平米,地方很窄。

问:那您一直没有换过工作了?您是不是党员?在厂里有没有得过什么奖呢?

万:我是一直在毛巾厂做到退休的。88年退休的,本来应该拿到提前退休两年的工资,但是也没有发。现在退休工资加起来差不多700块左右。我在纺织局做的时候,就是一般的工人,不是党员。那时候获得过“先进生产队”的称号。我也没什么文化啊。以前上过扫盲班的,差不多念到了初中,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就没念过书了。

问:您和老伴是什么时候认识、结婚的呢?

万:我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在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和同一个厂里的工人。结婚以后呢,因为我妻子年轻,喜欢跳舞,我就很反对她这点。那时候我们都已经有三个小孩了,但是我说了很多次她就是不听。后来,她就犯了错误了,和一个别的男人

有关系。我发现之后，就跟她父母讲了，想要她父母劝她，也原谅了她。但是她还是不改，我就决定要离婚。我告到了区法院，但是那一回是被法院判和解了。但是我不服，觉得不能这样过下去，于是就再去告，第二次告的时候，就离婚了。判了她六个月，那个男人因为违反了婚姻法，就判了一年。到了62年的时候呢，厂里的党支部书记介绍我和现在的妻子认识了。她本来就是上海人，但是是郊区的，浦东。也是我们厂的工人。然后我们就结婚，一直生活到现在了。

问：那么您孩子现在多大了？结婚了吗？

万：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59年生的，是在上海生的。他念到初中毕业就去参军了。去了山海关，一共呆了3年。然后就回来了，自己找工作。他开始是在塑料厂做模子，后来他们的老板贪污，厂就倒塌了。新来的老板是个台湾人，他不要原来的工人，所以我儿子就没工作了。后来他自己又去找了一家公司，是物业公司，去做修理工，修水管啊、电器之类的。他已经结婚了，我儿媳妇是杭州人，但是也是在上海出生的。他们俩现在有一个儿子，已经16岁了，上初中三年级。成绩很好的，一般都考三四名的，所以我们都希望他能考个好大学。我大儿子他们一家现在条件好多了。他们是丈母娘的拆迁房，是一室一厅，不过比我们条件好了。我小儿子呢，是1964年生的，他念到了高中。毕业后呢，就到化纤厂做了电工。后来那个厂因为环保问题就被关闭了，我小儿子就下岗了。下岗了以后他也自己找了一家公司，是私营企业，也是做电工。现在工资才700多，而且还没有三金，生活也不是很好。不过他现在还有事情做，比下岗要好。他爱人呢，是外来妹，是安徽来的。现在也还是安徽户口，不是上海的。她以前是在酒店

做服务员的,后来结婚了就换了工作,到托儿所做。他们也有一个女儿(当时正在房间内玩耍),是2001年生的,再过两个月就要两周岁了。我小儿子结婚晚啊,就是因为没有房子。像我们这样的情况的,那时候很多都是因为没有房子不能结婚,所以他一直拖到了38岁才结婚。不过他爱人年轻,才28岁。为了要结婚,我们就申请加盖房子,就在老房子上面加了一小层,也才15平米。就这样结婚的。小孩子呢,还小。不过她爸爸妈妈也没有时间照顾她,都要上班,所以就放在托儿所里面,到了下午我们就去接她。然后再回来做饭。

问:那您现在家里的开销是您儿子负责还是您负责的?

万:现在都是我们两老的退休工资,都是一个厂的,差不多都是700多,加起来嘛,就1500左右了。我们两老人,还有小孩子,有时候他们两口子也回来吃饭,平时生活我们退休工资就够了,不需要他们负责。他们就管自己的生活就行了。而且他们的工资也不高的。我们现在可以自己管自己的开销,就尽量不要他们花钱买这买那的。我们住在这里,生活水平低,花销也不是很大。不过我小儿子经常给我们买东西的,他工作太忙,也没有多少时间回来。

问:那就是日常生活都是您和老伴管的?家务啊,买菜做饭啊,照顾小孩子?

万:对,我们俩现在还能动,就是老了,身体走不动,做事情慢啊。不过也没有什么事情,一天嘛,就洗洗衣服,买买菜,接小孩子回来,再去做饭,也就做这些事情差不多一天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很快的,我们也不急,就一点一点慢慢做吧。

问:那您儿子们是毕业后就参加工作的吗?有没有下乡插队?

万:都没有的,大儿子就当兵当了3年,小儿子高中毕业就工

作了。

问：奶奶您好，您和爷爷平时除了做点家务什么的还出去活动吗？

林：我们这里地方小，交通也不方便，而且我们身体也不好，我高血压，心脏也不好，一激动就胸口疼，所以也不能去哪里动。而且菜场也比较近，所以一般都不怎么外出。而且，这里离商业区远啊，就希望离轻轨近一点，这样就方便点。而且这里住的人，哪儿的都有，很多外地人，也有很多生活过得比我们还穷的人，小偷也很多。治安不好的，很混乱。要是治安好一点，我们也可以安心点。

问：现在马上就要拆迁了，您希望将来是什么样的状况？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想法？

林：现在其实我们也不想要钱，希望政策是分套房子给我们。因为如果是补贴买房子的钱的话，我们还是买不起房子的，到时候就没地方住了。将来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想法了，都活了一辈子了，什么事情都见过了。就是希望小孩子都能好好念书，上好大学，不要走歪路就好了，要做有用处的人。

问：您现在和老家的亲戚还有联系吗？或者还有其他地方的亲戚？

林：现在都没有联系了。我本来还有一个姐姐，现在算起来 80 多岁了，出嫁以后就住在浦东，现在因为年纪大，走不动，不然还可以去看看，现在很少联系了。我姐姐生活过得比较好，她的几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在大学做教授的，所以她现在过得很不错。我老伴呢，也有哥哥姐姐的，但是现在也是年纪大了，也不联络了。就我们俩过过日子了。

从烂泥房起,不断翻修 18 年

姓名: 蒋月娥

性别: 女

年龄: 72 岁

籍贯: 江苏江阴

文化程度: 文盲

职业: 退休

婚姻状况: 丧偶

家庭结构: 本人,小儿子一家三口

居住时长: 50 年左右

采访地点和时间: 蒋月娥家中,2003 年 11 月

蒋老太的家大约 40 个平方。有两层楼和一个阁楼。底层进门是一间客厅,客厅里放置着一张桌子、三四只凳子、一个鞋架和一些家用电器,其中包括饮水器、微波炉、电饭煲(小型),都比较陈旧,这些器具上沾满灰尘,看上去已经用了很多年。底层里面一间是卧室,是蒋老太的儿子和媳妇住的。里面放置着一台电视机、一台缝纫机和家具,都是老式的。二楼有两间房间。其中一间是蒋老太的卧室。有一间阳台、一张床和一些家具。另一间是蒋老太孙女的房间,放着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些小饰物。顶层是一间阁楼,堆放着一些杂物。

总的来说,底层比较阴暗,客厅有灯但很昏暗,家具比较陈旧、简陋。

问：请您说说您当初来上海的过程好吗？

蒋：我的祖籍是江苏江阴，8岁来的上海。当初是和嫂嫂的女儿一起来的，到上海后就在姑姑家带孩子。10岁左右，经阿姨介绍，去帮人家做事，也就是带带小孩，买买菜，洗洗衣服之类的事。工资只有10万元，那时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吧。拿了钱不舍得用，家里还有兄弟姐妹，我是最大的，总是把钱留着带到乡下。

问：那您娘家共有几个兄弟姐妹呢？

蒋：娘家有七个兄弟姐妹(加上自己)，有三个弟弟。一个弟弟没有读书，下面两个弟弟读过书，大约20岁时(已经解放了)，就当了兵。我们那时在老家种地，很苦。种得到(粮食)种不到(粮食)都要给(租)。我父亲是做长工的，乡下7人只有1亩1分田。家里养活不起我们，还好附近的人给一些衣服。刚到上海时，因为上海纱厂的纺车很高，我太小不能做。

问：您上过学吗？

蒋：没有，以前哪有机会啊。小姑娘是不读书的。后来解放后上过扫盲班，不过要上班，前教后忘了。

问：您退休前是什么单位的？

蒋：我是上海第二十五纺织厂的。退休前做过很多工作：挖阴沟，挖防空洞，拖劳动车。还在泰山制药厂工作了3年，但没有工龄。最后是在二十五厂工作的，是自己到工厂去写号码的，就是自己去找，去报名的。以前的工作有的是托人介绍的，有的是自己找的。以前上班都不乘车，再远也是靠走的。每天上班8个钟头，开始时是29元每个月，之后一点一点加上去，到现在700多元。

问：您当时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吗？

蒋：我不是党员，以前在单位也只是普通的工人，也没有得过什么奖状或是荣誉称号，所以社会活动算不上多。我老伴倒是党员。

问：您是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蒋：结婚之后，大概是 22 岁来的，直到现在。

问：那您退休后的情况如何？

蒋：退休后，本来我们的房子是烂泥建的，下雨天会漏水。我用了 18 年时间修房子。是从老头死后 2 年开始的。现在房子有 40 多个平方。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身体，我有胃出血的毛病。以前上班假也不请，请了就没工资了。后来退休后，还要工作，在一个大学里做清洁工。为了造房子向人家借了很多钱，上班还债，身体更不好。

问：介绍一下您老伴的情况好吗？

蒋：他是江苏江阴人，我的公婆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来上海了。他是在上海生的。他们以前是种租来的菜田。解放后国家收回，他就三建工作，拿 76 元工资。他已经走了 20 多年了，以前吃了许多苦。51 岁死的，退休后四个月，是生癌症死的。他退休前在上海市三建公司上班的，普通工人，也没有获得什么荣誉过。

问：那您的几个子女呢？

蒋：我有 2 个儿子，2 个女儿。大儿子 47 岁，小儿子 45 岁，大女儿 52 岁，小女儿 51 岁。他们都成家了。小儿子结过婚，又离婚了。他们有一个女儿，现在和我住在一起，她在杨树浦的一个中专学建筑设计。小儿子在市三建公司食堂上班，和女婿一起混混。大儿子现在下岗了。以前是市政建的，厂现在关门了，最近到一个大学做保安。大女儿退休后回到上海，前年买

的期房，在大场，有 99 个平方哦。他们贷款了十几万。小女儿原来住在静安寺，后来拆了，搬到长桥。小女儿的儿子还在读书。我几个孩子以前都是中学毕业。儿子都没下放过。大女儿正好是 68 届的，下放到崇明，30 岁才结婚，小女儿也是 33 岁才结的婚。我现在和儿子媳妇一起，不过我们不太罗嗦。小孩不贴家用，家里是靠我一人。以前孩子下岗，最近出去做，工资很少的，只有 300 到 400 元。他们管他们过（日子），我管我过。

问：周围的环境怎么样？这里周围锻炼的地方有吗？

蒋：周围没有什么活动的地方，只能到公园活动。现在只有在家里活动活动，做做家务。再说，和周围邻里有一点小矛盾。不过，看病还是比较方便，在街道医院，比区医院近一点，条件蛮好的。

问：如果这里拆迁了，您对新房有什么要求？

蒋：看毛病，买菜要近一点。年纪大了乘什么车也搞不清。最好离孙女学校近一点。拆了的话就等分房子，没有钱买房子的。最好能跟媳妇分开住，能和孙女住。

问：对子女、孙女有什么希望吗？

蒋：希望儿子好好工作，孙女能有出息。我们年纪大了，飞不高也跳不远了。过去（能逃过）海防扔炸弹，活到现在已经很好了。

在访问的整个过程中，蒋老太基本上情绪很平静。老太太人很和气，可能是她不太健谈，而且在谈到有些事情时对我们有所顾虑。但当说到解放前，她和丈夫为了养家糊口，到处奔走；刚退休，老伴就病倒了；为了房子的翻修，仍要外出工作这些事

时,老太太禁不住流泪。她的儿子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不满意,满腹牢骚。

采访人/高 鹂 金美花

五个人 21.6 个平方

姓名: 史昌琴

性别: 女

年龄: 72 岁

籍贯: 浙江嵊州

文化程度: 文盲

职业: 退休

婚姻状况: 已婚

家庭结构: 本人、丈夫,大儿子一家三口

居住时长: 31 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 史昌琴家中,2003 年 11 月 21 日

语言交流: 上海话

问:您今年几岁?籍贯哪里?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史:我今年 72 岁,1932 年生的,浙江嵊州人。16 岁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上海,汽车、火车,坐了一天多的时间。过来就住在亲戚家,在曹杨路,借的私人房子。1972 年我单位分房子才到这。当初来的时候,我在纺织厂工作,工作是我伯伯介绍的。刚来的时候还没有解放,多劳多得,解放后就讲定额了。我每天走

着去上班,没多少时间,就十几分钟。刚开始要做 12 个小时,6 点到 6 点。这个工作我一直做到退休,退休以后就没再找事情做。现在退休工资一个月 800 元,老头子大概比我再多十块钱。工作时,我在自己工作的小组还评到过先进,1976 年还入了党。

问:您的老伴什么时候到上海的?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史:老头子今年 77 岁,也是浙江嵊州人,小学文化程度,他比我还早到上海。他来上海第一份工作是在拉链厂,很小的厂。一直是这份工作,解放时厂关门了,他就回去了。回去后在乡下呆了两年,再出来,劳动局介绍到大众汽车造拖拉机,后来并到大众汽车厂。大众效益好,退休了过年还有 1000 块,天热有 300 块。他家上海也没人的。我们两个人认识,是因为他的外婆和他的妈是我们村的,以前不认识的,之后我们就在乡下定了亲,到上海来结婚。什么时候结婚想不起来了。现在和老头子两个人总归相互扶持、承受,也不像年轻人冲撞,身体都不好。我们老头子心脏不好,不好受气,他有什么地方不对,不去顶撞他,顶他一句马上心脏痛起来,血管堵塞,要上医院的。平常我们在家里,就看看电视,也没有什么娱乐,文盲。没有条件,老头子么要看报的。

问:您有几个子女?

史:我有 3 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最小。两个儿子,大的 52,小的 49,都下岗了,在外面做。大儿子 18 岁参加工作,以前在粮店做经理的!属粮管所。现在下岗已经五六年了,国营的粮食局关掉了,自己在别的地方找工作做,一个月 1 000 多。他不是党员。媳妇和儿子差 3 岁,初中毕业,生也生在上海。现在在家里,一个月 200 多。她下岗之前也是在

粮店工作,卖粮食,也是18岁毕业分进去的,1200多元一个月。一个单位管的两个地方,一个普陀区,一个不知道什么区。几个孩子学历都是初中,以前文革没有书读的。我一个孙子18岁,海运,今年刚考进去。一个孙子15岁,外孙17岁。女儿结婚以后就搬出去了,不在一起,我们家房子小。女儿出嫁是自己的房子。不过我女儿每个月都会来看我们的,现在新房子买好了,搬了,但每个月还是回来的。平时也给我们买东西,东西每个月都要拎过来的。买些衣服,春节还给点钱。

问:您现在和周围的人以及老家的关系怎么样?

史:和邻居的关系还可以。以前工作的时候和单位里的同事关系也还可以。现在父母都没有了,兄弟还在,乡下不回去了。家乡话也只有碰到同乡人才说说。

问:住的房子有没有翻新过?

史:没有,这里是公房,造得和私房一样。现在家里有儿子、媳妇、孙子、老头子。房子没有出租,自己住都不够。我们是公房,只有一层,后面一分二,这个是自己搭的,违章的。5个人只有21.6平方,平均一个人四点多,以前分配不够条件,4个平方刚刚出去,没资格分了。现在和儿子住在一起都很好,我们不舒服他们总归要关心的。

问:住在这里,觉得这里的生活怎么样?

史:环境还可以,比较安全,不是很乱的,前面么有偷掉东西什么的。这里以前有医疗保健站的,现在没了。比如我年纪大,打针,六七针,每天要跑到街道,么么就方便了。河边健身的东西,坏掉了,拆掉了,早晨就只好在河边做做操。

问:这里要动迁?您有什么意见?

史:讲是要动迁,动也不动了,本来是10月份的,现在又不动了。

登记也登记过了，就等。没房源。现在留在这里的都是没有经济条件的，条件好的都买房子出去了。越等越僵。现在房价越来越高，更买不起了，本来像我们这样十几万，一室一厅二手房也很好了，现在不够了，要二十几万，那么多钱从哪里来？只好跟他走了。动迁后能到哪？这个也不好说的，现在的形势都是郊区，这是没办法的。形势都是外环线外面，内环线想都不要想。

采访人/卞雅艳 邓晓梅

自己孩子，决不能像对面家三个吸毒的儿子

姓名：吕雪芬

性别：女

年龄：71岁

籍贯：江苏无锡

文化程度：小学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丈夫

居住时长：27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吕雪芬家中，2003年11月21日、11月26日

语言交流：上海话

这是一幢4层楼高的老房子(每层楼里一间，中一间，外一间，

每层 25 个平方左右)。被访人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我们进屋子时,她正坐在小板凳上摘菜。在一楼外间,我们提出了访谈要求后,访谈就在轻松的氛围下开始了。

问:您是哪里人?能讲一下来上海之前的情况吗?

吕:我是无锡人。那时候我们还小,乡下苦啊。你们现在都生活在甜水里啊(笑)。上海条件好,通过介绍就到上海来了。大概是 1950 年来上海的,17 岁,解放以后来的,解放时我 16 岁。我来的时候,爸有的,妈已经没了,我 17 岁就没有妈了,27 岁爸也没有了。苦哦!来的那时道路封锁,你们都不知道。以前乡下苦啊,现在老好的(现在无锡很好的)。无锡那儿没有到上海打工的,来打工的都是苏北、安徽、江西的人。

问:家里有多少人啊?

吕: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像我这种年纪的人,(3 个小孩)是少的。我哥哥有 6 个(小孩),我姐姐有 7 个(小孩)。我不像他们养那么多小孩。我不喜欢小孩。(为什么呢?)当时太苦了,我在纺织厂做的,三班制,从早做到晚。带小孩苦啊,所以我不要(很多)小孩。当时上海纺织厂很多的。我(生的)第一个是儿子,下一个是闺女就不要(再生)了,一子一女不是挺好?但第二个又是儿子,第三个再生总算是个女儿。(笑)很顺心。(笑)那时(工厂)三班制,小孩都没有人带。老人都在乡下种地,我们出来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孩子还小,我在上海做工,没时间带他们,就把他们留在无锡农村,很苦的。没有办法,我们夫妻两个都要做工,没有时间。那时候大家都苦的。

问:您老伴是做什么的?他是哪一年来上海的?

吕：同年来上海的，我们两个以前是一个地方的。23岁时结婚，是56年吧。我们是同乡人啊，一起回去（老家），大家认得的，就熟悉了（笑），就这样自由结婚了。不过他比我出来早，他14岁就出来学生意，还要苦。后来村长的老板在上海开了个小印刷厂，他就来做学徒。现在已经退休了，天天出去玩。也到股市里去玩玩，就是旧里证券交易所，在街道医院对过。我们70岁过了，有老年卡，去公园玩不要买票了。（很悠闲的）（笑）你们以后年纪大了还要开心呢，社会发展呢，人越来越开心了。我孙女本来也考华东师范大学。我要她考华东师大，她不听话，要读法律，以后做个老师不是很好嘛。我大媳妇也是华东师大毕业的。

问：您和家人的文化程度怎样？

吕：我小学毕业，马马虎虎。我到上海之后也一直在读，读夜校，纺织厂不要求我们读书。解放前，书都是藏在袖口里带进带出的，门口要查的。以前不自由的。不过小学读书的字都忘记了（笑）。不像现在可以公开读书了，厂里也办夜校。当时是在江宁区读书的，就是现在的普陀区。以前我工作时还做过小组长，评到过厂里的先进，我做工不偷懒的。老头还是党员，我不是。我几个孩子，大儿子只有读到高中。二儿子读的是中专，女儿也是中专，都没有读到大学。大儿子在三个人里读书比较好，后来到农场去了，没能好好读书，去农场时只有18岁。

问：如今孩子们的工作、家庭情况如何？

吕：大儿子去过崇明农场的，去了8年。本来可以进我的纺织厂，他不愿意啊。在农场很苦的，现在又做股票了，废掉了，工作都不要了，没工作。不听话，就让他去。现在股市不好啊，以

前股市好的,投在股票里的钱现在全套牢了。现在他就在家里玩,和他爸爸一样,炒股票。我老伴喜欢活动,喜欢打乒乓。天天出去打乒乓,现在还没回来。我嘛,在家里做家务,买、汰、烧(笑)。大媳妇现在在外面做会计师。他们小孩在华东政法读书,今年考取的。

二儿子以前在橡胶鞋厂工作,表现得不错。厂长看他蛮聪明的,就批准他在外面读书。(他)在科室里做了好几年,后来厂要倒闭了,没办法维持下去了。厂长和他关系蛮好,就同意他出来做,但每个月要交 1000 块给厂里,那么领导就放他出去了。后来厂倒闭了,关系也没有了,就弄了个社保。后来厂里和他拗断,给了他 2 万块钱。他没工作了,现在拿低保要义务给居委会扫地的,他肯定不肯的,就去温州打工。他是有技术的,设计师,自己要读书的。喜欢画图、设计,就在温州厂里设计鞋子。一个月回家一趟,呆三天就走。有时候来看我,有时候就来一个电话。一年也难得来的,五一、十一、春节,他们离这里远,平时又没有时间,小孙子每次来都会晕车。媳妇是无线电厂的,这种厂也不好的,无线电都卖不出去,也签了社保。现在就在家照顾小孩,也不上班了。现在他们一个在外面做,一个照顾照顾家里也是可以的(笑)。孙子还小呢,现在小学五年级。

女儿在做居委会主任。以前在这里做的,后来调到那边去了。也有一个小孩,是外孙女。现在在工艺美校。高中没有考取,争取以后还能考大学。老二对她说,你出来到我的厂工作,画图,搞设计。

老二当时也是美校出身。老二结婚很晚的,到 30 几岁才结婚(笑)。老二找对象很麻烦的。当时他厂里给他介绍了六

七个对象，他一个也看不中，搞得我们急死了。他却一点都不着急，他说养小孩有什么要急的，你们养了我们这么多小孩最后不是还靠国家？反正有劳保的。他道理倒是的，不过不是什么靠不靠的，小孩早点大起来总归好的。他讲，不要紧，养个小孩玩玩，真吃不消他。东看不中，西看不中，这个媳妇算被他找到了。她（媳妇）住在淮海路，我们住在这里，讲起来她住在上只角，我们住在下只角。我们儿子和一个照相馆的老板很好的，这个老板和我们媳妇又认识的。开始她说戴眼镜的不要的，我们儿子戴眼镜的，后来两个竟然谈上了（笑）。我想，这就叫缘分吧。后来她父母，也是住在淮海路的，跑到我们家里看一看，也蛮满意的。媳妇比二儿子小8岁，今年33岁。

问：您家的房子是怎么盖上来的？

吕：房子是我们自己后来造的。开始是借人家的房子，（房子）原来只有11个平方，要呆很多人。很小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以前马路高，房子低，下雨嘛房子遭殃。所以当时一定要盖（房子），没有钱借钱也要盖。76年盖的，翻修盖了两层。后来陆陆续续，到现在四层。我们两口都是工人啊，当时（月）工资只有36块。当时造房子很苦的，儿子只有10几岁，女儿8岁。是借钱造房子的，当时就天天吃咸菜，（指着外屋一口缸）就用这个装的。我儿子给孙子讲，爸爸小时候苦啊，天天吃咸菜，小孙子说，我也要吃的（笑）。偶尔吃好吃，天天吃就难受了。当时造房子缺材料，都是老头子找人帮忙才解决问题。现在房子是很大了。这房子有四层楼，只有我们两个人（和老伴）住。我们住在上面，下面不住人。这是餐厅，里面嘛，我们看看电视。小孩都自己买好房子了，以前都住在这里

的。他们能独立自主,也好。大儿子搬出去3年了。(是单位分房吗?)自己买的房子。他单位都没有,怎么分房。当时房价还可以,20几万(笑)。二儿子搬出去一年多了,买的二手房,复兴公园那里,46万,6000块一个平方。现在还要贵不少,买的时候也借了不少钱。女儿出嫁了,现在住在曹杨五村,那里也蛮好的。我们住这里也有不方便,就是没有卫生。开始没有,现在要改得出不少钱,也就算了。不过浴室倒是有的。

问:您平时还讲无锡话吗?

吕:无锡来人了就讲无锡话。无锡话比上海话好听(笑)。孩子也会讲。他们都在无锡长大的(笑)。第三代也都会的。

问:平常在家里干些什么?日常生活开销怎样?

吕:平时就看看电视,做做家务。我们现在两口一个月有一千五六百块退休金,子女不补贴的,大家(经济上)不来去的。也还行,1000多块也花得完的,吃、穿,还有要送东西给小孩啊,孙子、孙女,一次给个50、100块。平时自己吃些鱼啊、虾啊、副食品啊,肉现在很少吃,对身体不好。早上经常吃麦片啊、奶粉啊,老头子糖尿病,不好乱吃,奶粉都吃低糖的。喏,橱上面的药酒就是无锡乡下亲戚到上海,带过来的。他们自己弄的。老头因为有病,偶尔吃上一口,这酒不好多吃的。小儿子也有毛病,脂肪肝,也是偶尔吃一口。大儿子也是脂肪肝,都是富贵病。他们现在都老实了,不敢多吃。平时子女也会送补品给我们,自己不买的,他们每次来都送东西,一送就是三四千块。我们现在生病,两口有医保的。小孩没有,卡是都有的,但卡上没有钱。我们两口卡上有钱的。看病么,我们就去中心医院、华东医院。不过蛮远的。小病就在街道医院看。老

头糖尿病，每个月都去街道医院看，药费也挺贵的，还好国家出一部分，自己出一部分。以前100块自己出20块，现在自己要出40块。医药费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街道医院便宜，但这些糖尿病的药那里没有的（拿出来给我们看，还有糖尿病专吃的奶粉），只有去大医院看。

问：房子拆了之后，准备买房子吗？想买哪里的？

吕：准备买。最好在这里买，在这里住惯了，太远就不去。总归要靠着一个小孩子，但不要靠他们养的，我们自己有劳保的，房子拆迁也有钱拿的。

问：住在这里还觉得方便、习惯吗？

吕：住在这里交通不方便，没有车子乘。会骑车就骑车，方便得多。现在调液化气也近了，就在对面。以前叫人调的，骑车要有一个钟头的路，毕竟年纪大了。现在调方便，老头子去调，5分钟就行。不像他们年轻人，我们在这里也习惯了，邻里都认识的，关系蛮好的。这里的治安也基本还行，以前这里吸毒的人很多，你看对面的那个开小店的，三个儿子都吸毒，开始就是先认识了一些不好的人，这些人都是外来的，不是我们上海人的，后来就吸上了，再后来就被抓过，但是还是改不了。你想，吸毒这要多大开销啊，他们没钱就去抢，去偷。真是不学好啊。把家里都败光了，唉，这么大的人了，还要整天的看店，也卖不了多少钱，可怜呐！他这三个孩子，以前都和我们家的从小一起长大的，但是，你看看，现在！唉！真是的。我就告诫我孩子，不能和他们一样，我孩子就说，妈，放心吧，我们有分寸，我孩子现在也不大和他们来往了！

问：这里的居委会怎么样？

吕：这里居委会不行的，我女儿也是居委会干部，在新的小区工

作,比他们干得好多了。我们家3个小孩,只有一个女儿有工作,两个儿子都没有工作(笑)。

问:那您现在对孩子有什么希望?

吕:希望他们读大学啊,找到一个好工作啊。女儿的小孩17岁了,也想考大学。

采访人/陈博华 张昱辰

解放后来上海做钳工的海门人

姓名: 闵光华(丈夫)、马杏珠(妻子)

年龄: 七十多岁

籍贯: 均为江苏海门

文化程度: 均为文盲

职业: 均为退休

家庭结构: 夫妻俩,儿子一家三口

采访地点和时间: 闵光华、马杏珠家中,2003年11月21日

语言交流: 受访者与访员之间、与家庭内部成员用上海话交流。

这里的环境比较脏乱,房屋分上下两层,老式结构,水泥地,房屋内部十分昏暗,家具也都是老式的。

问:你们家以前是什么地方的?为什么到上海来?

马:江苏海门。解放的时候来的,在乡下没事情就出来找工作。

问:来上海后一直住在这儿吗?

马：来上海以后，一开始是借的房子，搬了好几次记不清楚了，好像也是在这附近。刚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借房子么随便什么样的算咧，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我们当时结婚是在乡下结的，那时候我大概是 22 岁吧。后来到上海来么，房子就借借，对吧？当时么谁有房子空么借借算了。

问：一开始到上海找到什么工作没？

马：一开始做做临时工，有什么做什么。有工作就做，没工作就不做。开始做的样式多了，缝纫工……我老伴在轴轮厂做，现在退休了。那时候，他每天早上六七点钟走，乘公交车，以前都是乘公交车的。晚上下班时间说不定，五六点钟，六七点钟，七八点钟，还一直有加班的，大跃进什么的。他做钳工，工资以前很少的，只有几十块。那个厂现在没了，以前是在幸福村。以前不认识人，哪里有工作就到哪里去做。里弄里看谁没工作就带谁去找工作。他一直就在那里做，我就有工作就做，没工作就不做。我老伴退休有二十几年了。退休金啊，六七百块，七八百块。我也有退休金，棉毛衫厂发的。后来我就在那里一直做到退休。一个月也有 700 块钱。

问：您以前在厂里面是做什么的？钳工吗？

闵：我啊？哎，我们么过去这种手艺人么，只好这样的。我们过去年纪轻的时候么，讲难听点，文化不好呀，文化不高呀。

问：您家里有多少人？有没有人是党员或者团员的？

闵：嫁出去的也算的话有五个孩子，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小孩都是在上海出生的。我们家啊，团员有很多，党员么我们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倒有好几个。小女婿么是部队里啦，肯定是的。大的女婿么，是在织布厂，他也是知青，和我女儿在江西是一道的，回到上海来么……他是党员。他在车间里么，人员是他

调动的,甚至供销科也是他负责的。回来的时候原来是纺管局下面的,是大集体。他条件也还可以。因为什么呢?他讲起来人也蛮忠厚的,做事情也蛮踏实的。

问:那你们家那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人评到过劳模啊或者各种奖什么的?

闵:这个呢,小的女婿大概蛮多的,小的女婿呢他以前部队里奖励蛮多的。因为什么呢,他上次和我说,他档案里……那么其他人我不太了解,我也没有问过他们。两个人呢基本上还可以。大女婿呢,动力科,厂里面动力设备什么的,大型设备什么的,他也还可以。

问:你们以前读书读到什么时候?

闵:以前没读什么书,你问我几几年我也讲不清楚,因为没读什么书。以前很苦的,到上海也很苦的。要做工作,工作很重的。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也没有固定工作,有的话就做,没有就待在家里。这几年日子好点了,也有劳保了,以前只有两三百块生活费。

问:那你儿子和媳妇的文化程度高吗?

马:儿子初中毕业就去工作了,就到他爸的轴轮厂。后来没有换过工作,现在没工作做了。媳妇她是上海本地人,老家是淮阴。她嘛读到一半就“文化大革命”了,和我大女儿一样。你们也都知道的,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读书。

问:那个时候不是有上山下乡吗?

闵:这个有的,就大女儿,其他都没有。在江西。那个时候都是叫十年插队嘛,她没有十年,插了9年。就是修地球,修地球你懂吧?她是69届的,78年回来的。去了9年呀。回上海后,服装厂招考,她就去考,考上了就去做衣服,在里面做得蛮好。

一开始做质量管理,后来到供销科。后来那个厂卖掉了,就搞小锅饭,弄了七八十人到宝山去开了个小范围的小厂,让她去负责。但是路太远,也不太熟悉,后来就调回来还做供销科。国外有个厂让她去,她厂里不放,那个时候已经40几岁了。她就向厂里提出来要出去,后来厂里也没办法,就放她出国了。尼加拉瓜,太平洋和大西洋交界的那边。本来是去3年的,回来正好可以退休了,但是后来看那边情况也不是很好。因为那个老板是台湾人,后来就回来了,一共去了两年半。但是回来了以后又想到国外去,那边的老板也让她去的。我就和她说那你就去吧。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条件总归也比较好。但是主要考虑的就是家庭,比如对我女婿来说会有什么影响。我也不能做主,只好让她参考一下。她两个妹妹也让她不要去,但她坚持要出去,最后还是去了,又去了3年,回来了以后她又想出去了,她两个妹妹还是让她别去,就在上海找个工作算了,找一个什么两三千一个月的工作。因为她的技术还是过得硬的。在那边也是车间里的领导。后来她就不出去了,找了个厂,原来是美国人开的,专门搞进出口的,大概有两千多一个月,快过年的时候老板发了4000块钱奖金,老板也挺客气的。看她条件也可以的,因为她对于衣服是内行,能够“吃”得住。后来调到一个德国公司,一个月有400块美金。出去一天有几十块补助费,这个厂分部的加工单位多不过,澳门呀,都在外头的,甚至安徽都有的,现在这样下来也有四五千块一个月。

第二个女儿也是做服装的。第三个下岗了,单位把她养起来了。最小的女儿也是做服装的,我几个女儿都是做服装的。小的这个条件还要好咧,怎么好呢?当时她在袜厂做,公

司倒闭后,棉毛衫厂招人,她报纸上看到就去参加考试。她有个条件,因为她读过夜大学,当时招考的单位接外国来的单子,都是英文的,单子上有样式、颜色这些都要翻成中文的,其他人都不懂,就她知道些。她丈夫也比较好,是军人大学的,按部队里来算是B级,在电脑里算工程师,现在在一家公司搞自动化,电脑间里面是由他专门负责的。他这个人么蛮精的,公司要订货什么的,他比利时什么都去过的,搞电脑设备啦。

问:那你小女儿的丈夫是上海本地人吗?

闵:他不是,也是苏北泰兴。他是乡下到军校去读书,部队分配到广州,我小女儿那个时候也在广州军区,也是搞电脑的。他家不在上海的,和我女儿结婚后,随军家属可以带着跑,我女儿不同意,他就想办法调到上海。高桥那边也是他们部队一个系统的,他这种调动不同于我们的商调,什么叫商调呢?就是你同意放,我同意要,不是这样的,他这个调动要通过总政的,由于他这个级别总政要考虑全面,经过研究放他过来。高桥在浦东,我们是上海的,我女儿不同意,后来过二三年他就转业了。他条件也有,单位自己去找,只要找到单位要这边就放他。公司看到他的档案通过市政府就要他了。他原来在广州军区住的是三四层的房子,房子是部队的,转业了不能带走。后来他在高桥也有房子,到了公司单位给他在曹杨新村那边买了一套房子。房子六七十平方,市里面讲起来说你这个级别这种房型是不够的,最起码要两房一厅或者三房一厅,就补足他差价,贴了他一些钱。绿地集团在那里盖了一片房子,在中间有几幢小高层,就买了一套。大概有130个平方。现在在装修。不过代价也很大,花了70几万。小女儿就这样,大女儿刚才说过了,三女儿也是吃这个饭的,反正我三个女儿都

是吃这个饭的。

问：你儿子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闵：女的。她是这样的：当时初中毕业考高中有两考的，她当时考了个护士医药学院，到厂里做医师。她分数蛮高的，这个学校啦，录取了，那么录取了二考就不好考了，考的话她还是要考高中，假使不录取的话。那么现在她录取了，不好考咧。现在她在这个医药学校读第一年。

问：那你的女儿们的小孩呢？

闵：大的女儿呢，小孩在北京，在北京么，电视里不是看到吗？美林阁美林阁，蛮灵格蛮灵格，现在在北京开分店。算大堂经理，原来在上海的一家分店。就是北京开分店，调到北京去了。他读书读到高中，他爸让他读大学，那么这个小赤佬他不要。高中什么地方读的我倒不清楚了，不记得了。高中以后么就工作了，现在在北京美林阁做，现在做的蛮大咧，一天营业额要几百万。这是大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女儿。现在读到大学，她是读什么的呢，她是读服装的，设计啦什么的。第三个呢，大概今年考大学了，第三个女儿啦。那么小的那个也是女儿，现在大概初中二年级吧，15岁嘛。小家伙成绩倒蛮好。她在学校里考试年级里总是十名之前，年级里呀。班级里么总是一二名，年级里在十名里面。她（指小女儿的女儿）自己条件也蛮好，怎么蛮好呢？她老早读书的时候呢，小学开始就学画图，基本上每个礼拜去的。还有就是做《小主人报》的小记者。当时她们学校里是挑选出来的，诺基亚赞助的，和江西挂钩的。当时她在学校里一个是画图，《小主人报》，还有一个英文。

问：孩子中，有谁现在还和你们住在一起？

问：儿子，儿子呢原来是我自己单位里的，我单位是轴轮厂啦。住在一起的。四个女儿结婚后都搬出去了。第三个，现在买在铜川路那面的也是高层，就是铜川路那个……法院对过，那个叫什么什么公寓里面，买的这个高层。她买的时候便宜，30几万，装修毛40万。她这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男的，是大众汽车厂的。他是宁波人，他条件怎么好呢？是慧大啦，怎么说慧大呢，不是说难听，你找不到啦。怎么办呢？他一样都不要的，一天到晚就是买书看，他现在大概是车间里的技师。那么什么道理呢？他原来只是个工人啦，怎么出来的呢？他呢，原来是在一家厂里面当电工，那么大众厂招考，他就考取了，招考的时候么他自己厂里做了一段时间咧，那么只好放掉。当时他做电工，也蛮钻的。我女儿那个时候也在那个单位，大家是在技校里读书的，医疗器械厂的技校。他这个怎么样呢？讲给你听，我叫他慧大的啦。只会赚钞票不会用钞票，怎么样子呢？年纪轻轻的人，麻将不会搓的，香烟不会抽的，老酒不会喝的，那么你年纪轻轻的人这种东西不会么不是慧大吗？不会消费的啦。人是蛮老实的啦，对吧。人是蛮忠厚的。也不像人家丢三落四的，他蛮仔细的。那么厂里对他也蛮重视的。节日里面，国庆节劳动节加了三天班拿了2000块钱咧。什么道理呢？因为他一次三天，这个里面呢平均工资是3000块。他要比别人翻一个倍。他们车间里面，自动线上的电工都是他负责的。那么他算这个里面的班组长。而且，基本上大众汽车厂里面的工人比外面要翻个倍。

问：那他单位里住房公积金什么也都有的咯？

问：哎，这个都有的。这个不买的话钞票又拿不着的咯！那么他

现在大众里车子也买好了。桑车，2000型的。他每天上班呢，厂里面条件好在什么地方呢？上班去，你车子不买，厂里有厂车的。你买了车子，厂里给你1000块一个月，贴你油钱啦。车子开去，厂里停车场咯什么都有的。那么假使几个大众厂的买房子买在一起，今天你开你的一部车子我坐你的车子，明天我开我的车子，好省点油钱。对吧？这个都是什么找找窍门啦。那么他是这么一个情况。有时候礼拜天么车子就开出去。

问：另外几个女儿的房子呢？

闵：那么第二个女儿原来的房子在这一带的，是个筒楼。她的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在原来动迁地上改造的。那么隔壁人家的房子呢也有个筒楼，后来隔壁搬掉了，因为不是产权房，是私人房，所以就买下来了，搞了七八万块钱，这几天也在装修。那么这两个女儿呢，还可以，怎么讲法呢。第二个女儿呢，现在也退休了，退休么，大概拿个九百块千把块钱一个月。她现在搞什么呢？专门在人家药店里推销营养品。专门一天到晚在外面跑，上海所有药房都去过的，都认得的。那种营养品，还有什么痢痢头搽的药水啦，生意做得倒蛮好的，她的老板还给她拿几千块钱。她先生呢，原来是化纤厂的设备科。化纤是做这种人造棉里面的丝啦，那么这个厂呢是倒闭掉了。他52岁，他这个人呢，应该是厂里面做两三个月就待退休处理的，但是厂里没有这样做，他年龄没到，因为和厂里面领导关系也蛮好，那么怎么办呢？拗断，一刀切。但是他这个一刀切，现在停下来两年工龄，社会里、街道里、社保局里还可以拿400多块生活费的。拿了两年以后呢好退休。那么厂里面一刀切，一刀切以后呢给了他9万多块钱。这个不搭界的事情啦。他

这个经济条件也比较好啦，他这个厂要倒闭的时候呢，这个台湾老板在太仓开了一家厂，和原来一样的厂，你厂里面倒闭到我厂里面来。对吧，到我厂里来，合同签好，那么他合同签的时候呢先给他一万块钱。那么你到我单位里来呢，签5年合同。5年合同么年薪5万。这个条件不是蛮优厚吗？对吧？当然他本身有这个能力到这个地方去，那么他厂里下来一刀切还要拿这些钞票咧。那么这个第二个女儿呢条件也还可以的。对吧？反正呢，女儿条件都还可以。

问：一大家子内部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呢？

闵：内部的经济情况自己调节。自己调节呀。因为什么呢？我两个小孩呢，实事求是讲，不像人家小孩，为什么道理呢？人家小孩要讲的啦，开口了。那么他们呢，小孩呢，手里条件好，经济基础有，他不要你们开口的，平时有什么情况呢，到年夜的时候他钱会送过来的。三百五百这样，都会送过来的。到年夜，几个小孩，都拿2000块过来。我想这2000块钱拿来么我也可以过了，假使他不拿这2000块钱过来，我年也一样过呀。对吧？我们这个实事求是讲。那我也不去问他们讨的。他们晓得如果我乡下有什么事情了，像我原来侄子，乡下要结婚了，他们不要讲的，几个人凑起来，2000块送去了。这个是建筑在什么啊？建筑在经济基础上的。没有什么你要问他讨。我们老头子老太婆要出去啦，问他们要，我也不问他们讨的。假使你不给我，这桩事情我也要去的。他们给我么，我去的时候可以客气点啦。对吧？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呢，虽然说我的儿子，是条件比较差了点，他原来是我单位里面的，但是我厂倒闭掉了。那么他现在生活呢，厂里面拿400块钱生活费。厂里面其他的人呢，都拗掉了，他拿400块生活费。他现在在

他阿弟开的一个手机店里照顾照顾，那么进货渠道啦什么的。儿子他下岗了，协保协议签掉了，经济条件不及他几个阿姐啦。那么怎么办呢？像我的小女儿，他女儿读书了，几百块钱拿去，读书去。到年夜里都甩过来了，她们不要开口的。晓得兄弟的生活情况，也蛮体贴的。不是像人家家里“乌里嘛里”（沪话，有隔阂不舒服）。她们有时候生活贴补，那么我其他开销没有的，就是买点菜。也不要让几个女儿回来说我贴给你钞票你贴给他们啊？这种事情么也不好。“阿拉儿子蛮苦的”（阿婆语）苦呢，也不是，相对讲起来，对吧。

问：觉得你们住的这个房子怎么样？

闵：我这个房子么一上一下呀。我这个房子大概总归是70几个平方吧。儿子住在上面。

这个现在嘛定居定好来，没有办法咧。

问：不准备动了吗？

闵：怎么叫动呢？假如我现在到外面去，动，经济条件也要有的，现在不是几万块房子就可以买的。外面商品房价钱你们也了解的。对吧。所以现在也叫动不起来。

问：你们二老退休在家做些什么事情？

闵：有什么事情做啦？东跑跑西跑跑玩玩，没地方做了。每天么小菜场跑跑，买点菜来。下下棋，这种娱乐地方多了，对吧，高兴跑去看看。这个生活也太枯燥了，待在家里的话。

问：那你们这里讲过要拆迁什么的吗？

闵：讲是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拆迁，本来是讲去年和今年就要动了。后来是人家反映，上面也考虑了，为什么呢，房价太大了。像我这种房子，根据现在要是买的话，5000块一个平方，40万块钱，我要到外面买同等面积的房子我买得起吗？买不起的

呀。拆穿了讲,现在买房子总归是要买大一点的咯。再加上你装修呢,这点钱不够用的呀。条件你总归要给我创造好的咯。我现在是你拆也好不拆也好,我也无所谓了。加上我们这种年龄也不像什么要求高来兮的,那么他们小青年呢应该讲起来要求高了,装修一套房子的地板,大概是三房两厅两卫生,130个平方,一套地板咯也要2万多了。那你想想看。那么他这个条件,他有条件对吧啦。这个是2万多,还要好点的也有,对吧。柚木地板不是一般的地板,一般的地板假使几千块要买也好买了。现在买的2万多的。这怎么说呢,这不好这样讲的,上海现在生活水平两极分化距离拉得很长。不像过去解放前穿的老蓝布都是老蓝布,解放前算好的了。现在不是这回事。

问:你们这里一开始说要拆迁的话是把你们安排到哪里去?

闵:安排在哪里?我们也不太清楚。安排得远呢我也不想去。为什么呢?我四个小孩,基本上都住在这里,都在这里周围。假如这里拆迁你把钞票给我,讲得难听点,这点钱我到海门市里去买套房子可以住得很舒服了。我一样的钞票好买一两百平方米了,乡下市区里房子不像这里房子价钱大呀,2000块钱一个平方。30万买150个平方的房子很大了。但是我想我这样的年龄买这样的房子,我要收拾房子我还要佣人呢,做清洁工作。所以我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想想也算了。小孩也不会要我到乡下去,虽然现在交通方便了,但到底也要两三个钟头。有什么意思呢!小孩不会同意的。要他们跑一趟,这么多时间,不可能的。我们小孩说是说的,如果这里有近点的房子,像二手房,就买。这个么到时候看了。

问:那个时候说这里拆迁一个平方给你们多少钱?

闵：当时呢，这个东西我现在说难听话啦，原来这里拆迁办当时是说按人头算的。一个人给你6万块。人家不肯跑了，吵了闹了不肯跑了，吵到房地产公司。那么人家公司和我们不搭界的呀，他们给我们一个人6万块。现在动迁户呢一个人只给你28800。还有31200给区里面、街道、动迁组都分吃掉了。老百姓手里是没有钱了呀。那么这样摆得平吗？那个时候打架打得肋骨断掉，打得头破血流的都有。专门有一批打手的，你不服帖就打，这样的。现在是不允许这样做了。

问：您对您将来的生活有什么打算？对您的儿女、孙辈有什么期望？

闵：我这个条件呢，也是我自己创造的，我也不希望靠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还过得过去，对吧。我要靠你们什么啊，我不来依靠你们，你们也不来依靠我蛮好的。就这样一回事啦。对他们有什么希望啦？那么这个条件自己创造了，靠他们自己。要么关照关照，生活条件关照关照。一般我不是讲难听话，到现在一个人也蛮自卑的，那么大的年纪了，有什么呢。有几年好活啊？拆穿了讲。

我们还是可以的吧。这个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说有钱的人呢，用了算，用掉多少再算。没有钞票的人是算了用，一样的用。对吧，这个是根据自己条件来的。又没有什么标准一定要用多少钱。

问：这里的治安情况好不好？

闵：治安啊？治安么怎么说呢，这里一般说来也没什么好不好的。这个地方安静呢晚上也是蛮安静的。现在么，有些房子借给什么外地人了，他们都不管的呀，晚上吵咯闹咯，我

们怎么样呢？只好自己注意点。像我们晚上八九点钟么就睡觉了。他们不管的，晚上照样乒令乓啷的，像门口菜市场一样，以前还保持畅通的，现在一辆车子开到这里也开不进来的。但是这个便当呀，跑到门口就能买点青菜什么的，这个两方面的，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我说随便什么事情不能极端的啦。

问：你们那个时候从海门到上海来，现在海门那里还有人吗？和他们还有来往吗？

闵：我们姐妹是四个，一个阿姐在杭州，她是解放后出来的，我是解放前到上海的，四几年来的上海，49年解放的嘛。50几年了。和老家的人还来往的，我乡下还有一个兄弟，我过年回去。今年上半年刚回来一个月，我在乡下待了两个月咧。兄弟家也还可以的，还可以。

采访人/周雯娟 李莉莉

这个地方不称作“小区”

受访者：盛民康(公公)、谢佩娜(媳妇)

年龄：公公70多岁、媳妇40岁

籍贯：均为上海

文化程度：公公中专、媳妇高中

职业：公公退休、媳妇列车员

婚姻状况：均为已婚

家庭结构：盛民康夫妇，儿子一家三口

居住时长：70 多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盛民康、谢佩娜家中，2003 年 12 月 10 日

语言交流：采访时大都用普通话，家庭成员之间惯用上海话。

三层小楼，房间内基本上都堆满了各种物品。

问：请您先谈谈您的工作情况吧！

盛：我从小就一直住在这里，我爸爸在后边那个厂里工作，后来我就在那里做学徒，学了几年自己就在那里工作了，在那里一直做到退休。现在每个月到银行去领退休金，大概 1 000 多一点。

问：能说说您的家庭情况吗？

盛：我家里有五口人，我们老两口，还有儿子一家三口。孙子现在在上学。老太婆身体不好，住院了。儿子媳妇天天都要加班，忙不过来，我又照顾不了，所以没办法，只能请了一个人照顾。中午儿子媳妇都不回来，我自己随便做点东西吃，再去医院看看。老太婆没病的时候在家里也不能做事情，都是媳妇做的，她下班回来后做，中午我一个人稍微弄一点就行了。儿子在淮海路上的一个公司工作。媳妇在铁路上工作，是列车员，所以总是不回来，要天天随车跑的。他们不给我们钱的，老太婆自己也有退休金，所以我们自己够了，他们的钱都是他们自己三口花。

问：您对现在的住房满意吗？

盛：还可以吧，这个房子是我家自己建的，原来我小的时候，就只有一楼，后来我结婚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翻修了一下，造了三层。

问：您平时在家里都做些什么呢？

盛：早上起来之后看看电视，然后做点东西吃，再去医院一会儿，就差不多了。有时候有个人，我们两个会在我家里下下象棋。太老了，不想出去了，而且老伴身体不好，所以我们都不去外面。就是在家里看电视。

问：那如果要搬迁的话，您有什么打算吗？

盛：国家会给我们安排的。地理位置我希望还是我们这里，这样干什么事情也方便一点，不然搬到郊外，那里干什么都不方便。至于大小，我希望最少要三室吧，不然我们家人也没办法住呀。我们肯定不同意买房子的，现在房价那么高，我们怎么买得起呢？所以补贴钱也没用，我们还是房子的。

问：这个地方的环境您觉得好吗？居委会和你们联系紧密吗？

盛：环境啊，不是很好，太乱了，而且也很脏，居委会倒是蛮好的，经常会来问问我们。

问：您好，请先谈谈您的工作情况吧！

谢：我的工作招工考进去的，在列车上跟着车做服务性工作。上三天休息三天，有时候加班的话还要跟着加班车。我每天坐轻轨上班。

问：那您在工作的时候是什么职务啊？

谢：就是列车员。我不是党团员，也没有什么劳模之类的。平常生病啊都有医疗保险。

问：您是多大时候嫁进来的？当时他们家是怎样的？

谢：我啊，25岁，当时他29岁。嫁进来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个老外婆。现在我儿子在技校念书，丈夫在液压纺厂上班，在淮海西路，他是骑车去上班的。他搞销售，每天上班8个小时。他也

是毕业分配的，以后一直没换过工作，一直做到现在。我跟我丈夫一个月能开 2000 多工资，跟老人一起花用。老太太现在在住院，我公公照顾她。她不住院了在家里的的时候也是我公公照顾她。家里平常做饭都是我做，我上班的时候他们就随便吃吃了。我嫁进来以来一直住在这里，没搬过。我们家也没有知青下放什么的。我娘家就在前面。我天天去，很近，没事就过去。

问：那您平常在家的的时候都做些什么？这里小区有没有活动？

谢：做做家务啊。我们这里没有小区，不称小区。都要拆了还什么小区。没什么活动的。这里的环境也不好，很脏的，脏得不得了。乱嘛我们不知道，反正我们也不跟人家啰嗦。就是太脏了。

问：您平时有什么娱乐活动吗？

谢：我们那个单位啊，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很枯燥的，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是上班下班。平时嘛……平时娱乐活动就是同事之间呀，有时候过年过节出去玩一下。一家人碰不着的，都要上班的。过年我没有休息，我们轮休的，没时间的。要是有时间的话过年也会去走走亲戚。

问：如果动迁的话，您有什么希望吗？

谢：我也没有什么希望，最好是原拆原回。不动迁也无所谓的，就这样待下去嘛。反正得要超过现在我们这个房子的价钱，否则买得起啊？都是靠工资吃饭的。最好是原拆原回，我们也不要钱，要房子。买房买不起。现在都是多少啊，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到时候谈了再说了，不接受还是接受，都看了，到时候看房子，看他给我们多少价钱，就可以了，哪个合算跟哪个走。如果动迁的话，希望五口人还是住在一起，平常也可以

照顾一下两个老人。我婆婆今年71了,身体不太好。

采访人/潘兰兰 周英歌

希望将房子租给大学生的老太太

姓名: 钟艳秋

性别: 女

年龄: 71岁

籍贯: 江苏海门

文化程度: 初中

职业: 退休

婚姻状况: 已婚

家庭结构: 本人、丈夫及房客

居住时长: 20多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 钟艳秋家中,2004年8月16日上午9点半

语言交流: 上海话。

第一次看到钟阿姨的时候,她正和几个老姐妹坐在弄堂里折锡箔,满满折了一个大箩筐。今年71岁的钟阿姨满头白发,但皮肤白净,看上去很精神。听说我是大学生来做调查的,她很欣然地接受了采访。钟阿姨很健谈,她从自己的经历一直谈到国家的政策,气愤的时候嗓门也会高一个分贝,开心的时候则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

问：您是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

钟：我13岁的时候，父母从海门到上海来打工，我也跟着过来了。解放前那个时候，看到一块地自己搭个房子就可以了。我们都属于移民性质的。我们那个时候就在这里自己盖了平房。后来我出嫁了，到40多岁的时候，回来把父母的老房子翻造了一下，大概50岁左右就回来住了，一直到现在。

问：您退休之前在什么地方工作？

钟：我原来在毛纺厂上班，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在纺织行业的，像毛纺厂、棉纺厂这种。以前做得最苦，现在过得也最苦。每个月800多元的退休工资。像教师、事业单位、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工资就高，我们是最低的。我是54年在厂里入的党，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姑娘，21岁。我没什么文化，厂里培养我做干部，我也要做出个样子。我们党员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什么事情都要抢在前面干，一旦有福利，像分房子什么的，我们就要让给群众。就现在退休工资上可以享享共产党的福。

问：您有几个孩子？

钟：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经结婚了。两个外孙在读高中，孙子也读大学了，好像在南汇。儿子家现在住在浦东。

问：你们家有多大？现在有几个人住？

钟：我们家大概有100多个平方，现在就我们老夫妻两个住，以前女儿也住在这里的。有的时候我也出租几间房子。不过我对房客是有选择的。不像有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有钱谁都租的。我租房的对象一般以大学生为主。大学生比较稳定、可靠，有安全感，而且也弄得干净些。外来民工很混乱，做生意的人很脏，而且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这一类人我是坚决不借的。还有像贩卖假烟的也不能借，这种人白天在家睡觉，

到了晚上拿了烟出去卖,一看就知道是卖假烟的。有些租房的人很野蛮的,凶善这个东西在面相上就看得出来,这些人也不能借的。反正我们也不是靠房租吃饭的,有点房租也就补贴一下家用。我们这里规定房东要去派出所办理房屋出租许可证,然后每个月交20元钱。我办了,但是这里很多人都不办的,办的人很少很少。我们年纪大了,万一出什么纠纷、意外,派出所的人会帮忙的。现在不办也没什么后果,这里要动迁了,他们也不来管的。

问:听说这里要动迁的。

钟:本来说今年要迁的,按照他们以前说的,现在这里应该早就是平地了,你看,到现在还没动,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现在动迁也难,国家没这么多钱,投资商也没钱。一般来说,私房是按住房面积补贴钱的,公房按人头补贴。我们这里人口太密了。那些困难的人家就算一个人头补贴10万,三口之家起码两室一厅吧,30万到哪里买房子啊?!(钟阿姨指着对面的高层)现在那里卖到一万多一平方米,谁买得起啊?只能看着有钱人住进去,我们么就只能在这种房子里住住。

问:这里是不是住了许多外地人?

钟:我们这里外来人口占了居民人数的一半以上,这些人有的安分守己,有的不安定,有的是“逃生的”,就是超生游击队。作为房东我们不能借房子给他们,社会上要抓这种人的,我们倒给他们提供居住的地方,这个不行的。他们这种人不重视教育,认为只要给小孩子吃饱,让他长大就可以了。即使到上海来人开通了一些,让他们进学堂,小孩子读书也是不好的。多生一个就是给社会加重压力,给自己也加重压力。他们有的真的很苦的。我们和外地人也接触的,对他们不能歧视,但又

要防范。不和他们接触，他们会很“恨”的。这些人野蛮起来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马马虎虎过得去就行了，不要和他们斤斤计较。

问：那么您对这类的违法行为怎么看？

钟：我认为出现类似卖淫这些违法犯罪问题的关键是国家政策太松（说起改革开放后国家政策的变化，她满腹牢骚，显得有些义愤和激动，语气也开始强硬起来）。在毛泽东那个时代，比方我们一个办公室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是同志之间的感情，比较谈得来的那种，组织上就会找你谈话，男女有别，男女之间不能超过一般的同志关系，不能成为好朋友的。那个时候，男的要是婚外恋起码要教养、改造。哪像现在，这种事情多的是。前阵子《案件聚焦》就在放一个婚外恋引起的杀人事件（钟阿姨仔细地向我讲述剧情，她把里面的人物都理得很清，有几个人甚至连名字也叫得出来）。共产党样样都好，就是现在政策太松。你们写文章也可以写写的。比方说吸毒、贩毒、卖淫、贪污。我们这里吸毒、贩毒的人也很多，有几个抓进去，有些人看得出来的，吸过毒的人面色和人家不一样的，家里都是穷得一塌糊涂，一有点钱马上就买毒品。而且吸上了戒不掉的，骨头都要烂掉的。以前旧社会中国人吸鸦片，又没有文化，外国人叫我们“东亚病夫”，后来毛泽东上来了，抓到一个就枪毙一个，一下子全禁掉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开着门睡觉的，半夜听到有人敲门也不怕的，现在门关得紧紧的，还要被人家撬开。我记得当时我们厂里半夜开会，我们就在家吃好半夜饭，然后去厂里。半夜走在路上也不怕的，哪像现在谁敢半夜走啊，就算是白天走在路上也有人要抢东西。以前都说，香港人要做几道门，现在大陆上的人也要做几道门，有了

铁门还要装防盗门。听说政府又要从小孩子开始抓思想教育工作了,这是对的,但起码要几代人了。他们英国人吸毒就被扔到海里去,中国也要强硬一点,特别是贩毒的,该枪毙的就要枪毙。我在中央台看到人家对贩毒分子的采访(“那是终极对话吧!”居委会的陈老师插了一句),他们就说很多毒品买卖都是在缅甸交界的地方进行的,自己贩毒的不会去吸毒,那样会坏事情的。每次满满一卡车运过来,如果通过海关,就可以赚上亿的钱。我们对贩毒、卖淫的人政策太松,不光我们元和弄有,中山北路那里都有。对贪污的人惩罚得也太松了。我记得我们厂里原来的财务科科长贪污了2万元,被判了20年,还是在厂里宣布的,当时他走出去的时候,脚也站不直,是被拖出去的。我们毛纺厂当时在桃浦一个大队里办了个厂,我就去那里工作。那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很能干的,他自己造了一幢房子,像小别墅。人家就很眼红,都说他贪污,说来说去。结果查出贪污了400元,抓起来被判了3年牢。这个人性子很倔,在牢里绝食生病了,后来监外就医,但还是死掉了。原来贪污100元判一年,后来1000元判一年,我看现在的政策是贪污10万元判一年,你说搞得好看哇?

问:您租房子给别人,和房客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如何?

钟:房客一般都是自己问上来的,然后我们会问问他是干什么的,哪里来的什么。我们和房客的关系都很好的,我一向把他们当自己人,自己有什么吃的就给他们一点,尽量多照顾他们一点。这些学生从外地来上海读书不容易,我都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看待。我想要是我孙子也到外地读书,我也希望有人能照顾一下的。以前有个浙江来上海读书的女大学生在我这里住了3年。她管我们叫爷爷奶奶。我记得她妈

妈从浙江给我打电话，说她女儿不好好吃早饭，身体会不好的。后来每天早上我就给她准备早饭，小姑娘嘛也吃不多，有的时候下几个馄饨，有的时候煮点面条或者泡饭加荷包蛋，她吃了3年，我一分钱也没收她的。她回去的时候，我老头子帮她把书都打包，她的书很多的，然后送她到长途车上的。她到了家还给我们打了电话，算有个交待。

还有一个东北来的大学生小赵，毕业后一开始没找到工作，东北人很困难的，我就叫他一起吃饭，我们也不特意买很多菜，弄得人家不好意思，反正我们有什么他就吃什么，房租交不出也没关系的。后来他在青浦找到工作搬走了。今年五一的时候，他来看我们。我们当时不在家。他买了香蕉什么的，邻居帮我们收下了。最近搬走一个江西来读书的男孩子，在我这里住了一年多，我叫他小王。这个男孩子个性很强，但走的时候也很感动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不住在家里，他有一次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马上回来，他要搬走，我们白天回来了，他不在，所以就留了张纸条给他。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时候，他又给我们打电话来叫我们马上过来，我们当时就和他说明，我们这么大年纪，晚上出来不方便，如果真的要搬，明天一早我们就回来。后来也没有搬。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他很傲气，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开口要3500元工资，低了不干。那个时候我们老夫妻俩就和他谈心，劝他。不要把自己定位这么高，现在大学生多了，找工作就算工资低点也可以先做起来，哪怕开始只有1000块也得做啊，先站稳脚跟，以后有好的再换嘛，反正现在跳槽也多的是。后来他听了，人家开2000元工资，他也去做了。他是学法律的，5月份的时候要参加律师上岗证的考试，他们外地人在上海考试要暂住证的，那个

时候他就急着打电话给我,后来我帮他到派出所办了暂住证,并且帮他把时间延后了两个月。我们当地人办总归方便点,要是他们外地的自己去办,说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没有回旋余地的。前阵子他搬走了,他娘和姐姐也从江西打电话过来谢谢我的照顾。走的时候,他还说等弄好了请我们老夫妻俩去吃饭。我们哪要吃什么饭啊,只要他好就可以了。

现在我的房客是清水湾大酒店打工的一对朋友,还没结婚,不过已经同居了,女的好像是上海口音,男的好像是江西来的,以前当过兵,也是个党员。他们工作是翻班的。我们相处得还可以的(看得出来,钟阿姨最希望的还是做大学生的房东)。我对人是不苛刻的,我照顾房客也体现了社会对人的关怀。

采访人/赵晔琴

关心国家大事的退休工程师

姓名:严广海

性别:男

年龄:70岁

文化程度:大学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妻子及房客

居住时长：11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严广海家中，2004年9月2日上午10点

语言交流：普通话

早上路过严老伯家门口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吃着早饭，听说我想采访他，他很兴奋地请我进门。为了不打扰他吃早饭，我借口说等一下来找他，他说自己早上一直在家的。大概十点钟左右，我又来到严老伯家。大门开着，他朝着门口端坐着。严老伯满头白发，但人很精神。我用上海话和他打招呼，但他一开口就是普通话，这倒令我有些不知所措了。他说自己户口本上写着70岁，但实际上已经不止了。

问：您老怎么称呼？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严：我姓严，严广海。我们兄弟七个都在这，有钱的搬走了，现在还有四个。我是高级工程师，老爱人是药剂师，她现在去抱外孙了，女儿刚生了小孩，我就一个人看家。我一共有两个子女，大儿子42岁，同济大学毕业，学的是应用物理学，光纤光导方面的，现在一家三口都定居在德国，偶尔来中国出差就顺便到上海看看我们，不过都是匆匆一过的，你也知道出差时间算得很紧的。女儿是华东理工大学毕业的，现在搞房地产，月收入有三四千，女婿是财政局的，一个月也有两三千，加起来五六千，日子过的也蛮好的。我的两个子女我都把他们培养到大学毕业，送上社会，他们现在生活都超过了我，后来者居上了，我也完成了做父亲的责任。我们老两口靠退休金也可以养活自己，不靠子女。（说着，严老伯开心地笑了）

问：您以前是做什么的？

严：我是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的，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原来在北京兵器工业部下属厂，那是机密的单位。我们兵器部最穷了，退休工资不高的。（严老伯笑着说）像我这样的水平，退休工资至少 2000 块，而不是 700 块。（说起自己的老本行，严老伯一下子来劲了，清了清嗓门）毛泽东在的时候，提倡深挖洞广积粮，那个时候兵器工业得到重视，邓小平 78 年上台的时候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张和平崛起，20 年 50 年不打仗，所以兵器工业要压一压，我们的部队也从 400 多万减少到 230 万。从 80 年代 90 年代一直到现在 20 多年里，除了兵器部搞科研的外，其他都要压缩，但是最近有所改观。胡锦涛，第四代领导人在 7 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能战才能言和》。（因为普通话不标准的缘故，老伯把标题重复了好几次，直到确信我领会了，他才接着说）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有打败敌人的能力才能要求和平，你要是力气小，打不过人家，你想和平，人家睬也不睬你的。我是在《中国简报》上看到的，国内像《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不登的，美联社、路透社也都报道了，胡锦涛的话主要也是讲给外国人听的。实际上，我们从历史上也可以看出，清朝末年我国就是因为落后，外国人才打进来的。现在像对待台湾问题上，我们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工作到现在也没有起色。主要也是美国的干扰，中国又不敢和美国干，人家实力强啊。现在国家调整方针政策，今年国防建设投资增加了。不知道你关不关心新闻，昨天江泽民、胡锦涛还参加核工业会议，提出要振兴核工业工作。7 月份我国进行了三弹试验，（严老伯见我一脸茫然，他顿了顿，细心地给我解释）三弹就是东风 31 型、东风 21 型和波浪 2 型。你知道它们的射程吗？波浪 2 型的射程是 2500 公里，东风 21

型是 12000 公里，东风 31 型是 14000 公里。美国离我们是 6000 到 8000 公里，日本就更近了，像我们的东风 31 型、东风 21 型足足可以打到他们的本国。而且我们的导弹可以装原子弹、氢弹，是多弹头的，一个导弹出去可以分成好几个打到不同的城市，美国不是研制反弹道导弹嘛，他们最多也只能接一个的。这些消息主要是通过俄罗斯发布出去的，引起美、日、台的重视，在国内报纸上也是看不到的。

问：您老对国家大事很关心呀。

严：我平时就喜欢看看报纸，以前大学学的就是火箭型导弹结构设计，在北京工作了 37 年，期间调动了很多次，93 年退休才回到上海。原来父母年纪大了一直跟着我，我到哪里他们就跟着到哪里，父亲活到现在也要 100 多岁了……接下来就要轮到我了（笑）……这个房子是解放前父亲买的，那个时候还是旧社会，原来一直空关着。93 年我回到上海，先解决了户口问题，然后把这里的房子重新翻建了一下，盖到了三层，将近 80 个平方。那个时候他们就和我讲，要拆迁了还弄什么的，你看到现在还没拆，现在住住不是挺好的。借给外地人 20 多个平方，每个月也有四五百块房租。据我观察，这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家买房子搬走了，这里的居民都想拆迁的，没有人不想拆的。要拆就要拿钱出来，国家拿不出钱，就要私人老板掏钱，私人老板就要算算能赚多少才肯掏啊，赚不了钱他也不干的，这是经济规律啊。

问：这里的外地人估计要多少？

严：这里外来人口将近 1000 多，这里房子便宜啊，所以他们都在这里借房子。外地人穷啊，他们来上海卖菜，很苦的，每天起早摸黑还赚不到多少钱，但是他们还不愿意回去，家里更穷，

国家贫富差距实在很大的。以前我们一直管他们农村来的叫“乡下人”，那是上海人思想觉悟不高，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这里的治安也要一分为二来看，绝大多数外地人也是好的，偷赌也只是少数。我们这里都开着门的，以前要是来了个人，邻居都能看到的，他们也不敢乱偷东西的，现在外来人多了也讲不清了。治安管理要靠两方面，我们的派出所、公安局工资都很高的，嘴里还叫，他们的本职工作有没有做好呢？！公安系统中照样也有坏人的。（本来想听听严老伯对外来人口的态度，没想到他看不惯的倒是那些吃低保的游手好闲的本地青年）上海是东方明珠，生活条件在全国是最好的。像这儿有些年轻人不干活，每个月就拿 290 块钱低保，这 290 块钱要是拿到中西部地区去可以养活 5 个人了。报纸上不是说嘛，现在中国一天生活费不足 1 美元的有 2 千万人呢！这边的这些青年就是吃低保，这个工作不愿做，那个工作嫌累嫌脏。所以现在很多脏、累、差的工作都是由外地人做的。想当年 60 年代，我们的生活要艰苦得多，一个月 23 斤定粮，半斤油、半斤鸡蛋，吃豆腐浆也要半两粮票的。现在国家给他们低保，他们还嫌苦嫌累……

问：您现在的晚年生活过得怎样？

严：三句话，“以身体为目的，做人要糊涂点，生活要潇洒一点”。我就是根据这三句话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国家叫我退休，是让我回来养老，那我生活就要过得愉快些，国家给我的退休金我也足够用了，我要利用国家给的退休金使生活过得有质量。身体要好，心情要愉快。我多年没去过医院，人家对现在的医院、医保有很多意见，我从来没什么意见，因为我不接触的。（笑）我关心时事政治，喜欢看看报纸，同样是消磨时间，

有的人就把时间浪费在打麻将、打扑克、烧纸上，这些我是不沾边的，我觉得生活就要过的有意义、有目的，所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事情上。此外，我还参加两项社会活动，一个是街道举办的老年大学，我有的时候会去给他们做点讲座，有的时候就去听听讲座。这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增加些新的知识，一般准备一个讲座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写发言稿什么的。另一个就是街道的老龄工作促进会，我在那里担任常任理事，是维权组的组长。一般我们一个礼拜开一到两次会，提提建议什么的。同样是消磨时间，我觉得比人家要有意义。

对严老伯进行访谈倒像给自己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也许在这繁忙的市井生活中，没有人会有闲情逸致来听听他的絮叨，听听他往日的威风。更多的人也不屑于他的吹嘘，“我就看不惯他，满口的大道理，自以为比别人厉害得很”。在居委会我听到有人这样谈论严老伯。但不管怎么样，在严老伯口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对本地游手好闲吃低保青年的不满，而不是一味地数落外来人口的罪状，对后者他则更强调两分法的对待。在村落“一致对外”的大背景下，严老伯的声音无疑是一种不和谐的音符。

采访人/赵晔琴

靠卖废品供养两个儿子的退休女工

姓名：邢定兰

性别：女

年龄：70岁

籍贯：江苏

文化程度：文盲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结构：本人、两个儿子

居住时长：40年左右

采访地点和时间：邢定兰家中，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上海话，有较明显的江苏口音。

邢老太太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已经出嫁多年。她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两个儿子一个42岁，一个38岁，至今未婚。大儿子有二等语言残疾，在居委会帮忙。小儿子自小学四年级辍学之后就一直没有工作。全家靠邢老太太每月700多块的退休金和大儿子290块的补贴过日子。因此，她每天到附近去捡废纸和易拉罐，回家整理好卖给废品收购者。每天大概可以有几十块补贴家用。女儿已经下岗多年，有一个儿子正在读书，没办法给她经济资助。在我们的几次访谈中，她都是一边整理废纸和易拉罐，一边跟我们谈话。对两个儿子的婚姻和现状都不满意，但是显得很无奈，很忧伤。我们每次去都没有见到她的小儿子，大儿子因为居委会离家近，回来拿过几次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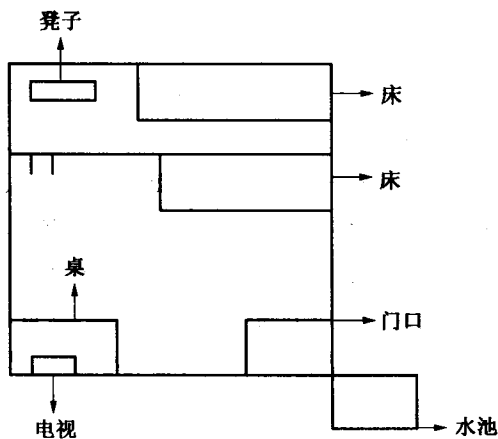
邢老太太是从江北来的，有较明显的江苏口音，但她几乎很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一点，一直跟我强调自己是上海人。11岁就跟妈妈一起来上海了。为自己是个上海人而感到很自豪，很骄傲。

邢老太太是文盲，连扫盲班也没去过，家里人大都文化程度很低。她对生活没有大的期望。对两个儿子也似乎失去了信心。但

对现状没有过多的抱怨，在访谈过程中一直很平静。唯一的希望就是她正在读书的外孙能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她似乎已经习惯了生活的一切。对于动迁，明确表示自己没有经济能力去买房，政府让住哪就住哪。对自己每天在外捡垃圾也没觉得苦，儿子没有经济能力，自己这么辛苦养儿子，也是应该的，虽然很无奈。

开始两次，她很紧张，话很少，后来一直表示感谢。

家里的陈设相当简单。只有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子，中间用隔板隔成里外两间。外间稍大，有一张老太太睡的床、两张小凳子、一张饭桌，还有家里唯一较值钱的东西——18寸黑白电视。里间空间非常小，只有一张小床，是她两个儿子睡的。一张凳子上堆着一堆衣服。水池在屋子外头。（见示意图）



问：阿婆是上海人吗？

邢：我是的呀！我浦东的呀！（一边在整理废报纸、垃圾罐）

问：您从小就在浦东？

邢：不是啊！我11岁跟我妈妈一起来上海的，原先在江北。具体哪里忘记掉了，就是江北的。来上海后就住在浦东御家亢(音)。

问：那在上海读过书吗？

邢：读的呀，里弄里只读了几年书，笨呀(笑)，脑子笨，读不进呀。20岁之前，在家带弟妹。20岁之后出去工作的。东做西做自己去做，不固定的。体质不好，一直没做固定的什么。哎呀，以前的那些单位很久了，早忘记了。最后一个还记得，市文房公司，国营的。是里弄介绍的，原来单位没活干了，里弄里介绍另一个。做小工的，铺水泥、抄黄沙，都干的，老苦的哦。最初工资是27块一个月，后来嘛，一点点加上去的。现在退休工资大概有700来块喽，不多的呀。单位离家不远的，不用坐车的，坐车还要钱咧。

问：那您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邢：结婚啊，29岁呀，29岁结的。丈夫是上海人，就是此地的。刚结婚的时候住在长宁区，和婆婆住在一起的。那个房子是私人房子，住了有三四年，后来拆迁搬到这里的。丈夫老早死掉了，死掉7年了。他以前是在运输公司做搬运工的，自己找的，没人介绍。

问：那他读过书吗？

邢：读了一点呀。具体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总归是没多少的。他退休工资那个时候400块。死得早呀，要不然也加上去了，对哦？

问：你们俩有几个小孩呢？

邢：三个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是儿子，今年已经42岁了。还没结婚！他小学在门口念的，就读到初中呀！他笨

的，不会读书。18岁开始就在里弄里头工作了。有到外面干过的，现在身体不好，又回里弄(居委会)帮帮忙。一个月就只拿290块呀，少的喽！女儿是第二个，40岁了，老早嫁了。也是读到初中毕业呀，和她哥哥一样。她工作是顶替她爸爸的，叫货员，跟随着车子的。后来下岗了，三四年了。厂里效益不好，下岗之后也没有再去找工作，她身体不好，没去工作了。她25岁时结的婚，结了婚就搬到婆家了。她婆家原来在徐家汇，后来拆迁搬到梅陇，就是新造的公房。女婿是跟随她一个单位的，运输公司的，也下岗了，自己再出去找的。我也不知道现在找到没有，我没去问过。他们有一个儿子，15岁了，总归是希望他上大学呀(笑)。有知识好，不用受苦。二儿子，他最小的，今年38岁。他读书读到四年级就不读了。因为老师让他留级，他不想再读了。也是读不进书的。他什么也没做，就呆在家中啊。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分钱也没有的。靠我养呀！什么都不去做。也没结婚。都38岁了。唉……(无奈地摇头)

问：您很辛苦，还捡这些垃圾卖？

邢：没办法的呀，没钱怎么办呢？

问：小孩都对您好吗？

邢：女儿好的，我生病了会回来看我的。儿子也可以。

问：您有兄弟姐妹吗？他们也在上海吗？

邢：当然有的呀，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是上海的。弟弟嘛，属虎的，66岁了。上钢五厂的，现在退休了。大的妹妹属猴，港务局的，也退休了。小妹妹没退休，还在做的，在市管理局。都没大有走动了，逢年过节走走。

问：您丈夫几兄妹？

邢：他呀，他只有一个姐姐，去世了，去世很久了。

问：你们家里有党员吗？

邢：只有小妹妹是党员，其他没有。

问：那你们得过劳模或者其他什么荣誉吗？

邢：没有，都没有。

问：阿婆，你觉得这里居住怎么样？

邢：蛮好的。

问：您自己的房子修过吗？

邢：小修一直有呀，换换锁，换门窗。大修没修过的。房管所的人蛮好的，随叫随到的。

采访人/陈婷婷 刘琼

双方父亲都被打成右派的镇江夫妇

姓名：丁永年(丈夫)、曹传锦(妻子)

年龄：丈夫 69 岁、妻子 65 岁

籍贯：均为江苏镇江

文化程度：妻子小学

职业：均为退休

家庭结构：夫妻俩、母亲

采访地点和时间：丁永年、曹传锦家中，2003 年 11 月

语言交流：采访时大都用普通话，家庭成员之间惯用上海话。

三层楼，一、二楼都是前后两间房，三楼一间房间，面积大约

100个平方。房间低矮，而且光线昏暗。丁师傅和曹阿姨以及丁师傅的老母三人居住。

问：听说您是1949年过来的，怎么想到要过来呢？

曹：1949年，我是跟我父母来的，从镇江来的，我老伴也是这个时候到上海来的。后来，1950年我又回去过。1952年又上来，我是16岁上来之后就没有再走了。（曹阿姨在计算年份）噢，我是1953年来的，来了之后就没有再走过了。刚来的时候，住在造币桥路，在光复西路那边，不过现在也已经拆掉了。因为我上海有亲戚，是我外婆家的亲戚。他们都是纱厂工人，刚刚解放的时候的纱厂工人。他们以前就住在造币厂桥。后来我们就搬到盘湾里，现在也已经拆掉了。我搬过很多地方了！后来我结婚了，一家就到这边来了，没有再动过。

问：那您父母的情况呢？

曹：我父母呢，以前在镇江是做生意的，开店，开了好多好多，家里好有钱好有钱的。后来，三反五反，就把家里的都分掉了。我没有办法，后来就老苦的，我就参加党的劳动。那个时候，我爸爸在解放前被国民党说成是新四军，那是有一次，一个受伤的新四军跑到我家里来，我爸爸呢，就想参加，但是我祖母不同意，她说还是做做生意就好了，我爸爸就让那个新四军从后门赶快走。然后，国民党就说我爸爸参加新四军。解放后呢，共产党又说我是国民党。我爸爸没有办法，就到上海来了，不过，很快就回去了。后来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斗死的，现在还活着的话，有九十几岁了。

问：那丁伯伯家里的情况是怎样的？

丁：我爸爸是后来（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爸爸的家里肯定

是有钱的,没钱不可能读得起北大的。他家里面肯定是落魄地主。后来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就逃难了,逃到镇江。全家一起逃。那个时候我爸爸是在国民党建设厅,那个时候也是江苏省,他在江苏省建设厅搞度量衡工作。以后到上海来就到大学。大学里的工作是自己去找的,不过,也是有熟人的,是同乡介绍一下,就进去了。那个时候很简单的,旧社会有一句话叫“朝中有人好做官”,像现在那么难,要左考右考。(介绍人)如果来头很大的,就给你职位高一点,如果来头小的,就给你职位小一点。以前的上海化工局局长是(爸爸)同学,他就认识这么一个人,就他介绍工作了。我和父母一起来上海的,住在亲戚家里,没有住处。后来和她(曹阿姨)结婚后就搬到这里来住了。我当时是集体户口。

问:那阿姨您16岁到上海来,有工作吗?

曹:没工作。后来就一个人独立生活了,我17岁就到那边大学后门摆摊头生活了,还做裁缝。以前没有单位的,都是自己做。直到1958年,大跃进,公私合营了,就是讲都是公社人嘛,我就到工厂上班了,嘉陵服装厂,就是西康路常熟路口,现在都并掉了。我一直做到退休,做了30年。我读书只读到四年级,不过,我在单位里也是做经理的。我在单位里,从73年就开始做经理了,一直做到88年退休。

问:丁伯伯,说说您的家人?

丁:我老母亲是大学里的工作人员,退休的。我父亲呢,是大学里的外语老师。右派!(突然冒出这两个字来)被打成右派,后来死掉了。我们一辈子没有生路(是指“文革”),到现在呢,也没有什么了,就算了,也就是这么回事了。哼!我是16岁就参加工作的,在上海国棉十二厂。(根据推算丁师傅是15岁

到上海的，一年后参加工作)后头是在上海纺专读书的。读好之后，是58年，1958年，参加纺织工业局上海安装队，全国到处跑。噢，我是1968年到国棉一厂的，一直做到退休。一开始是搞科研的，搞机械自动化、纺织机械自动化。以后才当设备科科长，管技术工作。上班的地方不远，骑自行车就能到。

问：您是什么时候退休的？退休工资有多少？

丁：退休的时候啊，只拿七百几。现在九百几，1000块钱差一点。我带徒弟(有些激动)，徒弟现在呢也退休了，他拿1500。你说这个合理吗？要技术有技术，要政治思想有政治思想，就是不给钱给你呀，哈哈(无奈地笑)。

曹：我也是。我到现在只拿了700块钱，我30年工龄，我从小14岁就学生意了，有技术，就是文化差一点，我技术好得不得了。我的徒弟现在也拿1000多，我在单位里带了8个徒弟，不要讲了，想到我们是党员就算了，自己，算了。实际上我们的苦真大了，跟你们讲。退休以后就不干了，养老了。(后来了解到他们是居委会的小组长，仍然在为大家服务)以前，我搞技术工作去。我跟外国人、日本人，朋友都几十年了。就是现在这些都不值钱了，就是说。在工作的时候挺好的，挺得意的，那个时候人家拿五六十块工资，人家说“so-la-so”，我就拿80块钱了，90多，那个时候90多算是高工资了。现在太落后了。我在单位里面还全是先进，没用场。

丁：我也是先进，但没有用。现在国家早就把我们给忘了，我们对国家贡献很大，我有43年的工龄，为国家干了13年，当中有四年是脱产读书的，其他时间都在干工作，干到现在一个月1000块钱还拿不到。

问：能讲一下你们孩子的情况吗？

曹：从老大开始喽，女儿，她是63年生的，读到高中毕业。后来到日本去读语言学校的，那个时候一阵风，大家都想出国。（她）以后就在日本读的大专，现在还在日本做会计，在人家公司里做财务。她在那边结婚的，什么时候结的忘了，不过，她是30岁结婚的。她儿子现在11岁，读六年级，他们那边读书早。

问：大女儿高中毕业后出国，是你们帮她联系的吗？

曹：她自己报名读语言学校的。就是那一阵风，八几年的时候那一阵风。大家都出国，出国是唯一的出路。那个时候大女儿就自费出去了。她跟我们商量，因为她在国内没有什么路好走，没有大学文凭，我大女儿她大学没考取。当时家里的经济水平中等，付了相当于现在两三万的钱。在日本读了两年的会计，拿到大专文凭的。她去了后也想回来，但是回来以后工资就低了，她有小孩了。在那里，工资不是顶高，生活还过得去，在日本也是处于中等，不是很有钱的。现在她工资是一个月20万日元还不到，但是工作很稳定的，在人家公司里面当会计，打电脑，做翻译。她现在回来一万块一个月也拿不到，所以她不愿意回来。在那边也不是挺好，只是过得去。

曹：回来，她的小孩读书读不起。小孩如果读双语学校，最差最差的就是和那些上海的领事馆还有投资商的小孩一起读，他们很有钱的。大概估计一下，如果到好的学校，上海浦东，一年，每学年要8000美金，住房是1000美金。那一年最少要一万美金，算十万人民币好了，那你的工资要拿多少。那我们帮她找个最差最差的，也是日本人到上海来创业的，打工的，供这些人上学的学校呢，上海也有一家，在虹梅路，多少钱一个月呢，大概3000块钱一个月，读书。但是只能读到初中，高中要回日本去读，因为高中要考大学嘛。我女儿如果回来，首先要

把这 3000 块钱赚起来，其他的还要自己生活，你没有一万块钱一个月，回不了。她算一算没有办法，只能待在日本，回不来。我家女儿其实蛮好的，以前我们都在单位里工作，她就在家做家务。她很聪明的，高中的时候都是三好学生。她书没有读好，我们有责任，我们家务都让她做了。

丁：我们工作忙，家里只好让她来，她就没有时间读书了。其他的家长给小孩请家教，我们让她做家务。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忙，自然而然她放学回来就做家务，后来就不行了，她大学没有考取。就差几分。要是第二年再考就考取了，但是我们胆小，就没有考。

曹：第二年再考，万一没有考上，怎么办，那不就完了吗。结果这么个机会就失去了。她自己要出去，她说我待在国内也没有出路。

问：那你们的儿子呢？

曹：儿子是 1965 年养的，4 月 10 号。他是 36 岁结婚的，今年 39。儿子嘛，搞工程，还可以赚点钱，我赚不到钱，他可以赚到钱。现在他还可以，马马虎虎。他中专毕业，后来就工作了。当时的工作是学校分配的，就在市建筑公司，建工局，搞设备安装。东方明珠里面的管道就是他搞的。做了大概 8 年，就出来自己干了。现在还是那个工作，没有变。他的老师在日本人公司里干的很好，地位很高，日本人就占公司给他管了。他现在的收入没有一定的。这要看他们工作接到了没有。工作接到了，一个月，8000，10000，可能更多，都可以赚到，有的时候没有事情干，也有的。儿子结婚就搬走了。房子不大，两室一厅，60 几个平方，在普陀区。媳妇也在公司里做，眼镜厂。是在日本人的眼镜厂，做眼镜。做好眼镜，拿到日本去销。她也

是坐办公室的,不是工人。娘家住在虹口区。都是工人,都退休了。他们是从外地来的,不过他的爸爸是上海生的。儿子和媳妇相差6岁。女孩子蛮好的。

问:那么小女儿呢?

曹:我小女儿她是69年生的,32岁结的婚。考大学的时候,她选医科。可人家开后门,她那个分数超过了,但进不去,本来到上海那个什么医学院去,当时挺好的,分数到了之后,进不去。我就很纳闷,这个应该是肯定好进去的,我说就改吧,改电脑吧。唉!改对了。这叫歪打正着,哈哈!她美国的学校都考取了。她外语好,电脑好,现在很神气啊。我的小女儿,她到好多国家都去过了,什么美国、法国、加拿大,都去过了。她现在是一面工作一面读书,读MBA,在上海交大,明年毕业。本来要到美国去留学的,我们有亲戚在美国的。后来搞搞,搞了几次,就是不让她走,后来就不去了。她以前是毕业得早呀,国家不放她走呀,她考取那个大学不容易的,可是不让她去,大学生不放,一定要工作五年之后才可以。以前就是这样的呀。后来她想想嘛,就算了,她跟我讲,那边大学么过掉了,日期过掉了,这边嘛姐姐又出去了,那么她想两个女儿都出去了不好,所以她就待在上海了。现在在上海国际航运工作。以前和现在不同,都是国家培养的,以前的大学生少,要服务五年才能走。后来政策就变了,你不用服务五年,只要把国家培养你的钱交出来,一年两千,五年就是一万块,也可以出国。

丁:要出国就等于是要重考,重考还要考GRE。她先是考的托福,后来要考GRE,这个忙了好几年,那个时候她已经在工作了,她就说,姐姐已经在日本了,我再出国,家里就剩下父母了,那我就不出去了。

问：那工作是她自己找的吗？

曹：工作是国家分配的，以前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是机械厂，搞电脑的。那个时候电脑还少了，要她建一个电脑房，实现现代化管理。后来她要到美国去，就辞职了。后来又不让她去，要服务五年。最后她也没有去，她要照顾我们父母，她很孝顺的。

丁：要赔钱，这个钱后来是好不容易才讨回的。现在她是国际货运公司副经理。她蛮辛苦的，蛮辛苦的。这个公司是香港人的。她做了十几年了。现在还要读 MBA，要到荷兰去拿这个 MBA 的证书。我说你现在读出来没有用了，现在 MBA 已经不稀奇了。她拼着命读，读出来也没有用了，我看。

问：那她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家里怎么样？

丁：他在日本人公司里工作，具体做什么我们也讲不清楚。他家里，他的爸爸妈妈也退休了，他们是普通的家庭。他爸爸也是工人，是搞什么电器的吧，去年才退休。他妈妈是工会里的，很久以前就退休了。

曹：他们结婚的房子是男方的。她家公公分配的一间房子给他们结婚用的。也不大，很小。在静安区康定路。她家婆婆呢，住的是石库门房子，老房子。离他们家只有五分钟，她饭菜拿过去给她吃，她是不开伙的。也没有时间，房子又小。

丁：他们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开过伙。不是到这里吃，就是在那里，大部分是在那里吃。她现在读 MBA，经常是十点才回来，她的健康情况不怎么好，老是劳累过度，回来话都不愿意讲了。赶快吃饭洗脚睡觉，就是这个样子。太劳累了，不读 MBA 的话，还好一点。不过，他们一个星期会回来看我们一次。

问：您的子女有没有在经济上资助你们呢？

曹：资助的，他们给我们钞票的。不过我们呢，艰苦朴素惯了的，生活方式不是像人家，要买什么啦，怎么样啦，我们也用不了多少钱，我们的工资也有，我们的小女儿每个月也给我们 500 块。我们的孩子都可以。我们没有跟他们拿钱，一句话，我们现在也用不了（很多）。可以了，我不是大吃大喝的，一般性就可以了。大家相处得也是很好的，就是有点事情我们讲讲，他们也不会生气。我们都有劳保，不靠他们。我的儿子赚得少，当然比下岗的人要好。媳妇工资蛮高的。家里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也是比较勤俭的，家里也没有什么大困难。有些事情就大事化小事，小事就化没有了，就是这样的。只要我们身体好，我们呢有劳保和工资，不管刮风下雨，劳保和工资总归够我们吃饭的。我们两个人一个月拿 1600。

问：能讲一下以前您住的房子的具体情况吗？

曹：以前我只有半间，这里前面半间是卖给我的，后来我翻了三层，是 86 年翻的。刚开始我是借人家的房子，不是这里，在盘湾里。以前借房子不像现在，我一个小姑娘，只做做裁缝，很难借到房子的。我借的这家人家呢，好像就是讲，我这个房子要了，你嘛，好另外借房子。那个时候，我只有 21 岁，人家要造房子没有钱，我就和她合造，那个时候是造了两层楼，后来她卖给我了，我就又翻了三层楼。当时还没结婚。结婚之后，他搬进来的，户口也迁进来了。

丁：我户口在学校里面，是集体户口，迁进来的。

问：你们日常生活中，有什么爱好吗？有些什么开销？

曹：我们三个人用呢都够的，就是我们艰苦朴素惯了，不像人家要用什么，要买什么，他在家看看报纸，我们家就订了五份报纸。

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已经看够了，没有什么地方好去。

问：那跟隔壁邻居关系怎么样？

曹：隔壁邻居不要谈，这个都过去了。都是门槛很精的，水平老差的。我们是宽宏大量，不跟他们计较。总是吃了就睡。因为以前我们成份不好，这个也是没办法的，我们都是让他们的。现在没什么矛盾了，他们老的都死掉了，两边都死掉了。所以现在也没什么矛盾了。

问：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搬出去？

曹：搬总是要搬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这边都是私房，不是单位里分的住房。搬嘛，总归是希望近一点喽。动迁，这里房子拆掉了，他们再给我们一套房子，就是这样。如果是拆一还一的话，原来是多少就还我们多少。这个要看政府的政策，我们没什么的。我们到时候看他们给我们多少再说了。

丁：我们也不想跟子女一起住。因为他们年轻人和我们年纪大的碰不拢，有代沟。他们花起钱来和我们的原则不一样。我们喜欢节约的、勤俭朴素的，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这样对身体好。我们经济上都不紧张的，所以无所谓。我们三个人反正都有劳保的，我们 97 岁的老太太也有劳保的。我们和小的也没有什么大矛盾。一起住也可以的。不过，我们觉得国家的政策极大的不合理。我们住在这里几十年了，国家应该原拆原还，拆一还一，应该是我原来住在这个地方，仍旧应该让我住在这个地方，我房子是 100 个平方，就应该还给我 100 个平方，但是我的房子质量差，你的房子质量好，我最多贴点钱给你，不要赶我跑。现在的国家政策不是这样的，现在是国家全部一样的政策给你，定好一个平方多少钱，然后你走人。你给我钱让我去买房子，我现在是 100 个平方，我拿钱出去买只好

买 30 个平方。买 30 个平方就是原来的地方,或者呢国家让你到老远的地方去,你要 100 个平方,可以的,但是要到老远的地方去。像松江、嘉定,那个就算乡下了。这个我是这辈子里都想不通的,你说这个合理吗?还有国家官商。你讲他是个官吧,他又是商,你讲他是商吧,他又是官。这是很坏的事情。

问:动迁组已经和你们谈过了?

丁:他们到我们家里来,问家里有多少人,房子有多少平方,政策是怎么样的。现在的政策是 3100 块一个平方,我们是 100 个平方,应该是 31 万,他们是给我们 40 万。如果买对面的新房子,是 9000 块一个平方,可以买 36 个平方。我们要和他们谈,他们又不睬你的,而且现在还没到这个阶段。谈的话,这样呀,你要 100 个平方,我给你 100 个平方,你到远的地方去。我们的小孩都在市中心,我们儿子在淮海路工作,我们小女儿在四平路……现在的临时户口也不登记了,谁住在这里,也不知道。现在生小孩,外地人到上海来生,生一个再生一个,谁来管啊。

问:那您现在和镇江的亲戚还有来往吗?

曹:现在嘛,我就每年回去上个坟,我爸爸是“文革”的时候死的,我妈妈是 82 岁死的,死了有 6 年了,现在乡下也没有什么人了。

采访人/朱欢欢

54 年跟随祖母来上海学工的盐城人

姓名:赵国栋(丈夫)、龚美芳(妻子)

年龄：丈夫 69 岁、妻子 64 岁

籍贯：丈夫江苏泰兴、妻子江苏盐城

文化程度：丈夫初中、妻子文盲

职业：退休

家庭结构：老夫妇俩、儿子一家三口

居住时长：28 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赵国栋、龚美芳家中，2003 年 11 月 24 日

语言交流：家庭成员之间以上海话和普通话进行交流，我们的访谈也以上海话和普通话进行。

房子是上下两层，砖房结构的，建筑不是很陈旧，面积大概有 100 平方米。看起来家里日子还可以，有煤气灶、电冰箱、微波炉、电视机等电器。

问：您好！请谈一下有关您当时来上海后的经历好吗？

龚：好的。我的祖籍是江苏盐城。4 岁时我爸爸就生病死掉了，后来我娘就改嫁了。我们姐妹四个，两个大的都送掉了，还有一个最小的阿妹，就给我娘带过去了。我是老三，就一直跟着我的阿婆，就是我爸爸的娘。后来 15 岁时，我就跟我阿婆到上海来了，大概是 54 年吧！我的阿婆和我的叔叔是最早到上海来的，她们大概是 51 年到 52 年这个时间来上海的。到上海来了之后呢，我就跟着我叔叔，也就是我爸爸的弟弟。阿婆刚开始没工作做，就帮人家补衣服、洗衣服。他们为什么到上海来么，主要是乡下苦呀，赚不到钱，生活没办法生活下去了，就到上海来做做小工。像人家过去旧社会，拉黄包车啊、踩三轮车啊，我们就做这种工作。当时来的时候是乘船过来的。

我们以前么都是乘船呀,没什么大轮船,乘不起的。都是木船,自己摇过来的。

问:那您来上海之后读书了吗?后来又做的什么工作?

龚:到上海来之后,也没怎么读过书。后来到58年的时候,参加了“扫盲”。当时我住在甘泉新村,就在甘泉一小里读了一段时间的夜校。工作嘛,之后18岁,我们里弄响应大跃进的号召,组织社会青年帮人家开河!我就去参加了。每天总归工作大概十多个钟头,一共做了一年多一点点时间,当时的工资只有30几块。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安亭,就在曹安路一直下去。59年的时候普陀区叫劳动服务公司的单位搞什么“三把刀”(切菜刀、缝纫刀、剃头刀),里弄里也介绍,就把我们这些社会青年调上来。我就在曹杨商场那边的理发店先做了三年的学徒。三年以后么,就算正式工人了。做学徒的时候第一年16块,第二年24块,第三年38块。这理发的工作,就一直在做,做到了87年退休为止。做理发师的工资40几块,一点点加上去的。六几年的时候,工资算高的,也给过50几块的。现在么,退休了,每个月大概拿个650块钱左右。

问:住房怎样?

龚:我们到了上海以后,最先住在海防路,在玉佛寺那里,近十个平方,草棚棚,自己搭的,矮房,矮得很,屋顶上头全部是稻草。里面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吃的两个破讨饭碗。我们在那里大概住了六七年。那时候用水都是在给水站挑水的,烧煤炉的。接下来就到了甘泉新村。房子是我的叔叔、我的婶婶厂里分的。叔叔以前住澳门路,在香烟厂工作。五几年的时候,照顾职工嘛,就分了一批公房在甘泉新村。两层楼的房子,就相当于“两万户”房子一样的。53年搬过去的,我的叔叔婶婶

到现在房子还在。房子面积只有 23 个平方，分两间，前面是小间，后面是大间。甘泉这边，都是用自来水啊、抽水马桶啊，五家人家一间灶头间。那个时候，房子算公房，但要交房钱，每个月三四块钱。结婚后就住在曹杨路了，那房子是向人家借的，每个月 8 块钱，只有一间，像这么大的一间。借了 20 年左右么就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我们自己买的房子。我们是 75 年在这买的房子。那时候就用了 600 多块，就买了外面这一间。里面都是我们 83 年自己搭出来的。现在的面积大概是 99.6 个平方米。

问：那您的退休工资有多少？现在主要有什么社会活动？

龚：我么，以前是老团员。里弄里的活动也参加的，比如说社区里晚上值值班。另外，社区里把我们棚户区里三十几家人家分为一个小组，我就是个组长。主要是有时候么通通气、开开会。有时候么里弄里有什么，比如说，小孩，特别是像你们这种学生毕业啦，有什么正经的事情，通知通知他们，关心关心他们。现在和老家里的人也不联系了，和隔壁邻居也不太多联系。只不过有时候两个同事一起，两个老职工一起玩玩。

问：请介绍介绍您的老伴吧。

龚：他叫赵国栋，今年 69 岁了。他老家是江苏泰兴，他的爸爸妈妈也是老早就死掉了。他的爸爸妈妈在泰兴的时候都是种田的。后来他 13 岁的时候，他阿哥这时候到上海来学徒么，就把他也带来了。具体的一些情况你待会儿等他回来了自己问他吧！

问：好的，那您先谈谈您的几个子女的情况好吧？

龚：我有三个小孩。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 41 岁，63 年生的。他从 8 岁开始读书的，读到高中，他是 80 年高中毕业。后来

就参军,到宁波台山去了,做了有4年时间。他参军回来之后在大孚橡胶厂做了七八年,滚轮胎,汽车轮胎,后来厂解散了,搬掉了么,他就下岗了。下岗停了大概两三年吧,就开始开出租车。大概三四年左右,后来呢就自己买了一部车子,自己开,帮人家开开,帮人家私人老板做做。媳妇是外来妹,沈阳人,结婚的时候26岁。婚后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停在家里,没有出去做事情。现在已经有一个孙女了,两岁大一点点,还没读书。儿子么现在下岗。下岗呢,基本上现在做一天拿一天,人家要是不喊你去做,你这个钱就拿不到,不大稳定。大概每个月么总是千把块钱。像我们退休工人呢,像我们老头子老太婆两个人并起来也有1000多了。女儿么也只有拿大约2000块钱,大女儿今年39岁。她也是高中毕业,81年毕业的。毕业了以后就是在机床厂,最早她进去是开行车,行车工,一直做到现在。她老公也是这厂里的,不过他下岗了。他们结婚后就住徐家汇,厂里分配的公房。他们也已经有一个女儿了,现在在读初二。小女儿今年33岁。也是高中毕业,大概89年毕业的。毕业之后,她直接考试考到上海市电话局,一直做到现在。她老公是实业公司里的,大概99年结婚的吧。小孩还没。她老公和她同岁的。结婚后他们住在桂林公园那里,也是公房,贷款自己买的。

问:这里的社区环境您觉得如何?还有,你们现在家庭关系还好吧?

龚:环境么,也蛮好的,没什么。关系蛮好,基本上呢,我们女儿呢,一个礼拜来看我们一趟。有时候天冷了,两个女儿还买点什么补品啊,买点什么药品方面啊、保健东西啊给我们吃吃。我们两个小孩对我们蛮孝顺的,蛮好。我呢,空下来么

就晚上睡下来看看电视呀，或者看看报纸啊，就这样，没什么花头。

问：如果这里要动迁，您会有些什么要求？

龚：动迁么，我们要房子，这钱要了派不着用场。房子不要很远，也不是一定要呆在我们原来的地方。特别是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毛病蛮多的，最好呢我们看病么方便点，年纪大了，买菜么也方便点。实际上我们退休工人，又不上班又不什么，小辈还要上班的，你不要路线太远了，（否则）影响也蛮大的。像我们媳妇，太远了，在郊区这地方，又找不到工作。要是靠近市区近点么，好找找工作，找好一点的工作。几套房子么，我们现在基本上户口呢，一分三，都分给三个小孩。最好还是和孩子们住在一个小区里，但不要住在一个屋里。我有我的想法，小辈有小辈的想法，住在一起生活，生活方面不大方便，比方说年纪大了，要吃烂点啊，要吃软点啊，但是你有牙齿的人，烧得烂的你肯吃吗？你也不会吃。

问：您对您的医保情况还算满意吗？

龚：医疗方面，你想我们现在每年700多块钱，这700多块钱，像我是毛病蛮多的，我不讲给你听，我讲给你听你要怕的，你要离开我八丈远了。我有肝硬化，又有胆囊炎，脾脏又开过，心脏又不好，你说我毛病多吗？我老头子高血压、糖尿病，心脏也不好，毛病很多的，假使我们搬到郊区……就不方便了。所以说假如拆房子了，我们就要求靠近医院附近。

问：您好！您的老伴刚刚讲过您的一些事情。请您再介绍一点关于您的经历好吗？

赵：我的老家是江苏泰兴。乡下的农民，当时读书又读不起，从小没读过书。到上海了才读夜校，算是读到初中毕业。我是跟

我的一个阿哥来的。以前乡下抽壮丁，抽壮丁要付钱的，付不起么，他就逃出来了，到上海学生意。当时都是乘船来的，我乘的是小船。来上海后，我开始在洋行学生意。以前解放前48年到49年都住在康定路。了解放的时候又回乡去了。后来呆了一段时间又回上海。当初主要是在上海纺织厂里做童工。单位在康定路，现在叫复兴纱厂，47年到49年都在那里做的。退休前最后一份工作是在长寿路上，电机厂。以前都住在宿舍里，集体宿舍。没结婚之前都是住宿舍。我是95年退休的，现在退休工资大概800多块。现在嘛，平时种种花、养养鸟。已经和老家里的人不大联系了。家里也基本上没人了，都出来了。我有几个兄弟姐妹，老大在上海，还有一个阿妹在乡下。还有一个阿姐么已经去世了。和单位的同事联系比较多，他们经常来玩的。

问：那您是党员吗？当初在厂里的时候获得过什么荣誉吧？

赵：我是党员。先入团，后入党。入党是65年。在厂里的时候没什么职务，工人。但在厂里的时候曾经获得过很多荣誉，我在厂里都是先进，评什么都评我先进。讲不清的，以前你做得好了就表扬你、奖励你，大会上又让你去介绍，这样的情况很多。

采访人/叶琼亚 张婷芳

当初跟小姐妹来上海的退休纺织女工

姓名：陶丽君

性别：女

年龄：60 多岁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小儿子和他的两个女儿

居住时长：五六十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陶丽君家中，2003 年 11 月

问：您是什么时候离开老家来到上海的？

陶：忘记了，还没有解放吧。17 岁的时候，乡下生活苦，娘死了，和哥嫂生活受气。就在小姐妹的带领下来了上海。

问：来上海后靠从事什么工作谋生？

陶：我冒充 27 岁，在国棉 25 厂工作。刚进去时，做的前 6 个月没有什么钱的。我在那里一直做到 1962 年。62 年退下来以后，又到松江、广州、西安等地去过。因为不能靠孩子，只能靠自己。自己要和丈夫生活，而丈夫又没有很高的经济收入。我到 68 岁的时候才真正休息。

问：来上海独自一人，您住在哪里呢？

陶：我假装是小姐妹的姐姐和小姐妹住在一起。22 岁的时候，也就是我结婚以后。我和两个小姐妹花了 250 元买了这里的一块地，24 平方住三家人家，是原来小姐妹的儿子。我自己有 12 平方。

问：和丈夫是经由怎样的途径相识结婚的？

陶：22 岁的时候在父亲的做主下回乡下结婚。对方是在乡下种地的。他不肯出来，到上海来，只是偶尔来走走。也曾经到上海来干过活，到码头上扛包，可后来与人家吵架，就回乡下去了。

问：您什么时候生大儿子的，他的生活情况如何？

陶：什么时候生的不记得了。刚解放吧，在上海妇产科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我查出来有肺病，就住在医院里。吃得特别好，都是厂里出钱。在小孩生出来 56 天以后，就开始上班了，由乡下老公的妹妹帮忙带孩子。小孩断奶以后，就由姑姑带到乡下去了。那时候有 95 元一个月，所以带一部分钱到乡下去，乡下老公负担比较重。那时候的工资算起来比较多的，其他的钱就存在银行里，后来就不值钱了。大儿子到乡下后，就由姑姑带。他很聪明，考大学就差几分，所以只能在家种地，后来出来在厂里干活。大了以后，在机电厂做了 17 年车间主任，改革开放后下岗了，一次性给了 7000 块钱。现在帮私人老板负责质量，车工、刨工都会做，经常出去安装。他 26 岁的时候结婚，老婆原来也是工人，现在下岗了。对于大儿子的情况，我也并不是很关心。我有两个孙女。大的读的是苏州的医学校，后来学校推荐他到师范大学，但父母反对。大孙女毕业后，分到无锡，中医学校，父母也反对。后来到了江阴医院配药，工作很舒服，但是没有发展。孙女婿在乡下开厂，挺有钱的。但从来不来上海，各种原因一言难尽，小孩大了，有钱了，就嫌弃奶奶了。小孙女现在读高中，成绩很好。

问：二儿子一家的情况怎样呢？

陶：大儿子出生两年以后我生了第二个儿子，也在上海妇产科医院。他生出来以后，就一直自己带，小时候由隔壁邻居照看一下，晚上和自己睡。因为离上班的地方比较近，所以抱着小孩上班。小儿子读到初中毕业后，分配到国棉一厂，媳妇也在同一个厂。结婚后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后来媳妇有了外遇，就离婚了。当初厂里分的一个房子现在出租，儿子和他的

两个女儿现在就和我吃住在一起，花的都是我的钱。儿子前年下岗，经人介绍，在一家工厂做保安，只有六七百块钱。两个孙女初中毕业，读的技校，一个会计，一个打字。现在几百元的工资只够自己开销。

问：什么时候生的女儿？女儿一家的情况如何？

陶：女儿最小，再两年以后生的。初中毕业后，分到房管所。女婿也是房管所的，搞动迁。他们生了一个外孙，现在浦东的一个医学院读中专，打算考大学。女儿家原来分的曹杨新村的房子卖掉了，现在住的是公公死后留下的曹杨新村的房子。

问：丈夫在老家，您为什么一直留在这里呢？

陶：因为老公不愿意出来，这里住在一起有个照应。老公现在70岁了，村里分给他100多块，我再带一点回去。

问：平时自己的生活怎样，都有些什么消遣？

陶：没有什么，就是烧烧饭。

问：您对于现状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陶：东西太贵了，医保太少了。

问：如果房子动迁，您有什么打算？

陶：房子归女儿，自己跟女儿一起。希望动迁能分到两室一厅的房子。最好能近一点的，方便就医。

问：您对于子女有什么期望？

陶：希望他们过得好。自己有劳保，和丈夫足够生活了。

问：您是否是党员？是否担任什么职务？

陶：不是党员，不想参加。但我做过生产组长，年年是先进工作者。

不习惯外来打工者的一家

姓名：谈芷生

性别：男

年龄：61岁

文化程度：大学本科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妻子和女儿

居住时长：51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谈芷生家中，2003年11月18日

这里解放前属于地主，解放后，地主将地捐给国家。被访户解放前就居住在这附近，算是老上海了。以前的住房是木结构的，泥巴房，低平房，有小阁楼。房子是私房，自己1952年造的，靠借钱买下土地。在当时，被访户的住房条件算是可以的。1978年以后对房子进行重建，现在的住房是砖瓦结构，上下两层，约有90平方。

问：先说说您父母吧，他们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谈：我的父亲在中大染织厂工作，主要是做纺织机器维修，他曾是劳动模范，上海的第一届劳动模范。家里当时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的工资，110元，而当时的平均工资是70到80元，所以父亲的工资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因为当时工厂是英国

人开的,而且父亲的技术很好。工作时,父亲曾分到房子,在现在的枣阳新村一带,但因为如果要公家的房子的话,就得把自己原来的私房交公,所以后来父亲把房子让给了他要好的同事。父亲做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55岁时,因脑溢血去世,当时他还没退休。我的母亲是纺织工人。

问:您的个人经历是怎样的?

谈:我1943年出生,1963年大专毕业,念的是化工有机化学。毕业后在化工研究所工作,主要是做稳定同位素的研究,国防方面的技术性工作,所以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工作期间,我又在华东纺织工学院(现在的东华大学)修本科文凭,读夜大,每周一三五去读书,取得了本科文凭。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变动过,1999年12月31日正式退休,那时我只有57岁。一方面是考虑到年纪大了,有高血压,而工作又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有点力不从心,单位里也有新来的大学生;另一方面国家体制改革,我所在的单位原来属于化工部,后来事业单位要变成企业单位,单位由化工部改为地方的,退休工资就会下降,所以我就赶在体制改革前退休,而且领导也赞成我们退休。我就提前了3年退休,现在退休工资1700元。由于我的性格比较耿直,在“文革”时曾经说过一些顶撞领导的话,再加上妻子家有海外关系,我就一直没能入党。党员和非党员的工资收入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年龄相当的同事大多都比我的级别高一些,他们的退休工资也就要高一些,大概高了300块钱左右。

问:您的妻子呢?

谈:我的妻子是浦东塘桥人,她初中毕业考的技校,1962年参加工作,在化工厂做,每天都是挤公交车上下班。她1992年退

休,今年57岁,退休后就炒股票。我们两人认识是由于我和她的哥哥是同学,就在1968年结了婚,只生了一个女儿。我的思想比较开明,觉得人多对国家不太好,虽然那时候还不知道马寅初的理论。妻子的父亲在解放后到了香港,后来1966年母亲带着她的弟弟和妹妹也去了香港,只有她和哥哥留在了大陆。妻子她是团员,受党的教育很多年,所以不愿意到香港去。有海外关系还是给家里带来了很大影响,我一直没有入党,就是因为妻子家有海外关系,在单位里大多事情是优先考虑党员的,像工资、级别等等。改革开放后,在香港回归之前她也到香港去探过亲,不过我一直没有去过,是想在自己的国家看看,究竟会怎样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受孔孟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小时候上过私塾,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对于国家的发展情况很关注,国家的发展最主要的是看老百姓有没有得到实惠,这是最实在的。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生活条件明显提高了,家里的家用电器增加了。

问:您的女儿多大了?她的情况如何?

谈:女儿1969年出生,1987年参加高考没有考上,以前考大学比较难考。现在女儿没有工作,主要是依靠我们父母。她曾经到深圳工作过5年,1988年去的,但具体做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后来就回到家,因为在深圳那边的公司不是很好。中间她偶尔也有过工作,但可能是因为工资不太理想,也就一直再没有出去工作。

(我们从邻居那听到一些消息,他的女儿曾经找过一个男朋友,但是家里反对,后来两人就只好断掉了,从那以后女儿似乎就有些郁郁寡欢。在我们访谈期间,她的话一直不是很多,她在家主要是做一些家务。她没有劳保,但买了医疗

保险。)

问：您有几个兄弟姐妹，他们的境况如何？

谈：我们一共5个兄弟姐妹，我有一个哥哥，三个妹妹。成家以后就分开住了，相互之间的来往不是很多。兄弟姐妹有做过下放知青的，一个到崇明，一个到江西。

问：您的一生经历了不少我们国家的重大事件，有什么让您记忆深刻的吗？

谈：家里以前认识的人有做地下党的，现在家里的一张桌子就是他们留下的。解放前，我曾经给他们提供过住处，解放后，他们被安置到农村，就搬走了，因为搬走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就把桌子留给了我。我的表二姑和大姨妈也曾是地下党，大姨妈曾是劳动局副局长，现在退休了，以前是上海虹口区地下党，主要是负责送信的。我从小受到他们的影响比较大。

问：对于拆迁，您怎么看？

谈：拆迁本来是说年底，但是好像不太可能，听说是打算规划成旅游区。因为我一个月要看五到六次病，有医保，在华东医院，如果搬到郊区会很不方便。如果拆迁的话，赔的钱是不够买房子的，一般的居民也买不起。

问：退休后，平日里都做些什么？

谈：退休后，我主要的休闲是看新闻，因为身体不是很好，所以一直坚持锻炼身体。

问：您对生活所处的社区环境评价如何？

谈：我最不满意的是公共厕所，很不干净，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外来打工的造成的，他们的卫生观念很差，公用厕所又不收钱，我妻子也对这点很不满。我觉得外来打工人员一方面工作很辛苦，没有剩余的钱，生活很紧，而公用厕所收费对于上

海本地人来说是不算什么的,因为上海人是有劳保工资的。

采访人/吴 同 黄素梅

新疆回沪的单亲家庭

姓名: 孟淑娟

性别: 女

年龄: 58岁

籍贯: 江苏省

职业: 退休

婚姻状况: 丧偶

家庭结构: 本人、儿子、女儿和外孙女

居住时长: 50多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 孟淑娟家中, 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 采访时大都用普通话, 家庭成员之间惯用上海话。

这是一幢水泥三层建筑的二楼。有两个相同的房间(每个大约10多平方米)、一个小厨房(大约2平方米左右)和一个卫生间。房间内布置凌乱, 给人脏乱之感。每间房内有一张双人床, 床上被子未整理。另外房内堆满杂物, 给人拥挤之感, 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笔者的位子是临时在床上清出的一小块边缘)

问: 您出生在上海吗?

孟: 我生在上海, 长在上海。我父亲是苏北人, 先来到上海, 后来

和母亲结婚生了我。我母亲是哪里人，不清楚，我对她没什么印象。她很早就离开了我和父亲。我是父亲养大的。他是上海仪表厂的工人。生活还可以，他很照顾我。

问：那您知道您父亲在刚来上海时做什么工作吗？居住情况怎么样？

孟：做生意的，卖一些木工货，他自己做，自己卖，也帮人做。（注：其父实际为小手工艺者）我们搬过很多地方的。最早住哪我就知道了，在快解放时才搬到这。这地皮是我父亲买下的，后来攒钱建了这幢房子。因为建房向别人借了钱，所以楼下和楼上的房子就给了别人。只有现在这间和里屋那间是。（注：两间房间是相通的，没有装潢，是水泥毛坯房）现在我、儿子、女儿和外孙女住在这。老头子他死了，都死了20多年了，生病死的。他姓季，不是上海人，是湖北人。我们是在新疆建设兵团认识的。他没来过上海，他死了以后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回上海了。

问：您现在还工作吗？

孟：退休了。以前在上海仪表厂，现在已经是倒闭的工厂了。大概是85年进厂工作的，那时候顶替我父亲的工作进了上海仪表厂，之后没有换过工作。我64年去了新疆建设兵团。现在退休工资就那么一点，700多元，我们单位不好，倒闭了。

问：说说您的孩子，是出生在新疆的？他们有上海户口吗？

孟：在新疆生的，有上海户口的，我们都回来那么多年了。女儿结婚了，在幼儿园做后勤，看大门，不是老师，她收入1000多元，还可以。外孙女7岁了，上小学一年级，就在后面的小学念。他们工作忙，我就送她上学、放学。儿子，就是刚才你们见到的那个，还没结婚，没有工作，自己做点生意。

问：您的儿女和您一起生活，会给您一些生活费吗？

孟：会的，我们都是一起生活的，没有分开。

问：那您平时除了送外孙女上学，还做些什么呢？

孟：不做什么了，在家买菜、做饭、洗衣服……没什么娱乐的。我也不大出门的，有事嘛才出门。我骑自行车出去，不大坐车。朋友也很少来往，就这附近的邻居，住了几十年了。麻将我是不打的，没意思。

问：是因为您去了新疆很多年？和以前的同学、朋友联系少了的缘故吗？

孟：可能吧。不来往，也就没什么联系了。（面色有些尴尬，似乎有难言之隐）

问：这里是不是要拆迁？

孟：听说这就快拆了，以后的新房子应该会更好吧。希望到时候不要有什么问题才好。我们也不太有办法。

采访人/石蕊 吴珺

四世同堂的老上海一家人

姓名：侯雪雯

性别：女

年龄：57岁

籍贯：江苏海门

文化程度：初中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丈夫、公公、大儿子一家三口、二儿子一家三口

居住时长：57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侯雪雯家中，2003年11月17日、11月21日

语言交流：基本上都是普通话

1971年自行建造了约70多平方米的房屋，共两层楼。后来翻建，共100多个平方米，共四层楼。家里有4代人，共9人。楼下住了侯雪雯的公公。大儿子一家(3人)住在二楼。侯雪雯及其丈夫住在三楼。小儿子一家(3人)住在四楼。走访期间，小儿子的女儿满8个月，正住在其岳母家(曹杨二村)。由于家里人口比较多，侯雪雯的公公的生活请了一个保姆料理，钱是由侯雪雯的丈夫和其弟弟一起出的。侯雪雯负责一家人的伙食，基本上，她自己和丈夫的退休工资已经够用作生活费，从未向孩子们要过钱。

问：您一直住在这里吗？

侯：从小就住这的。不过原来的老房子已经拆了。娘家也在这，丈夫家也在这。我爷爷奶奶原来是江苏海门的。我妈妈十几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来上海的。我妈妈是童养媳，所以也跟过来了。这里现在好很多了。原来没有水，我们都用苏州河的水，十几岁的时候，一边有人洗马桶，一边有人淘米呢。后来筑了坝，我们就到后面的小河里去了。后来大概有一个水龙头了，我们就去接水。

问：那您原来是做什么的？现在退休了？

侯：在国棉六厂(纺织厂)做的。做到50岁退休了。刚好做到退休，工厂就倒闭了。现在领退休工资，一个月800多块，原来

只有 100 多块,现在加了。当初读到小学,后来读了一个纺织厂办的中学。读了三年,一定要读的。读好之后就去厂里做事情了,后来就没有换过单位,工作的时候很苦的。

问:“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您正在工作吧。

侯:是的啊,那时候我刚刚工作,就有串联。我们上杭州,胆子小的跟着胆子大的。那时候也就是看看大字报。有人到广州啊什么地方的,我们胆子小就到近的地方。那时候做什么都要票啊,好像粮票我还有的呢。那时候我们是中间派,反正也不知道哪边好哪边不好的。

问:您是党员吗?

侯:不是的。他(丈夫)是党员,他是化工研究院的干部,63年开始工作。他也是养在上海的,后来给海门的奶奶爷爷带的,后来他生病在乡下治不好就回上海了。他爸爸妈妈一直在上海的。他原来是曹杨中学的,后来大学没考取就去工作了。本来应该退休了,但现在还在做,他本身只有 59。他原来是科级干部。他要求退休,因为他们工厂要转变了,领导班子要换了,但厂里不给退休,还是做原来的位置。退还是退了,还要做事情。很忙的。礼拜六、礼拜天也没休息。也拿退休工资。他退休了,反正现在还能做就做的。因为是干部嘛,照道理要做到 65 岁。反正他在家也没什么做的,会做就多做点。他连早饭都要我帮忙弄的。

问:那您家的房子是自己造的?

侯:是,自己造的。71 年造到二楼。因为条件比较差,原来是木板。几年以后就拆了,又用钢筋水泥造了一次。老早以前,水泥钢筋老紧张的。家里的房子有 70 几个平方,违章不算的话。整个一个楼面有 24 平方,四层楼。现在大儿子住二楼,

三楼我住，小儿子住四楼。小儿子最近在她岳母家，我小媳妇养了个孙女，八个月，住在她自己家。养个孩子挺麻烦的。媳妇家就在曹杨二村。他们房子也不大，我媳妇那家里有奶奶，有爸妈、哥哥，也蛮紧的。我小儿子晚上回来睡，白天去看他闺女，帮他们带带。

问：您有两个儿子？

侯：一个 33 岁，一个 31 岁。两个都是三十岁结婚的，我大儿子不想读书，初中毕业就去找工作了。反正没有固定的工作，一直做做停停。我小儿子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出来后就教书，教小学，在他原来读书的小学教书，那个学校的校长就是他原来的班主任。因为我小儿子以前很皮的啦，所以校长看不起他，给他小鞋穿。他做得很不开心，两年后就不做了，就去打工。原来他做过操作工，现在在办公室做做管理工作。做了 4 年了，基本上固定了。我小儿子比较行的，能力比较好，本来教书也可以的。现在小儿子一个月的工资大概 2000 元。我大儿子现在没固定工作，做做碟片 CD 什么的。

问：说说您的两个儿媳妇吧？

侯：大媳妇比我儿子小 3 岁，不是上海的，我大儿子没工作，是上海的谁要他啊。我媳妇是安徽的。她在一个超市做的，不是上海人经常会被欺负的。好像又不想做了。原来是卖鞋子，后来做得不开心就换了。大媳妇每天回来都很晚，没怎么说话。我小媳妇是上海人，比儿子小 2 岁，自己比较有文化，也挺有礼貌的。不过她不常在家住，所以相处得也不错的。

问：你们吃饭在哪里吃呢？这里（二楼的客厅，也有厨具）还是一楼？

侯：就在这里吃。一楼住着我公公，86岁。年纪大了，原来是我煮饭给他吃的。后来有了小孙子，本身又不好，在纺织厂做了三十几年了，后来有小孩忙不过来，就给他请了一个钟点工，帮他煮煮饭、洗洗衣服。我公公也很勤的，经常出去兜兜的。应该是一起吃饭的，但一家人不会都在的，要么你在，要么他在。午饭、晚饭我做。早饭我就去随便买点吃吃。

问：您现在就做点家事，累不累？

侯：还可以，挺自由的。高兴就烧点他们吃，不高兴就给他们买点熟的吃吃。下午有空就搓小麻将，5块钱一局。不是经常打的，哪边缺人就去哪。

问：您家还有什么亲戚啊？平时往来多吗？

侯：我这边还有姑姑、婶娘、兄弟，还有个老娘。我先生就还有一个兄弟。过年过节会走动。

采访人/李 纹 张 青

无法挥去的时代烙印的回沪老知青

姓名：夏依萍

性别：女

年龄：56岁

籍贯：上海

文化程度：中专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未婚

家庭结构：本人、母亲

采访地点和时间：夏依萍家中，2003年11月20日

语言交流：采访时大都用普通话，家庭成员之间惯用上海话。

40年代自建的房子，40多个平方米。夏依萍的母亲共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女儿。4个儿子中有3个住在近处。另一个在外地，但他儿子的户口在这，有时候也会回来住。现常住人口只有夏依萍和她的母亲。

问：您退休前在哪里工作？怎么找的工作？

夏：我原来正在上学，政府讲上山下乡，我就到大西北去了，去了甘肃。后来88年，大龄青年没结婚的可以回来，我就回来了，回来后在搪瓷厂。我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一直没有结婚。现在已经56岁了，就和我妈妈两个人一起住。

问：你什么时候上山下乡的？去上山下乡的时候是干什么的？

夏：68年去上山下乡，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我还在上中专呢。二十一二岁，正好毕业了，那时候说什么要一片红，我响应政府号召就去了，我弟弟几个都去了。大弟弟和二弟弟都在江西农场插队，78年就回来的。那时候每天到家里来敲锣打鼓的，不去就天天敲，都要出去。我当时还年轻，也不知道，总想要好一点，所以我们家都去了。谁知道现在弄得一身病，谁来关心你啊。我还是很有信念的，没信念怎么办呢？他们说病也治不好了，那也只能这样过一天算一天了。我那时在铁路上的，什么地方都去，不要太艰苦啊，我的病就是那时候得的。本来我身体老好，不好早就死了，到那里就弄成这样了。回来上海也是因为身体不好，他们说你是干部编制，回来的话干部

就没有了,我想没有就没有吧,户口在这里嘛,身体在那边适应不了。所以回来后就在搪瓷厂干勤杂工,大概半年多一点,他们觉得我能力不错的,就让我做管理工作,又到仓库搞内务工作。因为我比较会写,所以经常给厂里写点东西,都是写文章的。没退休时奖金多,加起来大概要 1000 多。后来刚退休的时候少的,大概两三百块吧,还可以过。后来大家都加工资,我也加了,现在每个月 700 多,750 不到,到银行去领。我们有医保,我是 97 年退休的,和 2001 年退休的人不一样,昨天我妈妈去看病,一共要 800 多,我们花了大概 300 多。去的时候就挂个号,交一部分医药费,大概交百分之三十几,我不记得了。

问:您一直没有结婚吗?

夏:没,当时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一点我就生病了,生了一场大病,我回来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去了。那时候我在铁路局,铁路上好,看病不要钱的,只要花车费。要放到现在,肯定看不起。

问:这个房子是谁的呢?有多大?住了几个人?

夏:我爸和我妈 40 年代自己建的,我们就一直住这里了。40 多个平方。我侄子偶尔来住。我和我妈住在这个屋子,这个屋子是违章建筑。我妈有 4 个儿子,每个有 3 口人,3 个在这里,住在那边的屋子里,那边还有 3 间屋子。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不过户口在我们这里,有时候回来住。所以这里的常住人口只有我和我妈两个。

问:您妈妈原来的工作是什么?

夏:区副食品厂,做咸菜的。解放的时候,年纪轻,都是搞单干的,后来搞公私合营,就这样进去了,一直做到退休。我妈妈有劳保的,每月 760。

问：平时你们两个人都干什么？有什么娱乐活动吗？

夏：两个人在家里做做家务，烧烧饭，中午睡一觉，就没事了。

原来我还打打毛衣，这几天不舒服，所以也没打，空下来就休息。星期三下午要陪我妈妈去看中医。平时就是和老同学，他们打电话过来的话叫我去玩玩，都是大家一起上山下乡，一起回来的，关系老好啊！到某家那里说说话聊聊天，或者谁有钱了出去吃一顿。单位里一年出去一次，今年已经去过了，三月十几号。同事有的还很年轻呢，现在还在工作，很忙，而且还要养家，不像我们，什么都不用想，就吃吃饭，睡睡觉就好了。和邻居见面的话就打个招呼算了，我不怎么出去的，都在家里。

问：觉得小区的环境怎么样？家里有事情的话，居委会会帮你们吗？

夏：环境不好啊，又脏又乱的，治安也不好，晚上的时候特别乱。和居委会基本没什么联系，除了选举的时候，拿票子来勾一勾就好了，其他就没了。

问：如果动迁的话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夏：我们没钱，要迁总归要给我们个地方住的，不会让我们住马路。我就是这么想的，一切都要宽容。现在不好，是光还没照到这里，照到这里就好了。我们都没想那么多，想那么多也没有用，还不如不想，还不如安心养病。钱够不够也没什么用，多了又怎么样呢？又买不起房子，吃也吃不穷的，就这样过吧。具体要求的话就我和我妈一室一厅就可以了。地方无所谓，只要里面有医院、菜市场，再好一点的话有个超市就好了。主要是环境，在哪里关系不大的，我和我妈都老了。政府动迁我们都要积极配合的，谁不想好房子啊。我们自己日子

不好不能怪政府，并不是政策不好，是我们机遇不好，谁让我们遇上这个环境呢！

采访人/潘兰兰 周英歌

两人居住，挂着六七个户口

姓名：汤林贞

性别：女

年龄：52岁

籍贯：江苏海门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结构：本人、母亲

采访地点和时间：汤林贞家中，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上海话，不过汤林贞妈妈的上海话带海门口音。

汤林贞所住的地方有两层，房子外面是一条小街，外面看起来很陈旧，已经日久失修，而房子内部的建筑材料以木材为主，楼梯、门与门框都是陈旧的木材。进门有一条很窄的走廊，走廊右边有楼梯，可上二楼，向前走就到客厅，穿过客厅就是厨房，家里没有厕所，但有淋浴器，以前没淋浴器时汤林贞就去澡堂洗澡。

问：您丈夫的户口也在这儿吗？

汤：没有，他的户口还在海门，人是98年上来的。

问：您刚来上海到现在都没工作过吗？

汤：我待退休回来，就是家里需要，小孩小，现在我就算去工作，45岁以上的人也不要了，隔壁邻居倒几次叫我去超市上班，工资不高，500多块一个月。

问：你家人中有是团员或党员吗？

汤：我是党员，我在农村入的团，我是班长，每年评先进，思想老好的。我这种人干活实实在在的，人家也蛮照顾我，过年过节让我回上海看儿子，平时周六周日人家叫我加班，我也就加班。中午仓库发东西，人家吃饭去，我就呆在那。我父母不是党员，都是工人，一般性。我大弟弟是党员，自来水公司，也是小公司，还配车子给他，我的弟弟妹妹都是团员。

问：儿子什么时候生的？

汤：79年9月生的。我那一批中，儿子算很小。我那时28岁，是响应国家政策，56天产假，享受这种待遇。儿子中专毕业后，自学了计算机网络，现在工作也是计算机方面，在广州的电脑公司，和朋友出去见识见识，费用蛮厉害，一天开销七八十元。想要闯闯，我也让他出去吃吃苦头，不然每天回来饭菜准备好，以为钱很好用的，儿子现在打电话回来说那里吃、住、行都很贵，知道钱不好赚。我和儿子还可以，有沟通，由于从小不在身边，他很内向，帮我讲讲，15岁到现在，天天和我在一起还可以。他从小不和爸爸在一起，也不大和爸爸沟通。我很理解小孩，平时不大管他，主要的管管，他要玩，只要和我说清楚和谁去、去哪，我都让他去。他喜欢到外面去上网，家里尽管有，但外面和人家一起，有劲，我也不管他。

问：您母亲几岁？（进门时，她的母亲正坐在门口和别人说话）

汤：77岁。她中风过的，93年中风。我儿子94年16岁，小孩没

有人照顾。那时我工作,单位里做的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业务),到处跑流动大,全国各地跑。

问:您和您的兄弟姐妹关系如何?

汤:还可以,妈身体不好,请人照顾没意思,给人家钱。兄弟姐妹,还不如我照顾妈,我呆在家里没事做,照顾妈本来就应该的。过年过节都蛮忙的,大家聚一餐。清明、爸周年时、中秋、春节,兄弟姐妹都到这老家来。爸妈现在也有退休工资,费用上他们也不贴了。现在就我大弟弟没小孩,其他几个都是儿子。几个小孩当中我儿子读书最好,读书回来,他也不贪玩,回家做好作业再玩。我们不在上海的时候,有时作业签名他还要等到小舅舅回来,叫他签好名后再睡觉。小弟弟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我儿子毕业后考上中学,他买了房子,是他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他那时叫我在那儿买一室一厅,我想地段太差就没买,现在想想后悔了,所以我想拆房分得远算了,现在房子差不多的,交通反正也都方便,无所谓的。他的房子有三房两厅两卫生间,很大。所以他讲,以后不行,妈就和他住;拆房子过渡阶段,我万一不行,他也说腾间房给我住住。他那时买房贷了十几万,以后拆迁的钱,他正好还贷款。他的老婆一般性,饭店里,1000多,还好他们那时房子买好了,现在上海房价多少高咯!小弟弟原来在房地产集团工作,许多小区就是这个集团造的,他帮老总开车子,所以买房子时多少有点优惠。他们的儿子今年刚升初二,14岁。

问:这里的房子翻修过吗?

汤:48年时,后面的房子是自己老公80年造的。(适当转换语气)我刚来时现在轻轨的地方以前是农田,这里还可以,以前这里高高低低的路,路灯也没有的。爸爸妈妈原来都是海门人,后

来到上海后两个人买了地皮自己造的。

问：房子如果拆迁的话？

汤：这是父母的遗产，到时候兄弟姐妹都拿一点，他们户口都在这儿。和妈是否还在一起，再讲了，分不分到时再讲了。这里有六七个户口呢。反正到时候拆了再说，动迁房子，我们就贴点钱住回去算了，我们插队落户也没什么积蓄，我当地有房子，私房，没考虑到上海是这样的，付贷款，付不起的。现在也没方向，买房子不能老盲目的，到时候分到房子我就和妈住，分不到，妈就和儿子一起住，我就帮儿子买，我回海门去了，两边住住，我在海门市区 94 年造了一间房子，儿子要结婚了，再说了，30、40 万，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

问：家里都是你烧饭吗？

汤：嗯，现在就是烧给妈吃，以前弟弟在一起吃，大家一起吃也很开心的。妈妈每月给我 500 元，给我当生活费，还有一点她自己藏着，她要一点钱零用零用就让她去吧，等拆迁了分好了，她跟着谁再讲了。

问：你平时做些什么？

汤：我也不大好出去跑，我早上烧早饭给她吃，中午又要回来烧饭。以前弟弟在的时候，我还好出去走走。我以前有空帮隔壁人家搓搓小麻将，现在我织织绒线，帮儿子织织衣服，我还在家勾勾拖鞋，帮妈妈洗洗弄弄，妹妹给我电影票子让我去看看，我也不要，现在电视也很好看。

问：你觉得这里居住方便吗？

汤：没有厕所不好，淋浴器都有的，就是没有厕所，以前没淋浴器，就去洗澡堂洗。买菜倒很方便，跑过去 10 分钟，最远的也就半小时，这里有 3 个菜场。治安不好。这里要拆迁了，有人把

房子借给外地人,有些做生意的人、卖菜人蛮本分的,早起早睡,有些人讲不清楚了,晚上不知干嘛的。以前治安很好,开着门睡觉也没关系的,躺椅往门口一放着就睡了,人家下雨天衣服没收还会叫人家收。交通嘛,这里有好几条公交线,不过要跑10分钟。现在方便很多,轻轨快很多。这里也有街道医院,走过去15分钟,以前还有社区服务,上门给残疾人看病,现在要拆了,就少了。医院还可以,有住院部,我经常帮她去拿药,吃中风的10年的药都差不多,每周我帮她去配一下。这里读书也蛮方便的。

问: 这里的活动多吗? 比方说天热纳凉晚会之类。

汤: 没有,天热么就天天晚上7点半有人值班提醒门关关好,不像新的小区有啥文娱活动。

采访人/徐 青 朱韵珊

一个靠低保维持生计的残疾人家庭

姓名: 梁光荣

年龄: 52岁

籍贯: 上海

文化程度: 初中

职业: 退休

婚姻状况: 离婚

家庭成员: 本人、母亲、弟弟

居住时长: 30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梁光荣家中，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上海话。

这间房子被一张帘子隔开，我只看到外面的一些设备。有一张方桌吃饭用，还有几把方凳。桌子旁边是水龙头和案板，梁光荣的母亲在切菜。他的弟弟躺在一张小床上，在看电视。电视摆在很低的架子上面，大概是十四寸的样子，可能是彩色的，不能确定。我猜想帘子后面应该有马桶等卫生设施，做卫生间用。阁楼上没能上去参观，应该是梁光荣及他的母亲睡觉的地方。谈话进行得不算顺利，觉得这家的男人们在言语中都颇有怨恨，倒是婆婆很想讲些东西，但每每被梁光荣制止。

问：梁先生，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

梁：我啊，52。我妈她74。

问：您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梁：生出来么就住在此地了。

问：那这里一共多大？人均有多少呢？

梁：那么算算看好来了……47平方，三个人，大概……依就写平均15。原来不是住这里，就在对面那边，后来搬过来的。

问：哦，梁先生有没有到外地去过，比如插队……

梁：69年去贵州插队过的，对的，后来身体不好就回来了，大概72、73年回来的，病退。回来以后在小区衬衫厂做工人呀，总之是蛮低层的。钞票（工资）又不多的，四五百块。

母亲：我那个时候在衬衫厂还要苦了……一天只有一块钱（母亲哭，擦眼泪）……

梁：你说这个干嘛，人家小了，懂不懂啦？！现在什么时间了……

弟弟：你问这个做什么，算问残疾人家庭经济情况喽？

问：哦，对不起，是随机抽样的。您的脚怎么了？

弟弟：四肢肌肉萎缩……懂了喽？天生的。现在一个月拿 380 块低保，少来兮，但是怎么办呢？

问：梁先生结婚了吗？

梁：离婚了。

问：可以讲讲您之前的婚姻情况吗？

梁：有什么好讲啦，依写一个离婚么学校就晓得了呀。

问：那么梁先生有孩子吗？

梁：没有。

问：梁先生能不能说说你的亲属？

梁：哦，有个外甥女，和你一样读大学呀。水产的，上海水产，又不是一本。专业倒蛮好的，英语系呀。

问：您的房子有没有翻修过？

梁：反正总归老低级的，依看到的。

问：梁先生退休了吧，平时做些什么事打发时间呢？

梁：退了，跟依说过了。看看电视呀，还有么买买菜……

问：买菜方便吗？

梁：倒是蛮方便的，也就这样了。总归是比较低层的。

问：正好您在看电视，平时都看哪些电视节目呢？

弟弟：我么反正一直在看电视，节目么就……多了。体育台、案件聚焦，还有么电视剧频道一直看的，电影……

问：你们和邻居串门吗？

弟弟：不太串，周围么……讲讲话的，反正总归没有什么事做呀。许多外地人……四川、山东、安徽都有的，搬过来的。

问：您家有没有劳模、党员？

梁：没，都是群众，哪里来劳模啊，都是很低层的人。

问：你们对居住环境有什么评价啊？

梁：有啥评价啦，总归勿是老好喽，反正啊……就这样子。

问：如果说要搬迁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弟弟：做啥，要帮我们搬啊？一年以前就说要搬了，到现在。反正别的啊不现实，房子大点，近点，郊区反正是不去的。

问：如果搬迁给你们补助……

弟弟：有什么用，给了啊买不起房子，不搬不搬。

采访人/徐慧丽 司徒丹东

80年代迁入的一对扬州夫妇

姓名：葛燕莺

性别：女

年龄：50几岁

籍贯：江苏扬州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受访者夫妇、老母亲、两个弟弟及其妻子、孩子

居住时长：20多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葛燕莺家中，2003年11月

房子上下两层，每间20多个平方。葛燕莺是回沪知青。

问：请问，你们一直以来都是住在这里的吗？

葛：对，我们住了有 20 几年。回上海以后就是一直住这里，我先生以前在扬州的时候做过厨师。我是营业员。厨师是他后来学的，先做小工。结婚后他开始做厨师的。

问：那您母亲日常生活状况如何？

葛：她现在一般没有活动，身体不好，糖尿病，不过有医保。她原来年轻的时候是在纱厂工作，一直做到退休。退休以前工资 50 几块钱吧，现在退休已有 30 年了。她不是党员，但她是工会的，群众关系蛮好。

问：那您退休工资多少？

葛：我拿 400 多块，医保什么都没有。上海这边的待遇我们都享受不到，只有劳保跟他们一样，医保什么都没有。我先生跟我都这样的，不过我们两个人身体还好。

问：那你们有没有为以后打算呢？比如说存钱之类的？

葛：怎么好存呢？我们现在只够生活！还要欠呢！还要负担女儿的学费。现在嘛吃饭可以省一省，生病嘛没有医保。

问：那你们家现在一共多少人？

葛：我们家九口人呢。兄弟三个一个母亲不是九口吗！我们排老大。后面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女儿，一个女儿也没有劳保。

问：那你的两个弟弟有没有插过队呢？

葛：一个崇明，一个新疆。他们现在都回来了，是母亲身体不好，想儿子了。崇明的是调回来的，新疆的那个是母亲想儿子了，太远了，才回来的。然后他又到江苏插队，回来的时候不好到上海，老家有人，所以到江苏，投亲靠友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还没结婚。

问：那您的兄弟姐妹都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葛：我们在 76 年结婚的。老二 77 年结婚的，我们先结婚老二再结婚，老三在 78 年完婚。他们的对象都是上海人。

问：那对现在的生活状况还满意吗？

葛：一般，怎么满意？这里是贫民窟。跟扬州的房子比差不多，也都差不多！房子是自己的。那扬州的房子有 70 几平方吧。跟这里比，好多了！大多了！不用九口人挤 20 几平方的房子。老二现在住在单位给的房子。他们不是每星期都会来看母亲的，母亲我们照顾啊！他们有时来看母亲，有时接过去。过年的时候一家同聚。哪家好在哪家聚。母亲不是有劳保嘛，就是吃她自己的劳保咯！

问：那这个房子自从你们住进来以后有没有动过呢？

葛：没有。原来刚来的时候只有上面的公房，后来下面这个房子空了好多年才买下来的，大概在九几年。

问：墙上的国旗有什么讲头吗？

葛：没有，有一年过年她爸爸做的。字也是他自己写的，随便写的。

问：您到上海以后有没有做什么工作呢？平常居委会会经常来关心你们吗？

葛：没有，我们年纪也大了，没人要了。平常跟他们说话用苏北话。阿婆（她的母亲）也会说，她是在苏北长大的。平常也没做什么事，以前有卖菜，现在不好卖了，有人会来赶的。没有人来关心我们。谁来啊？他们说你们有劳保，不来的。

问：听说这边要动迁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葛：我们等他分房子啊！如果他们不给分房子只给钱的话，那我们只好回扬州老家了。女儿是先在电信公司工作了 6 年，然后考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去德国的班，去了德国。我们当然也

想去德国咯!

问:那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活动啊?比如说看电视,看书之类的?

葛:就看看电视,看书一点也看不进,眼睛不好。做家务。

采访人/张卓琳 余萍

一位待退在家的中年妇女

姓名:潘美珍

性别:女

年龄:50岁

籍贯:浙江绍兴

文化程度:初中

职业:待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一家三口、丈夫两个兄弟(各一家三口)、公婆

居住时长:20多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潘美珍家中,2004年8月10日下午3点半

语言交流:上海话。

潘美珍是本地居民,她说自己今年已经50岁了,但是从穿着打扮来看,似乎和她的年纪对接不起来。看得出来,她很喜欢装扮自己,虽然待退在家,但是眉毛和眼线却画得特别的深。她说,儿子在房里睡觉,为了不吵到他,她就给我搬了张椅子到门外的走道里,又到隔壁借了把小椅子,还不停地说:“这里比较风凉,里面特

别热……”，听到我也是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她便和我拉起了家常。

问：您是什么地方人？住在这里有几年了？

潘：我们这里是绍兴坊，都是绍兴人，绍兴人弄咸菜出名的。我八几年从静安区嫁过来的时候，还看到这里有咸菜缸。

问：您现在退休了吗？

潘：待退在家，每个月 600 块钱，到退休就有 1000 多块。我们这里下岗、协保的人特别多，日子不好过啊。有种人天天呆在家里，就靠一点房租了。我儿子现在读职校，学的是计算机什么的，以前不想读书的，现在大了要读了，明年想参加三校生高考，要是考上一年起码要一万吧，他要读书我们做家长的也不能不让吧？我们这代人很苦的。我是七几届的毕业生，经历过上山下乡。那个时候插队落户到安徽种田，不过我那时眼睛不好，所以没多久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被分配到一家物资公司，刚开始那里像里弄生产组，7 角一天，9 角一天，后来慢慢企业化操作了。

问：你们这里基本都是私房吧。

潘：（说起家里的房子，潘阿姨颇有怨气，看见婆婆在门口走动，她便靠近我说）我们这个房子是私房，有产权证的。在土地证上只有 31 个平方，这外面的都是后来违章搭出来的，就这点地方住了四家人家，11 个人，我老公的三个兄弟，每家 3 个，再加上两个老的，挤得要死。这里的房子盖得很早的，解放前也是外地人逃过来自己搭起来的，后来就在老房子上再翻盖的。伊拉老早还讲“河水冲了墙篱笆”，我是没有看到。房子里面也是一塌糊涂的。（潘阿姨指着对面的三层楼）最早这里只有两层的，后来有的外地人厉害，搞到什么证件就借本地人的地

基，加盖了三层，然后把一间给本地人，这些我也不太清楚，都是听来的。

问：这里是不是快要拆迁了？

潘：这里说要拆，我嫁过来的时候就听说了，现在儿子都这么大了，还没有拆，不拆也太不像样了，和对面的新商品房一比，这贫富差距也太大了。原来听说隔壁单位要来买这块地，现在不来了。我们这里要是拆的话也不知道政策怎样，以前听说是三口之家按人头补贴十几万一个人，现在谁也不知道。不过，他们要是有了房子，交通还可以的，肯定很多人都要房子的。买对面的房子太贵了，买个两室一厅也要好几十万，听说，前面靠近苏州河那块的房价已经涨到一万了。

问：这边有很多外地人吧。

潘：这里外地人不要太多噢，基本上都是的，你看，我们对面这家住的全是外地人。（说着，潘阿姨还微笑地和他们打招呼）这里上海人越来越少了，有钱的早就搬出去，把老房子借给外地人了。每个月也有几百块房租，具体多少我从来不去问伊拉咯，应该还可以咯。这里的治安不好，风气很差的，偷东西什么倒还可以，只要自己出门把房门关关好，也不会怎么样的。不过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后，这路上的“鸡”就特别多，有时候，吃好晚饭出来吹风凉还听到他们在谈价钱，“50块、30块”，我们么，晚上很早就关门了，不太出来的。有的时候听到外头叫，“捉人了……”，一般捉了一趟就好点了，不过马上又来了，哎，搞不好咯。

在半个小时的访谈中，潘阿姨一直在向我抱怨家里条件差，生活困难，偶尔她也会问问我的情况，“你们每年出来调查有什么用

啊,写出文章也没什么用的。我外孙女在海运学院读金融什么的,她从来不出来调查的”。她还时不时地向路人打招呼,包括和她做邻居的外地人,“干什么的啊”“噢,大学生来调查咯”,潘阿姨兴奋地向他们解释,表面上看他们似乎相处得还不错。

采访人/赵晔琴

含辛茹苦培养女儿上大学的下岗女工

姓名:蔡燕华

性别:女

年龄:45岁

文化程度:初中

职业:下岗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结构:本人、丈夫、女儿、母亲

居住时长:20多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蔡燕华家中,2004年9月10日下午2点

语言交流:上海话

在我进入这个地方调查不久,某电视台的一个姓温的编剧因为要编写关于棚户区里单亲下岗母亲如何艰难培养子女成材的电视剧寻找素材,因为我正在棚户区做调查,所以同学介绍我们认识,和她谈过几次后,她希望能在我研究的被访者中寻找一些真实感人的素材。我通过这边居委会老师的帮忙,替她联系了一位下

岗女工,并约好了采访时间。

我和温一点多就相约到达,因为时间尚早的缘故,我和她开始在这里的小弄堂中晃悠,可能棚户区的生活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那一人宽的弄堂、小孩们打闹的身影、路边围着桌子砌长城的人们以及烧纸钱、做道场的场景都引着我们一步步往里探访。

远远看到蔡阿姨,她正在家门口的小弄堂里和邻居阿婆们拉着家常,见我们走近,她忙开门进屋,我们也跟着进去了。屋子里基本上没什么光线,阿姨连忙打开一盏很小的日光灯,我发现罩子上尽是铁锈,然后搬出两张椅子请我们坐下。此时我们才注意到她眼圈发黑,两个深深的黑眼圈显得格外突兀。房子才两米左右宽,外面是四个平方左右的小客堂,摆着一张半旧的小方桌,里面是一件灶间,光线太暗,看不清楚。可能是用木板搭了个二层楼的缘故,所以底层显得特别压抑和昏暗,伸手就可以触到房顶的那种。沿着约半米宽的木扶梯可以上到二楼,那便是他们一家四口人睡觉的地方。访谈中,一旁的编剧几次提出能不能让我们上去看看他们的房间,哪怕只看一眼,阿姨坚决不答应,“实在不好意思,没什么像样的床,很乱的,像贫民区一样。床一边是书,一边睡觉,一塌糊涂的,没什么好看的”。她表示女儿回来一般都睡在地板上,“这个房子是我娘家的,人家是嫁男人,我是讨男人,有什么办法啊。”

问:现在家里住几个人?

蔡:我们家现在就住四个人,我妈,我们夫妻两个还有我女儿。我们夫妻都是老三届。我老公原来在化工厂上班,很早以前就协保在家了,一开始他在大学里看门,一个月450块钱,实在太少了,女儿还要读书的呀。现在在街道的矫治办工作,每个

月就 600 多块钱，一大把年纪还要准备社工的考试，考出来了工资就可以涨到 1 500 块。他每天看书都看到很晚，有的时候到半夜一点也不睡觉。

我“文革”的时候还参加过大串联，当保皇派、红卫兵，上北京也看到过毛主席。因为身体不好就在里弄生产组做，也很早就下岗了。为了工作也到处求人，后来在一家医药公司做清洁工作，也是临时工，那里的老板人很好的，对我很照顾，女儿参加高考她还放了我三天假，让我陪女儿去考试。后来公司搬到浦东，路太远了，所以我就不做了。我也在超市做过，给人家卖裤子，被偷掉两条裤子，我当时都快疯掉了，一扣就是 200 元，本来就是按效益算钱的，扣了 200 也剩不了多少了，而且那里一天要做十几个小时，后来我就索性不做了。

现在就呆在家里。年纪也大了，工作不好找。我们这代人“文革”的时候没读到书，要文化没文化，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没钱啊，实在没办法，你说有什么办法啊。要我到人家家里做佣人，我也没那个脸，情愿呆在家里，没什么吃就没什么吃。（访谈中，阿姨一直重复着这几句话，显得十分的无可奈何和失落。）

问：你女儿现在多大了？

蔡：（说起女儿，她显得由衷的安慰）我女儿从小就练书法，一直练到五年级，还得过区里的二等奖。那个时候他爸爸抓得很紧，写得不好就一记耳光打上去，还叫我不要心疼。我女儿很争气的，读书一直很好的。我们平时省吃俭用，但是女儿读书是不省的。女儿在晋元中学上的学，高中是直升的。考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和她说，钱你不用担心，你只管考就可以了，就算考到大专只要自己尽力了就可以了。去考试那天，她爸爸就

和她说了一句话“祝你成功”。她自己也说紧张得要命，一场考试上了三趟厕所。考完了，她对我们说，不到450分不要和她讲，后来我侄子到网上一查，考了494分，语文考了127分，她开心得要命。我和我妈还特地到家乐福买了巧克力分给弄堂里的邻居吃。她现在读的是医科大学七年制的法文班，今年是第五年了。学医科其实也是我们的想法，我父亲原来就是个医生，我当时想读没读成，现在我们几个兄妹的子女中也没人学医的，所以我就想让女儿学医。就像她爸爸说的，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当时医药公司的人都和我说上海那所大学的临床医学七年制法文班最好，我们就决定考这个了，我女儿也没什么主意的。我女儿大一的时候就考过了英语四级，二年级下学期就考过英语六级和法语四级。因为家里穷，她就做点家教补贴家用。现在我让她不要做了，她心脏也不太好，一直痛，而且医科学习很累的，很多东西要记，我和她说身体最重要，身体垮了还谈什么啊。我女儿也很听话的，现在不大做了。

因为家里穷，她穿得也很朴素，我们这条弄堂里的老人见了我女儿都这么说。人家女学生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她不是。其他女孩子聚在一起说什么衣服啊，她都不参加的。吃饭的时候也是，人家在楼上的餐厅吃饭，她就在楼下的食堂吃点便宜的。有的时候，她也恨的，说人家父母怎么有钱，我们家怎么就这么穷？他爸爸就光火，“依投胎投在我们家没办法，要么依去跟人家爷娘好了”。不过我女儿还是很懂事的，读书很卖力。

问：要供女儿读书，你们的经济负担也很重啊。

蔡：（说到家庭经济条件，她一直在叹气）女儿和我说，以前中学里

有个老师很坏的。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我女儿看到有位置就坐了，正巧他也在车上，大概是我女儿没给他让座，那个老师后来就一直针对我女儿，说她穿得不好啦什么的，我和她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只要成绩排在班里前几个，人家也就没话了……原来我们准备了2万块钱给她上大学用，那个时候一年四五千学费，我想2万总够了吧。谁知到现在居然要1万块1年，7年就要7万块。第一年开学的时候还是他大伯伯瞒着他老婆出的钱，叫我们不要说，反正我们心里都知道的，叫女儿也心里记着，等毕业出来赚了钱还给大伯伯。现在我的退休工资基本上都给女儿了，一年的退休工资积在卡里不动，到开学就直接划到她学校的账户上当学费。平时再给她400块钱零用，我女儿也很省的。不过现在人大了，她爸爸也说要接触社会的，老是读书也不行的，有的时候也要和同学出去玩玩什么的，她爸爸就给她一点钱。我们一直和她说，要好好读书，不然真的对不起爷娘的。她学语言用的录音机什么的都是别人坏了不要了，她爸爸拿回来修修给她用，用用不好了再修。家里的电脑也是大伯伯家淘汰的显示器和别的亲戚家的主机组合起来的，是拼的。他爸爸说了，现在买电脑都是玩的，要是真的对学习有用，他肯定给买的。家里穷归穷，但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不过我们在小孩子读书上面是从来不打回票的，要买什么书只管买。她高考的时候我就拿给她一张单子，问她要订什么报纸尽管订，后来她选了语文报、数学报什么的，我自己掏了100多块钱出来给她订。吃东西也尽量给她吃得营养好点。钱对我来说很重要，没有钱失去了很多。但是我不会让女儿不读书，这个是要分阶段的，有些人家想得很通的，家里困难，就让小孩子早点工作。我不这样想。

现在不读书,以后出来更加没钱,难道她还想像她妈妈一样吃没有文化的苦啊?不过博士我们就真的供不起了,我和她说,她要是想读的话,以后边工作边读。反正我们只能供到她七年读完,结婚什么的也只有她自己来了,家里实在没钱了。我们在家平时也尽量省点钱,我衣服基本上不做的,都穿旧的,要么就是她以前中学的校服什么的。(我这才发现,阿姨穿了一件白色的大 T-shirt,可能是旧的缘故,颜色有些泛黄)菜的话也吃最简单的,现在一般就是青菜、冬瓜汤,再买点便宜的鱼。

(说起鱼,蔡阿姨就气愤地向我们讲述昨天的经历)昨天买鱼的时候,被斩了 10 块钱,气死我了。现在乡下人也很坏的,我想女儿“十一”要回来了,想买几条鱼煮给她吃,2.5 元一斤,我买了 8 块钱,给他 20 块,他应该找我 12 块的,可是只给我 2 块,还硬说我给他的是张 10 块。后来干脆诅咒了,说什么他要是拿了 my 钱家里谁就要死掉。哎,算了算了,没什么话好说的,气死我了。

采访人/赵晔琴

“辣椒风”和“摇篮房”

姓名:倪卫力(丈夫)、韩婷婷(妻子)

年龄:丈夫 41 岁、妻子 30 岁

籍贯:丈夫江苏江阴、妻子湖南

文化程度:丈夫初中

职业：丈夫职员、妻子家庭妇女

家庭结构：夫妇俩、儿子、丈夫的父母

居住时长：41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倪卫力、韩婷婷家中，2003年11月21日

语言交流：与访员交流用普通话，家庭内部用上海话，与老家亲戚说江阴话

倪卫力的父亲，72岁，退休，原籍江苏江阴。来上海后先在军队服役，退役后在某织袜厂当工人，一直未更换工作，直到80年代退休，退休金约700元。现因病住院。母亲，72岁，退休，原籍江苏江阴。来上海后一直在某织布厂当工人，未曾更换工作，直到80年代退休，退休金约700元。现长期在医院照顾老伴。

问：你们现在家里住几个人？

韩：嗯，目前是五个人住。

问：您是上海本地人吗？

韩：不是。我老家在湖南。我丈夫是上海本地人。我来上海，是因为我姐姐在上海结婚，那个时候她怀孕，怀孕反应很大，正好我是学医的嘛，我就过来了。我一直帮她带小孩，没工作。我老公在地铁明珠线里面上班，现在就是值班，工资一般，1500左右。他今年41岁，我30岁。我们已经结婚3年了。

问：那您父母一辈是从什么地方搬过来的？

倪：江苏江阴。他们来上海，这个么，就跟你们一样的，你们是读书，他们是打工。他们一九四几年就过来打工了，那时候我妈只有20岁。我爸是当兵的，我妈是做工人的，就是在织布厂

里做的。我爸退役就跟我妈结婚了,后来有这个证,就可以办户口了。解放以后,他们就住这个房子,先是借的,到1962年的时候,买下了这个房子。我爸退役以后在织袜厂上班,现在他72岁,退休了。退休金不高,只有700多块。以前嘛,这个收入……这个钱很……很经用的,现在这个1000多块没有用了。他身体不大好,光靠他们700多,就光是去看病都不够。我爸正在医院里面,这个医药费多贵啊。看到现在,3万多块了。呵呵,远远不够啊,他们这个收入远远不够的。妈妈身体还可以。

(对自己儿子)飞飞啊,快点长大噢,长大以后就跟两个阿姨一样去读大学。我们小孩要跟你们一样啊,我就高兴……(对小孩)你也要做研究生啊。

问:您有兄弟姐妹吗?

倪:兄弟……有啊,我们是兄弟四个。他们都在上海,住在别的地方。我排行老三,在上海出生,1963年。那个时候我们小,爸爸妈妈养了四个小的,知道吧,没人带,没功夫带,就把我放到乡下了。噢,那个时候我在老家呆了一年多吧。

问:你们从江阴移过来之后,跟老家那边还有联系吗?

倪:联系的,有空的话,他们就过年过节的时候过来,过来玩两天。老家的嘛,是我的长辈,都是爸爸妈妈的兄妹。现在这个车子多,方便,过来的话只要四个钟头左右。

问:您平时和兄弟姐妹联系多呢,还是和周围的这些邻居联系多呢?

倪:兄弟嘛,因为住在……他们要上班啊,也没什么空,一般他们是休息时来看看爸爸妈妈。周围的嘛,因为天天能够见到面,知道吧,见了面总要说两句。

问：你们平常在家里都说上海话是吧？

韩：我在家里是说的。

倪：你们来嘛才说普通话。跟老家说话的时候，那个很自然地就转变过来说家乡话了。

问：等孩子大一点了，你是不是准备出去工作呢？

韩：没考虑。

倪：现在我们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未知数……是吧。小孩嘛，小孩能成才，至于做工嘛，也没多少钱啊，现在这点钱，做了工就没人带小孩了，没人带的话……我们的精力现在就在孩子身上，是吧。自己没有本事嘛，把这个希望放在小孩身上。

问：你们平时都有些什么娱乐活动？

倪：想去娱乐就是没钱。以前看看电视听听音乐，现在是……现在有了小孩嘛，我们就不大看。因为看电视他也要看，小孩嘛，要看坏掉眼睛的。

韩：我忘了，我们好像几个月没看电视了。我们都是为了他。平时听听音乐，可以唱唱歌。

倪：上海都是这样的，这是普遍现象了，都生活水准不高，那你怎么去逛街，去逛街的时候只能去看看。

问：你们也为小孩攒钱吗？

韩：有小孩的都是这样，父母嘛，也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以前我们也不像现在这样的，像你们那样，打扮得漂漂亮亮。现在不行，小孩，总是第一个就想到他。

问：你们以后打不打算买房子？

倪：有钱的话当然想买房子，每个人都想过得好一点，是吧。每个人都有一种欲望的嘛，对吧，都想生活的好一点，那要看什么生活水准的。如果收入高的话，有钱花的话，当然想买了。每

个家庭都应该有这样的打算,想有钱了就去买房子,你看我们这个家……就是想买也没钱买。

问:这一片有没有说要动迁?

倪: 噢,他们不来了。

韩: 不来了,吓跑了,因为这里不给房子。他希望给我们一点钱,打发走,但是多数人想要房子,毕竟这里有钱的人少。这个房子……那个车子一过就像摇篮一样摇摇晃晃。

问:如果要动迁的话你们怎么办?

韩: 动迁啊,我们就等他们分房子,如果有钱就换房子,就是这样子。

问:如果给你们一套房子在偏远点的地方,你们愿意去吗?

韩: 就看什么地方,像桃浦那个地方的话太远,就不去了。

倪: 有钞票嘛无所谓了,没钞票嘛不行的,很远的那不方便,尽量地放在近一点,对吧? 那时候我爸爸妈妈从乡下到上海,现在我们一动迁从市区到郊区,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呵呵……没钱就这么回事。现在这个社会嘛就需要钱。以前做好人好事的多,现在哪里有。

问:你们认为你们这一片环境怎么样?

韩: 不好,你看这里乱七八糟。

倪: 太乱了。为什么呢? 我们这里就是空房多,出租的也多。因为有人想这里早晚要动迁的,就搬走了,搬走了这里的房子就空着,空了就出租,出租了就便宜,那么外地人做生意的就过来了,越来越多,像我们这个村,10%都是外地人。在这里就卖蔬菜,没办法,我们这里前两个月,还盗窃的,治安不好。

问:你们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吗? 买菜和买东西方便吗?

韩: 买菜还方便,蛮近的,旁边就是菜场。

问：你们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呢？

倪：我最不满意的，你看天气好一点（现在下雨）的时候，灰尘很多，就像胡椒粉一样。空气也不好，一点都不流通。我儿子，五六个月的时候，因为……可能是从我姐姐那边嘛，小区里有树什么的，回来后的第二天就咳嗽，不像感冒，就咳嗽，因为这里旁边就是小店，那个辣椒风一吹就吹到我们家里，看（病）一个多月，花了3000多块钱呢。小孩气管炎就引起那个有痰，有痰就把吃的奶水全部吐出来了，我和他爸爸两个晚上没睡觉。下雨了才好一点，有的时候外面灰尘很多、很脏，我每天都要清理那个的，而且车子一过，我们这个房子就像摇篮一样很响，那个大车子一过……很乱的这里，晚上这里人很多，卖菜的啊，民工啊，不安全。我们这个小孩在外面玩就怕给抱（走）了。

采访人/章 雯 张晶晶

在这儿长大的女大学生

姓名：洪思懿

性别：女

年龄：23岁

文化程度：大学在读

职业：学生

婚姻状况：未婚

家庭结构：本人、父母、叔叔

居住时长：23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洪思懿家中，2004年8月31日下午2点

语言交流：上海话

入秋以来天气渐渐凉爽了，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里不见了踪影。“这个时候要找年纪轻点的人访谈是找不到的”，居委会的陈老师给我泼冷水，“他们现在都在麻将桌上忙呢”。果然，我在小巷里转了几圈，透过低矮的窗户看到好多人家家里都在砌长城，有的远远就可以听到麻将牌清脆的声响。

到洪家访谈是陈老师引荐的。他们家门口很小，就对着不到一米的狭窄弄堂。跨进门口就看到一个30出头的男子卧在躺椅上，手里拿着本小书，走近一些可以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来来来，给你介绍个大学生，她是来做社会调查的。”“啊呀，我没空的”，他懒洋洋地说，“叫我侄女吧，大学生对大学生有得讲了。”说着，他把楼上的侄女叫了下来，小洪人很清瘦，穿着睡裙，揉着惺忪的睡眼从楼梯上下来，和我礼貌式地打了招呼，然后请我进了里间，她叔叔又给我倒了一杯水。就这样，我开始对小洪进行访谈。

问：你今年几岁？在哪个大学读书？

洪：我今年23岁了，学环境艺术设计，马上就是二年级了。明天就要开学了。（小洪笑着说）我们学校那里是公寓式的，每年1500元住宿费，加上学费，一年总共1万多块。还有日常的开销，这个也不一定的，一般每个月父母给三四百元。我以前读的是技校，属于三校生考的大学。像我这样读大学的，我知道就我们这条弄堂里好像有两三个，一个在医大，七年制的，

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还有一个是上大的。以前我们一条弄堂里的还经常在一起玩，现在有一个已经搬走了。

问：你从小就住在这里吗？

洪：我从小就住在这的，我们家现在从一楼到三楼一共60多个平方，就我父母、我还有我阿叔四个人住。上海人住在这里很少了，基本上都搬走了，把房子出租给外地人。外地人到这也就是一年多之前的事，他们也是陆续进来的，一般就是来借房子。这里借房子很随便的，应该要办什么房屋出租许可证的，但好像很少有人办什么手续，而且房钱也便宜，所以很多外地人都来这里借房子。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有人来管一管。派出所也只是偶尔来查查，或者出了点事情，有人去讲了，他们才来看看。我们隔壁邻居以前也把房子租给外地人的，现在不太清楚。居民和外地人吵是有的，都为了一些很琐碎的小事情，我们和外地人没有什么接触的，房子也没有借给外地人过。

问：你怎么看这里的外地人？

洪：外地人来这对我们是有影响的，比较吵、闹，他们把东西乱堆在门口，弄得一塌糊涂的。老早这路上没人摆摊卖菜的，现在很多。这里小偷也蛮多的，我们家没遇到过，隔壁邻居被偷过，液化气的钢瓶，还有自行车什么的都被偷掉了。有的人家到居委会反映，有的也报警的，但都没什么结果。这些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干的。外地人在这里也比较危险，比方说，他们用电器都不当心的，随便弄的。这里卖淫的人也有。夜里就站在弄堂里，有的时候还站到居委会的门口，反正晚上居委会都下班了（笑）。

问：你们这什么时候拆迁？

洪：拆迁的事情一直在说，但是没什么动静。本来说今年年底，谁知道。年年都讲，年年都不拆。（小洪话不多，尽管她土生土长在这，但是关于这的情况，她似乎知道得并不多，而且显得有些漠不关心。）平时我都住在学校，一般一个礼拜回来一趟，回来了我也一直呆在家里，不出去的，所以这儿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有的时候在弄堂里乘凉也听到他们大人抱怨什么外地人怎么怎么不好啦，一般听到这种讨论我都走开的。（问小洪原因）自己不感兴趣，所以从来不参与。

问：你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计划？

洪：等拆迁就可以搬到新公房里了，别的也没什么。倒是在学业上，希望有机会可以继续深造。

离开小洪家，陈老师讲，这个女孩子不太讲话，一直呆在家里，可能和她阿叔的事情有关，觉得自己矮人一截。原来他叔叔小的时候被别人带坏了，在浴场洗澡和人家发生矛盾，后来就出来打群架，把箍桶的铁片削尖了插到人家脖子后面，触到了神经，弄得人家两条腿瘫痪不能走路。那个时候他是被判死刑的，他母亲不服给他上告，他被改判无期。当时他还没有满16周岁，一直被关着，直到满了16周岁才开始服刑的。后来在监狱里表现好，又改到18年、14年。一直到30岁出头才出来的，现在好像在做快递。他母亲就是为了他的事情操劳过度，很早就死了。不过他哥嫂对他还是不错的，房子都留给他的，现在他们还和他一起住的。

采访人/赵晔琴

（二）董家湾

董家湾总体概貌

一、董家湾的地理位置和由来

董家湾位于上海市闸北区境内，周边有诸多交通干道、公交枢纽站、地铁站、轻轨站、火车客运站和长途汽车站。众多交通节点聚合在一起，使这里的环境变得非常复杂，人口也因此庞杂且流动性大。就董家湾周边环境而言，它东面紧靠一座立交桥，东西千余米，仅有这一座桥可以穿越南面的铁路，因此不论何时，这里总是车水马龙，每当早晨和傍晚车流高峰时，行人、自行车、公交车、各式汽车挤作一团，整条马路水泄不通。由于道路改造，立交桥下不宽的路面也承担起了上海道路交通分流的重要使命，同时，立交桥下也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二手自行车和零配件市场。所谓的二手自行车，多数是从各种渠道来的非法盗窃自行车，而所谓的零配件也只是将一些报废的自行车拆散，把可以用的部分清理出来买卖。整个董家湾的东面全部被改造成了店面，摊主们将货物堆放在马路上，供人挑选。人流、车流夹杂着心怀各种目的的人，你来我往，显得格外喧嚣和嘈杂。董家湾西面临河，早期河道上常有运货的船家来来往往，但如今，河水已经变得黑臭，再没有什么船家的穿梭，河堤也筑成了结实的防汛墙。河的那一面，建起了高高的商品房。南部，早期的董家湾紧邻铁路，后来由于城市改造，铁路边造起了围墙，新建了轻轨线和一条马路。北面原来也是棚户区简屋区，1995年被拆除，建成了如今的两栋蓝印户口商品房。董家湾的行

政中心——居委会也就设立在这两栋商品房楼下的一间房屋内。同一个居委会，两种不同属性的人群由此被一条马路分隔开来，彼此很少来往。

根据一些老人的记忆和有关资料的记载，董家湾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有一批船家顺着西面的小河把蔬菜运到这里来卖，到了晚上，船停在河边，人便住在船上。随着船家的增多和市场的兴旺，水上的人家走出了船舱，开始在河岸边搭建简单的住所。当地老人描述，直到1945年，这里的前前后后主要还是菜地、坟地和一些荒地，人家总共不过二三百户，住的都是草棚，围墙用的是木板。草棚起初搭建在河边，随着搬来的人越来越多，这种草棚逐渐向四周蔓延开来。但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多数草棚都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彻底烧毁过。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苏、安徽、山东、湖北等省灾民及破产农民大量流入上海，有些灾民们沿铁路来此就近栖身谋生，在大片废墟空地上再次搭建棚户简屋，棚户区进一步扩大。这里的棚户有瓦顶木柱竹片泥墙式、油毛毡顶木片墙式、芦苇稻草编搭的“滚地龙”式、芦苇搁搭的鸽棚式四种类型。大都阴暗潮湿，污水遍地。棚户聚居点以同乡群体居多，起初是一户人家，当他在这里扎根站稳后，其兄弟姐妹或同乡就会纷至沓来，在附近聚居。如今生活在这里的本地居民大多是当初第一批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可以说，董家湾是一片典型的依附铁路与河流生长出来的棚户简屋区。

二、董家湾本地居民的状况

最早摇着船，来这里卖蔬菜的多数是江苏兴化人，也有少数苏北人。抗日战争胜利后，逐渐又搬来许多苏北人、兴化人，还有少数河南人、扬州人和高邮人等。最终，苏北人在这里占据了绝对的多数。直到现在，兴化人多数还是沿河居住，而其他地方则以苏北

人为主，夹杂少数其他移民。他们虽然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但在这么一个同乡程度非常高的社区里，很多当地的习俗仍被保留下来。例如，就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说，有一定年龄的居民，尤其是老人，都还是操持着一口浓郁的苏北话。对于上海话，他们只听得懂，却说不来。对于中年人来说，当与他们与外界交流时，虽然会说出纯正的上海话，但一旦他们自己相互对话时，家乡的语言立刻又不知不觉地脱口而出了。

三四十年代，这里的居民多数以出卖苦力或做小生意为生，例如贩米、卖菜、搬运、拉黄包车、踩三轮、拾荒、讨饭等等，也有些人在工厂里做工人。但不论做什么工作，都很辛苦，整日整夜的忙碌，生活却依然不见好。直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许多工厂倒闭或者被改造，造成了许多工人失业。直到改造完成后，工人才恢复了工作，有些工人就这样在工厂里工作一辈子，直到退休。

刚解放时，董家湾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这种规模一直持续到1954年左右。在当时上海市的返乡动员下，一部分人把房子卖掉，离开了，但是规模并不大。当时的人口流动多以探亲访友和治病为主。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嫁、拆户分户和新生人口的增长，这里的人口规模迅速膨胀。80年代末，人口流动使董家湾人口密度变得更大，务工、经商者成为此次流动的主力。

根据董家湾居委会2005年7月的统计，本地居住有2058户，共计5515人，其中居住在路南棚户简屋的有1700多户，住在路北两栋高层商品房的有300多户。60岁以上的老人有686人，占本地居民总数的12.4%。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689人，但实际外来人口会大于这个数字，居委会工作人员解释说，由于环境的复杂性，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大，因此无法估计出确实的外来人口的数量。

目前董家湾地区的人口比较复杂,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可以概括成“三多一少”四个字。“三多”即残疾人口多、两劳释放人口多和贫困人口多;“一少”即钱少。据居委会统计,董家湾辖区内有关疾人口 123 人;两劳释放不足 5 年的人口,即居委会日常工作的重点看护对象 117 人;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口 1052 人,达本地居民总数的 19.1%。而由于有些失业人口认为来居委会登记并不能解决实际的就业问题,因此,统计可能不足,实际的失业人口比重会大于目前的这一数字。由于收入低,本地居民,尤其是男性,在婚姻选择上只能娶外来妹为妻,董家湾地区共有 100 多户这样的人家,这样的婚姻结构给家庭和居委会都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居民的文化程度大多集中在初中,年龄偏大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则更低。残疾人口的生理缺陷、刑满释放人口的牢狱背景、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匮乏以及文化水平较低、缺乏特殊技能、上海人的心理自居等原因共同造成了董家湾地区就业率的偏低。多数居民没有好的工作,下岗、失业不在少数,很多人只能靠在外打零工度日,或者有些人只能歇在家里。就算就业人口大多也是从事体力劳动者居多。

三、董家湾的历史演变

董家湾最初形成之时,地处偏远,水、电、煤等城市基础设施几乎没有。最早来到这里的船家们在岸上打一井,用来煮饭和饮用,而日常生活的用水则全部来自小河。1925 年,附近路段铺设下水道,但一二八、八一三日军入侵上海,原有道路和部分下水道遭到严重破坏。日军占领期间,下水道无人养护疏通,大多淤塞。抗日战争胜利后,市工务局对下水道重新翻排、铺设,使管道再次发挥作用。但当时的“防疫龙头”被霸占在私人手中,居民们需要向其购买“水筹子”才能使用。1949 年 7 月 13 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规定，改“防疫龙头”为“零售水站”。次年6月，设立公用给水站，为棚户区供水。50年代初，棚户区的供水得到大力改善，至此，居民的自来水使用得到了保证。1979年后，市自来水公司开始为居民接水进屋，据居民回忆，1984年，董家湾最终实现每家每户自来水进屋。1985年，附近主干道下水道改造，新铺设口径300~700毫米自来水干管，总长度20余公里。新建2万吨级地下式水库唧站，保证了铁路上海站及周边地区供水。

直到解放前，董家湾地区一直没有通电，居民们使用的都是煤油灯。居民们回忆，一解放，这里的电就通了。而当时棚户区居民用电量极少，1946年，生活用电仅占全区总用电量的4%，1949年底，用电量才增至2484万千瓦/小时。1952年起，闸北水电公司为棚户居民安装集体电度表。1958年，基本不再使用煤油灯。

吃饭，董家湾最初的拓荒者们都是用自己搭的灶头烧火做的，燃料是豆秆和柴禾，豆秆可以捡到，柴禾可以从做这门生意的船家那里买到。直到解放后，居民逐渐使用煤炉。1972年，市煤气公司开始经营液化石油气，董家湾第一户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居民出现在1981年。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石油液化气，但由于贫困，为了省钱，有些家庭只是在做饭的时候使用液化气，其他时候，例如烧水或者炖汤时还是使用煤球或柴禾。

由于董家湾是自发从城市中生长出来的，谈不上任何规划，各类建筑或沿原乡路或小河建造。所筑道路布局混乱，路形弯曲，路幅狭窄。董家湾周边的四条马路均初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本是泥路或煤渣路，50年代多数马路铺成了石块路，直到1986年，才全部改造完，即目前的柏油路。多数马路在历次改造中不断加宽加长，但境内的董家湾路至今长也只有376米，宽仅5.5米。由

于路况较差,解放前这里根本没有公交,在工厂里上班的工人只能每天步行很远。直到解放初,这里的交通也以马车、人力车为主。现在居民还是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公交站点需要走五六分钟才能到达。

在本地人口增长和房屋破旧的双重压力下,1980年代居民开始又一次大规模改造房屋,将原本木制毛毡的棚户改成砖头、水泥建筑,同时,扩大房屋占用土地面积,侵入走道,为房屋加高、加层,以缓解住房拥挤问题。尽管如此,效果仍不尽如人意,有些人家一间屋子里仍住着两三户人家,老中青几代人。

由于城市的发展,董家湾一带日渐热闹了起来,近十年来,沿街的房屋全被改建成了店面,有些房主把屋子租借给外地人做生意,有些房主自己经营。靠北的一排店面一半演变成露天的集市,附近的居民就在此买菜。另一半店面做二手衣裤、鞋的生意,很多废旧的衣物等放在摊位上供附近的民工挑选。而董家湾南面的一排店面多数经营饮食生意,西面的则是二手车市场。据称,这些店面很多都是幌子,背后经营着非法的交易。居委会工作人员称,辖区内治安状况不太好,吸毒、贩毒人员较多,偷窃现象也严重,尤其是逢年过节就会经常发生外地人的偷窃案件。

总的来说,董家湾是上海历史上典型的棚户区,它的形成、发展和现状都与整个上海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不断传出这里将要拆迁的传闻,很多居民都期待着这一天的来临,盼望自己的生活得以改善。随着城市的改造,相信这一片棚户区最终会消亡,但它的存在也向人们展示着另一个真实的上海社会。

调查整理、撰写: 闵思卿、朱建华

纱厂里的苏北女工

姓名：林豪杰(丈夫)、李敏珠(妻子)

年龄：林 79 岁、李 76 岁

籍贯：均为江苏金湖

文化程度：林读过几年书、李文盲

职业：退休

家庭成员：老两口和孙女

居住时长：51 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 年 11 月

问：您是怎么来上海的？

林：我老家是江苏金湖县，到上海是因为解放前农村，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是农村的房子，只好投奔到上海，找亲戚。当初农村困难，有地主恶霸，我们是贫农。那时候还有旱灾、水灾，(遭)受自然灾害。后来来到上海也很苦，划着一只小船来到上海。当时，16、17 岁，还没解放，日本人还没投降。因为当时上海有亲戚，所以投靠亲戚，刚到上海的时候又找不到亲戚，只好先到处干苦活。一开始在河里捉田螺，卖了钱再来谋生。后来做了一阵才知道亲戚在哪里，去投奔亲戚，被介绍到厂里工作，一直到现在。刚到上海时到处干苦活，没有好工作，都是苦活。

解放前，在中国这么多的省份中江苏是较好的，苏北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好的，就被水灾搞坏了。农民辛苦种了一年的

粮食，洪水一来就全毁了。解放后共产党修水利确实做了件好事，现在大的灾荒是没有，苏北多少年了都没有灾荒。那时候，从苏北到上海大部分人都是坐那种手摇的小木船，起码要5天到6天才能到，现在只要三四个小时了。

李：像我们以前在农村吃的苦多了，像以前一向说“翻身不忘共产党”，“毛主席是我们的恩人”。以前在厂里忆苦思甜，像你们接班人不知道什么叫“忆苦思甜”。一开始到上海，是划船在苏州河里，后来住在广源路亲戚家，后来52年来到董家湾，现在住的房子是买的。经亲戚的介绍到纺织厂工作，是上海第二棉纺厂，一直在那里工作，一直到50岁退休，现在76岁。先生在银行里做，一直做到退休，现在79岁。

林：在银行里一开始也是做苦工，我们亲戚有人在银行里做，所以先在银行做小伙计，写写算算。解放后银行被收公了，一开始是私营银行，后来是公私合营银行，后来是人民银行，最后是工商银行。

像纱厂里要有一定的湿度的，所以很热的。还有做夜班时，白天下班了就让你睡在厂里的地上，专门有人值班，到时候上工了就叫你起来做工，厂里就是这样干的。现在上海纱厂为什么关门，不是人民不穿衣服，关键还是国家有意调整。现在上海失业的人这么多，如果纱厂开了，像她们以前的工作，现在没人吃得了这苦，没人肯做。

李：以前苦啊，7个夜班，6个早班，5个中班……

林：7个夜班是因为上海电不够，所以放在夜班，日班少。7个夜班做好，人已经不行了，像她们如果生病了，像一般单位应该请假，但她们不行，她们厂里有厂医，下去休息一个小时再上去继续工作，那时候纺织是上海的支柱产业。如果做中班，做

到十点钟是没钱的，做到十一点才算钱，很抠的。一直这样三班做到退休，所以说建国的时候，他们很苦的，在纺织厂也是报也报不进，出也出不了。像我们银行也是这样的，经常上班了不知道几点回来，因为账多起来，一份份查账，做到十一点多也可能，很苦啊！

李：上海第二棉纺厂以前是日本人的，顾正红也是这个厂的，他那时候让工人罢工，要日本人发工资，现在他的铜像还在厂里。解放前我也是在日本人的棉纺厂里，那时候，虽然发工资，但是很少很少，条件很苦，六进六出（就是六点上班，六点下班），而且一天休息都没有，直到解放后才有休息。工资很少的，尽管纱厂很苦，但是还是很多人想过来，因为纱厂的工资稳定，比一般高一点，还要有走门路才能进去。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吃尽苦，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们救出来的，我们现在就是靠共产党拿劳保。工资一开始几毛钱，后来几块，几十块。

问：您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李：53年入党，在纱厂里，当时入党很难的！要考验，入党要看成分，我是贫农，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班前会”、“班后会”、“早汇报、晚指示”，饭前、饭后开会，下班开会，大会小会，家庭访问，工人中有困难的要相互帮助。平时一下班后，每人做了多少活都是要考核的，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像现在有电风扇、空调，以前什么都没有。在家里还可以用扇子，在厂里没有电风扇，汗出得都湿透了。

问：你们受过教育吗？

李：没有文化。

林：读过几年书。

问：参加过扫盲吗？

李：参加过，因为那时工人太辛苦了，以前3个礼拜才休息一天，像现在一个礼拜休息3天，以前是三班轮做，很辛苦！

问：你们儿女的情况如何？

李：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和儿子下放，一个到江西甘泉县，一个江西崇仁县，外地，现在调到南昌市里去了。大女儿回上海了。儿子小时候在甘泉中学读书。小女儿现在在上钢厂附近，以前是漆厂的，因为漆厂有害的，所以提前退休，说实话现在的几个孩子都还不错，外孙、孙女也不错，两个读本科，孙女也在读夜校。小女儿什么也没碰到，因为哥哥、姐姐都下放了。我那时候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人家独养儿子都不肯下放的，但我一个号召下放，我就送他们下放，我们老早总归相信党，相信国家。但我小女儿分配到的工作也不好。照理哥哥、姐姐都下放了，她应该分配好的单位，我们总归分配到哪里就哪里。那时候的人都不像现在，都很老实的。儿子、女儿（读初中然后下放，一个68级，一个70级，老三届）下放在农村种田，吃了很多苦。在山区，那时候号召说小孩子在城市里是糖衣炮弹，去到那里只看到山看不到人，都苦的。大女儿最苦，下放十年，一直在农村种田，才回来。儿子做了七八年，后来（在）矿里工作，被调到南昌市里工作。那时候小孩子还不懂事，恨爸爸妈妈把他们送出去，说爸爸妈妈思想好，让我们去吃足了苦。现在的小孩子都是糖水泡出来的，没吃过一点苦。大女儿现在五十几岁了，退休了，女婿是江西人，在上海结婚生小孩的。回来后因为我退休了，所以她在纱厂顶替了我，在生产组，她也一直在棉纺厂做到退休。女儿先回上海，婚后半年，女婿也回来了，也在棉纺厂工作。

问：您的兄弟姐妹现在情况怎样，互相还有联系吗？

林：我的一个弟弟，还有妹妹也来上海，但他们都去世了，刚来时他们跟我住一起。现在农村的条件也好了，我现在也不经常回去，有大事才回去，现在年纪大了，更不大回去了。

问：儿女现在的居住情况怎样，是否和你们一起住？

林、李：他们都住公房，不和我们一起住。儿子在外地，孙女回上海了和我们一起住，孙女 27 岁，孙子在同济大学，外孙女也是大学本科，两个都不错，孙女在咨询公司工作。孙女出生在江西，到初中时，我到江西照顾她，到高中时回上海读书，高中毕业考了专科。儿媳是南昌人，他们在江西结婚，他们现在经常到上海来，儿媳已经退休了，儿子在江西南昌市财政厅工作，我以前回去江西照顾孙女读书，经常家里住半年，江西住半年，现在孙女在我这里，我一般去江西住个把月，因为孙女在家里。我要照顾她，现在的小青年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问：如果动迁你们有什么打算？

林：如果动迁，我这房子 30 多平方，偏远的地方不去。我过去靠共产党，现在也要靠共产党。我有心脏病，浑身是病，所以我们两个老人不去，就是靠共产党，要求分在附近。解放前我吃尽了苦，我 12 岁父亲过世，小时候就讨饭，解放了，是党在苦难中将我们救出来，现在我也要享受国家的待遇。现在靠共产党做适当的分配，像我要不是靠共产党早就没命了。现在我身体这么不好，就是靠共产党劳保，还有两个女儿。如果不迁的话，这个地方还可以，周围都有医院，我的房子也蛮大的。解放前我们吃太多苦了，现在我们也靠共产党。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穷人从哪里拿劳保，这是事实。现在我们房子要拆了，像我们这一辈子也可以住公房了。

问：你们还会讲家乡话吗？

李：我不会讲上海话，都是讲苏北话，儿子女儿都不会讲苏北话。

问：与老家还有联系吗？

李：有时候会回去，母亲去世回去了，兄弟去世回去了，兄弟姐妹五个还剩下一个，三个都死了，我是老大。

采访人/陈江华 刘 敏

来自崇明岛的码头搬运工人

姓名：赵振国

性别：男

年龄：78岁

籍贯：上海崇明

文化程度：小学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本人和妻子

居住时长：六七十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赵振国家中，2003年11月19日

语言交流：上海话

该地块北面是蓝白相间的20来层的高楼建筑，西面隔河相望的是五六层的新村房子，南面贴着轻轨，东面是围墙围起来的工地。整个地块基本都是1至2层的棚户简屋，其中有一座很显眼

的3层房屋，明显有着加盖过的痕迹，墙外挂着一块“旅馆”字样的牌子。居委会坐落在一街之隔的高层小区内，小区门口站立着穿制服的门卫。居委会推荐洪阿婆给我们带路，我们沿着一条小巷向要采访的第一户人家走去。巷口两边摆满了各种水产蔬菜的地摊，几乎占据了路面的1/2。小贩们把烂菜叶子和鱼鳞等随意地丢弃在角落，加上当时正下着小雨，路面显得湿滑肮脏，满地都是黑色的污水。我们跟随她自北向南走了5分钟左右，向东再拐进另一条十分狭窄的小巷子，在接近轻轨道路的地方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屋檐下的椅子上坐着一位正在拆粉红色毛衣的老伯，洪阿婆向他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身份以及将要采访的情况，我们临时决定先来采访这位老伯。

环顾四周，老伯背后是一栋一层砖瓦顶、水泥砖墙的平房，红色的木门，门上贴着的对联显示这是一户信仰基督教的人家，没有窗户。周围房子结构也差不多，但多为两层，也有三层的建筑，高度参差不齐。赵老伯家的房子显得特别矮，这条小路其实也只是房子间的缝隙，仅可供一人出入。我们开始了访问。赵老伯全名赵振国，现年78岁，满头白发，架着一副老花眼镜，穿着一件泛白的蓝色工作服。他对采访表现得比较配合，但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始终不忘手中的毛线活儿。

问：您是什么地方人啊？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

赵：我崇明(人)，就是上海郊区。今年78(岁)了。我出来的时候18岁，日本人还在呢。日本人要搞个清乡，要户口，我到乡下去搞个户口。户口迁出来3个人，(19)37年或者38年，户口迁到上海来了。出来之前，在崇明家里种地。崇明在长江口，潮水来(时)海滩坍下来，我的房子也跟着坍掉了。只好搬场

(搬家),家里皮皮邋邋(乱七八糟)了。农民要靠土地吃饭的,土地坍掉了,没地方吃了,就到上海来了。

问:您老家原来的那些亲人现在还依旧在那边吗?

赵:兄弟姐妹现在都过世了,只剩我一个了。我最小,阿末头。一个姐姐、两个哥哥都没了。老家那边,两个侄子在种地,还有两个已经在上海了。当初到上海来,是我哥哥先上来的,在地铺市场。老家现在只有小辈了,像我同年龄的一个都没了。

问:您和老伴是在老家结婚的吗?

赵:嗯,她是浙江人。她就呆在家里,一天到晚做家务工作,没办法的。现在和老婆一个人在一起。各人家管各人家过。

问:你们刚出来的时候,给家里的母亲寄钱吗?

赵:嗯,那时候是嫂嫂和哥哥养她(母亲)。现在嫂嫂也过世了。我老婆讲,您放心,我们吃粥,您也吃粥,我们吃饭,您也吃饭,您放心好了。我老娘听到,蛮开心的,每次生日都跑回去。

问:崇明那边有没有靠打鱼作为谋生手段的?

赵:装渔船做买卖是另外一帮人。只有到了春天的时候捉黄鱼。我们小的时候捉黄鱼,在端午节以前。谷雨时要出洋。谷雨之前,船、人、网都准备好了,一到谷雨日子,船就出发了。我们专门到有船的人家,(花)一点工夫,不要本钱,就做一遭。带着网去,带一网的鱼回来,卖一卖钞票不得了。其他捉鱼人都是扬州人,捉鳊鱼啦、白虾啦、青鱼啦,还有上海人叫的“烤子鱼”。这种鱼都是外邦人到崇明这里来捉,崇明捉鱼人很少,只有到了季节,一年中只有一季,捉黄鱼。现在这个时候黄鱼还没来。我小时候黄鱼更多。上海把这个黄鱼叫南洋黄鱼,我们这个地方捉的叫北洋黄鱼。可能在靠近日本以北。上海的船要开到那边去捉。这鱼呢是两样的,它是红嘴巴、红

肚皮，卖出来的价钱和南洋黄鱼也是两样的。没有新鲜的，都是咸的。带上卤盐，带一仓的盐去，鱼捉上来，就用盐腌一腌，到上海来就卖咸黄鱼，以前叫北洋黄鱼。

问：您刚到上海的时候，就住这里吗？

赵：我不在此地。那个时候我在西藏路延承桥。那时候属于西藏北路，西藏北路刚刚开头。就是苏州河那个延承桥，在闸北区。我们那时候只带了一点点东西，我刚来时借房子住。现在这个(房子)原来是公共的，我1969年买的。老早是搭的草棚棚，叫做滚筒。好房子有的，但不多。门前马路口，弄堂东边，有片房子蛮好，都是老板的。这地方以前没房子的，它东边是炸弹坑，日本人进来时丢的炸弹。第一幢房子也是炸弹坑，那时候要炸铁路嘛。解放之后人一点点多起来了。

问：您刚到上海的时候做什么工作？有过什么变动吗？

赵：那时候是日本人开的，西藏路桥西边，叫四行仓库，靠桥头灯那边叫大陆仓库。有些布团、纸头、食品，没地方摆，就进仓库。四行仓库就是谢晋元八百壮士呆的地方。大陆仓库，现在也改名字了，已经改成百货店了。这个地方是日本人开的，门前是仓库，我们来的时候日本人还在，他们不住在这里，大概在商业市场。商业市场在四行仓库的后面，我们就在那地方工作。我的工作调过，但基本上都是搬运工。单位叫上海港务局第九装卸区。在吴淞码头的第一个码头，现在是集装箱码头了。我53岁就退下来了，那时候大批的顶替，我的女儿顶替上去。我有四个儿女，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最小。小女儿顶替我，她今年43、44岁，她儿子已经14岁了。大女儿是乡下农民，第二个女儿在第一纺织厂，现在倒闭了，他们

夫妻两个人都是纺织厂的，女儿现在退休，女婿在做临时工。小女儿还没退休。小儿子在石油队、研发部、印染厂，已经倒闭了，现在做临时工。所有儿女都在上海，但不住在一起。二女儿住在曹杨八村，还有一个在吴淞，儿子在周家嘴路，十四点几的房子三个人住，最最小的房子。

问：儿女们都是什么时候结婚的？他们平时有空来看望您吗？

赵：25岁以上，哦，是28岁。上海那时候年龄抓的很紧啊，太早不批准你结婚。结婚什么的都要上头审批，不审批不能结婚的。结婚势必要有结婚证书，上头要审批，同意了给你一张。

星期天，一个月来一趟，有时候。有时候……嗯，他们一起来大家碰一碰。我们就买菜烧烧吃吃。

问：您子女中有党员、团员的吗？

赵：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嘿嘿嘿。我老婆的阿妹，在香港。那时候这关系在毛泽东手里就要作案了，现在是无所谓。以前的话说你有海外关系，不可以入党。老婆的阿妹，她也不跟我们来往，她做的工作也是纺织厂。就来了三次。

问：能说说您在“文革”时的情况吗？您儿女中有下放的吗？

赵：“文革”的时候我们是工人，拿不到什么东西，清清爽爽一个装卸工。那时候毛主席最相信我们工人是力量，现在最相信知识分子，要有人才的啊，这是国家的任务。那时候，最大是工人阶级，排第一名的，嘿嘿嘿。

大女儿插过队，小学毕业就跑掉，读不进去，不想读。下放到浙江，余姚过去点，三七市（音），在那边种地，也就没回来，和那边人结婚，生了个女儿。她那时候想回来，我怕住宿上麻烦，所以没给她回来，在那边凑合着住下去了。前两天她还刚来过一趟。

问：您觉得这里周围的邻里关系怎样？

赵：周围这里马马虎虎，邻居马马虎虎还可以。我两个朋友现在已经过世了。（以前单位里的同事）一退休大家就不来往了。我身体不好，毛病好多，有坐骨神经、脑梗，心跳过速，这些好像是……看毛病到闸北中心医院去看。一般要过两条路，选有质量的医院，一个地级，就是街道，还有一个区级医院，闸北区。

问：退休在家，平常有什么消遣，比如搓麻将之类？

赵：我玩，没有钱搓，一个人生产，两个人吃，你讲是紧张吧？啊是紧张吧？

问：您觉得住在这里，各方面条件如何？

赵：这里交通也算还好。但到高桥去，就讨厌了。此地去高桥的车子没有，要转的，交通还是不太方便。环境的话，这里环境哪里好了？马路上卖碟片的人跑到你家里来，背了个包问你耍吗？前一段时间警察在抓，好点了。他们这些人一般是租了房子住在这里的。这里一排和外面一排要拆了。居委会是一塌糊涂，有事的话来问一问，没事的话几个月看不到居委会的人。这里居委会是一塌糊涂。

问：这里的房子快要拆迁了是吗？

赵：前面一排，门前这一排，到这条弄堂为止。房子来量过了，户口簿复印过了，现在是等着来拆。现在就是钞票不够暂时不拆，计划这里拆的，现在就拆一排房子。我听人家说是开发商觉得不划算，这里本来是下只角。

问：房子拆迁费用，是按人头算还是按房屋面积算？

赵：嗯……现在一般性呢他是两样都算。按人头算也有，按面积算也有。

路人：现在拆迁和市里面的精神要求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不满意。

现在和以前90年出头时候拆的政策，肯定不一样的。我们还是希望老早那种拆了以后分房子(的政策)。现在是希望拿钞票。4万多块到哪里去买(房子)啊？现在买房子，一室一厅要20多万，二手房。新房子要60几万。20万块钱去买房子5个人住，还是不行的呀。

问：房屋拆迁后，你们希望搬到哪里去？

路人：我们总是不希望跑到老老远的，交通不方便。年纪大的人，那个医疗机构、医疗单位，就不方便。实际上你们说，政府对这种地方根本就不关心的。这种地方就是“被遗忘的角落”。

赵：我听说现在那个新村路，就是虹桥机场那边，原来好像是商品房，这里过去……是3000多(每平方米)。你算我们(要买)50多个平方好了，这个钞票我们怎么去买？买不着的呀。工人怎么拿得出这么些钞票来啊？所以说这个三口之家，拿得出这点钱吗？没有呀。人家最最多拿出一两万。现在有个万把块钱积蓄蛮好了是吗？我和你说，这个和市里的要求，距离太大。这里是黄金地段，现在在造那个现代化的客运站。外面贴着说是全部要现代化的，要怎么怎么样……现在全部说要动，说到现在马路还没动过。中兴路说要放宽，到现在还没动过呢。

他们要是强迁，公安部门一起来。强迁也要给钞票的，几万块钞票给人家，人家不是就走了吗，听起来也好听点。现在政府政策是很好的，到下面就不执行。

采访人/乔一江 崔华 周鹏程

祖孙三代的大家庭

姓名：蔡美玲

性别：女

年龄：78岁

籍贯：江苏盐城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本人、丈夫、大儿子一家三口、小儿子一家三口

居住时长：60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19日、2003年12月2日、
2003年12月17日

语言交流：上海话

蔡美玲的丈夫名叫郑江，是江苏建湖县（今福临）人。大儿子今年55岁，下岗4年，妻子下岗8年，孙女14岁，就读于实验中学。小儿子47岁，妻子45岁，孙女职校毕业。女儿51岁，丈夫去世二年多，外孙女初中毕业后，从事营业员工作。

蔡老太太家是两层楼的旧房，老夫妻住在阁楼上，大儿子一家住在一楼，小儿子一家住二楼，女儿结婚后已经搬走。全部采访是分三次完成的。第一次访谈进行一段后，蔡美玲的大儿子过来打断我们，解释由于蔡老太太因八年前甲状腺开刀，所以喉咙不好，不宜多说话，第一次访谈终止。第二次访谈半途，屋内有人开始吵架——估计是她媳妇，老太太有意结束谈话。第三次访谈，因老太

太连续咳嗽，只能终止。

问：您是怎么来到上海的？

蔡：我本来就在上海出生的，一直在上海。是我妈把我带到上海。我妈生下我11天，我爸去世了。这有什么办法？……是哥嫂把我带大的。我们姐妹多啦，八九个。我妈又是个“瘫子”，真的没办法。刚到上海来，做生意，就在“校西”搭个棚。那个时候日本打上海，我们就逃到乡下去，那时我20岁。后来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我回到上海来的。乡下没有亲戚。1945年回上海来就住德清坊。德清坊在前面一排，离这儿不远，就斜对面。走过去几步路，马路旁边。后来就住对面，29号里面。我在德清坊时18岁。后来我22岁到他们家（指丈夫家），（就是）这里16号。

问：刚来上海的时候靠什么谋生？

蔡：（当时）像逃难一样到上海的，逃到上海以后，拉黄包车——那个时候（男的）都是拉黄包车，我哥都拉黄包车。女的在纱厂里做，我那时是在纱厂里做的。我11岁就在湖旁边新炬一厂（音）做，我是学徒童工。

问：跟老家的人有来往吗？

蔡：我乡下也没去过。（那边的人）不认得的。那个时候没有田，像是逃难过来一样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乡下有些什么亲戚，我们不晓得的。我妈没过世的时候，她跟我讲很多，那我知道，后来妈没了，（与哥嫂的）话就少了。

问：想问问您老伴儿的情况。他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蔡：他以前骑三轮车。他大概是过江的时候出生的，也逃到上海来。所以他叫郑江，长江过来的时候，船上出生的。他也一直

在上海。没办法呀，(才)到上海来。主要问题，在乡下没吃的，只好到上海来。他父母刚刚过来的时候也拉黄包车。

问：您有几个子女？

蔡：我(有)三个。两个儿子。现在跟我的两个儿子住一起，大儿子住下面，小儿子住在我们屋里，都住一道的。

(指着门口一中年妇女)这个是我小媳妇。她就住在后房间。他们住后头，(我们)老的住阁楼上。这个房子没办法住，只好想点办法(凑合住)。小孩又大了，我们又差不多了(指岁数)……没办法……我住在这里 60 年啦。

问：您子女的工作情况？有没有插队落户的？

蔡：大儿子没出去，他腿不大好——残疾呀，没办法。大儿子在自行车行里(做事)，是分配的，本来他 67 届的，后来大概到 18 岁分在自行车行里——在虬江路。过去“文化大革命”嘛，有谁好好读书的啦？后来老师一直闹课什么的。他们一直没法读书，就呆在家里。后来，他分出去，像待业青年一样。18 岁开始，把他分到车行里，一直做到现在。现在下岗了，自己干，(还是)修车子。我的小儿子也是分配的，75 届，76 年分配的。他小，生怕他到外面去，香烟啊、老酒啊，然后打架啊样样来，不学好啦。(所以)他阿姐替她出去。后来就只有女儿出去(插队落户)。我一直身体不好，本来我女儿——只有一个女儿——就留在上海照顾照顾我，结果要(年轻人)到乡下去，我女儿就顶替小儿子到海丰——就是大丰农场那边。呆了三年。然后回(上海)来顶替我，我(那时)在菜场里(做)。做了没几年，后来把她分配到桃浦机械厂。后来厂里把她弄到市委里开车。也开了两年多。后来，就有的做就做，没的做就呆在家里。她本来退休了，一个同事把她介绍在桃浦工作，帮人

家发货，(做)保管员。

问：子女的家庭情况？

蔡：(大儿子)小孩小，还在读书。那个时候穷，没办法，30多岁才结婚的。后来生小孩，小孩现在14岁。他老婆下岗大概8年了。她也身体不好，平时头痛，没出去做。(每月)只好拿大概三百块吧。(大儿子夫妇)他们原是国毛二厂(音)的——(现在下岗)签协保。大媳妇属马的，还要两年才退休呢。她是生产组的。小儿子是洗衣机总厂的，现在不是又卖掉了吗？(小儿子夫妇俩)也都签协保。没办法，找到活就做，找不到活就在外面兜兜。假如要你了，就做个一个月或怎样；不要了就回来。小媳妇是国毛二厂的。下岗后，在环龙(商场)做营业员。但现在又没(工作)了，停了半年了。(小儿子的)小孩20岁。也是小姑娘，现在小姑娘好。我女儿啊……女婿已死了两年多了。没办法……她不住这儿，她跟女儿一道住共康的，结了婚就搬过去了。(外孙女)在商店里打工。她文化不大好，初中毕没毕业都不知道——这种事我也不管的。

问：阿婆，您平时空闲下来做什么？

蔡：退休下来带小孩。三个小孩，我女儿的女儿我带大；大儿子的女儿我带大；后来小儿子的女儿我带大。

问：阿婆，你们从搬过来开始，这儿的房子有没有改建过？

蔡：噢唷，没有——过去哪里有钞票？哎哟，作孽嘞。现在动迁组来了，我想想还蛮开心。(但)来了两个多月，(到现在)讲也没讲，我一直在这里。人家讲得难听点，小姑娘也嫁掉了啦。这个是大(儿子)，55岁，就生在这里的。这有什么办法？你想想看，没办法……

问：那您觉得这里小，其他还有什么不方便吗？

蔡：其他，我跟你讲，我呢，身体不好，我希望（住房）近一点，靠近医院一点，（公交）车子多一些，别的没啥要求的。也不好为难（动迁组）。

采访人/周 涛 蔡逸静

儿子下岗后在踏三轮车养家

姓名：孙书平、江雪琴、孙爽

性别：男、女、男

年龄：70岁（父亲）、63岁（母亲）、35岁（二儿子）

籍贯：均为江苏淮阴

职业：父母退休、二儿子下岗后蹬三轮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父亲、母亲、二儿子一家三口、小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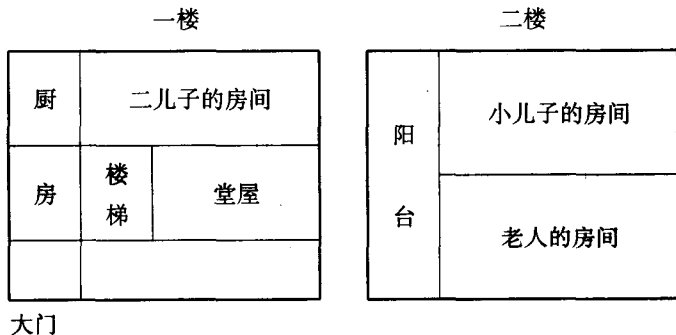
居住时长：近50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19日

语言交流：受访者与访员之间交流用普通话，家庭成员之间交流用上海话夹一些苏北话。

房子从外面看是两层，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阳台，整个房子占地不会超过25平方米，由砖头和水泥砌成。房子的一楼有两间，一间是二儿子的房间，一间被二儿子称为多功能厅；二楼也有两间，一间是小儿子的，一间是老人的。在屋子内，我看到了被二儿子称做多用途的房间：屋里有一台电视机，但几乎听不见声音，微波炉

放在电冰箱的上面,微波炉的牌子是格兰仕的。一把老式的藤椅正对着电视机,上面放着海绵等杂物。还有一张桌子以及一桌子的菜,都很清淡,桌上还摆放着水瓶茶碗等日常用品。屋子的平面图如下所示:



图一

图二

在这里补充介绍的是,楼梯是木质的,由于年代久了,上面已经磨出了印子,中间凹了进去且颜色已经磨掉了。厨房和堂屋的地面上铺的是一般的瓷砖,在进门处有块垫子。由于那天下雨,屋子的地上有点积水,湿湿的。

在这里就大概地描述一下二儿子。他的发色很杂乱,黑色的头发看上去不是很多,大多数是银白色和浅黄色的,可能有些是做事情时沾上的灰尘;胡须里混杂着白色与黑色,白色更多些。人瘦瘦的,挺健谈。

问:阿婆,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好吗?您过去是哪里人?

江:我今年63,当初是从苏北淮阴那里过来,我当时一个人到上海哥哥家里,是我大姨家的哥哥,不是我嫡亲的,他老早就来上

海打工了，我学校毕业来到上海，是在乡下读的书。我念过两年初中，念到初二就不上了，我们家里没有钱。我兄弟姐妹两个，我排老大，家里还有个弟弟，他在乡下种田。种田，收到（粮食）家里有（吃的）了；发大水，年头不好，就没有（吃的），家里老困难的。我哥哥在上海做生意。我来上海时 20 岁，其实 20 岁还不到呢，只有 19 岁，虚年 19 岁。

问：您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呢？

江：结婚以后就到这边来了，一直就住在这里。我老早读书的户口在我姨娘家，我是上海的户口，小时候我姨娘家没有小娃，就把我过继给了姨娘。

问：您和您的老公是怎么认识的呢？

江：到上海来之后，我有一个同学在旧货市场做生意。老早就是收铁，她有个门市部，我就在里面跟她一道做。我家里老头子也是做铁的，跟他们老（很）要好啦，我那个同学是女的。她老公和我老头子很要好，然后我就认识我家老头子，然后就结婚了，认识一年多就结婚了。

问：结婚后还有出去工作吗？

江：我大概在旧货市场做了快两年。结婚以后做家庭主妇，又出去跟人家做做小生意。老早以前卖香烟，就是那种小地摊，一包一包地零卖。总之，样样都做过，去乡下给人家割草喂马吃，一百斤，多少草料啊！没办法，老早没工作。割草按一百斤算钱，有时候割的多，有时候割的少，一个礼拜拿一次钱，大概二三十块钱，那个时候是算蛮多的，有的人只挣几块钱。我年轻的时候是很能干的，身体一老就没有用了。我身体不好，脊椎压迫神经，要开刀没有开，发现这病有三四年了。吃药没啥用，幸好我有劳保，一般我也去看感冒、头疼的病。医保是

退休以后办的,我先是沒有固定工作,到后来就有了生产组了,生产组是里弄里办的,我就到里面去了。在生产组里做的是调味品,咖喱粉,不喜欢(吃咖喱),咖喱老苦的。我做到生产组倒闭,生产组倒闭就到工厂里做服装,做了好些年。

问:爷爷,您又是如何来到上海的?

孙叔平: 1934年我出生,我是在旧社会过来的,1949年解放我已经16岁了。我的父亲是从乡下来的,阜宁的。我母亲也是在那边一同来的。我父亲先来的,拉黄包车。我七岁到上海。我们坐的是民船,就是乌篷船。因为那个花钱少,我们兄妹来上海之前穷啊。我们那个时候在家里,爸爸一个人在上海。我现在70岁,(来上海)63年了。

问:您自家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呢?

孙叔平: 那个时候我父亲身体不好,嗯,是这个情况,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死了,56岁死的。我24岁就当家了,我的兄弟是在1997年生毛病住医院,吃错药打错针死掉了,44岁。还有一个妹妹,在江湾镇。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妹妹只有11岁,我弟弟只有六岁,全是我带大的,都是在这个房子里带大的。我兄弟后来黑龙江,但死掉了。我的妈妈身体不好,她不工作的,爸爸死掉后,就是我一个人在工作,这个道理跟你讲不清楚,我这个人苦得很。24岁当家养弟弟又养妹妹,妈妈又有病。国家补助几块钱,老早工资只有八九块。我妹妹读书,弟弟也读书,都是我负担。妈妈又有毛病,(他们)都念到初中毕业,以后就“文化大革命”了!各走各的了。妹妹她念完初中就到搪瓷厂(工作),是国家分配的。我没有服兵役,因为我是老大,要养一家的。国家说我一个人养活一家人,如果我去服兵役,国家要负担我一家人,不是负担我一个人。弄到后来服

兵役都没有去。

问：您读过书吗？最早做过哪些工作？

孙叔平：七岁的时候没有念书，那时候穷啊。我爸爸生毛病又蹬三轮车，我们那个时哪有钱读书呀。我们在锁厂里头，一边做活计，刘少奇不是号召工人也要识字、也要知识嘛，那么我们就白天做活计，晚上去读书。夜校，是夜校啊，不要我们的钱，国家出钱，学费 15 块。我那个情况也读书，一直读到初中毕业。我要从五年级开始读，我还没有进厂之前已经在外面读了，也读夜校，不要钱的，一直是到 16 岁开始做生意。在旧货市场上做生意，那个时候穷，没办法呀，想办法做生意。在旧货市场上跑呀，到 22 岁，国家号召我去做工人，锁厂是国营的。我做了 38 年。我调过很多地方，最早是在上海市公用电器制造厂，周总理号召一年三级工，就进去了，一年三级工三年满师拿 53.5 块，那是 1956 年，还都可以，那时 49 块养一家啦，一家五六个人。1958 年就是大跃进。我们本来学好了要到外地去的，大跃进嘛，就留下来，没有到外地去。工资是 49 块多。一直干到 1966 年，就调了。

问：现在家庭的情况如何呢？

孙叔平：三个儿子。现在就只负担老三一个了，他胖找不到朋友，又没有工作，人家嫌他胖找不到工作，就没有成家。现在在街道、区里、劳动局三番五次地跑，人家都说没有单位要他。资本家不要，没有办法。老大一米八十多，老三、老大像我，老二像她（指着阿婆）。

问：您后来的工作经历是？

孙叔平：我从原来那个公用电器厂调到扬子五一电器厂。但我嫌五一电器厂路远，要照顾有毛病的妈妈，就调到锁厂了。后来

跟另外一个人对调，调到上海动力锅炉厂，生产轮船上的炉子。动力锅炉人家嫌吵，意见很大。我就调到徐家汇，就是现在的上海无线电子厂。我又远了，我妈又有毛病，再两个人对调，一个五级工和我这个三级工对调，五级工和三级工，他做的事情难，我做的事情容易。老早是有级别的，三级工是三级工的工作、三级工的工资，四级工是四级工的工资，五级工是五级工的工资。难度高的活计都是他们做我们不做的，你能做五级工的活计，他就把你升到五级，那样工资也高，升一级加十几块钱呢。后来又调到上海动力机床厂，跟一个姓胡的人两人对调，他调到徐家汇，因为他住在大木桥，我住在柳林路。上海东亚机床厂，做一个大下午就不行啊，五百六十公斤的空气锤呀，一锤下来就是五百六十公斤。但我挺得住，因为我从五一下来就是钳工，所以图纸能看懂。做这个大家伙不要紧，它就是里面的一个汽炉让榔头起来和打下去。毛主席的八字方针就是充实、巩固、调整，还有一个什么。就因为这八字方针我又调到上海的红卫锁厂，是轻工厂，充实轻工业。我们那个时候是小劳保，就是自己有劳保，家属没有劳保。（工厂）调满一百个人就可以申请大劳保，那就是自己有劳保，家属也有劳保。这个厂原来只有几十个人。调过来后，正好一百个人，几个月以后就是大劳保了，国家申请下来。这个单位很小，我们就充实小单位，做锁，效益很好。那时候是包销的，是统一经济计划，不是市场经济，现在是市场经济。我在这个厂里一直打锁眼，打了二十几年。我做什么活计都是超标的，老早喜欢你超我超的，那个时候我们这个锁来不及供应。后来不行了。三中全会一开，好了，大家都做生意了。你开锁厂，我也开锁厂。锁一多了嘛，就不行了，单位倒闭。

1992年我们这个单位就不行了，开始走下坡路。因为东西卖不出去，仅靠做出口生意。人家外省都不要你的锁了，人家都有自己的锁厂。老早是毛泽东控制住了，你是做什么的就做什么。后来三中全会一开，我们锁厂生意就不好了。

问：您什么时候退休的？

孙叔平：1992年我退休了，我58岁，一刀切。统统叫我们回来，不给我们做了。因为厂里效益不行了。58岁退休到现在，退休12年了，刚刚退休时270.2块，现在拿858块。现在上海市每年加一次（退休金），九年加了32块钱。现在退休的人拿的更多了，一千多块钱，三四千块的也有。如果我们现在退休的话也能拿一千多，退休早啊，真的，没有那么多。

问：孩子平时回来看望你们吗？

孙叔平：老大平时没有时间回来，过年过节来，我们这三个孩子都很好的，他们都没有让我操过心。

问：叔叔，请介绍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好吗？您过去的工作情况如何？

孙爽：我1969年出生，已经35岁。念到初中就开始工作，工作的单位叫搪瓷七厂，我初中毕业后，老爹和老娘为了怕我在社会上学坏，还是趁早找份工作挣点钱，说难听一点嘛，叫一天到晚向老爹老娘拿钱不好意思，自己苦一点，多多少少手上有一点零用钱，对吧。以前从家到厂是走过去，我的厂很近，从我家走到那个厂大概五分钟就到了。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是三百至五百块之间。后来我的厂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工资总共是七百到八百块之间。拿的工资，每个月也要交什么饭食费。它是象征性的，就是父母亲收点钱，也是帮你存起来了，等到将来你急用了可以拿出来！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像结

婚啊,或者是各种想不到的大事情要钱用的时候。1986年开始工作,工作了15年,到2001年领了两年的失业金,现在正在寻找工作,还没有找到工作,领救济金的时候就在找了。理想的工作最好是坐在家里,大笔一挥拿个一百,但是没有这个机会。我上班的时候交给父母也就是两三百、三四百,不一定的,现在不是不给,但是要按照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身上零用钱充足一点的时候我就多给一点,钱少一点的时候我就少给一点。像多的时候我身上有三四百我就给个一两百,少了我就给个一百,一百五十几。给一点说起来就是让父母心放宽一点。

问:您现在的工作情况如何?

孙爽:现在就是卖力气挣钱,蹬三轮车,2002年以后开始的。收费是看远近的。我们一般性就在门口,从这里开始到新客站附近,没蹬出过闸北区。现在蹬三轮车也要上牌照的,我没有上牌照。别人坐一般是三块钱到五块钱,最多时候五块钱。一个月大概能挣三四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在上海开销简直不够,做任何事情,哪怕你就是出门嘴干了买瓶矿泉水就两块三块。出门没有四五十块钱在身上就不敢出门!就是四五十块钱也是最少的呢。像我这样的,在厂里干了15年。现在回家了,按道理说是根据你干的时间长短,按比例(拿补助)。下岗以后我到处找工作,三轮车的钱还是我老娘出的。

问:您自己的婚姻生活如何?

孙爽:我与我的妻子是在偶然间相识的,通过同学的聚会,她是朋友的邻居,两个人觉得感觉好,就在一起,然后就结婚了。我妻子是上海人。她会一些日本口语,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我们两人在收入上差不多,我的工资是按工龄算,举例来说,三

年加 50,十年加 100,比例是不同的,她的工资虽然起点高,但因为她工作的时间短,就弥补了两人的差距。现在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小孩子由奶奶带着,平时在附近的幼儿园上学。

问：你们现在住的这房子以前翻修过吗？

孙爽：我们的房子 1967 年翻修过,后来就没有再动过。之前我们住的与周围的邻居是一样的草房,墙是土造的,屋顶是草做的。到了 1967 年那个房子坏了,才建了现在的房子。

问：将来这里要拆迁的话,你们有什么打算？

孙爽：根据他们的规定,老人可以分一套,没有结婚而要结婚的也要给一套,有自己小家庭的也要给一套。给了钱的话,钱多就在市中心买,没钱的话就在郊区买。对于现在的生活我们是很满足的,知足才能长乐。

问：平时都是怎么打发剩余时间？

孙爽：平时不工作的时候做做家务,在家里看看电视,陪老人说说话。以后拆迁房子总归是听国家统一分配,我们小青年结了婚总归跟小青年在一起。

采访人/潘园园

渴望改善居住环境的老党员

姓名：徐振邦

性别：男

年龄：77 岁

文化程度：文盲

职业：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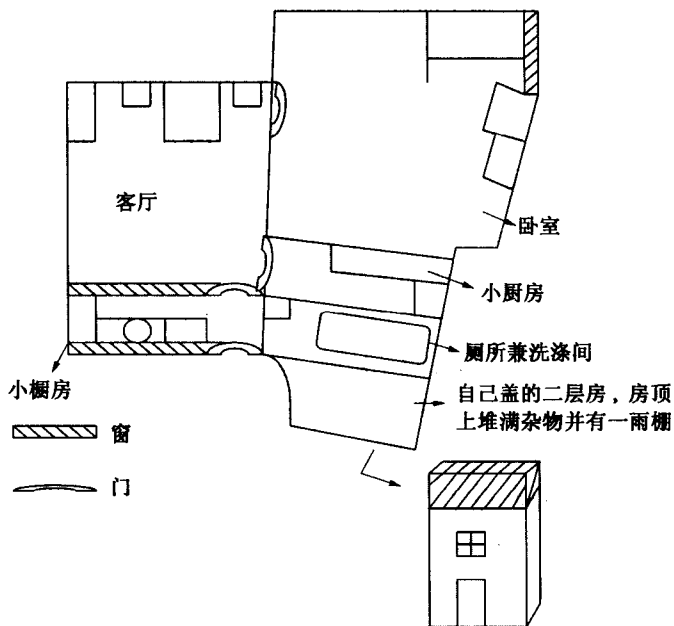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丈夫、妻子、三儿子一家三口、大女儿的两个儿子

居住时长：数十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24日12:40—14:15

语言交流：上海话



老人年龄 77 岁，没有上过学，上过扫盲班，识字不多。出生在上海，以前住在静安区（旧称江陵区），旧称差头角地方，长化路、马骑路，现在改为什么路老人也不清楚。

问：您最早住在什么地方？

徐：最早我家里在马骑路。一匹马的马，骑，骑马的骑，马骑路。现在叫……叫句熊路。一句话的句，熊猫的熊。句熊路嘛，就是靠近这里，国棉……国棉四厂的边上。老早这个叫马骑车路削铁厂啊。（哟……）那地方又叫漕头角，人们叫差头角。上海人说漕头角、漕头角。现在什么地方呢，玉佛寺对面，日本人打到后边，那个时候，上海人小时候苦啊！我们住的地方是叫洗澡间，英国人的租界，我们住在租界。那个时候叫江陵区，我们那个地方叫江陵。黄浦江的江，陵嘛是陵墓的陵。解放后改了，改静安区了，这个地方是我们出生的地方。

问：解放前后，您都做过什么工作呢？

徐：解放前，做小生意（得意地说），卖饼等等。可以赚多少钞票啊，这又说不准呀，最早能赚到饭钱。日本人来到此地，这个负担很重的时候，做一天是一升米、二斤蚕豆，什么蚕豆，生虫的蛀蚕豆。给日本人做，工具还是我们自己的啦。过去叫“填工”呀，什么叫“填工”呢，“填工”么就是进到第一天，就得做一天，做一天算一天。一天总归要十二个钟头，早晨到晚上，做做做，过去总归是十二个钟头呀。我们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呢？（咳嗽）开头叫德哥区（音）。这个事情话长。（咳嗽）真的啊，我都是讲亲身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小时候就靠父亲一个人工作，他在上海做苦工。我13岁就跟父亲（干活），日本人那个时候正好打进中国，没有汽油烧，生意卡车没法做了，那就烧柴吧，你们可能没看到过。卡车烧煤，烧的这钢炭，呼……，摇啊（老人边说边做手势示范）。后来就用橡皮大车代替，日本人把中国人不当个人，叫你做苦工，做牛马，马拖大车，什么叫大车？就是两个人拖马车。

那个时候上海没有解放,国民党反动派蛮多的,我到17岁,要当兵,你不参军,就要你粮食。我们人多,家里还要用到自带米。粮食要交给乡保长,不交,你这个人就要当兵去。一听到当兵啊,人吓也吓死了。不敢去就躲起来,你又躲不了,国民党都登记好了。这个苦你们就不知道了。你们想不到。

那个时候,刚刚解放,什么都没有(咳嗽)。解放后,我进了柴油六厂运输公司,运输公司投入生产以后就买卡车了,长春汽车厂解放牌出来了。国家就给我们每个人分配一辆,当然是领导介绍,国家再安排,我们集中起来就到车场里试车。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车子是我们的生命”,跳板,用跳板扛上车子。后来,搞革新,机械化,车子上装随车吊。毛主席亲自讲的,一定要搞技术革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来搞。结果大吊车有了,小吊车有了,锡铁吊。那个时候,不单单是一个单位革新,全国都在搞革新。

后来,我调到上海市化工物品运输公司,一直做到退休。过去公平码头、胜利码头我们去还要等的。现在车子一装就可以走了。都不同了,形势转折了,跟党中央讲的一样,哦……叫什么,过小康生活。现在我们要谈小康了,对不对啊。

我的工资从72到82.8元再到101元(颇为得意)。1987年退休,退休金800多元。

问:您老是党员吧?

徐:我1958年入党,老党员了,年年评为先进。

问:您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您有几个孩子?

徐:21、22岁结婚,我妻子做工,也是同乡人,她今年76岁,也是穷人,工人出身。我一共六个孩子,四个儿子两个女儿。老大是

儿子，当兵回来的，现在 57 岁。最近他的单位要卖掉了，他们要下岗了。他有两个儿子，大孙子 2002 年 10 月 1 日结婚，在上海汶水路汽车制造厂车间里做，中美合资的。第二个孙子在房产公司，最近一段时间调到办公室里了。我第二个儿子，49 岁，媳妇很早下岗了，她过去是在八中的。他们的女儿现在大学毕业了，出国了，在新西兰，还可以。我第三个小孩是女儿，现在退休了，她有六个小孩，不容易的。她的一个姑娘生毛病，22 岁死了（老人提到死去的外孙女，十分痛心），嗨哟，很好的一个人。在别人家里玩的时候，她有心脏病，别人不太知道。第四个儿子，是男孩子中的老三。现在也下岗了，在房产公司里做，给人开车子，他的妻子也下岗了，现在呆在家里，有毛病，心脏不太好。他们自己本身有个儿子，现在技校出来还没有工作，今年 21 岁。第五个是女儿，还是女儿。她 45 岁，下岗。她是在……统一纱厂，她的娘退休，她顶替进来的。现在厂关掉了，她去做了推销。她到海丰插队落户，她那个时候一动员就跑，全家就她一个先跑的。她的丈夫和她同学，现在也下岗了。他们有个小姑娘，还在读书，在靠近桂林路的地方上学。最小的孩子舒服在家里，做做生意呀。做生意，又不赚钱。他的妻子是下岗。他们的小孩读书，在桂林路这个叫什么技校读电工。

大儿子住在彭浦新村。老二住在延吉东路，杨浦区的，他是厂里分配给他的房子。大女儿也是厂里分配的，住在彭浦新村。第三个儿子和我住在一起，就在后头。二女儿是在闸北四中门口，靠马路对面，私房。最小的儿子他现在住在张庙，泗塘新村，他单位就是街道里的，要他付房租的，他的户口还在我这里，那里没户口。

问：你们的子女接受过怎样的教育？他们在什么学校上学？

徐：我大儿子是在青知中学，大概是青知。老校长对大儿子还是好的，印象是好的。下面几个孩子呢，我的姑娘就在这个门口读书。二儿子在现在的闸北四中，过去是八中。

问：你们的孩子经常来看看你们吗？

徐：看，老大来得多。老大不管刮风下雨，一个礼拜最少来一趟，来问长问短（哈哈……）。反正到此地，跟他的娘，跟我谈谈，平时家里兄弟姐妹多碰碰，谈谈心。老大的媳妇死了（老人又伤心起来）生癌，钞票用去不少，他的小孩全出道了。

问：大女儿的两个儿子也住在这里？

徐：怎么办呢？他们的公房很远的，人大了，地方就不够了。我家里真的是困难，吃苦自己喊没用。像我外头问起来，家里人多。外头的房子我另外搭出来的。我不是不讲道理。我申请执照，执照发给我了，东借钞票，西借钞票，弄出来。街道党委书记跑得来，看看说这个不行的，你搭了这么高，怎么可以啊，我说我这个老房子有执照。他说拆，我就拆（老人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后来我就去拆。你看我这事到哪里去讲，如果说我不讲道理，大家硬拼，你又不敢打我。（老人始终处于极激动的状态下，数次拍案而起）。家里这么多党员，怎么说也说不过别人。你看，我们这里怎么样，没有宽敞房子。有真正的像纪晓岚这种人哦？我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里有这种人，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问：您对你们的孩子有什么期望吗？

徐：希望现在三顿饭，大家吃吃好。我没有想过发财，发财做什么呢？我能为国家效劳一点。不是讲客套话，现在叫我站纠察，我还站。我老太婆生病一直看到现在，有劳保还要贴钱。老

早不要钱，现在劳保要贴钞票。

问：您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徐：现在没什么爱好了。老早爱好吊环啦、单杠啦、举重啦都可以的，现在就不弄了。平常么就喝喝茶，谈谈心。现在年纪轻的人，什么人睬老头子啦？别人叫你一声已经蛮好啦。

问：您和邻居有来往吗？

徐：一般。不够熟的，碰到点头；比较熟的，就问“老太婆，老爹爹你好哦”，总之关系还要好的。总之自己态度谦虚点，客客气气的，我老太婆老早还是里弄干部。

问：您觉得这里各方面都方便吗？

徐：交通四通八达，火车也方便，买东西方便，超市什么东西都有。很方便的，菜蛮好。我不去考虑这些问题。看病，中心地段医院，中华新路一直走过去，蛮近的。这个地方总的讲还是可以的。

现在有一部分人不在这里，房子在这里。我们这里好几家人房子空着，借给别人，400块一个月。我没地方，只好住在此地。这里撬门的有，小偷也不少。夜里女同志卖身的也不少。过去讲是婊子，现在讲是体力活，辛苦得不得了。我昨天还和她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帮人家打打工嘛。（她说）钞票少呀，这个可以钞票多一些。（我说）你想发财，就不要命了，你年纪轻轻的。她假装笑笑，不说话了。我说你什么地方人，她说江苏的。有些人不清楚被骗到上海来。偷自行车这里也有。像这里的旧货市场，不管你小路货，他们全收的。小路货你懂不懂啊？小路货就是从厂里偷的积压商品。不管什么东西，到此地总归卖得掉的。胆子这么大，老早毛主席，铁不好卖，哪个敢收？一个都不能拿铁。我说来这里摆摊

头的全不是好人。

问：你们这里要动迁了？有什么要求吗？

徐：没地方动，房子是关键问题（谈及房子的事，老人一直无法保持冷静）。我现在就是没有钞票，随便什么地方给我，只要安身之地就行了。提不出要求，我人多，要求多分被别人批评，我现在不要，只要说得过去，摆上台面，就可以了。公事公办。

采访人/陆 扬 赵金鑫

退休后，摆摆小摊

姓名：张阿妹

性别：女

年龄：77岁

籍贯：江苏建湖

文化程度：文盲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本人、丈夫、大儿子一家、小儿子一家

居住时长：46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至12月，共3次访谈

语言交流：访问员与受访者之间说的是上海话和普通话。家庭成员之间常用苏北话交流。

受访者住在本市闸北区，在上海已为数不多的棚户区内，人口

密度相当高，但绝大多数是老人和将近退休的中年人。这个区域里，房屋之间的间隔非常近，每家人家都在尽可能地使用每一寸空间，但仍无济于事。很多居民把水槽接在门口，为了雨天洗衣洗菜时不淋到雨，便用塑料板或布搭在门框子上方，这样一来，狭窄的公共走廊显得更暗了。被访者的家共二层，大儿子一家三口住在前楼，小儿子一家三口住在二楼，阿婆和阿公住在后楼，即朝北的底层房间，不到十平方米。房间陈设也相当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一个柜子上放一台十八寸的老式彩色电视机，一盏日光灯，显然是一种十分简朴的生活。

问：阿婆，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基本情况吧？您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住到这里来的？

张：我现在77岁了，江苏建湖人。家里农民，种田就是工作。家里一共姊妹六个，我是第四个。我是20岁到上海来的，大概1957年吧。我爸爸妈妈没来过，我19岁结婚，随后就跟老头子一起来的。那时候乡下苦，乡下来上海的人挺多的。人家说在上海做做小生意日子也还可以，所以就跟老头子两个人到了上海。我没读过书，文盲。扫盲班算是参加过，但是跟不上啊。老头也没有读过书。老早哪读得起书啊！

问：参加过工作吗？

张：做是做过的，退下来了。第一份工作在耐火材料厂做。里弄里推荐过去做的。外包工，要你做你就做，不做就回家去了。大概是一九五几年大跃进的时候工作的。也做好几年了，三四年吧。后来没做过什么工作了，家里小孩又多，忙家务也来不及。后来在里弄里做过小组长。那时候在耐火材料厂具体

做敲砖头，耐火砖。那个时候单位哪有什么钱啊，二十几块钱。我现在退休了，也没有退休工资的，外包工没有退休工资拿的。

问：老先生以前在农村是做什么的？到上海来以后参加过正式工作吗？

张：也是种田的。来了之后工作过的，现在也退休了。刚到上海来的时候拉黄包车，骑三轮车，后来有了点钱了就做点小生意，批点菜去卖，鱼也卖过，肉也卖过。生意大概做了多久这记不清楚了，反正进厂也二十七八年了。他也是在耐火材料厂工作，后来厂倒闭了，就到吴泾化工厂，一直做到退休。工作嘛，也是敲砖头，耐火砖。这份工作是由邻居介绍的，是正式工。单位离家不远，就在中山北路，离火葬场不远，走过去也就一刻钟。要翻三班的。在吴泾化工厂具体做的就是看仪表。工作还可以，只是单位太远了，在龙吴路，那个时候又坐不起车子，只能骑脚踏车，路上要近一个小时呢。而且翻三班，也蛮辛苦的。所以只能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他现在退休有劳保的。退休工资大概七百多，八百块不到，七百五，没有其他补贴。老头子退休后另外做做生意，卖旧货。生意怎么讲呢，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有时候一天只做二三十块钱。一个月生意大概能做三四百块吧。（我们后来走访了老先生的旧货摊，是卖自行车零件的。那一带有很多这样的摊。）

问：您是党员吗？

张：不是。

问：您家里现在的生活状况怎样？

张：家里人蛮多的。八个人：老头子、两个儿子、孙子孙女，三个女儿都出嫁了。一个在大华新村，一个在泰山新村，还有一个

在大木桥。大女儿现在 56 岁，24 岁结婚的。二女儿在农场呆了十年，大概 31 岁才结的婚，现在 54 岁了。小女儿也是去农场。后来顶替她爸爸，现在 45 岁，二十四五岁结婚的。她们工作也挺忙的，就节假日买点东西过来看看。我现在跟两个儿子一起住，但不是吃在一起。我们老夫妻两个自己吃。

问：介绍一下儿子、儿媳和孙子的基本情况好吗？

张：大儿子 51 岁，28 岁结婚的，大媳妇今年 49 岁，他们生的是孙子，今年 23 岁已经工作了。大儿子读书读到初中，那时候大多都读到初中，初中毕业后就分配工作了，印刷建材厂。分配去开车子，送工人上下班。分到这个厂做到现在。媳妇也是上海人，读书大概也是读到初中，两个人在一个厂里的，她做账。孙子读书读到中专，进的一个什么外贸公司，具体什么工作不太清楚。小儿子 42 岁，28 岁结的婚，媳妇今年 41 岁。小儿子也是初中毕业。进的是皮鞋厂，当工人，现在单位里效益不好，他自己身体又不好，下岗在家。下岗后经朋友介绍做过保安，做了半年，要值夜班，他胃吃不消，做不动也就不做了。媳妇读书读到初中，进了一家服装厂做工，现在也是下岗，工作也没找。孙女今年 13 岁，还在读初中。

（笔者的三次到访都只看见阿婆和在旧货摊上的老先生，没有看见她的小儿子和小媳妇，说是出去玩去了。笔者想对他的小儿子一家三口做访谈，追问他们什么时候在家时，阿婆说他们到外地喝喜酒去了。）

问：您儿子们现在享受低保吗？他们平时贴你们生活费吗？

张：低保有的，但每个月也只是一百多块钱。生活费不贴的，女儿们过年过节过来看看我们会买点东西。

问：阿婆，介绍一下您家的居住情况吧？

张：我们来上海后一直住在这里。刚来的时候住的是草棚。草棚是买的，大约 40 平方吧。现在住的水泥房是大女儿出嫁后，大约是 1984 年左右翻造的。是在原地拆原地建的，花了大约 1500 元钱。现在这房子大概 80 几个平方吧。我们这里都是私房。我和老伴住在后楼。大儿子住在前楼，小儿子住在二楼。在屋外搭了一间灶间。家里没有卫生间。没留什么空房出租给别人。

问：阿婆现在上海话好像还不大大会讲是吧？家里其他人呢？

张：嗯。老头子也不大会讲。儿子女儿会讲的，只是苏北口音改不掉。孙子孙女上海话讲得很好了。在家里，和儿子女儿还是讲苏北话。

问：阿婆平时有些什么娱乐呢？老先生呢？

张：看电视，做做家务，还有就是和这里的老邻居聊聊天。他么，基本上都在摊子上，晚上回来也就看看电视。

问：现在和老家还有联系吗？

张：老家还有人在。但好几年没回去过了，基本上不来往了。小辈们更不会来上海了。

采访人/严卫丰 王正国

解放初来上海的江阴人

姓名：薛长发

性别：男

年龄：76 岁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本人、妻子、儿子、儿媳和孙子

居住时长：20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23日

语言交流：上海话

从交通路大道拐进董家湾路约百米，来到受访者的家，这是一个两层楼的砖瓦房屋，临街而建，占地约12平米，阁楼是自己搭建的，空间比较狭小，家里陈设简陋，客厅兼做餐厅，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旁边是厨房，设有卫生间。目前全家合住的有五口人，受访者与妻子已退休，与一个儿子、儿媳、孙子一起住。

问：我想了解一下，您大约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呢？

薛：我解放初就来上海了，我那时候20岁，今年76了。刚来上海的时候，本来是住在潘家湾的，地方小，小孩多，房子就买在这里。那时乡下苦呀，要种田，赤着个脚……正好上海有一批老板来我们那里招工，考试通过，就来了。

问：考试？考什么？

薛：眼睛、长相等等，要长得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的。当时自己年轻，单独过来的。后来小孩多了，原来的房子显得小，就搬到这里，有20多年了。

问：来上海之后在哪里工作？

薛：长阳路的中国纺织技艺厂，做车床的，一直在那里工作到退休。在工作期间入了党，也评过先进什么的。

问：平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薛：经济么，家里以我们为主，他们稍微贴一点。退休工资也不多，两个人差不多，1400 这样。退休以后，我们这批人没什么的，退休工资卡、社保卡，再没什么。

问：能不能说说您和您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薛：她是淮阴人。是别人介绍的，她那时也住在潘家湾。我们结婚 50 多年了，我大儿子今年 51 了。我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和小儿子住一起，其他三个儿子都住出去了。小儿子现在没事干，开饭店，小饭店。他们夫妻两个一起开一间小饭店。生意一般吧，能过得下去。还有一个孙子在读高中，我们老两口照顾他。小儿子是 74 届毕业的吧。大儿子去了黑龙江，后来回来了，回来以后在××公司（没听清楚）。以前大家都住在一起，后来，老大、老二丈母娘家里去了，老三自己买房住出去了，女儿么，嫁人出去了。

问：平时，家里面热闹吗？

薛：他们两个白天出去的，家里就剩我们老夫妻。还有个孙子，要弄给他吃什么的。这个么，老两口总要照顾他的。小夫妻白天就出去忙了。过年过节，小孩总要回来的，回来看看，一年也就一两次。平时么，有事情，打打电话，没事不打的。

问：孙子读书是谁来供呢？

薛：这是他们供的，小孩的学费是他们来，我们嘛，就弄点他们吃，早上买点心吃，晚上烧点他们吃，有时他们也贴点钱，一个月一二百块钱。等于我们的退休工资就是“开开伙仓”。

问：您现在住的房子，自己翻修过吗？

薛：私房么，漏了就自己修一修，没有特地翻修过。老房子也买不进什么东西。这里水、电、煤气都很好。看病很方便，走走才 15 分钟。

问：这里是不是快拆了？

薛：拆，我们这一块早了。拆嘛，最好还是希望拆的，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要拆的话，也没办法。拆房嘛，就随便他们了，我们这点退休工资也买不到房子的。分房子，就算分给你，也要你贴钱的，至少一半，如果40万，那自己就要拿20万，退休工人哪里来20万。儿子媳妇么，就开个小饭店，除去吃用开销，也存不了多少钱的，存不了多少。拿钱的话，估计也拿不多。分房也要贴钱，自己也没那么多。再买房，也可能僻远的地方，感觉还是不拆比较好。拆迁呢，分房也是分在很远的地方，郊区，看病不方便，小孩上学也不方便。现在……就这样混吧。

问：这里是市政拆迁吗？

薛：对呀，拆150户，如果不造，不会拆的。不对头哦，出的价钱差很多。买，每平方4000到5000元；卖，每平方才3000多元，怎么买？家里三代人的房子，三代人住，没这么多钱。动迁组进来两个多月了，没有一户人家走的。价钱全不对，4000多一个平方，一间房8平方米，三代人怎么住，即使20几个平方米也不够呀。即使拆房也要让老百姓先安顿下来。和动迁组谈不拢，真的谈不拢，我们谈过一次，就再没谈过（笑）。反正现在怎么办，他们想了什么办法，我们也不知道……（停顿）……这是切身问题呀。而且像我们那边拆房，即使价钱什么谈拢了，地方还是在很远。最主要是看病不方便，年纪大的人，说不清楚的，万一有什么急病……（笑）

问：平常有什么休闲活动吗？

薛：早上么，像我们这样的，能跑就跑到外面跑一圈，兜兜玩玩。烧烧饭买买菜，看看电视，其他再没什么了。居委会会有组织过活动，不过少，基本上都是自由活动。

问：你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文革”吧，“文革”对你们一家的影响，除了上山下乡，还有什么事情特别大的吗？

薛：“文化大革命”……以前打打杀杀，厂里也有，社会上也有，像我们家几个孩子文化比较低，没好好读书过。

采访人/董 瀛 李 沛

退休后经营小店的纺织厂工人

姓名：李秀珍

性别：女

年龄：76岁

籍贯：江苏常州

职业：经营小店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成员：本人、儿子、儿媳以及孙子

居住时长：30多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自家小店，2003年12月2日

语言交流：上海话

受访者是一位76岁的老人，她十几岁时就来到上海，在第三纺织机械厂工作，老伴已经过世，现在与儿子、儿媳以及孙子居住于董家湾29号。他们居住的是一上一下十几平米的房子，楼下的房间放了一台20寸的彩电和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等。由于没有什么摆设，因而显得比较大，他们在房子的外面搭建了一间三四平

米的小房子做店面，室内的采光很不好，很暗。

李阿婆是一位很健谈的老人，我们在很融洽的氛围中结束了这个访谈。虽然李阿婆所居住的环境在常人眼中很差，可是阿婆看上去生活得很好。

问：李阿婆，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

李：十七八岁就到上海来了，当时是考来的，常州招来的。在第三纺织机械厂工作，就在这（附近）。一直做到退休，当时还是厂里的工作标兵呢。工厂离这里蛮近的，上下班都是靠走的，那时候要养两个小孩，没有多余的钱来买自行车，更加不要说坐车了，当时也没什么公交车的。现在一个月退休工资 700 多块。我 20 几岁才结婚，老头子和我是一个厂里的，他是从福建来的。我们本来住在潘家湾的，后来才买到大洋桥，一直住到现在。

问：阿婆，那您现在是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吗？

李：嗯。他们都协保回家了，有时帮他们看看小店，总归要帮帮他们，让他们出去做点活的。女儿嫁出去了。他们都是初中毕业，没什么文化。当时是一片红的时候，68 届。不少年了，三十几年了，当时 68 届一片红，我儿子跳级，正好碰上，不然轮不到他的，两个都插队落户，一个淮南，一个淮北，大概插了有六七年，正好有两个（名额）好调上来，我儿子身体不好，就调上来了。女儿过了两三年病退上来，两个才都回到上海来了。然后女儿出嫁了，儿子就在这里。（笑）插队落户，那个时候吃的都是杂粮呀。插队落户，那个时候国家号召呀，对吧？一片红么，只好去呀，不去要办学习班，像我们老人就办学习班，不办学习班不给你上班。我想两个走一个还好，（结果）两个统

统都出去了,随后就剩下我们两个老的,对吧?我儿子种松树,山上种松树的,比别人生活苦了一点,后来两个调一个上来。女儿队里都吃杂粮,都吃珍珠米,没粮食吃,不习惯,小样来(身材小),那个时候小样来,人都小啊。嗯,十几岁就出去了,一片红的时候,我儿子跳级,读书聪明,跳一级正好挨到(碰上插队落户)。两个一起出去(笑),一起走要多少钞票啊!阿拉(我们)那个时候工资不多,家里(雇)佣了个人,我们两个都(上)长日班,小人(孩子)没人带,要读书要吃饭,两个插队落户走了。两个人在这里买了房子,本来我们住宿舍的呀,小人(孩子)送到乡下去。以前讲起来老可以了(生活水平不错),现在讲起来老蹩脚的(生活水平差),对吧?呵……(笑)那个时候国家号召不好不去的呀,对吧?两个都下乡花费大啊,椅子什么都是自己买去的。吃的是杂粮,到了家里就不肯走了,插队落户苦啊。

问:您对这里的环境满意吗?

李:蛮好,环境方面现在想想也蛮好,现在比老早(以前)好多了,老早(以前)这只角(街区)差好多,打针的人很多,打针的就是吃白粉(毒品)的人,老早很多的,已经捉掉很多了。老早乱噢,现在都有值班的。现在有种人看看他蛮漂亮的,(其实是)贼骨头,依吃得消哦?!(有一次)小菜场有人偷皮夹,我捉住了他,是个小伙子,等到派出所警察来,人都逃掉了,我的手被他弄得……年纪轻(力气大),是吧!

问:前一阵你们这里选举居民委员会,是你们自己选,还是他们指定你们选谁?

李:不是的,我是居民小组长,居民委员会选举是这样的:先是候选人名单出来,候选人名单出来了,我们大家考虑一下这

个人。因为选出来要为人民服务的，不为人民服务选他干什么，对吧？这样考虑大概十几天，后来候选人来了，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认识之后居民小组长再去了解一下这个人是否牢靠，是不是能为人民服务。然后居民小组长再开个会，决定选谁，再去批，批下来再投票，也不规定选谁，选出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指定选谁居民要有意见的。（还是）这样比较好，是不是？我们嘛，一个星期开一次活动会议，汇报汇报情况，同其他干部联系联系，通知事情。我们都有联系的。反正对国家有利的，阿拉就做，对国家不利的，坚决揭发。

问：很多老人早上出来锻炼，您呢？

李：锻炼锻炼，早上5点就起来。6点多就要开小店，早上到小区锻炼锻炼，小区里都有锻炼器材的。（做了几个锻炼的动作）本来搓麻将，现在看小店，没空搓了。那些都是搓麻将朋友（笑），现在都没时间了。现在他们（儿子、儿媳）赚点钱，对吧？他们要生活，小孩要读书，生意也不多，天热可以赚两百多，现在天冷一百都做不到，可是人不能走开。（笑）这个呢，锻炼身体对自己好呀，对吧？

问：嗯，怪不得阿婆您看上去那么年轻。阿婆，您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李：怎么讲法呢？他们年纪轻的火气大点，我们老人心胸开阔点，就没事情了。我气量老大的。家里的事情不要让别人说，像我这样活一天是一天，76岁了，还有多少日子啦，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年是一年。我一个人劳保六七百块，我也不要用他们的钱，有的时候给孙子一百块零用（钱），看得过去就可以了。（笑）我现在过得还可以，买两件衣服有得穿了，不像小青年。

我现在气量大,老了就要气量大。

问:阿婆,你们以前是不是说过这里要拆迁?

李:嗯,拆迁是讲过的,以前是讲12月底要结束的。现在买他的(房子)要4000块(每平方米)。我们这个地方的居民经济困难,这样走不掉,三代人拿了这些钱能到什么地方去呢?(大家)都要求房子。现在房子还没造好,又不像老早(以前)出去借房子,钞票国家出,现在要自己出,更加不肯走了。看样子现在谈不成,要到来年开春了。

问:假如拆房子的话,您或者您儿子、女儿想搬去哪里呢?

李:这要看情况了,总归要近点了。小孩要读书,有的地方房子造好了,医院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不可以的。假使老人生什么毛病送医院都来不及。这种(居住环境)都要考虑到的,你说是不是?小辈要考虑到老人,老人要考虑到小孩读书,这里到底读书近呀。假使搬到郊区去,读书到底没上海好,郊区两样的。现在读书都很紧张的,我外孙在同济大学读书,作业天天做到夜里11点多,忙得不得了,学费要1万多(笑)。达到(我的)要求就买房子,达不到要求就不肯走了。这个不像你买样东西,你好退的。你说是不是?从今以后呆在那里,不动了呀(笑),对吗?我们这个房子也买了30几年了,以前我们也没房子,乡下来的。都是考来的,也不是上海的。招来的时候只有十七八岁,什么也不懂,人也不认识(笑)。现在到上海来都是基本功,他们讲苏北话什么也不懂,现在习惯了,稍微听得懂点。

采访人/徐珏苏静

50年代划小船来上海的江苏人

姓名：苏小妹(妻子)、鲍庆祥(丈夫)

年龄：妻子 76 岁、丈夫 74 岁

籍贯：江苏射阳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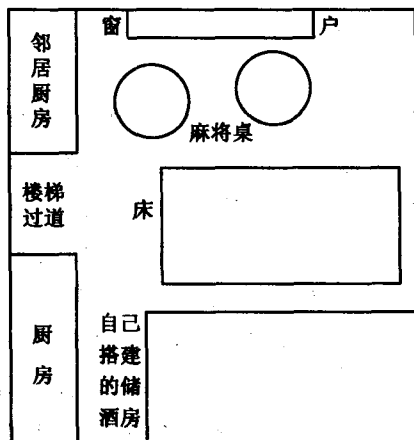
家庭成员：老两口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 年 11 月 26 日

语言交流：有时候说苏北话，有时候说上海话。

我们粗略观察了一下这里居住的情况：供居民行走的巷道很窄，路是石板铺成的，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巷道两旁紧密地搭建着居民住的平房，自来水管都接在屋外，居民们洗衣洗菜就蹲在外面进行，这样也导致巷道两侧长年积水不干。据估测，鲍家的房子应该在这片棚户区深处的位置，因为我们自进入这片区域后很久才走到他家。这片棚户区中有很少几幢用灰质泥浆粉刷的两层楼房子，鲍家就是这种楼房。儿子一家住在楼房斜对面的平房里。鲍家屋内黑漆漆的，开了一盏吊灯仍显得很暗，家里没什么家电，于是一张大床、两张麻将桌显得格外突出。适应了房内的昏暗后，我们仔细看了下房间的布局，作图如下：

家里就老两口住，与儿子一家完全分开。访问开始时，鲍爷爷到医院去了，于是我们先对苏奶奶进行了访问。



问：苏奶奶，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您老家在什么地方？

苏：我76岁，他74岁，江苏射阳人，淮阴过去一点。50年代来的。我丈夫先来，在这边找到活安顿好了就回家乡把我接过来了。我们婚是早就在家乡结了的，在家乡办的，我15岁，他13岁就订婚了，后来结婚没多久他就到上海来找活了。

问：那奶奶您家是做什么的呢？

苏：我家是种田的。他4岁时父亲就死了，是他母亲带大的，他有两个哥哥在上海，他们来这比他早，一九三几年就过来了。后来他大了，两个哥哥就把他带过来做学徒，1946年开始做到1949年。

问：爷爷最初来上海是坐什么交通工具来的呢？我的意思是他乘车还是坐船还是怎样过来的？

苏：坐小船来的，家乡有条河和上海的江是通的，一大群人划着条小船就过来了。那水臭是臭得来！我过来的时候也是坐船。

问：爷爷刚到这的时候在哪住呢？

苏：住的草棚棚，也是在这里，但房子在前面，董家湾 50 号。那时买房子还是借他哥哥的钱。

（老爷爷这时看病回来，还带来了好多人，他们是来打麻将的。白天，小小的卧室被老两口办成麻将室赚点零用钱，每天都有同社区的人来这里搓麻将，老两口有空的时候也上桌打两圈。屋里顿时乌烟瘴气、吵吵闹闹，爷爷也感到这样的环境不适合访问，就把我俩带到外面小屋。苏奶奶对我们说：“他有文化，能听懂你们问什么，回答的也对你们路，我什么都搞不清楚，你们问他，我去做饭。”于是我们转而采访鲍爷爷。苏奶奶把我们问过她的问题简单地向鲍爷爷说了一下，于是鲍爷爷不等我们问就很热情地讲了起来。）

鲍：我 1946 年到的上海，学了三年徒，工作是我大哥介绍的。做到 1949 年，改行去扛码头了，一直到 1957 年 11 月。学徒时，那真苦呀，从早忙到晚，老师傅让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没钱挣，只包饭。那时睡觉一点儿不成问题，倒头就睡，现在不行了，晚上睡不着觉。后来去了码头，就是扛货，搬煤炭，送煤到船上。你们可能不知道，外港和内河码头做的活是不一样的，我是在苏州河，也就是内河做工的。

一般就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去。我们扛码头算是在运输公司，其实就是个劳动力。工作不固定，有工作就去做，做完了就回家。一天可以挣两三块钱。那时候两三块钱很多了，跟现在不能比，3 块钱在大光明电影院，能看上 5 场电影。现在一个礼拜的工资都看不上一场。

问：上班的地方离家里远吗？

鲍：不远，很近的，跑（走）就行了。从家里到苏州河穿小路跑个10分钟就到了。后来码头不做了，1957年到香皂厂上班，上海新华香皂厂，又做了一年，1958年到铁合金厂。

问：这些工作都是怎么找的呢？

鲍：被支援过去的。1956年开始全国大炼钢铁，大跃进，1958年上海大炼钢铁，你们肯定不记得了，上海大炼钢，我们香皂厂的很多同志就被派去铁合金厂，支援一线建设了。

问：钢铁厂工作辛苦吧？

鲍：苦啊，热，整个背全是湿的，辛苦呀。那时候当炉前工，出钢的时候那个热啊，累啊。但是那时候宣传“干革命不怕死”，我们就什么都不计较，加劲干。当时上班实行三班倒，一个礼拜这一天上早班，后一天就上中班，然后上晚班。厂在吴淞，乘车过去。上夜班有夜车。那时候一张月票6块钱上海坐遍，哪儿都能去。后来炉前工不做了，1968年被厂里派到工宣队。工宣队你们知道吧，就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时候不是有造反派和保守派吗？我是保守派，镇得住那些造反派孩子，就让我去做工宣队。先去的是技校，去了一年多点，1969年去了上师大，上师大后来并到华师大，华师大我也去了一年多，那儿的老师我还认识不少。

问：工宣队到底干些什么事呀？

鲍：工人阶级到学校参加帮助知识分子改造，去批斗那些学术走资派。那是最后一批大学生，“文革”后来不是都没有大学生了吗？那是最后一批。后来厂里的造反派头头贪污，生活腐化，他是冶金局的第四把手。王洪文你们记得吧？那时群众都到市革会，就是城市革命委员会去闹，最后，王洪文到厂里头来，把那些造反派头头都抓起来了。第一把手关进去了，第

二、三把手下放了，厂里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所以就把工宣队撤回厂里，在厂里批斗那些腐化分子，说：“先把厂里斗好了，再斗外面。”不过，我回厂里也彻底脱产了，1973年入了党，1975年当上了支部委员，1976年做到了支部副书记。

问：爷爷还是先进工作者了，得过什么奖吗？

鲍：大奖没有，“五好工段长”当过几次。1970年脱产做一线工作，做支部工作一直到1988年退休。但那时候出现问题，没人接班，纯粹的技术工人很难懂怎么搞支部工作，领导跟老工人又搞不好。我不一样呀，我当工人土生土长的，容易跟工人聊，后来来的都是知识分子，工人不服。工人来当，文化程度不够，觉悟不高，入党难，不能当领导。所以领导听了我的分析，让我去培养一个。我就建议用小赵，小赵以前是我带的，我送他去上大学的，我就跟他说，“我到年龄了，要退休了，我看好你呀，你要争取入党，接我的班。”结果他就入党了，1年后转正，3个月后作支书了，他叫我当顾问，我觉得不好干推了。后来小赵干得挺好，压得住，成了工段长，后来提成了副书记。

问：那您从厂里退休后还找了些其他事做吗？

鲍：我1988年退休的，厂里行政科叫我去搞副业，搞个门市部。当时老工人都不想退休的，不肯回家，不想退休还想找事干，我就说我一天不多做，我支书呀，要以身作则。回家后到天目西路街道做了6年，卖饭票、做采购员、看门，样样都做，因为我什么都会呀。当年钳工、电工、机工都做过，喷油工也做过，所以我在街道什么活都可以干。

问：您退休是多大岁数呀？

鲍：67岁。做事做到1992年还是1993年，就什么都不做了，身上

有病,不行了。在家不做什么,有空的时候搓搓麻将,街坊邻居在一起搓麻将打发时间。一天输赢也不大,就6块钱,有的时候,干脆就不要人家钱了。都是些老人,没事干,又都发财了,所以吃过午饭就到我这儿来搓几圈。

(此时,他家里已摆了两桌麻将,还有不断的人进来围在麻将桌边上看。)

问:您在街委会里没找个事儿干吗?

鲍:当个小组长,就收收清洁费,开几个会就完了。

问:听下来觉得您家里生活一直挺顺利的,没碰到过什么对家里有重大影响的事吗?

鲍:一直顺利,连“文革”的时候都没什么影响。我算是个左右逢源的人吧,在厂里比较会做人,我是保守派,但造反派都是我师兄师弟,一道的,怎么会斗我?礼拜六是我们保守派接受批斗的时间,但我每逢礼拜六休息。星期天一回厂,什么都乱了,受伤的受伤,地上都是血,1969年武斗是最厉害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家里还是可以的,我早些年不是在码头做嘛,那时候有定量口粮,支援到铁合金厂的时候这个口粮定量也就带过去了,两份相加,所以家里还过得去,没饿着。家里又只有一个儿子,经济条件算是可以的吧。

问:您儿子什么时候出生的?

鲍:1957年。老太婆一直在家里烧饭,干家务,儿子一直是老太婆带。

问:他的学历是什么?

鲍:初中毕业,不行。“文革”那阵子他刚小学毕业,跟着学校去劳

动，在宝山顾村，抢收抢种，种地种田干过一阵子。

问：他那时候不是应该去支边吗？

鲍：没有，他是独生子，不需要。我倒是被动员过下放到江西农村，1956年的时候，我没同意，我有固定工作，有住房，不下。1962年又被单位动员回老家，但是针对的都是“单身汉回家”，我不是，不符合要求也没下。

问：儿子后来做什么工作呢？

鲍：1976年分配到泰山电影院，做“跑片”。跑片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可能看不到了。就是负责在这一片电影院之间传片子，这家放好了，再跑到另一边去放，就这样来回跑。几年后在影院承包了块地盘，搞出个什么舞厅，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效益还行。后来电影院没生意了，他舞厅也开不下去了。电影院最后是被宝山文化局包去的，儿子不想被人管，就要求下岗回家，一个月450元加四金。现在回来都三四年了，我看他混得实在不像样，他说想卖酒，我就想办法帮他 and 家乡酒厂联系到一批货，他在卖。

问：我看您家门上还挂着什么上海市闸北区什么大曲公司的牌子？

鲍：就他搞的，成立了一个公司，也不是什么正经公司。他不是下岗嘛，但算在职工，在闸北区文化局下面挂了个名，他要卖酒的时候，就去单位要了个名义把这牌子挂上去了。税务局来了，想加税，我说加什么税呀，家乡带过来的酒，又不是什么外面的酒，不加。他们也就没加了。生意不好，不好（摇头）。你看这屋子里堆的，都没有卖出去。

问：您媳妇是上海人吗？

鲍：本地人，起重机厂的，跟儿子从小是同学，又是老邻居，都住这

一片，两个就好了。她的父母是上海本地人，就在闸北区住。

问：我看您在这边有一套房子，对面又有一套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鲍：对面房子是我自己的私房，这是公房，外甥女的。本来我们老两口和儿子媳妇住在对面，我们住楼上，他们住楼下。后来外甥女不是花6万元把这套公房买下来了吗？她自己后来又在平江路买了一套一室一厅，这套房子就让给我住，我们老两口就搬过来了。我们现在住的这间房子，是后来儿子卖酒没地方放酒，他就找他同学过来帮他搭建了这间。房管局的过来看，很不高兴说不行，但我儿子不是下岗了吗？跟房管局一说，他们也就不管了。

问：这房子怎么会买得这么便宜？

鲍：只买了使用权，没有产权的。我1950年买下来的，1957年翻修后到现在，一直没动过。厂里本来可以分房的，福利房。当时我去厂里，小濮现在做副总经理了，我作支书那会儿，他是技工，他问我要不要福利房分房，要的话跟他说，“有事找小濮”，但我没要。厂里对房子翻修也是有补助的，但我从来没拿过。我支书呀，共产党员，不拿。

问：那您外甥女是无偿把这房子给你住，还是租给你呢？

鲍：无偿的。

问：你们这里要拆迁了吧？你准备怎么办呢？

鲍：没个准消息，有的说要拆，有的又说不能拆。老太婆担心死了，说这一拆怎么办，就算一个人补贴6万，我们家五个，也才30万，30万到外面买什么房子。现在一套少说也要300万，我们厂又开始讲社会化了，明年开始跟厂里都彻底没关系了，厂里也不会管。怎么办呀？我倒是想得通，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问：您儿子担心吗？

鮑：担心，拆了以后，要迁到顾村那边，媳妇上班就远了。对拆迁意见都特别大。

问：您现在和儿子是分开住吗？

鮑：儿子和我没关系，他也不向我贴钱，我也不给他贴钱，饭也分开煮。只是孙女上中学了，我给她奖励点钱。平时她要花点儿零用钱，只要跟我说，我还是给她的。她现在上彭浦中学，成绩还不错。

问：如果要拆迁搬房子，您是希望和孩子分开买分开住，还是一起住呢？

鮑：一起住。人老了，要个人在身边照顾，老太婆生病了，我还能去帮她买药，领她上医院，我生病了怎么办？只有靠儿子。我退休后病又多，糖尿病、小病不断，怎么办？就指望儿子了呀。

问：那您儿子挺孝顺的？儿媳呢？

鮑：挺孝顺的，一个独生子嘛。儿媳也还可以。我跟儿媳没什么，老太婆跟她关系就比较紧张了，她家兄弟姐妹也多，都还能照顾父母，她也比较省心，所以对我们还是比较尽力的。

问：现在退休了，跟原来的老同事还有交往吗？

鮑：才退休那会儿还联系，现在不联系了。去厂里的时候，倒是去党委、厂办坐坐。

问：跟亲戚联系多吗？回家乡看过吗？

鮑：不大回家了，家乡没人了呀。以前还有个侄子，63岁死了。姐姐也死了，回去没什么亲戚好走。我哥哥都在上海，一个在中山医院，85岁了，一个在运输公司，79岁。我们仨经常联系，不时走动走动。但是大家都老了，都有家里的事要料理，身体也没有以前好，也就没以前来往得勤。

问：您跟邻居的联系多吗？

鲍：我们是老居民了，在这都 50 年了，左右都认识，不认识的人也面熟。况且这儿还有我家乡的人，都一个地儿来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经常聚聚。你看，这些街坊到我这儿来搓搓麻将，混日子。

问：你平时就打打小麻将消遣，还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呢？

鲍：老头子了，还有什么其他娱乐。每天早上打扫一下卫生，买菜，一个早上也就没了，搞搞中午饭，下午几个邻居打打麻将，孙子孙女要回来了就散了，各自回家做饭，晚上看看电视，一天也就这样过了。

问：您觉得您住的这个地方居住环境怎么样呢？

鲍：很坏，真的很坏。这个地方卖淫的、偷盗的很多，居委会也知道，但没办法。现在这里多半都住的外地人，有钱的老居民搬走了，没钱的就把房子租出去给外地人住。居委会怎么管，不好管。我的鞋子晾在外面，前几天被人偷了。

问：派出所没想点什么办法吗？

鲍：不行，没办法。好不容易抓住个人，抓进去没几天就把人放出来了。像前阵子，这些人把水道盖子偷了，一个女大学生晚上骑车经过，就掉下去了，国家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害得那姑娘门牙都掉了，破相了。

问：这个社区的医疗保健搞得好吗？

鲍：没有医疗点。我们一般去闸北区医院。现在生不起病呀，一生病医药费都能压死人。上面政策倒是出得好好的，推出平价药，但是一到下面什么都不是了，现在看个病真是难啦，我身体是一周得上一次医院的，以前一个星期花 19 块我都受不了，现在涨到 26 块，不合理啊。我到居委会去开会，提到这个

问题，居委会的人说什么要讲市场经济，我说讲市场经济就不要老百姓活命了！都是医保局自己搞的，上面的人不知道的，就是下面这些人搞出来的！

问：这个社区有没有为居民提供一些公共健身器材，娱乐场所呢？

鲍：拆了，没有。

采访人/邓 蕾 张成杰

从童养媳到供养下岗子女的单身母亲

姓名：钱碧莲(母)、女儿

年龄：母亲 75 岁，女儿 47 岁

籍贯：江苏镇江

职业：母亲退休、女儿下岗

婚姻状况：母亲丧偶、女儿离婚

家庭成员：母亲、女儿和外孙

居住时长：50 多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 年 11 月 18 日

语言交流：上海话、普通话、苏北话。

问：奶奶，请问您是哪儿人？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钱：这个么，年纪轻的时候就来了，我不大晓得了。

女儿：（我母亲）镇江扬州的。结了婚才来的，以前结婚早啊，解放前是童养媳。爸爸（跟我母亲）同一个地方的。结了婚后，我爸爸先来上海，然后我妈妈再来的。来的时候好像就住这里，

没搬过。大概五六十年了。我是生在上海的，我们兄妹几个都是生在上海的。（我母亲）大概 1949 年解放初就到上海了。

问：奶奶，你来了之后做什么工作？

女儿：工作么，城建，城建局，就是供应材料的。公司是顺德路，材料公司，现在大概卖掉了。

钱：厂是在中银路，以前都是走着去的。

女儿：中银路 100 号，就是下面的一个厂，叫材料三厂。工作是里弄里介绍的，不像现在自己去找的，里弄介绍的。工资大概 30 几块吧。以前 30 几块值钱呀，就相当于现在几百块。现在退休也只不过多少钱啦！以前 7 块钱的生活费，我记得我小时候生活费只有 7 块钱，不超过 7 块，学费可以免费的。现在要几百块了。我妈没有换过工作，一直做到退休，退休时退休工资 40 几块吧，大概 42 块。

钱：30 几块。

女儿：哦，我也记不清楚了，80 年退休的，现在都 75 岁了。

问：奶奶，你家几个子女啊？

女儿：现在四个。我离婚了，和我母亲一起住。我们姐妹四个，我哥在外地，住西安。四个子女都成家了，外孙都 20 几岁了。现在在读大学，21 岁了。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她小孩还要大。我现在下岗找不到工作，太老了。

问：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啊？过年的时候？

钱：哎，过年，孙子都来。这个在外地，山西，（指着他的儿子）下乡分在外地，还住公房呢。大女儿分配到农场，儿子都还没上来呢。

问：他们都是念完初中下放的？

钱：嗯，那个时候毛主席还在呢。

女儿：那时候我还小，才一年级。高中毕业，（文凭）不承认的，我

们是“文革”的受害者呀，就算初中毕业呀，我们工作以后，单位里再去读书，只好拿个初中文凭，我们这个文凭不承认的。我们都没有读书，那个时候都不算的。我插队落户到长兴岛徐汇农场，我74届，倒霉呀。81年回来的，在外面呆7年了噢。

问：你们搬来时房子就这样了吗？翻新过吗？

女儿：57年造的，就来的时候，57年翻修到现在没动过。

问：你们没有听说过要拆迁？

女儿：说要拆迁，谁知道啊？动迁组来过的，九月十几日来的，都不知道要往哪里迁了，说是要拆，现在都没声音了。（动迁组）进是进来了，但不知道要哪一天了。

钱：他们说不拆，就翻造了，造到弄堂里去了。

问：如果拆迁，你们想搬到哪里呢？

女儿：不太清楚，有好几个地方了。最后定下来还不知道呢。具体不知道，条件好的，还叫你买断呢。最好是原拆原回。原地方好呀，新客站这地段多好啦，对哦？再过几年，这里真是黄金地段。这里房子拆掉，要万把块一个月了。乡下多少呀？二三千块一个月（有点不屑）。我们最好就是原拆原回了。这是最好的办法，是吧？我们都住在这几十年了。我妈已经住了50几年了。我都47岁了啊，我从小就在这里住了。

问：这个房子漏雨吗？

钱：漏的，要是他不拆，这个墙什么的都粉（刷）一下，现在准备拆呢，我就用纸铺一下。要拆了，我就不刷了。

问：阿姨，奶奶，你们平常都做些什么？

女儿：我们就呆在家里，他们（其他子女）不在（笑）。这有什么好讲的呢（笑）？折锡箔（冬至快到了，烧给她父亲的），看电视、

看报、聊天……就是现在这样子啊。

钱：也出去锻炼锻炼。现在长骨刺，就吃这个药。劳保，没有劳保就不行。

问：平时居委会对你们的生活照顾多不多？

钱：没得照顾。有事就找邻居帮帮忙。邻居都蛮好的。

问：居委会选干部你们都不关心？

钱：就他们说选谁就选谁。我们都不识字呢。我们就是旧社会呀，你们是新社会呀。像我这个姑娘，15岁，这么高，说，你们是旧社会呀，我们现在是新社会。我们旧社会没有吃的，没有粮票就没有吃的，好多过期的粮票我都扔了，不应该扔啊，放到现在给孙子看看，纪念品啊。五个人就是五张票子，十个人就是十张票子。粮食不够吃，吃的是小米。

问：你现在对你的生活还满意吧？

钱：我们拿劳保还好啦，女儿下岗才苦。孩子上学要1万多一年，学费很贵。我们劳保750多一点，够用。现在东西贵，以前30几块钱，儿子女儿公公婆婆可以一起过了。现在都下岗，等孩子念书出来就好了。我拿劳保还可以，女儿下岗不行，来上海半年一分钱都拿不到。外地的，纺织厂里做的，现在42岁，一分也拿不到。现在打工，太老了，不好找。像小女儿有下岗证可以找找，大女儿没有下岗证不可以顶替我的。要是拿450块钱还可以。房子要拆了。现在家里的家务都是我做的，在家就是烧来吃吃、洗洗、擦擦。现在小孩子大了，都不在我身边。以前小孩全是我看，4个小孩子。

问：他们跟你感情肯定都很好？

钱：二女儿才好，女儿才好。每个星期都来，不来就打个电话。过年过节儿孙子都来。他们都下岗，没钱。像我劳保拿两个

钱，新年给孙子们一点。自己少花点，一人100，逢年过节的，外孙啊、孙子啊开心了，都大了。这两个都一米七几了。

问：现在你最大的心愿就是女儿找到工作？

钱：这两个女儿不找，就小女儿找，她有下岗证，这两个女儿没下岗证，岁数又大了。

问：你们这儿买东西什么的都方便吗？

钱：方便。坐车5分钟就到了。菜平时买少点，过年过节女儿都来了，就多点。附近都是外地来的，他们有钱的，房子就买到外面去了，买了房子的都走了。

问：火车站这边人都挺多的，你觉得安全不安全？

钱：煤气瓶都偷得去呢，我都得锁好门，那些瘪三会砸窗。知道我没钱，也不来。出门都得锁门，叫旁边的邻居互相看看。

问：那你们和老家的人还有联系吗？平常回去吗？

女儿：镇江，我还有舅舅在那。没回去过（很肯定）。我长这么大，就回去过一次，乡下就没回去过，从来都没回去过。我二十几岁时回去过一次。舅舅是有联系的，联系是有联系的。有两个舅舅，一个是在上海的，已经不在世了。还有个舅舅在乡下，不是乡下，是镇江市里的（强调）。

采访人/徐 珏 苏 静

家有百岁老母的退休教师

姓名：吕祥生（丈夫）

年龄：75岁

籍贯：江苏

职业：退休

家庭成员：本人、妻子、母亲

居住时长：五十多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19日

吕家的房子有两层阁楼。屋子很小，大概有10个平方左右，一进门右边是张床，床边的柜上放着一台老式的彩色电视机。正对门的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自鸣钟，钟的旁边是一张遗像，据说是这家老太过世的丈夫。屋子内基本没什么家具，墙壁看不出来是什么颜色，很昏暗。

问：我们可以进屋子去看看吗？

吕：可以啊，进来吧，屋子里太破，不好意思让你进来的。上面是阁楼，我们住在上面，老太太年纪大了，不方便上下，住在下面。这附近差不多都是这样吧，有的人家条件好些。

问：您什么时候来上海的？以前哪里人？

吕：20岁。到上海来结婚的，她家早就在上海了，我老家苏北，同乡人呢。家里从小给定的娃娃亲。上海好啊，谁都想来。到这里来总归是好的地方，过得去就行了。我们是先走路，再乘轮船，再坐火车到的上海。在这里住了五十多年了。

问：您最初来上海的时候是做什么工作的？

吕：我以前蹬三轮车啊！开始的时候，要吃饭，就做三轮车了。后来搞民办小学，大家合着开个学校。后来改为公办了。我早以前念过私塾。

我1989年退休，老太婆1986年退休。

问：您在工作的時候有没有入党呢？

吕：没有。家里成分不大好。一切是唯成分论，越穷越好。现在要是党员就好了，房子就解决了。

问：“文革”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冲击？

吕：没有，普通老百姓没有人来找麻烦。

问：请介绍一下您现在家庭的情况好吗？

吕：我们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特殊的，我们结婚以后就在这，生了一个小孩，女儿，今年已经退休了，55岁，她住在普陀区。家里呢，就我们三个老人，一个99岁，我们两个75岁，现在生活就是这样，还不错，还可以，退休工资还可以勉强糊口吧，过得去。物价涨了，也没有办法呀，物价上涨有什么办法呢？我和老太婆每个人有九百多块，合起来就将近2000块了，只能勉强维持生活。退休金是没有增加，但政府也会考虑这些问题的。人民有了问题，肯定要解决的，但只能慢慢解决。政策就是这样嘛！解放前和解放后、现在都是这样。解放前生活水平低，解放后好了。现在物价上去了，政府会考虑增加退休金的。

现在有些问题发泄是没有用的，国家有政策。在政策允许下能照顾你就不错了，政策不允许，发泄是没有用的，毕竟我们国家发展，和美国不能比的。要这样看。退休的（人）之间不一样，现在退休和老早退休的也不一样，就像现在小学教师退休一个月要2000多块，不能比了。以前的小学校和现在的学校不一样的，收费也不一样。以前是几块钱，现在是几千块钱。像你们大学一年要1万块。钞票掌握在谁的手里？老百姓手里没有钱，都在贪污腐败的（人）手里。

问：您是否可以谈一下您女儿的情况？

吕：我女儿她是初中毕业，插队落户。按照政策当时应该不下乡，但我当时是个当权派，呵呵。不过后来“独苗上调”，回上海了。我们也没走后门。她回来以后一开始在街道生产组，后来到烟糖公司做店员，做到退休。她1977年结婚的，家里没房子，后来她老公说孩子也大了，没有房子麻烦。正好厂里有领导要换房子，小一些，两室一厅。比较便宜，现在就贵一些了。再加上房屋公积金，就买下了，她家比我们这里大一些。我外孙初中毕业，19岁参军了。他爸爸要他考技校，子弟学校。毕业几个月就参军去了，他现在很后悔。当初是想边工作边读书，但后来不想读书了，现在还要读大专，读夜校。他爸爸是厂里的普通工人。我是主张外孙读高中，再读大学，因为他成绩还不错。但他爸爸主张读技校，结果到现在我还恨他爸爸，没把孩子培养出来。外孙现在有工作，在一个德国人开的工厂里上班。有色金属制造，中国和德国合资的。还没结婚呢，而且工作没几年。工资也就一千多点，呵呵，他是工人啊，不像白领。像你们出来就是白领了。将来毕业想留在上海吗？

问：不一定，也可能到上海周边的地方，比方杭州啊。

吕：现在杭州不一定比上海差，我是这样想，从全国来说，浙江是全国最小的省，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我退休以前去过杭州，游西湖。新安江水电站、雁荡山、杭州，我都去过，普陀山也去过。退休以后就没出去过。

问：到普陀山是去旅游还是去烧香？

吕：我不信这一套，我是无神论的。靠自己。上海信仰佛教的多，我们家老爷子以前信得厉害。

问：你什么时候住到这里来的？这屋子有没有装修过或者是重

建过？

吕：老早是茅草房，后来经济条件好些就用砖头围起来，上面盖上瓦，就这样了。茅草房坏掉了，东倒西歪不能住人的。我们是1963年搬到这里的。这个住宅区以前修的都是一样的，后来，比如这家，就是重建过的，水泥的。

问：您在这个地方呆了那么久了，对这里的居民、小区环境、居委会等有什么评价？

吕：这里流动人员很多。小偷嘛，肯定是人人喊打，不受欢迎的。有很多老人，我们这一带都很熟悉，再远点就不知道了。公房里差一些，门一关都不认识。我们这里好些，认识的都能打招呼，居委会也会到家里看看。我们家有个99岁的老人，国家每个月给40，另外50块营养费。没有工作，没有劳保，就每个月给点钱。95岁以上享受这种待遇。标准具体多少不知道，政府怎么讲就怎么做。闵行区80岁以上每月就有50块。像我们这个区是比较穷的，那是和区政府的经济实力有关系。

问：您对自家未来的生活有什么设想呢？

吕：我们年纪大了，看病有医疗保险，有的看病会给报销的。是这样的，国家给700多，花掉了，自己再付300，再花掉了，到医院看病就要拿15%，也就是100块我们自己拿15块，据说要上涨到25%。你看，油以前是三块三一斤，现在是四块三，贵了一块钱，涨30%。人的生活费用慢慢增加了，就住房没有。是私房，没有保险。将来动迁的话，拿出一笔钱和子女合买（房子），我们有这个打算！我们是想买个房子，离子女近点，小就小点了。但问题是，拿着钞票，能不能买得到？这是个大问题。现在一个房子就二十几万三十几万，还要吃饭吧，还要

看病吧？哪里来的钱呢？我们的医保还要上涨……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说来说去，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

问：现在和苏北老家还有什么联系吗？

吕：没什么联系了。因为那边穷，来一次很麻烦，时间长了也就没什么联系。现在交通发达，通信也便利，时常也来看看老人。

采访人/王蛟飞

返沪的支内老党员

姓名：肖惠英

性别：女

年龄：74岁

籍贯：安徽

家庭成员：本人、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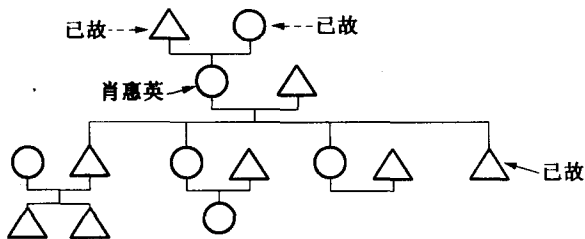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20日

语言交流：受访者与访员之间的交流语言是普通话，受访者家庭成员之间交流的语言是上海话。

受访者家为两层老式房屋（房屋来源为租赁），上面一层是阁楼（不属于受访者），下面一层是一套两间房，一间是厨房（较为狭小，基本只容得下一个人，平时煮饭主要是用煤火）；另一间是作为客厅和卧房使用。受访者家内设施简单，基本的家具是两个小沙发，一张双人床和一个衣柜。受访者家前面是一小块水泥空地，周围是结构高矮不一的棚户区。在受访者家中只住有肖惠英老人及

其老伴。

受访者家庭成员：



问：可以谈一下您的原籍是哪儿，是什么原因来到上海的吗？

肖：我是安徽人，爸妈都是过来做生意的。那时我爸爸年纪大，40多岁才生我，我从小帮爸爸做生意。我们是因为家里穷才到上海来的，我生在穷人家，假如我要是生在有钱人家，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问：当时就住在棚户区吗？

肖：我1952年开始住在棚户区，当时房子还算好的。（后来离开了上海）回上海有七八年的时间。

问：您的老伴是上海人吗？

肖：老伴是宁波人，也是苦人家，他爸爸是种田的，十六七岁养不活他了，就到上海机器厂学手艺。

问：您和您老伴是怎么认识的呢？

肖：别人介绍我们认识，我觉得他成分好，家里穷，人老实。他拿了工资要寄钱回去养家。他家里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

问：可以谈一下您的工作吗？

肖：1951年我在厂里工作，是小厂（装订厂），那时还正规，参加了工会。1952年改造私营工商业，搞斗争，我因从小在贫苦人民中长大，我就出来强烈启发大家，工作队看我活跃，能带头，

就让我到工作队,后来到闸北区委。一直从“三反五反”,“公私合营”中过来,后来到闵行轴承厂工作,是一个四千多人的大厂。1966年市里派一个主任到厂里做报告,宣传“三线建设”,说是需要有能力、有觉悟的人去成都支援工作,当时的成都还没有轴承。我那时在保卫科工作,那时我们有两套房子,我思想觉悟高,觉得共产党员要起带头作用,什么都没有考虑,两套房子交给厂里,什么条件也没有,拿了家具,带着老头孩子到了成都轴承厂。那时成都轴承厂只有三百多人,技术落后,我们去了大概一年多,产品上市了。那时我们去时一千多人一辆火车,是中央派的火车,直接派我们去的。我们去了干劲很足,不讲苦不讲累。但那时我们刚去,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受牵连,那时成都闹得很厉害,我们窗户都用棉被钉起来,生怕被子弹击中。半年后厂里才生产,一年不到,产品就出来了。那时是土坯房,我们还觉得好。成都人民住的是茅草房,要让出来给我们住(那时内迁是受照顾的),但我们都没要。那时我们去的人干劲大,一心想把成都建设好,根本就没想到个人怎样,那时汽车都需要我们的轴承,由原厂的几百人和我们去的一千多人发展到四千多人,后来我们书记、厂长因我们文化水平低,提拔干部有分歧。我们带队去的厂长中途走了,到无锡,我们就只剩一个干部,双方领导就不好沟通,干部不团结。后来中央把火车轴承也给我们做,厂里效益好,修房子修了12栋。我们这边的干部由于受到排挤,说不上话,我们这批人就苦了,没有了头头。后来过了好几年(1980年不到),我们厂里的轴承出了三次事故,要查原因,一查出来是使用了其他钢材代替了轴承钢。后来就不把这个产品给我们做了,我们就做小轴承,大的轴承给了闵行滚动轴承厂。

我们的小轴承，养不活厂子，厂里头头看看不对，就开始分钱，把我们这个厂分空了。后来工资拿不出，我们就困难了。我们以前是成都市大企业之一，很早就进入了社保局，后来生产做不出来，厂子面临倒闭，上面派人下来，这些厂长党委书记招待他们，要塞钱，上面的人就不问什么了，后来说厂里人多，养不活，厂就垮台了！

问：是什么时候成都的厂破产呢？破产前你们就退休了吗？

肖：大概 1997、1998 年破产，我们日子相当苦，工资发不出。我今年 74 岁，1978、1979 年退休的。退休前我六十多块工资，老头子五十多块，但退休时只拿了三十多块。你去看看那时内迁的人的生活，你看了都会掉眼泪。

问：现在的情况呢，平时的退休补助还是那么少吗？

肖：现在我们加起来一千多块，现在我到上海报进户口，每人增加 50 块。我刚来上海就想要报户口，为了报户口，我成都来回跑材料，跑好了就送到现在的四平路派出所，他们要什么材料我就跑什么材料。因为年龄登记不对，我反复跑了上海每一个我工作过的地方。1930 年，跟我的档案材料吻合，但他们还不给我报，我就要求见他们所长。我把我的情况跟所长讲了一遍，所长听说我要找到市里，就叫我下午三点钟来。我下午三点去，那个给我报户口的女同志，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已经帮我报上去了。我工作这么多年，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还说人家做什么呢？我就说谢谢你谢谢所长。两个月后，我的户口报下来了。我是穷人出身，我不跟人家比，跟过去比我已经生活得很好了，现在国家发展得这么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高兴。我的遭遇这样，说落后一点的话，就是不应该那么积极，我要是安分守己地在上海做个工

人,现在房子票子都有了。现在找人家,人家不睬我,我想得通时,就安慰自己,想不通时,就会流泪。假如我是犯错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这样的待遇正常。可我没有,我过的日子每天都要计算,有时我心里不平,我不相信我们党会这么对我,现在的有些党员拿几千上万,根本就看不起你。为什么会这么对我?我气愤啊!我要是犯了错误,我心里还要平衡点。

问:您的子女是怎样的情况呢?

肖:我走时,留了一个大儿子在上海,那时他去了农场,工作表现不错,毕竟中学成绩好。现在有五十七八岁了,他后来调到了航道局,现在工资拿一千多。我带去的一个小女儿因为读书读得好,先在一家厂里当会计,还帮其他厂里做,挺好的。大女儿1996、1997年回到上海,大女儿、女婿中专毕业分配到四川彭县山沟里,女婿哥哥是航天部的,就把他调到了四川航天部。因为他有病,很早就退休回到上海,现在就在一家书店里打打工,买了个小房子,他们还有个女儿,我这个外孙女还可以,是四川省第三名考到上海财经大学的,外孙女现在在一个美国的公司工作,拿1万多,外孙女婿是公司的小头头,也拿1万多,他们钱不乱用,现在挤在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准备要到澳大利亚去。

当时我和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住在成都厂里分配的房子里。我太糊涂了,儿子很内向,读书要强,他读大学(成都大学)第一年考试,三门功课不及格,觉得伤了自尊,就几天呆在家里睡觉。后来带他到医院去看,说是得了抑郁症。回家后家里人劝他,他也不说话。有一天,他说要去图书馆看书,骑着车出门时,我听到他书包里咣一声响,也没多想,后来才知道他是骑车去了水库,响的是他锻炼身体的哑铃,一周后有

人在水里发现他，身份证也带在身上……

我一样顺心的事都没有，想不通啊。有些党员们待遇好，但想不到我们。那时我还在上海闵行轴承厂，在保卫科兼内勤。有个老太婆来找我，我接待她。她说她的儿子、儿媳不给她一分钱，她刷马桶，不够生活。她讲着就哭了，我把她讲的向上级汇报。我们都认为养儿防老，老母亲不养不行，后来组织里每月从他儿子工资里扣6元出来，买6斗米给她，再加上她刷马桶，也就还能过去了。我们那时就这样对老人。但现在我们向有关部门说，他们也不怎么管。我变得一点志气都没有。我要求也不高，给我廉价房子就行了。

问：那你们回上海后住房是怎么解决的呢？

肖：我是到上海来的流浪者，一开始租了一间房，450一个月，现在房价提高了，人家要出高价，我租不起，就让我走。我到处找房子，最后就找到这个地方来了。我算过，我到上海，经济上不够，也不好意思拿小孩的钱，就到处跑，找到这地方，这里也不是我直接租的，是我到上海来，生活紧张，就去照顾一个老妈妈，我们相处得很好。这间房就是老妈妈的女儿帮我找的。250元一个月，像这种住房，我很想找市委诉苦。我们这批人，真正忠于革命忠于党，不讲个人利益。所以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和老头子在两个厂里的两套房子都上交掉了，现在我到上海来，跟谁去说？人家拿算盘一算，你除去房钱450元，还有550元，不算困难户，一点都没有照顾。我原来那两套房子，一间都要不到。我现在就想要廉价房，国家不是有廉价房吗？你给我一间廉价房子，就像现在这个一样。现在250元一月的房子找不到了。房子拆了就找不到了。有房子就没有恐惧感了。原来一套房三四万，现在翻倍，我哪有这

么多钱？要是我脑子灵活点，那是可以大把大把地捞钞票的。但我们把党看得比生命还重，贪污是对不起共产党的。现在连正当的要求都没人理我。我们七十多岁这代人，吃苦有份，享受就没份了。我在成都住的房子很小，一开始是住三个房间，还有一个厨房。儿子死后，老头子还在上班，我一个人在家怕，厂里还有房子，就推掉了大的一套，只要一室一厅。人生说不完的痛苦。

问：您现在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家都在上海，没想过和他们一起住吗？

肖：大儿媳妇有癌症，碰不得，死了怎么对得起她家人。他们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32岁，小儿子27岁，人家4个人，哪个欢迎你？女儿到上海来，买了套房子，但也容不下我，女婿脾气不好，说两代人不能住在一起。是我外孙女打电话要我到上海，我说租到房子就到上海，后来就租了这个房子。

问：您老伴在宁波还有家人，有想过去宁波住吗？

肖：我不能回宁波。回去他的妹妹就叫我参加耶稣教，说是可以住在教堂的一套房间里，我有50年的党龄了，我怎么好参加，就没去宁波了。

问：您的子女有给您生活费吗？

肖：儿子没钱给我，儿媳身体不好。女婿有病，也没钱给我。外孙女要给我钱，我不要，让她存起来到外国去读书。大儿子也不能来看我，我没有家产可以给他们的。

问：您生活的一些基本福利，如医保什么的，怎么解决呢？

肖：医保在成都，我有糖尿病，在上海看病不能报销，医保都是在成都的女儿每月寄来的，我想找组织讲，现在组织的人跟以前不同了。

问：看来您的健康状况也不太好，您老伴怎么样？

肖：老伴身体健康。我有冠心病、糖尿病。

问：平时锻炼身体吗？

肖：平时早上锻炼身体，练功养生。

问：平时您和周围邻居有来往吗？

肖：这个地方很复杂，什么都有，晚上就关起门什么都不管。

问：您觉得现在的生活怎样？

肖：我简直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我刚搬到这个地方半个多月，衣服都是旧的。我女儿的衣服给我穿，我13岁做童工，我情愿去帮哪个小公司做饭，也不要别人的补助，可是像我这种年龄，谁会要你！

问：您对将来有什么期望吗？

肖：我正要到市里反映情况，还没去，市里工作忙，建设上海，国家事情太多，我们不能帮助他们，反映了他们也没空解决。希望你们反映，看看我们这种人需不需要照顾？说这么多我现在就是想要一套廉价房，房子解决了，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采访人/赵璐 廖桂村

曾在老家开布店的退休夫妇

姓名：尹阿妹

性别：女

年龄：71岁

籍贯：江苏建湖

文化程度：小学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本人、丈夫及儿子一家三口

居住地点和时长：近 50 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 年 11 月 29 日

语言交流：家庭内部成员交流使用的是苏北话和上海话，受访者与访员间交流使用的是普通话。

被访者家的外部环境呈典型的城市棚户区状态：暗淡的墙壁、蜿蜒的小径、暴露外置的垃圾和臭水沟，夹杂着各种复杂难闻的气味，巷道里或坐或站着各种穿着随意的男女老少。治安很差，卖淫、贩毒吸毒、打架斗殴经常有。居民晚上一般都不会出去，即使听到外面有响声也最好是待在屋里。

房屋是 1957 年买了此地的一茅草房后拆掉自己重盖的，面积约 50 多平方米，有一间厨房（一个水池砌在厨房外壁上）、一间呈正方形的客厅（同时兼做饭厅和小两口的卧室）约 20 多平方米。客厅上面有一间阁楼，是老两口的卧室。当我们被引入客厅时，首先发觉其屋内地面要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左右，后门左边贴墙放着一个折叠的圆桌，然后是一张木制方桌靠墙而放，墙上挂着几张全家福和光荣退休的奖状，桌子边上分别放着三把椅子，门口的右边贴墙放着一些小物件，其中比较显眼的是一架缝纫机，缝纫机用布盖着，缝纫机边上放了同样一张稍矮一点的方桌，上面放着电饭煲、水杯和开水壶。然后正对着门的是一张很平整的床，床的左边是一道通向阁楼的梯子。厨房紧挨着房间。因为光线不大好，我们没有看清厨房和阁楼的布局。但相信这个主房间的布局内容可

以代表和显现这个家庭的大部分历史和现状特征。

问：阿婆你是从什么地方来上海的？

尹：我家原来是在江苏建湖，在那里是卖布为生，后来因为家乡打仗，比较乱，于是决定出来，那时是 1947、1948 年吧。父母和哥哥等人先出来，等有落脚的地方后再把我和祖父母等人接出来。一开始先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后来看回不去了，于是就在大统路和中兴路那个地方，叫中兴路 1377 弄的位置买了个茅棚住下了。

问：说说你做过的工作，好吗？

尹：小时候我们家在江苏卖布，我就在家里的布店里帮忙，后来 1948 年搬到上海来后我正好 16 岁，家里在这边又开了布店，我还是在布店里帮忙。1950 年我和我先生结婚离开家，开始做临时工。我在不少地方做过临时工，那个时候是给人“替工”，人家有时没时间了，我们就给人家代两天，等人家回来了，我就回来。在粮厂和被服二厂都做过。在被服二厂给棉大衣钉纽子（纽扣）。钉衣服胸口上和袖口上的纽子。那个时候工资比较低，但生活还稳定。后来到了有线电厂做了四五年。开始是做学徒，那个时候做学徒苦啊！做学徒一个月只有 16 元，而来回交通费和饭钱都得自己管，他们不管。第二年 18 元，第三年 21 元。到三年满师是 39 元。正好那时碰到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为了给国家分挑重担，我们就要不计个人损失，评级不能评得过高，应该想到国家，那就评得低一点。本来应该评一级，一级有 42 元。后来评了个半级，半级只有 39 元。

从 1958 年到 1961 年多少年啊，一直拿的都是 39 元。后

来又调了一个厂,不久因为那个厂里原料不够了,又被人推荐去做零件。后来零件厂里人手多了,就把我们送到高桥化工厂那里去开垦。30多个学徒工都到那里去开垦,大家没事可做。工会就要我们到黄浦江边去开垦,种山芋。我们那些人哪里会种啊。开垦,几个人就是在那里挖,也不像农民松松土,都不会啊。我们种的时候,就是一块土挖上来,把苗放下去,然后把土盖上,也不会把土打打散,到最后都长不出。后来又碰到大潮汐,黄浦江的水都涨上来,然后又退回去,就把许多山芋苗带到江里去了。在那里消磨了一段时间,就又回到了厂里。

后来厂里效益仍不好,1962年时我就又被调到南市区的一家圆珠笔芯厂,中间因为圆珠笔芯厂没有原料,减产,在同属于轻工业局的上海塑料厂里做了近半年时间。再后来因为笔芯厂离家比较远,“两调”又正好开始,人员根据家庭和工厂的距离找到方便的对象,就可以互换工作。1964年我就又被调到上海电池厂,是工会帮我调的。后来因为这个厂跟日本人的关系不好了(因为需要向他们日本人进口一批碳粉而不得),活很少就减产,减产后人又多了1000多人。后来分到兄弟单位。我被调到上海管压器厂,这都是组织(轻工业局)调动,不是我们自己调动的。然后在这里就一直做到1983年50岁退休。到今天都20年了。上班一般都是乘坐公交车和骑自行车。

问:您以前在工厂担任过什么职务,获得过什么荣誉吗?

尹:没有,一直当工人,当过检验员。

问:能说说您的先生吗?

尹:可以的,我先生比我大3岁,我们是1950年结的婚,那时我18

岁，他 21 岁，他家原来也是江苏的，江苏盐城。跟我一样，也是那个时候逃难到上海来的。他结婚前是和父母住在中山村附近租的房子，在中兴路。婚后几年我们才和父母一起搬过来的。我先生解放前后一直都在军服厂，军服厂原来属于仪表公司，“文革”后仪表公司统一改行，改为海燕无线电厂，我们做军服的就统一调到一个地方继续做军服。改行是国家改的，不是我们自己改的，如果是自己改的，就享受不到现在的待遇。

我们现在的待遇是这样的：工人退休后拿一千元多一点，另还有一些补贴。看病不用自己掏钱，厂里统一安排我们每年缴纳 50 元钱到医保卡里。我们的医保是这样的，每人每年自愿交 50 元钱，然后谁生病了就用这笔钱帮助他。

问：能不能再介绍一下家庭成员的变动情况？

尹：好的。我们没什么变化，我 1950 年结婚，婚后我们住在中山村，中潭路那里，租的房子。1957 年我父亲帮我们找到这里，我们一开始买的是茅草棚，买下后拆掉自己盖的，就是现在这个房子，盖了后一直到现在没有大的修改。我儿子是 1967 年出生的，现在 36 岁。小时候在上海读的书，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了。读完初中后十七八岁正好邮局招人，有一个亲戚介绍他到邮局工作，在邮局送送包裹、电报。1989 年他 22 岁结婚，对方是上海户口，后来生了个儿子。再后来因为什么原因离婚了，女方家里没有兄弟，所以外公外婆坚持要小孩，双方都要这个小孩的抚养权，打官司两个月相持不下。双方都要小孩，法院说再让你们考虑一个月，一个月后双方还是都坚持要。法院讲要照顾女方，那么就还是判给女方了，每个月贴她 200 元生活费。离婚后她跟了别人了，跟了一个乡下来在上

海打工的。这人又懒又不肯做工。(两人一起)回到乡下,叫女方家里每月给他们钱过生活,那姑娘的父母亲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妈妈是技校老师,爸爸是工程师。那姑娘可能是有什么毛病,身体里铜过量了,就是(广告里的)那个“黄金搭档”讲的铜过量。人长得瘦长,经常摇头。本来她是在电器厂卖电器,后来她怀孕了,因为政策规定有了小孩不能再生,她不肯打掉,说:“要打掉这个小孩,除非先打死她。”于是厂里没办法,就把她开除了。那个男的本来是她爸爸的学徒工,那男的人懒不肯干活,把她带到乡下去。后来她把命也送了。她妈妈一开始带孩子来这里也不肯跟我们讲她死了,直到死了一年才跟我们讲。说埋在普陀山什么什么地方,后来我们去给亲戚上坟的时候顺便去看她的坟墓。哎,她和我儿子离婚了,却还把我儿子的名字刻在那个墓碑上,他们就不刻那个乡下人的名字。本来他们应该刻那乡下人的名字,他们说:“不要,我女儿给他害死了。”

后来2000年时有人又介绍了一个女朋友给我儿子,这个女的认为他结过婚,不愿意谈,要回去。要他送她回家,结果他就和她一道走了。后来糊里糊涂地在女朋友家里待的时间超过了假期期限(劳动纪律规定是5天,他以为是15天)而被解雇了。后来就到外面找一些工作,做临时工。在电机厂做过临时工,最后去一家私人老板开的快递公司送快递。在快递公司的收益和老板四六分成,一切其他的费用自己负责。每天那么辛苦却赚不到钱,不愿意做,别的工作又干不了。后来干干又回来做快递。现在他又找了一个姑娘,今年(2003年)五月份刚结的婚。这个女的父母是四川山村里苦人家,为了讨生活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在近苏联的阿克苏安家落户,生

了三个女儿，三个女儿都结婚了，后来她（阿婆现在的儿媳妇）因为和她丈夫有矛盾就离婚了，回娘家后她爸爸说要找就到上海去找，到上海大城市去找。到上海后她朋友介绍就到我们这里来了。她今年 33 岁，比我儿子小 3 岁，她原来也有个小孩，11 岁，跟他爸爸，现在读初中了。这个姑娘因为是外地人，她要在结婚后 15 年才能有上海户口。又因为他们原来都结过婚，所以政策不让他们再生小孩，所以到现在我也没孙子。只得有时去原来那小孙子的外婆家去看看我那小孙子。

问：你们家现在的经济关系是怎么样？全家的收入如何，又是如何分配的呢？

尹：我们两个老人加起来有 1000 多，儿子嘛，以前在邮局还可以，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他钱少，一个月六七百，自己要吃饭，然后车子坏了要修车，剩不了多少。儿媳妇原来没工作，现在在做临时工。儿子以前在邮局工作还有养老金什么的，后来不干了，那些“金”的交纳就停止了，我让他自己交，他就不交，说以后找到单位再交。后来他干快递，我问他在这个快递公司做有“四金”吗？他说要做了一年才有“四金”。他和我们在一起吃住的。

问：在一起吃饭，儿子贴一些钱给你们吗？

尹：他们没钱贴，我们也不要他们贴，现在我每月有七百多块钱，我先生有九百多块钱，我们两个肯定是够了，只要一家人过得和和睦睦就算了，都是一家人。再说，家里的钱到底都是孩子的。

问：您家现在的家庭关系怎么样？

尹：我们家庭关系和睦、团结，子女对父母尊重。我们怜惜子女，把家庭关系搞好这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你们年纪轻

的应该知道，我们老人的收入比他们高，所以从生活上他们小辈对我们长辈要“拍拍马屁”，呵——这是实事求是地讲。我们老人现在生活还可以自理，身体也可以，精神也还可以。我虽然有毛病，但自己也保养得好，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都不严重，而且有医保。血脂呀、胆固醇呀什么的也还可以，血糖也不怎么高，自己保养的还可以。思想呢，是乐观的，因为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所以还是挺乐观的。身体如果不好，那就要悲观了，子女要是再不孝顺，那就更要悲观了，我们老两口结婚 53 年了，互相关心，过得也是蛮开心的。我 18 岁，他 21 岁结婚一直过到现在。这样嘛，我的心理还是平衡的，身体也是挺健康的。就是希望今后儿子能够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生活自立，不要一直依赖我们，我们现在还可以（让他们）依靠。一旦我们去了，他们生活不能自立，那他依靠谁呢？我们现在就是担心这个了，其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啦。

问：你们现在都退休了，平时怎么安排时间，有什么休闲生活？

尹：我嘛，原来在厂里没当过什么（干部），现在退休都 20 年了，和原来厂里没有什么联系。只是每个月去拿退休金。现在在这里当了个居民小组长，管理十几户人家，平时也就干点通知的事情，开开会、帮忙收收水电费什么的。另外就是忙忙家务了，看看电视。我先生退休了，也基本没有什么社会交往，他们（老先生）单位有个退休工人委员会，单位里倘若有什么事情会去的。他身体也不大好，有糖尿病，平时走路也没劲，走起来慢得很。你知道吧？不能走得太快。平时没什么别的喜好，就是喜欢打打麻将，看看电视。

问：您现在对住房啊，生活啊，子女啊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希望和

困惑吗？

尹：住房？那当然啦！希望搬到一个有花园，可以休息、锻炼，空气好一点，买菜、看病、上学近一些的地方。有钱的话我们会买商品房，没钱就买二手房。不想去郊区，太远。生活嘛，我们老的就这样啦，没什么想法。儿子儿媳，希望他们能找到好一点的工作，在经济上独立起来，不要一直依靠我们。现在他们对我们说不上孝顺，但还可以。困惑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拆迁，能给多少补贴，我们以后住哪里。

问：您这个小区现在的生活环境、邻里关系怎么样？

尹：社区环境是不好的，太脏、太乱，不方便。邻里关系一般，好不到哪里去，平时和那些打打牌的人玩得还可以。

问：过年过节你们会回家乡去吗？

尹：我和老家基本上没有联系，和父母来上海以后基本上都没有回去过。过年过节一般也不回去。家里养不得人了（指没有经济来源）。不过说不定明年就要回去一趟。我母亲死掉了，去年在我住院的时候死的。她 96 岁，差两天就 97 岁了。我爸爸去世已经 20 多年了，都葬在我们那个老家，哎，都葬在那里了。我打算明年清明节去看看。他们给她送葬的时候我没有去，那时候我住院，身体不好，哥哥兄弟去了。

采访人/严卫丰

60 年代迁入的工人家庭

姓名：唐招娣

性别：女

年龄：71岁

籍贯：江苏淮安

文化程度：文盲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成员：本人，儿子一家三口人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18日

问：请问您老家是哪儿的？

唐：原籍是苏北淮安，妈妈16岁时乘小船来的上海。

问：您一直住在这里吗？

唐：刚出生时全家住在华师大中山桥，靠近自来火厂。出生以后逃难回去，再来上海时就住在华师大一村对过的二排工房，南面第二排，北面第一排。20几岁结婚时住在河塘边上草棚棚，1964年搬到这儿来的。

问：您以前做什么工作？

唐：37岁上班，在耐火砖厂。不做砖头，厂里部门多，机修、木工、泥工，我先是在泥工组，哪里造房子，帮老师傅把黄沙、水泥拌起来，做小工，以后就在大炉间敲煤。现在工资一年一年加起来，拿700多一个月。那时只有30块。每天早晨4点半，最晚5点，乘47路公交汽车，3站路就到虹口公园。国营企业，别人介绍的。后来职业没变化。“文革”期间我是这里居委会组长，每个礼拜小组读报纸。结婚后一直当到现在，换届时说自己年纪大了，但大家一直让我做。开会通知一下，里弄里发发东西，组织读报。

问：您是党员吗？有没有获得什么荣誉？

唐：普通工人，不是党员，没有获得荣誉。

问：说说您家里的情况吧，您的丈夫，还有孩子什么的？

唐：他是苏北的，读过小学。在上海图钉厂做钉子，后来合并到空调总厂。厂先是私人的，后来变成国营的了。他拿过五好职工。我们1954年结婚，当时我20岁。第一年订婚，第二年结婚。公公死得早，婆婆在国棉二厂上班，三班很辛苦，买菜烧饭样样来，和老先生感情挺好。我自己是1933年出生，今年71岁，属鸡，我没上过学。1959年儿子出生，他初中学历。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今年46岁。他19岁进厂，拿800块。媳妇下岗两三年了，在外面做清洁工，拿700块。现在我的劳保不够交水电费，儿子钱也不多，给我500块开伙。孙子17岁，属兔子，在丰华中学念高中，闸北公园那里。我婆婆风瘫12年都由我服侍。

那时上班很辛苦，人很瘦。后来到厂里大炉间敲煤。长日班家里照顾不到，就调三班，当时先生做长日班。

1955年下放动员。婆婆丈夫死得早，为把我爱人养大，在厂里做三班，辛苦。把我这个媳妇讨回来就在家做家务，她上班。（他们来）动员我，（我）不同意！我小时候生在上海，家乡没亲戚朋友。我叫他们不要来，随便怎样都不去，乡下没人，后来就不来了。我先生生病看不好，肝癌。1969年生肝炎，以后一直没发过。后来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再检查出来已经晚期了。他68岁过世的。

问：你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自己的房子吗？现在都住哪些人？

唐：儿子媳妇孙子住在上面，我在底下。1964年买的房子，一买就是旧房子，装修过。老早墙是烂污泥，后来都铲掉了。当时

是借钱买的这房子，外面是自己搭建的铺子，租给人家卖皮衣，租金 300 块。以后拆迁不算。灶间在外头。

问：平时有什么爱好？都做些什么事情？

唐：就在门口串门，麻将搓搓，1 块 5 角，中午 12 点到下午 4 点。然后烧晚饭，消磨时光。早上 5 点半起来，孙子 6 点要叫他，儿子媳妇 6 点一刻起，早饭烧好，给孙子吃牛奶，再买点点心。吃好以后我再吃。然后买菜，菜买好，拣拣，自己烧中饭吃。小麻将搓搓。下午 4 点钟再洗菜。儿子媳妇 5 点半回来，孙子 6 点。一天过了。有时看看电视，但孙子做功课就不看。

问：以后这里要拆迁，是吗？

唐：拆迁也没办法，我就要求搬得近一点，顺着政府政策。

问：你对这里的环境满意吗？社区怎么样？

唐：满意，儿子女儿都很满意。孙子现在也懂事了，会节约用钱。社区空气清新，但就是菜市场比较吵闹。

问：老家呢？和那边还有什么联系吗？

唐：与故乡老家没多大联系了。

采访人/张成杰

董家湾总会贴上“穷人区”的标签

姓名：焦根生

性别：男

年龄：67 岁

籍贯：江苏阜宁

文化程度：小学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本人、妻子和大儿子一家三口

居住时长：67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门外，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一般是普通话，偶尔是上海话。

焦根生的家有前后两间，前是厅，后是两层的阁楼。两个老人住阁楼，阁楼很小，只够两个人住，一个阁楼一间房。

问：家里祖上是怎么来到上海的？

焦：父母是移民，从苏北阜宁来，30年代到上海，到上海找工作打工。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在工厂给资本家做。

问：能说说那时候您父母的生活情况吗？

焦：家里一开始住在普陀区，靠保人就是地头蛇做靠山，投靠他找工作。以前有帮派，投靠他做苦力，让他保护自己，防止别人的欺侮，但如果受到国家的欺侮就不行啦。过去我父亲在大沿桥铁路的煤厂，是日本人管的。过去拿这钱不能养活全家的。父亲打工挣钱，母亲在家，靠工资是养不活全家的，就靠厂里带点煤回来。过去冬天穿的衣服都很宽大，裤子什么的下面把口绑紧了，然后把煤往裤子里面装，衣服也是的，要把下面系紧了，装煤。带煤回来是能换钱的，可以补贴家用。但过去是查的，过去警察都是日本人的走狗，帮日本人的。日本人对每个进出工厂的工人都是要检查的，查到有什么东西带

出厂了就要打,用粗的棍子,上面带有钉子。我父亲曾经有一次被捉住带东西了(煤),被狠狠地打,打的两条腿都见骨头了。躺了半个月不能动。还要被当时的警察关在国民党管理时期建的碉堡里,作为关押之地,吃饭、上厕所什么的都在里面,不像现在犯罪了还管吃喝。过去这样不叫犯罪叫生活,现在生活比过去不知道好上几倍了,现在烧饭用煤气了(他指指,其实应该是液化气)。

问:当时,家里一共有几口人?

焦:(当时)家有5口人,两个姐妹、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母亲在家照看孩子,过去妇女很少上班的,只有在纱厂工作。

问:您有几个子女,他们的情况如何呢?

焦:有2个儿子2个女儿,现在和大儿子住在一起,住5口人。大女儿在杭州,浙大这里。小女儿在上海,住在宜川路。现在生活都蛮好的,不像以前。大女儿在崇明农场插队,10年,插秧,然后认识了她的先生,跟着去了杭州。其他子女没有插过队。大女儿小时候在闸北四中读书,毕业后工作。她现在在浙江大学做会计,丈夫是教授,日本留学回来分配到杭州,因为是杭州人,叶落归根。大儿子在上海铁合金厂,搞三产管理。小儿子在大众公交公司搞管理。小女儿下岗,原来属于上海废品公司。我有2个孙子,2个孙女,大孙子读初二,大女儿的儿子读高一。

问:现在住的这房子是怎么来的?

焦:在董家湾的房子是买的,住了67年了。以前住在现在的两湾城这里,以前闸北、普陀区都是棚户区,都是穷人住的,有钱人住南京路,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住黄浦区、南京路的人都瞧不起闸北、普陀区的人。过去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到外地插

队落户，到兵团，同样闸北和黄浦的青年都去了，黄浦的看不起闸北的青年，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你看现在南京路还有烧煤炉子的，但闸北现在烧煤的也不多吧。

问：您和妻子这辈子都经历过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焦：我妻子是马路工，修马路的，45岁退休，现在退休工资八百多元。我1937年出生的，就在上海，住在这个房子里，67年了。以前12岁的时候在周家嘴路的玻璃厂学徒，做热水瓶胆之类的东西。12岁前上学，上私塾，有个先生教书。那时候没钱，几个年级一起教，教好一年级再教二年级，混合在一起上学。我在玻璃厂里工作直到退休，一直干这一工作，像我们这一代，小学徒时学什么，就做这个一辈子，不像现在大学生不一定将来干的是自己的专业。现在这个厂国营了，过去这个厂私营，然后再公私合营。我是92年退休的，退休后在工厂组送送东西，做做事情，呆在家里也难过。做了十多年了，那时候的退休工资不高，现在涨到九百多元，在工厂做一个月能拿到七百、八百元，不过年纪大了，在那里做事也是干完今年就不干了，明年就不去了。

问：对现在的生活您觉得还满意吗？

焦：现在我们靠自己的退休工资也能养活自己，做做家务，打打麻将。我在工作组的工作一个月只要去半个月，有任务去，没任务就不要去了，还是蛮轻松的。现在的生活蛮方便的，买菜什么的就在门口，交通也便利，就在新客站。（我们指着她妻子身旁的一少妇，询问是谁）大媳妇，在家10年了，骨头摔坏了，在家不上班。

问：如果拆迁想搬哪里？

焦：拆迁早了，我希望住附近，但肯定是在郊区了。现在买房子

是没钱。

采访人/贝 晋 董晓蕾

出租闲置房的退休机械保修工

姓名: 姚志刚

性别: 男

年龄: 70岁

籍贯: 江苏泰兴

文化程度: 文盲

职业: 退休

婚姻状况: 丧偶

家庭成员: 本人和大儿子(上班的时候住,因为这里交通相对方便)

居住时长: 52年左右

采访地点和时间: 家中,2003年11月19日10:25—11:19

语言交流: 上海话。

姚志刚的家50平方米左右,2人住,并出租部分。

问: 您是哪里人? 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到上海来的?

姚: 江苏泰兴县,黄城乡。我先来的,解放以前,大概16岁。我是别人介绍来上海的,在一个老板那里学生意(老人提及很高兴),旧社会,混口饭吃。当时我在家乡帮别人放放牛、切切草、砍砍柴,混不到饭吃。有个人住在上海,我的哥哥拜托他,

帮我介绍到上海光华切丝厂当学徒。后来到杨浦区来运发米店做学徒，解放后劳动局介绍到国棉一厂上班。一直工作到退休。我是保修工，就是吃机械饭的。那个时候一进去拿50块，后来逐步加(工资)了。因为我有气喘病，1997年退休了(咳嗽)。刚刚来的时候，住在对面。学生意时就住在学生意的地方，来运发(米店)。大概1949年搬到这里(咳嗽)。

问：您几岁结婚的，爱人是做什么的？

姚：我21岁，她也是21岁。她的父亲是工人，她在申新九厂工作，二十二棉，过去叫申九。她的母亲也是工人，大概他们有个哥哥。她是别人带过来的，从泰兴城到上海的人蛮多的。

问：您现在和老家还有联系吗？

姚：(嘿嘿)现在家乡人全没了，我大概有超过20年没回去了，这个事情我入党的时候，他们去调查过的。

问：谈谈您的家庭现状吧。有几个孩子，现在都在哪里？

姚：我有四个小孩，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是67届，一个69届。两个人都到黑龙江去(插队)。那个时候市里有规定，市里不是有这个规定吗？退休的时候顶替一个上来吗？后来因为我老太婆(退休)，大儿子调到二纺机。他读过夜大学。后来调走了，具体到底什么情况我也没有和他联系过。第二个儿子是党员，党员的事情具体我不清楚，因为我和他不联系，他是在黑龙江考取铁路大学，后来就分到海南，具体做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总归是干部一级的。1998年，不知道，还是1999年，他的同事把他调到上海的一个铁路公司，他是一个主任。底下两个(孩子)全分在了上海。女儿分到中华印刷二厂，在老北站那个地方，现在关掉了。她就找人把她调到山西电影院，后来在闸北区文化馆工作，一直到现在。两个孙女在

读大学,上海师大,还没有毕业。外孙女已经工作了。

问:您是党员吗?过去有没有被评为先进或劳模?

姚:是党员。大概是在“四人帮”打倒的时候入的党。当时呢,我和你实事求是地讲,当时我们厂里有一个人为难我,影响我入党,不谈了,这个事情不谈了。劳模是没有。先进嘛,是小组先进,又不是市里的。

问:您这个房子的情况怎样,自己有没有做过翻修?

姚:房子50平方左右。本来就是这样的,没修过。就是上头和下头,我没把它隔开来。现在是两个人住。还出租给别人。因为我的工资少,没办法。出租的话,补贴补贴。我从51年,一直到现在,没搬过家。本来我要搬到曹杨新村的,我女的不肯去,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当时曹杨新村交通不方便。她在二十二厂工作。这房子买了大概五六年了。

问:那么您子女现在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姚:啊……小孩的房子,女儿分到房子的,女婿还没分到房子。一室一厅,早就住上了。其他小孩呢,小儿子没房子,户口就在这里。现在他住在甘泉新村,为什么道理呢?这件事情复杂了。他的小姨子,被人家用刀刺死了,她还有孩子,我的儿媳妇没办法,她家里又没有老的,又没有小的操心,跑到那边去照顾,就暂时住她那里。他们抚养着小姨子的孩子。我小儿子、媳妇跟孙女户口通通在这里。大儿子自己住在七宝,他有房子的,自己买的。

问:经济上有没有子女补贴你?

姚:没有,所以我这里的房子出租,补贴补贴自己。800块还拿不到,怎么办?

问:您平时空闲的时候做些什么呢?

姚：我本来是里弄小组长，后来生病身体吃不消，就不做了。身体稍微好一些，搓搓小麻将。现在是不搓了，有些小财嘛。

问：这个地方您觉得住得还算舒服吗？

姚：在我说起来，怎么叫舒服呢？过去没有房子，现在有了房子，住的是蛮舒服的，对吗？从我本人说起来，在这个地区呢，我们还算可以，对吗？这里交通还可以，就是卫生情况太差。对面就是小便池。乡下人特别多，弄得一塌糊涂。治安现在里弄里还可以。过去这里吸毒的蛮多的，现在不大看见了。

问：假如房子拆掉了，您准备怎么办呢？

姚：我总归要买房子，否则我住在什么地方？没有地方住啊。小儿子没房子，大儿子的房子又不会给我住的。总归买二手房，自己拿的工资，买二手蛮好了。老太婆么，去世了。最好在市区，方便一点，看毛病么，像我这样的年纪，这毛病发起来，马上就要到医院里去的，对吗？只要可以住住，这么大年纪了，对不对啊？

采访人/陆 扬 赵金鑫

一位笃信基督教的纱厂女工

姓名：杜菊芬

性别：女

年龄：67岁

籍贯：江苏盐城

文化程度：文盲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成员：本人和妹妹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19日

语言交流：上海话

我们依约来到了杜阿婆的家里，惊奇地发现杜阿婆的二层小楼是一个私人旅馆。一进门，感觉空间很压抑，床、桌子、椅子挤在了一起。有个小门通向不到一米宽的厨房，厨房门口，有一个年代久远的木制深黑色梯子，可通向二楼。在床的前方的电视架上放着一台80年代产的金星电视机，置在半空中，在电视机的斜上方挂着一位老年男子的黑白像，可能是杜阿婆丈夫的遗像。杜阿婆热情地搬出了几把椅子，开始了我们的访谈。

问：阿婆您几岁啊？哪里人，为何离开家乡来到上海？

杜：67，我是江苏省盐城的。我到上海是小时候，六七岁跟着爸爸，还没解放就到上海来了，因为老家生活苦，生活不下去，所以就到上海来了。来上海后在徐家汇，徐家汇你晓得吗？我父亲做木匠，被工头弄伤了，拿不到钱，不像现在有保障，过去没有保护啊，高兴给你钱就给你钱，不高兴就不给你。我那时候在化纤厂，很小，像你们一样大。织棉的，纺织企业的。你们现在条件不错，我们那时候哪里有钱读书啊！所以现在我就希望我孙子孙女考上大学才好。你们要好好再接再厉读书，做国家栋梁。我们一生是不谈了，苦透苦透，现在我们感谢党。给我们医保养老金，600多块钱。

问：来上海后就没有再回老家过吗？

杜：我们回乡过的，全部回乡到乡下去了。我妹妹和我都回去了，到老家去，老家土地改革的时候，分了田。我们家那时候穷啊，现在穷好像不光荣，过去穷还是可以的，哈哈！是吧？那时候人穷得要命哦，过去穷没关系，只要肯做，不拿人家的，共产党会帮你的，分点田给我们种。但我那个时候受不了了，都吃大白菜，我受不了，就到上海来了。

问：您又回来了？

杜：嗯，又到此地来了。回来还是做化纤厂，再是纱厂。之前，我在化纤厂工作，给老板做。那时候有老板，私人小老板。后来公私合营了，大概 1955 年吧。老板不要我们了，不再做了还要你们啊？对不对？于是我不做了，回家，后来又来了，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

问：一家人都一块来上海了？

杜：就是我来，我家里还有我的妹妹，妹妹来了又因为查户口，到江西，不同意后回苏北去了。以前常常有运动，没现在这么稳定，以前常常搞肃反啦，反修啦，反外部渗透啦。我没有去，我妹妹去了，后来我父亲退休了就回老家去了。我弟弟现在还在乡下呢。都来了生活不下去呀。那时候我们在这里，我父亲先来的，我母亲来来去去，来了之后生活不下去。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好苦哦，我那个时候坏，受不了苦就逃到上海来了，呵呵呵。是这样的，到我父亲这里来，烧饭给我父亲吃，大了嘛我就出嫁了。出嫁后，都做临时工。我后来做的多啦，做做人家就不要了。

问：您爱人是哪里人啊？

杜：我爱人是浙江萧山的。我们是介绍的，亲戚介绍的，跟他同一个车间的亲戚介绍的，他是浙江我是苏北，和他是一个单位

的。我认识他时，他早就在上海了，在运输公司。结婚时，我是22岁，他是28岁，比我大6岁。他先是做装卸工，后来做驾驶员，后来眼睛不好，去管仓库，现在退休了。上海运输公司，后来到化工运输公司，并掉了，哎哟，事情多了，你们不懂，事情多得不得了。

问：在上海你们的住房有否更换过？

杜：换哦，换了不晓得几个地方了。

问：这些年来你们的生活有些什么变化？

杜：我们后来好了，介绍我们到街道去做，人家看我们工作好，把我们留下来做长期工，街道工厂。感热器，做矿车用的，我们是做长工。男男女女的都有，有的车间做机床，我是开行车的。现在退休了，感谢党，给我们养老金。你讲什么好呢，600多块钱，身体好的时候还可以，看病是不够的。有劳保费，如果没有还要苦啦。

问：你们两位老人身体好吗？

杜：还可以。大病没有，那就好多了。我们现在呢，孩子你不知道，我们是信上帝的，嘿嘿嘿。我感谢上帝，信基督教。

问：我外婆也信基督教。

杜：真的啊？那好的，你以后也要信哦。外婆都为你祷告呢。我孙子孙女都信，跟你差不多大，嘿嘿嘿，信了就好，神一次一次把我救活了。不是我们信基督教就不死，也要死的，但是不到黑暗的地狱去了，而是到天堂去了。

问：阿婆您有没有看到上帝？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啊？

杜：有的哦，表现，有。这个见不到的了。很好很好，是精神，精神在我们里面驱散黑暗，我们的灵魂就不会去地狱，夜里睡觉，不安定，没有药也能睡觉，没有信仰的就不行了。我们信，它

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平安，夜里就不做梦，以前做梦常常梦见一块板在大河里漂啊漂，叫救命却叫不出，喉咙叫不出来，看见边上好多人，一个都不来救我，一点一点沉下去，就这样，害怕。

问：现实生活中有没有感应到呢？

杜：现实生活中有，比方假使我做不好的事情了，心里扑通扑通，这事情不能做，神就在我里面跳了。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不能做，不要去，我就不去，去了，做不成还要闯祸。好大的精神啊，比方我一样东西没有了，不用怀疑别人的。比如我怀疑你一样，不可以。我就祷告，嗯，神就会告诉我我在哪里给我看到，这就是精神。有毛病的人，身体疼了，就去看医生，世人的医生也是神造的，是神派来救人的。为什么人缺少气，缺少血，缺少水了就要到医生那里去吊了？吊水接气啊，就是神，把他们招出来要救人。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起接触并信奉基督教的？

杜：我啊，20 多年来了，是别人介绍的。就是刚刚和你讲话的隔壁的老太太，她信神的，她 90 多岁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才开始，会受批斗。以后开始开放了，信仰自由了，我们教会就成立了。还有教堂，每个区里都有两三个。我每个礼拜天都去，家里还要聚会。教堂不远，就是 48 路到闸北区。信仰基督教的人多，礼拜天做礼拜的人也多。每个教会千把人，早上两班，7 点开始一班，9 点开始一班，平时还有唱诗班。要学习呢，小青年要学习。

问：您家里人都和您一样信仰基督教吗？

杜：我家里人相信神的，就是他们不虔诚，还要找工作，这也允许吧，我们的神不勉强人，你信不信都随便，不信呢，不勉强。

你信谁谁就会救你，你不会到阴间去了。我们的神是救活人的神，死了他不救的，因为定律定好了。到黑暗里好可怕啊，不能动，很闷。牛顿他讲人是猿猴变的，他后来推翻了，自己信耶稣了，他自己信上帝了。

问：阿婆您有没有晚上起来祷告，吃饭前感谢上帝等宗教仪式习惯呢？

杜：嗯，祷告的。早晨不祷告就没有饭吃。我们还看圣经，圣经的创世纪，人和天怎么来的。

问：听说，居委会经常有事来找您，您是不是在居委会做一些工作？

杜：我呢，居委会里不参与，但是他们晓得我们信主的，不说假话，我们不敢说假话，我们就希望人家好，我们吃亏了，我们自己受，不向人家讨便宜。

问：听说这里治安方面还是存在不少隐患。

杜：治安这个地区最坏最坏的，你们小孩子不懂，不知道的我讲给你们听，对吧？居委会问你们，你们不要讲，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不是相信基督教就不相信党，我们相信党，我们没有领导就不能过了，没有安静对不对？这个地方吸毒、贩毒——

问：我们来的时候看到许多家庭贴着“无毒家庭”。

杜：无毒家庭呢，他们就不做，对吧？没有贴的不一定做过。有的做过，有的没做过，就不能贴。你们小孩子天真不懂，无毒家庭没贴的我们就看出来嘛。没有做的可以贴，有一个人做的就不可以贴。那就体现出来了。对不对？你看我们信神的都是“科学的科学”，我们信化学，我们相信科学。化学，做什么？我们身上有毛病，用化学化验，我们都相信的。

问：您相信科学吗？

杜：科学！我们这是“科学的科学”，对不对？我们神讲的，有病就有药治，我们信上帝的就是要有病就治，不是迷信，弄个香灰吃吃，我们不吃，我们不相信那个，我们就相信科学。你们读书不是相信科学吗？我们那个是“科学的科学”，不要说你们，高级的院长还相信呢。你要，一定要相信社会主义是科学，是科学的科学。有个台湾的弟兄，东华大学上课，问生命哪里来的，你们现在知道吗？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没有学过就不知道，我们信神就晓得了，生命就是从阿爸阿父天上的父神来的，他是万人之父，他是灵，我们人是他造的。山上的老壳啊，树皮啊，狗富石啊，鸡富石啊，里面都有灵。我们要什么，阿猫阿狗会给我们吗？我们神就是要我们信仰他就可以了。我外孙女、孙女都信，我孙女一次题目做不出，她说我这道题目做不出怎么办，就祷告主啊。我孙女今年12岁。

问：您一共有几个子女，他们都从事什么工作？

杜：我子女三个，两个儿子，两个媳妇，他们都信神。我大儿子以前开出租车，现在不做了，因为身体不好了，现在待业在家。我二儿子在宝钢，还可以，我媳妇他们都到教堂去。我女儿开旅馆，一共三层，他们都借房子出去了。我女儿也信主耶稣，我女婿在中外合资，大概日本合资做的，在上海。他具体做什么我不大清楚。我大媳妇在税务局做，她父亲是嘉定人，算是国家干部。小媳妇也在宝钢。孙子孙女都是独生的，在读初一、初二吧，小了。最大的15岁，最小的14岁。

问：家里有没有人是党员或团员？

杜：只有媳妇是党员，那个税务局的。两个儿子，他们不告诉我。他不讲，嘿嘿，他说妈妈我是相信主的基督教家庭，基督是什

么？我说信主以后，生命自在里面。你跟从主，做主的子民就行了。不自杀，不贪心，不要贪国家的东西，那么党会不欢喜吗？对不对？他就是照这样做的。

问：两个儿子不跟您一起住？

杜：这房子给我们开旅馆，他们住外面。他们有时候不来，多数不来，因为我老了，他们不想来麻烦我。现在他们照顾我，不到我这里来，我大媳妇前天还打电话来说看看我，我说忙得很。孙子孙女也跟他们一起来。

问：这个旅馆生意怎样？

杜：还可以，能租出点房我就不错了，我大儿子在外面租 900 块一个月，嘿嘿。一个月赚三四千块钱，还要客满呢，很辛苦的。住这里的人各种各样都有，不好租的我们不租给他。条件好的不肯租我个地方；条件不好的，我不好给他住。

问：您这里似乎经常当聚会用，您认识的人也比较广吧。

杜：还可以。我讲给你听，现在单位都倒掉了，这个叫破产了，像我们还有劳保，那个叫养老金，有的还没呢，嘿嘿嘿。我们现在特别的关系就是我们信主，关系最好的都是教会里面的人。

问：和老家的那边亲戚经常保持联络吗？

杜：现在就是电话通通。我弟弟顶替我父亲，现在单位破产拿不到钱，他就在厂门口坐，破产以前单位门口坐，他单位统统把他们给赶走，现在卖掉了，赶他们到哪里啊？他骨折用药不要说进口的，连国产的也用不起。我们就找认识的医生，最好的办法是戒药，我们家庭困难啊，打三针，把这个固定了。到现在还不能行走，又看了几个月去复查一下，还有许多坏死，要是不打那个针就废掉了。装不锈钢，又装不起。到现在残疾证还没开到，太困难了。不能工作，走路一跷一跷。是我亲弟

弟，对我挺好的，他又没有父母……他有小孩，有妻子，妻子是外来妹，居委会挺关心我的，对我们挺好的，他叫我弟弟去弄残疾证。弄不到，好难弄，医生给他开刀，弄残疾证要负责的，不肯开，他说慢慢会好的，到现在还没好。

问：平时您是否经常出去走动？

杜：我常常出去，跑的好远，上海北车站，公共汽车应该说很方便。对面新区健身器材不给我们用哦。

问：这里有物业公司吗？

杜：我们这里都是居民，平房，没有物业公司，只有居委会会有清洁工。

问：这里如果要拆迁的话，你们这房子估计会怎么样？

杜：这个只有他评价了吧？动迁组，不清楚。

问：听说这里周围居民意见还是蛮大的。

杜：这是肯定的。这个地方看毛病什么的方便一点。到郊区，70多岁的人啦，到乡下去看毛病不方便。叫人家拿钱去买（房子），没钱，这地方本身就穷得要死。买到什么地方啊？拆迁后买到现在这个地方啊？买不起的啦。

旁人：他们昨天还跟我谈呢，他讲我们三代了，给你13万块钱。那里房子3室1厅就要20几万，2室1厅就要十几万，你说说看。

杜：他（指旁人）女儿临时工，女婿又没工作，苦得要命哦，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啊？动迁组哪管你有没有钱，我们平头百姓哪里有那么多钱啊？拿个一两万都够呛。

问：要是他们补贴的钱合理您就愿意？

杜：嗯，就走了，我们愿意。

问：您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旁人：远的地方没人愿意去。一个叫月浦，一个叫海滨，我们也不知道，在长江旁边。海滨在吴淞口，月浦还要远了。你不去就拿钱买，哪里有钱啊？

杜：老早我们这里苦得够呛，现在好不容易好点了，又弄到乡下去了，把小孩带到乡下去了。

也是在后门大庄那里，对不对？像那个长宁区不拆也要拆，我们还算是好了。

问：您对孙子孙女辈有什么希望，希望他们到什么样的工作岗位？

杜：呵呵，工作是他们的自由，我希望他们能跟你们一样考上大学。我就这样的愿望，我就望他们不要像我一样，不识字。

问：他们读书还好吗？

杜：读书成绩还可以，很高兴。你们老人看到你们也一定很高兴。不论遇到什么问题，不论想做什么，要向上帝求神救你们，你有痛苦他们会救你的。上次一个学生，没考上大学，他就跳楼自杀，一家人完蛋了。人生在世，神会给我们活路的，天上的麻雀他都养活，他都有数，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希望你们不要碰到困难。有神带你们、救你们，有困难想到神，神啊，你带着我们，我们不怕，什么都在你手里。

问：阿婆谢谢您，刚才耽误您吃饭的时间了，打扰您了。

总的来说，我们所采访的这两户居民是董家湾比较典型的体力劳动者的两种生存状态，一个怀念改革开放前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无力改变贫困的现实而不得不接受现实；另一个则相当现实，通过婚姻和教育实现着向上流动的潜在可能。同时，当地大量的信教群体蓬勃发展，表现出基督教对贫困者巨大的吸引力，以及教徒之间的向心力，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稳定上起了

一些作用。居民对区政府工作普遍评价不高，尤其集中在治安、外来人口和动迁补偿上，有可能在将来出现难以控制的对抗情绪。

采访人/乔一江 崔华 周鹏

卖酱菜补贴家用的退休女工

姓名：毛顺筠

性别：女

年龄：67岁

籍贯：江苏无锡

文化程度：小学

职业：做酱菜生意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本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公公

居住时长：11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2月2日

语言交流：有时是普通话，有时是上海话。

上午我们来到了第二个采访对象毛顺筠家中，阿婆接待了我们。阿婆今年67岁，满面笑容，看起来很年轻。家有两层，一开始是一层，后来由于儿女们的加入，就自己搭建了阁楼。客厅兼餐厅，两台电视机、电话，冰箱等电器。大厅中还有一桶桶酱菜（平时阿婆就卖些酱菜来挣些零花钱）。房子看起来很旧。阿婆在访问中虽然乐呵呵，但也透露着些辛酸。两儿两女亲生的（还有一个不

愿说明、抱养的儿子,到后来我们参观房子的时候才发现)。亲生的两个儿子是双胞胎,抱养的儿子已经结婚搬出去住,双胞胎中的一个已经下岗了,两个女儿都已结婚。阿婆的婚姻是包办婚姻,吃过很大苦头,对现在的年轻一代吃不起苦深感忧虑,对儿女的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希望儿女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问:您原来是哪里人?你们什么时候来这里的?你们刚到上海时就住在这里吗?

毛:我是无锡人。大女儿生下1个月后我来上海的,到这里有49年了。我的阿婆阿公先来,我后来的。我来的时候房子是平房,后来自己翻上去的。我生在乡下,没书读。家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姐姐死了,弟弟死了,还有个哥哥在上海,父母统统都死了。我有4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闺女,他们都已结婚了,小孩已经很大了。我们家,现在住在这里,有两个儿子,我阿公,我老头还有我5个人。

问:您以前在无锡干什么呢?

毛:种田啊,我父母都是种田的,后来我妈妈来上海帮人家做保姆。那时候很苦的,我妈来了上海以后就把我们都弄过来了。那时候户口好弄,只要你来。我小时候吃的苦多啊,讲讲都要出眼泪的,所以不好讲的。我10来岁的时候就要帮人家做童工。以前我爸爸租地主的田,交不起租,就把我送到地主家做工,帮他们洗衣服、拖地板,那时候大概也就10来岁。解放以后不能用童工了,就放我回来了。我做了好几年,我和人家不好讲,讲讲要哭,我小时候真的很苦,想想现在的小孩是开心。

问:您开始是做什么的?

毛:我开始是在上海钢管厂做的,在车间做事的。后来62年三年

自然灾害，两个职工要下来一个，我就下来了。现在老阿公病了，我就在家服侍他，他已经 92 岁了。我蛮吃力的，要买要烧。早上买粥给他喂好，让他睡下。我自己也总要老的嘛，我今年 67 岁，家务事很重的，两个儿子也没有结婚，心事也很重的。我还做点小生意，酱菜生意。本来是隔壁房客做的，现在他回乡下去了，就让给了我。我反正在家里没事，现在已经做了一年了，也不辛苦，都是人家送过来的，自己不用进货，卖出了大家就都来买了。

问：您是党员吗？“文革”的时候您有没有去参加什么活动？

毛：不是党员，我是小老百姓，当时在食堂就当一个小组长，整个食堂我管。每年评先进、“三八”红旗手之类我都有的，我家里奖状很多很多。那时厂里的头头叫我们出去造反，我们就出去了。我们厂里有一个大头头，斗过的，要他拿一根稻草，把它竖起来。我们厂里当时有两个派，一个叫造反派，一个叫什么我忘记了。我们是造反派，造头头的反，他们是帮头头的。有时我们在烧饭，他们说，“你们不要烧了，跟我走吧”。我们就跟他们走了。我们的厂在武宁路那里，我们几十个人就统统去了。我们女同志就是去喊喊口号什么的。但他们也有武斗的，我们厂里武斗很厉害，不过没有人死，只是有人受伤。

问：您爱人是什么地方过来的？现在在干什么呢？

毛：他和我一样都是无锡过来的，只是隔了几个村子。他比我大 5 岁，今年 72 岁了，现在退休在家。我 19 岁结的婚，20 岁生的大女儿。我是人家介绍的，我家离他们家 10 里路，那时就用船把你摇过去。结婚女方不摆酒，男方摆两桌酒就好了。那时乡下是包办婚姻，以父母做主，他们说好就好了。我们以前都不认识的，我有不同意见，后来还是没有办法。那时我们结

婚简单得不得了，就一条被子，两件衣服，一个箱子就过去了，我们那时真是旧社会。

问：您两个儿子结婚了吗？现在有没有工作？

毛：还没有，今年 32 岁了。有工作的那个不肯谈，许多人介绍他都不要。还有一个在谈，他以前做车床，现在失业了。老早居委会经常来关心关心，也帮他介绍过工作，叫他站在马路上挥挥小黄旗（交通协管员），他不肯去，说年轻人做这个不像的（丢脸）。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呀，一模一样的，连他们爸爸到现在还分不清哪个是大哪个是小，只有我认得清。我两个儿子都很孝顺的，家里的事很肯做的，下岗的那个，在家洗衣服洗碗什么都做的，他说：“我在家两年了，你洗衣服洗被子都不用了。”

问：您大女儿去过农场，她什么时候结婚的呢？您小女儿呢？他们住在哪里？他们都有小孩吗？他们经常来看您吗？

毛：大女儿，她是回来后结婚的，30 岁左右结婚的，现在住在杨树浦的发电厂那里。我小女儿也结婚了，住在彭浦新村。她们都有小孩了，大女儿的小孩今年 19 岁，高二，成绩很好的，在提篮桥那里读书，市东中学，是个重点中学。她周六、周日要上什么班的，外语什么的，不能来，我没读过书，也不懂。女儿们经常来的，不来就打电话问问我好不好什么的。

问：您两个女儿是什么文化程度？

毛：她们都是初中毕业，初中那时就相当于高中了。

问：知青下放的时候你们家有没有人去外地？

毛：有，我大妹妹就去外地了，下放到我们原来乡下。我还有个大闺女也是下放的，她是 73 届的。大女儿下放到长兴岛的前卫农场 14 年。后来我退休了，她就顶替我。

问：你们老人家的医保好吗？

毛：医保有的，也是可以的。我们老爹爹，没有医保怎么看得起（病）？他有心脏病、前列腺炎，好几种病，他一年至少要住 5 次医院，一进去就是 1 万多，自己只要拿一两千元。他脑子坏了，已经糊涂了，吃的都是（治）精神病的药，年纪太大了，医院也不收了，床位要留给年轻人。

问：你们家有没有把房子借出去呢？

毛：我们没有，我们家人多，自己都不够，我楼上楼下大概 60 个平方，二层。大家一起住，两个儿子，后面是老公公，还有我大妹妹，房子很小的。

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说过要拆迁啊？动迁组来过这里吗？您以后想不想动迁出去啊？

毛：讲，年年讲了，讲了大概 10 年有了吧，还没拆，不过我们前面拆了很多，一批批开始拆。来看我们这里的老板很多，但我们这里贫困人口多了，房子要的多，老板吃不进。没有来过，前面已经进来了，这一带还没有。想出去，想出去再买房子。我两个儿子肯定要买房子的，我可以到乡下去，我们这里动迁很多都去乡下。

问：您以后想买什么样的房子？

毛：不是买，是问他们要房子，要到乡下去。但要房子我们还得贴上 10 万 8 万的，我们哪里来的钱呀？家里还有人下岗。人家一致要房子，前面 100 多户人家全部要房子。这房子倒还可以，在大场下面，路线也还可以，交通也还方便。

假如我们家动迁，要我们到哪里去？我一个儿子下岗，我退休工资只有 600 多元，我老爱人只有 700 元，哪有钱去买房子啊？买人家新房，涨价涨太高了，只好买二手房。前两年买

二手房只要十几万,现在卖到20几万,30几万了。我和老头子打算分套房子到上海乡下去过过。儿子要工作,就让他们在上海,工作方便点,现在分房子要分到桃浦还要下去,他们怎么工作啦,只好在这里了。两个儿子一人买一套一室一厅,买人家二手房,现在大概十七八万的样子。

问:你们平时闲下来干什么?

毛:喜欢搓搓麻将,小麻将,三块四块,都是周围邻居,吃过饭大家一起搓搓麻将,到4点钟么烧烧饭,我和我老公都搓的。

问:你们现在对子女有什么期望吗?

毛:总希望他们能“往上”点么,父母能靠靠,总希望他们能早点成家,找份好点的工作。婚姻呢,我两个闺女都由她们自己,她们看上算数,我们已经吃过苦了,你们只要看得中,觉得好,过得开心就好。我儿子我也不多讲,我叫他看得中就谈,看不中就算了,他们自己来,我不管。

问:你们小区安全吗?

毛:我们这里不大安全,昨天晚上那边弄堂里的一只煤气钢瓶被偷掉了,我们这里主要民工多,都是借人家房子住在这里的。

问:您现在还会回老家吗?

毛:来往的,每年回去一趟,我奶奶葬在老家,每年清明下去一趟。这个(在她家走亲戚的)就是我大妹妹,我老公的妹妹,和老家经常来往的。小孩不经常去,有事了就带他去。

问:你们孩子都讲上海话吗?

毛:小孩都生在上海,当然讲上海话。无锡话也会讲,我带他去乡下时,他也会讲。

我来上海后 8 岁就开始做童工

姓名：杨月媚

性别：女

年龄：67 岁

籍贯：江苏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丧偶

家庭成员：本人，大儿子一家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门口，2003 年 11 月 21 日

问：阿婆您老家是哪里的？当时怎么过来的？

杨：嗯，是从苏北过来的。怎么过来的我也不清楚，我当时还很小，是不懂事的时候，和我爸爸、妈妈一起过来的，还有我的几个姐姐。我爸爸、妈妈过来找工作赚钱，所以我也跟过来。我们过来这儿的时候没熟人，逐步逐步才有熟人的。

过来后，父母什么都做，能赚钱的都做，挑柴啊！我有四个姐姐，本来妈妈生了 13 个小孩，但真正活下来的只有 5 个，他们（因为）没有钱（养）全都死掉了。来了之后，孩子都很小，能做事的都去做童工了。我和几个姐姐没有联系了。他们都在老家，因为妈妈回老家，所以跟着回去了。大姐是从来都没来过上海。我们都没读过书，都是文盲，不识字，没有钱读书啊！

问：您最早过来的时候住在什么地方？后来有过什么变动？

杨：都是一片荒地，还有水稻，水田那边是铁路，这个地方，旧社会时是桃园。当时的房子是毛竹做的，毛竹劈成两半，绑成房子的壁，房顶是用芦材搭成的。我开始时住在那（指不远处），结婚后搬到这，住用毛竹做的房子。1938年前建的这个房子（12平方米的两层砖瓦房），孩子们都住在这，结婚后搬出了。房子不出租的。以前家里没有什么家电，吃饭都吃不饱，哪有冰箱什么的。后来儿子结婚的时候才有了冰箱。

问：那您来这后是做的什么工作呢？

杨：我8岁开始做童工。这儿旧社会有纱厂：一厂、二厂，是日本人办的。工作没做好，他们就用开水泼我的身上，现在我的身上都是伤疤（用手指右侧脸往下）。后来我就一段时间不能干活了，过一段时间又到别的地方工作。后来到针织厂、棉毛衫厂。最后是军衣厂，是解放军的，我12岁去的那，在里面缝纽扣。解放后敲石头建马路！做做停停的，工作都自己找的。后来我又到上海钢铁厂、三厂、五厂等，我很苦的，从出生就很苦。

问：您家有没有人是党员、团员的？得过什么奖励吗？

杨：老二是团员，在农村得到的。我以前在工厂里工作时经常发一些毛巾、香皂之类的奖品，还发奖状。

问：您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您丈夫干什么活？

杨：我20岁结婚，他是上海人，我们都是亲戚，认识就结婚了。解放前，他和妈妈在上海种田，16岁的时候他就跟叔叔还是什么亲戚去扛米袋、拉大车，解放前、解放后都在做，退休前做码头工人，还在笔厂做过工。1967年死了，在二楼一脚踏空，掉下来摔死掉了。

问：您有几个孩子？他们的情况怎样？

杨：我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是第三个，年龄分别是 46、44、41、38 岁。他们都读到初中。我们打工出钱供给，都在四中读书。现在只有小儿子没结婚，其余都结了。我有三个孙女，都在读书，在四中和八中。大媳妇是宁波人，大儿子一家在这住，12 平方，有两层，我和他们一起住，我住在楼上。厨房在搭的房子里。其他三个都住在公房，都还可以。大儿子在橡胶厂，现在下岗。老早卖地石的，能吃饭就行。大媳妇卖衣服。其他的都下岗了，二儿子以前在笔厂，作为 77 届下放到奉贤。两三年后回来，回来后到他爸爸厂里顶替。二媳妇一直生病。三女儿和女婿都扫马路。第四个在我退休后顶替了我，做马路工。

问：您空余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杨：除了吃饭，就是玩啊。看别人打打麻将，在马路上晃晃等等。

问：您这儿说过要动迁吗？如果动迁，您有什么要求？

杨：老早说过的，十几年了，还没动迁。如果动迁，几个儿子都想要的。政府怎么给，我们就怎么要。要求都是白费。

问：子女在经济上会支持您吗？对子女有什么要求、期望？

杨：我的劳保有 500 多元，他们以前帮助我，现在不给我了。现在都在一起吃饭。对他们没什么期望的。

问：您和邻居经常有交往吗？和亲戚、朋友或同事都有联系吗？

杨：和邻居都挺好的。老家的人都不过来的，我没朋友的。

问：对周围的环境都还满意吧？

杨：都还满意，有劳保、医保的，都还满意。治安也好多了，别的都还好。

新疆回沪知青

姓名：闵奇石(丈夫)、筱爱琴(妻子)

年龄：丈夫 65 岁，妻子 58 岁

籍贯：丈夫江苏射阳，妻子江苏盐城

文化程度：丈夫大学，妻子初中

职业：夫妇俩已退休，丈夫平日在城隍庙帮人看铺子(卖玉器)，妻子在新客站干活

家庭成员：老夫妇俩和小儿子一家三口

居住地点和时长：16 年(夫妻俩从新疆回来后)。小儿子已在此居住 30 年，丈夫的家人居住时间更久，从祖父辈起，其几个伯父现今仍居于此。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 年 11 月

楼房为三层。一楼为厨房、客厅。二楼三楼为卧房，都有电视并且三楼还有电脑，三楼养鸟和花，有两间房，楼梯稍窄。老先生的房间在三楼，有衣柜，电话，钟。

(一) 对妻子的访问

问：你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

筱：73 年搬至此地。我以前是新疆支边青年，87 年退休后到此地，娘家在昌平路(静安区)，我退休后在新客站干活，先生一直在。以前是平房，回上海后，将旧房改造，我有两个儿子。

先生出生在上海，他祖籍江苏射阳。我是江苏盐城人，董家湾以前很穷的，基本上是江苏来的，有养猪，种田，卖荸荠，因此得名。先生祖辈在此住了一百多年，先生几个兄弟住在此地，有的买房、分房搬出，他几个伯父现在还住在此地。

问：您现在几岁？孩子的情况如何？

筱：我年龄 58。我 18 岁到新疆，从农场到山区，直到 87 年回城。那时小孩住在上海，由奶奶带着。我在农场做护工，因为先生是大学生，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所以到山区，后来到乌鲁木齐地质队工作。我 42 岁退休，先生 49 岁退休，回来做临时工。他现在在家带带孙子，还在城隍庙帮人看铺子，卖玉器。大儿子在龙门宾馆做厨房，小儿子做保安。大儿子买房在彭浦新村（宝山），已婚。小儿子和我同住，有一个小孙子（小儿子的），平时在托儿所，小儿子住在楼上。楼下一间房，楼上三间，我们老夫妻住一间，以前大儿子和他外婆住一间，后来大儿子自己买房去，每月付公积金 600 元，大媳妇也是知青。

问：和小儿子住在一起，大家的关系相处得怎样？

筱：小儿子与我一起吃，小媳妇是外来妹，没工作。小儿子工资 600 多元给媳妇用。孙子托儿所 200—300 元，媳妇用 200 多，所以儿子的工资用完了，儿子就吃我们了。我们夫妇工资 1 900 左右，付保险费（有几份保险）500 元，两年要七八千，平时省下一点，小儿子不够就倒贴一些。家庭平时假使有矛盾，我作为长辈会谦让一点。小儿子他们开了一家理发店，由媳妇打理，因为媳妇没有工作，就培训过，所以每月交税，管理费，但现在媳妇不太肯做了，生意不太多，媳妇平时也会做做临时工，如服务员等。家庭还算和睦，我们不太约束小辈，十分开通，不太计较，很怀念以前在新疆的朋友，很珍惜以前的

时光。

问：能回忆一下在新疆的那段经历吗？

筱：小时候，我在静安区江山小学读书，成绩不错，担任干部，深得老师喜爱，中学读的是长江中学（南京路），成绩不错，初中的时候我自愿报名到新疆。在农场自认为没吃苦。在新疆，众人中我还被挑选上画报，到上海宣传鼓励大家到新疆，63—65年大批上海青年前往新疆支援祖国建设。后来我从农场到了新疆阿勒泰山区。先生是58年考大学来到新疆的，58年八一钢铁厂到上海招生，先生便报至八一钢铁厂，读书，之后被工厂推荐至乌鲁木齐新疆大学读地质。后来因“文化大革命”，先生从新疆大学毕业，知识分子接受改造所以进山区，被分到工矿。从山区调至乌鲁木齐后，我们经常出野外（地质考察），我是搞后勤的（买饭菜票），先生搞地质，两人不在一队，是分开的，队中只有一两个女的。大儿子68年出生在上海，由外婆带着，此时我在山区，因为上海条件较好，读书条件，所以大儿子留在上海。大儿子出生50几天后我就离开了上海，后来我42岁退休，先生49岁退休。在新疆我开过三次刀（国家付钱）。第一次开刀刚到新疆，在连队，拾麦穗，每天只做两个小时，几个月后，在过春节时生病开刀，由于医疗事故，国家为了关照我，把我调到卫生室，当时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国家分配的，每月有三元零用钱，自己对当时的生活很满足，很适应生活。

问：您和先生是怎样相识的？

筱：我不想回农场，所以探亲期间，经亲戚介绍与先生在上海结婚。当时我22岁，先生29岁。然后再一起回新疆，当时三年回家探亲一次，一次两个月，来回车费全可以报销。

问：你们在新疆的生活怎样，为什么回上海呢？

筱：当时在乌鲁木齐房子有三室一厅，每月付房租，住在市中心，是新疆最繁荣的地方，像上海的南京路。为了小孩才回上海，户口迁回上海后，房子被公家回收，回上海后就没再回过新疆。在新疆时，每年从5月工作到9月（因为封山），11月休息在家。为了落叶归根，为照顾母亲，才回的上海，回上海后，照顾母亲，母亲在我家住了七八年，请了一个钟点工，到去年1月去世。

问：退休下来，所得的工资能维持日常开销吗？

筱：87年退休后，工资在当时还是比较高的，有180几块。89年物价上涨，工资也逐步提高，63年在新疆工资只有3块。先生工资较高，又是大学生。现在先生工资1030几块，我800多块，因为87年退休的工资改革没轮到。

问：还记得“文革”时候的情况吗？

筱：“文革”时，我出生不好是小地主，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文化教育很满足，所以在“文革”期间，不参加斗领导活动，私下还会偷偷安慰被斗的领导，很同情他们，我不参加批斗，只做旁观者。我父亲被批斗过，67年探亲回来，看到父亲被斗，所以很有感触，很同情那些被批斗的人，不参加批斗活动，因为父亲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但没被抄家，由于家里条件不好。

问：对于动迁有什么想法？觉得住在这里好吗？

筱：如果动迁房子，分到哪里就住到哪里，没有意见，因为自己只有一点点工资，买不起房子。在董家湾过得很习惯了，邻里也很和睦，很热闹，买菜也很方便，碰到困难可以互相帮助。平时做做家务，有时到住在淮海路的姐姐家，一起逛街，觉得生活很充实，要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

(二) 对丈夫闵奇石的访问

问：您的祖辈在董家湾住了相当久的时间，能说说您祖父辈的生活境遇吗？

闵：我祖籍最早在山东，后到了江苏射阳，我出生在上海。从水路到的董家湾，一到上海祖母就过世了。我8岁当童工，在宝凤纱厂，祖父种菜地，大伯父、二伯父、三伯父都在宝丰纱厂。父亲读了3年书，15岁拉黄包车，有个老板买了部车（3000两白银），由于拉黄包车钱少，一个月5元，父亲学徒开车，老板出钱让父亲学徒，正常要三个月的学期，但父亲只花了一个月就学会了，还把执照给考出来了（从前考执照很烦的），开车一个月40个大洋，实际拿90个左右，大夫人、小夫人给的红包。大伯父，二伯父不干活了，靠父亲。抗日战争爆发后老板（老板姓赵）走了，东北人，家里解散了，父亲在大同路拉客人，后来和人买了部卡车，1946年父亲生病，由于旧社会什么都没有，就把车给卖了，屋子也卖了，什么都卖了，看病。当时读书很苦，很多事都干过了，4个孩子我排行老三，父亲腿残废（大关节能动小的不能动），但还能开车，所以又与人花了十二两黄金买了部车，49年解放后，没有生意了。

问：您是位大学生，能说说您的个人经历吗？

闵：我叫闵奇石。51年当学徒，做羽毛球拍，上海产出售至香港。做事很辛苦，12点睡，4点起。文盲没读过什么书，以前读过私塾，零零碎碎的。哥哥以前读书很厉害的，全校第一！我读了一年书，因父亲生病就不读了。53年感到学徒不能做了，不能没有文化，去读书，不然没出息了。就去宝山区，在南赵

宅小学报5年级,结果考下来,数学0分,语文60分,有个认识的老师,叫我不读了,可我硬要读,就读了,后来慢慢升上去了,名列前茅,后升入闸北粹文中学。58年初中毕业,考入上海冶金工业学院,说我眼睛不行叫我去上海师范学院报到,但我认为当老师待遇不好,不想去,后来去了新疆乌鲁木齐钢铁学校。到那边发生爆炸,出现事故。自己发现此专业危险不想学这专业了,由于一次意外,去报考大学,老师是这样介绍地质学的,说这个专业是如何如何的好,自己就读了地质学专业,大学条件很好。64年分配去军工部,在新疆阿勒泰北疆矿地报到,65年春节一过,兵团与我们合起来了,被调至博吐海,属于军工部。因为是技术员,“文化大革命”时期,66年……(不肯说了)

79年同学的父亲是建设局局长,建设局要成立个队,我就去了,被借用,在山里的工作很爽的,有草有木,有鸟有鹿。

问:之后什么时候回上海的?在上海从事什么工作?

闵:87年回上海,第一批工程师是81年的。(单位)本不同意我回上海,(自己就)提早退休。回来后在新一建设公司,呆了7年的工程部,后来到总经理办公室当副主任,89年以后处级干部都不可以兼任。之后,我做过石料生意,赚了七八万块钱,最后被人骗光了,因为我是搞研究的,不会做生意。后来到了99年,我得了脑溢血,就不做生意了,最后一笔生意是在奉贤,盖了十八层楼,得了白玉兰奖。所以你们毕业后必须讲信用,说话必须算数,因为坏人多,要注意不要像我,被骗光了钱。

问:现在退休了,还有没有再做些别的什么工作?

闵:现在我卖宝玉石的,但现在的宝玉石也很难销售,因为缅甸的

宝玉石,70%、80%都是假的,但我卖的都是鉴定的,我自己有仪器的,只有鉴定是真的我才会卖出的,所以要讲信用,但我现在年纪大了,没什么精力,我在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有活力的。

问:还记得以前董家湾的情形吗?

闵:解放前,这里是很穷的。是一片土地,高架里面是市区,外面全是郊区,全是……地,几乎没有什么人。这里有一条细煤屑路,旁边有第一织袜厂,以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后勤。这里还有国民党的一个连部,后面还有一个营部,那时候国民党的兵也很苦,吃饭都抢的。董家湾是农田,那时上海只有600多万人口,我58年离开上海后,基本上与上海没什么关系了,58—87年基本上30年与上海没联系了。

问:谈谈您的子女的情况吧。

闵:因为两个儿子的缘故才回的上海,以前我们每年都去野外的,所以对孩子的教育不够。但那时国家对我们还是支持的,小孩可以回上海,但回上海后,户口不让报,从79年到86年,报了7年,后来想了很多办法,通过了很多关系才报进的。后来86年报进,87年就准备退休,由于从小两个孩子不跟我在一起,所以一个初中毕业,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孩子初中毕业,由于没有户口,所以也就不能报学校,所以就学了厨师,现在是二级厨师。大儿子是68年生的,小儿子是70年生的。大儿子比较老实,9岁到上海,缺乏父母的关心,但幸好董家湾没有学坏,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

问:在新疆的生活怎样?

闵:在新疆,在“文革”期间日子过得不好,“文革”后生活就好了,我们工资比较高,回来后工资258或285,那时这里没有人比

我的退休工资还高。现在不行了，工资只有 1 065 块，因为退休早。

采访人/陈江华 刘 敏

两层阁楼里的六口之家

姓名：周新慈

性别：男

年龄：58 岁

籍贯：江苏南京

文化程度：初中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本人、妻子，大女儿一家三口，小女儿

居住时长：50 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 年 11 月 19 日

语言：上海话

上午我们在居委会阿姨的带领下，来到了我们采访的第一个对象周新慈大伯家。穿过窄窄的弄堂，来到一幢两层阁楼的小房子前。周大伯乐呵呵让我们进屋，还倒上热茶。家里简陋，客厅兼做餐厅，摆设一些彩电、冰箱、电饭煲等电器，旁边是厨房，设有卫生间，由竹楼梯到阁楼。整房面积大概 19 平方。

问：您老家是哪里的？

周：我原来是南京人，南京郊区中华门。47年来上海的。我来的时候连我爸爸共有四个人，我们来了四个人，我父亲先来，后来又来了三个人。后来我弟弟和妹妹都是在这里出生的。自来的时候就一直住在这里。我老伴是苏北人，建湖人，她是随她父母过来的，她父母本来也是穷人，来上海开始时是骑三轮车的，一直到58年组织起来一起分配到厂里。

问：这里以前是什么样的啊？

周：开始这里都是棚户区，对面是厂，耐火材料厂。我们这里都是平房。原来是农田，这里有养猪的、种田的。后来草棚翻起来。刚翻起来的时候，空地也比较大，这里原来的马路可以开八吨的车子。由于住房紧张，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房子都开始扩建，比如这里间半间是用来烧饭的。我家阿弟结婚了，大家都要住房，就搭了半个灶间出来，不搭出来没地方烧饭。我在72年调到上海鼓风机厂专门修鼓风机，一直到现在退休，72年到现在，我义务劳动多年。

问：那您刚来这里时做什么？

周：刚来的时候还是小孩，到62年才工作。开始读读书，最早是我父亲来上海工作，在化工局橡胶厂工作，刚开始我读了两年私塾，五几年还有私塾，都是自己人办的。读了两年后读民办小学，然后是初中。

问：您来上海之后都做过些什么工作？

周：在海洋渔业公司，就在复兴岛。做了10年，在东海。那时候，我做水手，因为海洋里潮湿气候的影响，得了坐骨神经的毛病，不适宜水上工作，看了一年多各样的中西医就好了。好了以后调到航道局，做了没几年又调了个单位，因为搞团的工

作，我老的书看得比较多，对当时的政治有点反感，团的工作就不搞了，打了报告就下来做工人。本来在团里工作比较清闲，没有技术，考虑到今后政策有变更的时候，我们吃饭就没有饭碗了，所以讲只要有点技术有点手艺，不管什么时候都有饭吃，到下面来做工人以后就专门学技术。具体地讲，我搞的是电器修理，主要修理电动机电动工具，还有小的家用电器。我还刚刚帮人家修电器，刚回来。现在我退休了，厂里效益很好，但我内部退休了，今年刚退休。退休了现在一个月拿 920 块钱；要是在厂里工作，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多拿 700~800 元。

问：老伴以前是做什么的？

周：她以前在纺织中专读书，读完书以后分配到申新九厂，就是荣毅仁开的，他前几届都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解放前是中国著名的大资本家。她在里面做挡车工，她们很辛苦，工资也很低，多数挡车工都有静脉曲张，挡车女工多数身体都不好，因为她们在高温下工作，温度都高达 $40^{\circ}\text{C}\sim 41^{\circ}\text{C}$ 。现在这个厂已经关掉了，93 年下岗后厂就卖掉了，现在长寿路的“红子鸡”酒家就是她们当初的厂。

问：您是党员吗？

周：都不是。那时我对后来的政治有些看法。我喜欢看书，看历代王朝的书，看多了，觉得搞政治的下场不是很好，我以前是搞团工作的嘛，所以我决定还是下来学技术。

问：那您的几个子女情况怎么样？

周：我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大学刚毕业，东华大学的。她是学计算机的，她中考时化学英语都是满分。她当时考的是重点高中，进才中学。进才中学是台湾投资 3.5 亿造的，她就是进才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她本科毕业后拿了学士学位证书，她自学

了日语,英语六级也考出来了。我老婆刚下岗的时候就拿175元工资,那时我小女儿正好上高中,我那时白天工作,晚上还要打工,为了让她读好书,她们一学期学费要2400元,住的又是公寓,条件很好。我小女儿以前在学校里很好的,是团支书,学生会干事,做很多工作,很忙的,天天工作。现在在日本老板的信息公司工作,日本老板很小气的,日本老板和台湾老板都是出名的小气的。她是做程序设计的,他们有三个小组,她是一个组的小组长。我小外孙也很厉害的,才6岁,我小女儿教她学英语,她英语已经讲得蛮好了,在幼儿园里她的画一直被老师放在橱窗里。我们家现在都围着她转,重点培养她,正好我小女儿教她,等于半个家庭教师。大女儿原来在街道工厂工作,在厂里帮忙做纸盒的。后来工厂倒闭了就在家里,后来她就在路田卖卖生姜什么的。小孩虚岁已经6岁了,小孩上幼儿园很贵的,今年开学就用了500多,现在画图班、外语班那可都要钱啊,现在1个月也要300到400多元。我女婿工资又低,只有800多元一个月,自己吃饭加小孩上幼儿园差不多用完。我女儿每天卖葱什么的,一天十几块钱也就最多了。我老婆93年的时候下岗回来,工资也很低。

问:那您的几个弟弟和妹妹都住在哪里?

周:我弟弟的儿子结婚了,嫌房子小,就在外面买了房子,就买在沪太路。我妹妹也住在那里的,她是动迁过去的。

问:你们家庭氛围怎么样?

周:现在么,大家都住这里,女婿也住这里。我们家有个特点,就是容易满足,不要无休止地追求,知足常乐。

问:你们这里的义务劳动是怎样的?

周:是闸北区武装部组织一个为民服务,那时激励学雷锋,搞了11

年，专门为年纪大的或者老师等修修家用电器，我们那时就有志愿者了，我属于老志愿者了。人家有困难了总要帮人家解决啊，这个社区工作也是要搞的，尽自己的本分，不要做坏事，昨天晚上人家家里电全没了，点蜡烛过了一晚，我一直帮人家修修东西的。

问：您闲暇时间都干些什么？打牌打吗？

周：我这个人不喜欢打牌搓麻将什么的，我平时就喜欢修修电器，看看书。我很喜欢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古今中外的各种书，我每个星期都去街道图书馆借书。

问：你们周边基本上是外地人还是上海人多？

周：上海人都不在这儿的，这里几乎没有上海本土的人，只有前面弄堂有一家上海本土的。这里基本都是普通劳动人民，没什么特别高层次的人。前面有一家大学教授，他是宁波人，这里也出了一个苏北盐城的画家，其余没什么名人。不过我们这里的小孩读书都不错，复旦、同济、交大的都有，主要是由于家里贫困，想争取找个好的工作。

问：你们现在在家都讲上海话吗？还讲南京话吗？

周：不讲南京话了，我只有在遇到南京人时才讲南京话，我们家小孩在家，一定要讲上海话，要从小培养孩子的上海话和普通话。

问：你们这里的房子将来会拆迁吗？

周：一两年内可能要拆，现在按新的动迁法来拆迁，现在很多拆迁都很不合理，比如我们这里有一部分人家要拆迁，他们拆迁后会分到一套房子在郊区，但他们还要付10万元，我们这里是市中心，如果到了郊区，工作学习都不方便，你还要付10万元，而且还没有装修，你说这样合理吗？我们在这里至少还住

得可以,你要我们搬,至少给个合理价格吧。我这房子底是19个平方,上下共38平方,上面有个小阁楼嘛,按现在动迁法,如果我们家拆迁,按人头算,6个人,每人在6~8万元间,就算他给我50万,我在这里买一套70多平方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差不多50万,就等于我小女儿跟我们老夫妻一起住,我大女儿家怎么办?这些还是不算上装修费用的。

问:你们现在的劳保、医保都好吗?

周:医保有的,但对医保还是有蛮大的意见,我工作了41年,我看病今年用了700多元,用完了我自己还要付2000多元,再看病只报销20%。我如果现在生病,一年医保只有700多,其余自己承担。在毛主席的年代,我们的医药费应该都是全报销的,像我已经开了两刀,一个胃开刀,去了3/4,肠子开刀也去了7.8公分。我们工作了41年,应该享受全报销待遇,但现在都没有。

周大伯在采访过程中一直健谈,是乐呵呵的,家里人都很和睦和气,讲到他的过去,都是很自豪的,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很满足。尤其谈到大学毕业的女儿和聪明好学的外孙女时,更是一脸高兴。

采访人/沈燕 黄春桥

一个即将搬入新房的核心家庭

姓名:马建国

性别：男

年龄：51岁

籍贯：江苏盐城

文化程度：高中

职业：退休

婚姻状况：再婚

家庭成员：本人、妻子、儿子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20日

语言交流：普通话

马建国的房子有两层，上面一层是他自己用木头搭建的，每间房间大约有20平方米左右。由于房屋原本的高度是有限的，因此被隔成两层之后，给人的感觉很压抑。马建国和爱人住在下面，儿子住在上面。

马建国这一代可以说属于第二代移民，他的父母最先从苏北移民到上海，站稳脚跟之后在上海生下了马建国。虽然马建国的房子与周围的邻居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在访谈时他自始至终流露出对所在社区的不认同和自身的优越感。事实上，他家已经买好了新房子，不日就将搬迁，可以说他们马上就要摆脱董家湾社区里的群体，开始新的生活，这与董家湾大部分居民抱怨社区环境但又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

问：跟我们说说您的经历好吗？

马：我51岁了。生在上海。高中毕业后第一份职业是在中心服务站做收款员，这是一个街道办的站。1974年进单位，做到1979年，而后开始做真正的财务，从1979年做到1987年，一

直做财务；1987至1990年做了3年的工人，让我当了3年工人。1990年以后做财务，一直做到2002年退休。退休的时候50岁，主要是因为眼睛不好。规定的退休年龄是60岁。

问：您爱人年龄多大？

马：50，她的出生地也在上海，老家是江苏盐城。

问：您爱人做什么工作的？

马：在安徽种地，上山下乡。当时她不想去。1970年去的，一直做到1979年。她1979年回来，我们1980年结婚。当时已经是大龄了。回来之后，就在我的单位。我会做服装，她不会做，我教她，就教出感情了。

问：她的工作是怎样情况？

马：我把她调到另外一个单位，我是会计，我认识人，把她调到新兴衬衫厂。第二个单位，也是一个街道的服务站，做车工，然后调到距光厂，做车间主任。一调过去就做车间主任，她有本事，她会上料。做了两年，时间不长，2002年5月29日退休的。

问：您是党员吗？

马：我家都不是党员。

问：你们平时都说上海话吗？

马：说方言，都是苏北的嘛。会讲上海话，这个地方是贫民区，小市民很严重的。在这片说上海话会被人笑话。

问：您儿子现在的工作情况如何？

马：他是复旦大学2000年毕业的，换了好几份工作，原先在私人开的票务中心也做过。自己找的，他有个同学，一个圈子里的。现在在华云集团。

问：您觉得您儿子现在的经济状况是属于上层、中上层还是中层？

马：经济效益啊？按照我们来说，刚开始起步，他现在的月薪有8000。

问：您父母是什么时候移民到上海来的？

马：我是1952年生的，我爸1932年到上海拉黄包车，一直到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炼钢铁去了。我母亲跟父亲一个地方来的，刚来没工作。1958年大跃进，在弹簧厂做。

这套房子是我爸买的，当时不要钱，叫国资。解放前买的，当时比较困难。

问：你们几个兄弟姊妹？

马：三男一女。结婚的时候就分家了。原来一家六口人，姐姐结婚结得早，20岁就结婚了，1968年结婚的。大哥当兵回来转业，现在还在做，良工门厂。1979年5月1日结的婚，那时28岁。他的房子是分的，卖掉了，买了我姐姐的房子。

我姐姐是搞人事工作的，她的两个女儿、女婿都是党员，我姐夫不是党员，她两个女儿情况好一点，当兵的，在市公安局。

我弟弟还有单位分的房子，单位在上海，是顶替的。

问：你们现在买新房子了吗？

马：我们已经买好了，在宝山区，他们（邻居）不知道，不告诉他们，他们都是小市民。

买房子后我们打算住一块，媳妇、儿子。我老伴儿买的，她一看40多万买120平米，便宜啊，2002年买的。

问：你们对居住的小区满意吗？

马：不满意，你们不要晚上来，晚上不安全，吸毒、注射、卖淫都有。

问：这些人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吗？

马：习惯了。这个地方一开始就是这样，有好几年了。讲句良心

话,在毛泽东时候比较好点。现在条件好了,但社会治安差。这几年开始的,因为贩毒,这里打击力度不够。

问:您以后对生活有什么想法,理想状态您认为是什么样的?

马:带着个小孩子,安度晚年。

问:以后你们搬走了,会怀念周围的邻居吗?

马:没什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采访人/孙 哲 曹佳鸣

棚户区里的做生意人家

姓名:古天宇

性别:男

年龄:50岁

籍贯:江苏

文化程度:大专

职业:做生意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本人一家三口,父亲、母亲、祖父、祖母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21日

语言交流:上海话为主,偶尔说普通话。

古先生家在弄堂两侧都有房子,楼下西面的外间是厨房,楼下东面是保姆的房间。我们顺着东面自搭的楼梯走上去,古先生的房间在厨房的上面。房间10多个平方左右,虽然不大,但房间内

部布置得比较考究。第一眼的感觉很难把这房间与棚户区联系起来。房间内有一张双人床，一个五斗橱，一张用来放东西的单人床（也做沙发用），一张饭桌几把椅子，一个装饰柜和一台 29 寸大彩电。房间墙壁上、装饰橱里放满了装饰品，显得这里的主人是有有点家底的。桌上三盆菜，一盆是烤麸，一盘红烧肉炖笋，还有个绿叶菜。

11 月 21 日上午我们到达董家湾，找到这户人家时，男主人古先生不在家。于是我们先去采访别的人家。中午再到这里，古先生还是没有回来，保姆和一个中年妇女在厨房准备午饭（后来得知那个中年妇女是古先生的生意合伙人）。我们去交通路吃了午饭，又逛了一会，下午 1 点多再次返回这里，终于遇到了古先生，他在厨房和生意合伙人谈着一些事情。我们上前与他打了招呼，他先对自己今天失约表示抱歉（上次我与他约好今天上午要做访谈），迅速与合伙人交代了几句后把我们领进屋子。古先生让我们坐在桌子一边的单人床上，他自己坐在桌子另一侧的椅子上。就这样，我们的访谈开始了。

古：你不要看我这里东一间西一间的，5 间房子，300 元一间，一共 1500 元，人家排队要借房子。我们现在只出租了一间房子，250 元，借给人家打工的，再雇了个保姆，500 元每个月。

问：那您的条件还是蛮不错的。

古：所以我说，你来这里采访我好像不是很合适。我以前做过生意，开过“叉头”（出租车），我们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可以的。现在住这里主要是我老婆和孩子，吵着要搬家，但是两个老人（指爷爷奶奶）生癌，不方便。反正我现在生活并不是很困难。我娶的是个外来妹，她在控江机场做会计。

问：就是刚才那个人？（指先前在楼下厨房的妇女）

古：不是刚才那人，她是和我一起摆摊头做生意的。她儿子上海大学今年刚毕业，本来在虹桥开发区做程序的，后来考公务员，被分配到街道里去了。500多个人招25个居然让他考进去了，碰到××（脏话）了。她儿子在上海大学学工程预算的，文不对题呀。我和你交流可以，但这里的情况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还不算太那个（差）。你要了解这里，应该去了解那些比较底层的，那日子才叫苦。像我这人，我自己觉得，没什么采访价值，我一个月光房子钱就有4000块。我现在主要是吃以前的老本。

问：您以前做过哪些工作呢？

答：我以前在工厂做的，我并不是很底层的那种人。我以前开叉头（出租车）开了5年，车是和我弟弟一起买的。挂的是强生公司的牌，下靠的。像人家开黑车什么的，这种我是不做的。我这人呢，说老实话，胆小，不敢做这种违法生意啦！我家里人也不同意我这么做。也不是怪我厂里不好，厂里亏得效益不好，效益好我倒不走了。效益不好人反倒有种本能要去做，对吧？效益不好，我就在门口摆摊头。以前摆摊头生意好做，一块钱的东西卖十几块，现在生意难做呀。我现在就是吃以前的，我又不好出去做，有两个老的生病。

问：您现在做的是什工作呢？有什么收入？

古：我摆摊头，我有营业执照的（说着起身拿出一个塑料袋，拿出营业执照给我们看）。我卖的是儿童用品，摊头就摆在外面路上。这里摆摊头蛮滑稽的，从不许你摆到允许你摆，然后又到不许你摆又允许你摆，总归有过程的啦。我最早是卖旧货的，就是家里这种淘汰下来的东西，后来集中卖童车，人家淘汰下

来的，也是旧货么。我要卖的东西就放在后面的仓库里面。

问：请介绍一下您家人的基本情况好吗？您家是移民到上海的还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古：爷爷奶奶，以前是胶化厂的。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苏北人，乡下不好，人家说起来还是上海好，就逃荒到上海。爷爷来上海是1915年，奶奶是1919年过来的。别人给他们介绍的工作。我爸到上海时8岁，他是一个人。他们以前很苦的，我爷爷奶奶以前6个孩子。我爸养了两个儿子，每人又有两个小孩，我弟弟条件比我好，他在宝钢做事。平常跟他还是交往的。说到感情呢，他和爷爷奶奶没我和爷爷奶奶感情深，因为我是他们从小养大的。

问：您爷爷奶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古：哎，爷爷有病，90多岁了，一直要去看病。有癌症，这毛病看了有几千块钱了。你看，（起身从单人床的墙边拿出一个大塑料袋，里面全是病历卡，医院的单子，药方，发票之类的存单，翻开病历卡和发票给我们看），我也不知道有几个月了，都是看毛病的单子。（继续翻）这是××单（未记下），其他的就不要去管它了。9个多月了，就没停过。我今天又到医院去了，没停过。我家有保姆，但是保姆一个人弄不来的，我不好出去的，万一保姆捣糨糊呢。你不知道的呀，保姆也不是都懂的。昨天我去中科院，帮老人咨询，198块买的药，年纪大生癌症，前列腺癌。两个老人一个人身体还好，一个人不好的；一个人有劳保，一个没有的。因为我爷爷的退休金什么的以前都是我管，所以我弟弟要贴钱，但是我不要。他们也贴了一部分医药费给我，但我这人有时候马大哈，混在一起用掉也不算。呵呵。现在我要开始回报了，以前我赚进现在要付出了。（扎好

塑料袋)

问：你们亲戚方面平时会帮帮忙吗？

古：嗯，亲戚帮忙这个问题么，我觉得现在这个亲情没以前那么深了。人家看病不大叫我们的，同样我们也不大叫他们。他们来看看呢最多买点东西，实际上事情是我们做的。亲戚里，有时候过年什么的他们也来，但我们家地方那么小，叫人家怎么吃饭烧饭啊？索性到饭店里吃一顿，大家开开心心算了，省得自己烧的不好吃，又忙到死，没意思的。年纪大的人就和我们不一样，年轻那时候到礼拜天、过年了才买点肉买点鱼，平时不吃的，我们就没这种事的！我们想吃就吃。当然，总归说现在社会进步了，现在很多人说，现在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我觉得这种人是无能啦。他们自己没这个能力。像我，每天早上6点起来，一直忙忙碌碌到晚上，我就靠自己劳动付出(赚钱)，我以前是很忙的呀，我现在才开始空闲一些。以前公共汽车很挤、没位子，现在路上叉头(出租车)有的是，你嫌没位子你去坐叉头。以前说自己家里怎么怎么小，好像很光荣的；现在没人说了呀，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是你没这个能力呀。家里小，你有能力就自己去解决呀。当然这种解决也有通过不同的渠道。

问：您爷爷奶奶刚来上海的时候住房怎么解决的呢？

古：听人家说，好像这里的房子……，这个地方以前是最苦的地方，地痞流氓比较多。以前你交两斗米还是两石米，我也搞不清楚，就是说，交这点粮食，这块土地就给你了。我爷爷刚来的时候是两个棚棚，我们就撑几根柱子，所以这里两边的房子不应该算我们的(指两边搭起的“违章建筑”)。以前地道战，这里都是穷人，这种房子(指自己家附近两侧搭起的二层房

子)都是违章建筑。现在人家不动,我们也不好动,我们如果动的话,万一人家的塌了,我们要负责的。有时候这种房子坍塌和我们不搭界的,因为是老化坍塌,但明明是老化坍塌,可人家说你是造房子造成的,那你就尴尬了。但房子老化的话也会稍微修修补补的,我们总归希望政府动迁,但这动迁的速度太慢,我们闸北区是慢得不要再慢了。这地方实在太差,所以我女儿吵了要搬,都已经买了房子了。

问:你们怎么会想到买房子的?您买的两幢房子是哪里的房子啊?

古:就是这里过去,后面的高层 97 平方。我那时候买得早,只有 2000 块一个平方,便宜呀那时候。现在房价不对了,翻跟头了,3000 涨到 6000 也有的。当时,我是看这房子差才买的,另外一方面我同学同事那时候都买房子了,他们让我去他们家里看看,我看了后心痒。我想,你们打工都能买那么好的房子了,我有什么不可以啦?本来我老婆单位那里要买房子的,后来我去看,那里房子不好,正好这里要卖房子,我想就买这里的房子了。后来我和我老婆吵,吵吵吵,吵到后来,半年了,没卖掉!索性不吵了,涨价了呀!那么等于一间房子我要贷款,正好,总归有点贷款。房子两房一厅,房间小,厅大,一间房子 13 点几平方,另一间 11 平方。买的时候花了 34 万,那时候便宜,我也不知道,我这人糊里糊涂的。以前和人家一起买××券,我糊里糊涂的,想这东西那么贵的,后来中午吃饭的时候逃出去买的,跟在人家后面,人家买 10 张,我买 5 张,莫名其妙赚了 5 万,我也不知道怎么赚的。尽管我是住在这种地方(你去看看我们这里后面,贩毒什么都有),但不是我不想搬,主要两个老人。我爷爷奶奶,你也知道的,老年人离开

土地,死的快,我也没办法。年纪大的人了,不要说搬家了,有时候睡觉换了枕头也不舒服的。我在这里给他们养养老。老年人观点和我们也不一样。我们的观点么,我感觉先进一点。像我这些钱,都是勤俭节约挣来的。

问:搬了以后这里房子怎么处理?

古:看情况,那里借得(出租价格)高一点,这里借得(出租价格)便宜一点,像别的地方借得还要高。

问:搬家以后,您爸爸妈妈还和你们住一起吗?您爷爷奶奶住哪里?

古:不是不是,我爸爸妈妈和我们分开来。我弟弟,他不是宝钢么,宝钢分了间房子,这里又买了间房子。两个老的应该会去跟我弟弟住在一起。爷爷奶奶和我们一幢大楼的。

问:对了,您爸爸妈妈现在住哪里?

古:我爸妈就住这里后面(指弄堂对侧的房子)。我们一家等于是五间房。保姆和爷爷奶奶住一间,他们是一定要住在一起的,万一晚上老人有什么事的话……下面烧饭用的,也算一间。这房子实际上绝对是××(脏话)的。再说,这里周边环境也不好,所以我孩子、老婆要搬,我也蛮认同的。人家说环境重要,小时候她住外婆家,是公房,公房环境还比较好。这里么……我老婆原来是工厂里的,待在这里么……我跟人家说我们就等这里拆了,这房子确实是不好呀。动迁等了那么多年了,卢湾徐汇静安就都不谈了,就是闵行也比这里要好,你去看看火车站南广场北广场完全两个世界。

问:那么现在一幢房子贷款,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古:1000多块,现在房子在涨,房租在跌,因为现在很多人在买房投资,所以这房子买的越多空房子就越多,要借的人还是10

个人，但房子有 100 套了。所以说这个有风险的。风险也不去谈它了，反正就是混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了。我们那时候，1980 年、1983 年，我们 18 个人只有一个人进大学。

问：您家里以前有什么上山下乡的事情吗？

古：上山下乡，一样也没的。上山下乡是六几年呀，一片红的时候，这时候我爸已经……我爸现在已经 66 岁了，怎么挨得上，上山下乡现在都是 50 岁的。

问：您是什么学历？

古：我是大专文凭。我那时单位里读了四年，所以说也算学了点本事。但是时代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读的，现在就不谈了。

问：您对您的女儿有什么期待呢？

古：经济上的问题，现在没什么，就等小孩长大。最近刚帮她付掉学校的钱，小孩子预备班一学期要 3500 块，民办的。现在总归是为了小孩。她学校在真北路宝钢路，青云中学。我们经常送她的，送她去接她回来。我不好天天送她。我现在整天忙忙碌碌，我要是真的静下来的话么……家里有老人啊，他们也年纪大了。还有就是现在的钱，这里要开销，生病了还要去看。我就等这房子拆掉，房子拆了就有钱了。我动迁的愿望比人家都迫切，但动迁的政策太慢，我还听说这里有人到北京去上访，动迁的矛盾很深的。我们后面人家 45000 一个人，一共 13 万，你说这点钱你在徐汇买一室也买不到的，所以现在政府要造什么廉价房，其实廉价房也跟不上。

问：电脑家里有吗？

古：我们到现在还没买，因为什么道理呢？主要怕小孩子趁大人

不在会玩游戏,小孩子喜欢玩,生怕她老是打游戏。还有我考虑到就是对眼睛不好,打电脑伤眼睛。所以你看,我家里,别的东西没什么,这个电视机买得算是很好的,保护眼睛的,2300多块,考虑到买了还保护小孩眼睛。但是你知道事与愿违,眼睛想让它好不见得好。我们父母两个都没近视,小孩子会有近视眼的。小孩子戴眼镜很不方便的呀,下雨天眼镜上都是水,要擦的,去看眼科买眼药,小乐敦我们一直买的,这些钱都是浪费掉的。你看,就是看电视看坏掉的。所以我电脑一直不敢买。

周四我去昆明玩,火车票也买好了。这次要去长江三峡,你说这钱有着不用好像……再说我们现在出租房子平时就有4 000块。

采访人/刘程沙力成

煤炉子是这边外地人或者 家境不好的人烧的

姓名:程远山

性别:女

年龄:48岁

籍贯:江苏盐城

文化程度:高中

职业:下岗

婚姻状况:再婚

家庭成员：本人、丈夫和女儿

居住时长：11年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

语言交流：有时是普通话，有时是上海话。

程远山的家总共一间房，后面是间小厨房，房间比较挤，上面有一小阁楼。进门左手是一张床，床边有一小桌子，上面摆放着电脑。房间中间有一张小的钢丝床，床边有一些石膏塑像，对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尊观音菩萨像。进门处是一小方桌，吃饭所用，上面点了一支檀香，飘着悠悠的香气，观音菩萨像那一直放着“药师光菩萨曲”。房间的墙壁铺了墙纸，厨房里贴了瓷砖，家中用的是液化气。阁楼很小，仅有一张床。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程远山还在带着邻居家一个约摸两岁的小女孩。

问：您老家是哪儿的？怎么到这儿来的？

程：房子是爸妈的，爸妈是从江苏淮安过来的。爸是盐城人，到上海来打工，以前是乘船来的。这里都是盐城、高临等地来的。这里的房子原是耐火材料厂的厂房，后来做家属的房子，原来这些家属住在虹口区的花园路，再搬到此地来，现在就等着拆迁。现在房子住的是我们一家三口，爸妈被弟弟接去一起住。我原来住在浦东，是再婚后搬过来的。女儿在这里读书比较方便。

问：您有哪些家人，他们现今生活状况如何？

程：爸妈现在都退休了，爸73岁，妈71岁。爸爸原来在杨浦区矽钢片厂做的，妈妈原来在南京路六一商店，现在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的缝纫组。我们一共三个兄弟姐妹，一个弟弟、一个妹

妹。弟弟曾是风云二号卫星的工程师,弟媳在宝钢做的。妹妹住在浦东,现已下岗。

问:您家里的生活状况怎样?

程:我原来是托儿所老师,后来托儿所倒闭了,下岗回家,现在靠帮别人带孩子、托送孩子来赚钱养家。原来托儿所在浦东,家也在浦东玉田路,由于前夫生活作风不好,精神也有问题,后来离婚了。大概是在1992年底的时候离婚的,94年底搬到这里来的。现在就等女儿毕业工作了,生活就好了。现在的丈夫也是退休在家,平常就靠帮别人运运液化气之类的赚点钱。一瓶液化气的运送大概可以赚到5块钱。女儿是83年9月生的,现在学的专业是环境艺术设计,在东华大学读专科,也想考本科,现在学习比较忙,打算过四级(指英语CET4),现在女儿一年的学费就是12000块,所以自己和丈夫都在做事,为了女儿。现在女儿的就业有了落实,在一个玩得很好的小姐妹的儿子公司里搞广告设计。她(小姐妹)是信佛的,所以觉得多做一点善事菩萨会保佑的。

问:家庭一个月收入有多少?

程:我带的小孩是邻居的,还有接送另一个孩子。带孩子一个月500元,接送150元,还有一个200元,一共850元,再加上下岗里弄发的协保,一个月180元。老公是在玉制品厂退休的,现在换液化气,这里的人都烧液化气,煤炉子是外地人或者家境不好的人烧的。一瓶5块钱,也算打工吧。

问:说说您的人生经历吧。

程:我今年48岁。我以前在沪太路小学,后来中学在闸北十中,中学时做过红卫兵。上山下乡时去崇明农场8年,但只种了8个月的地,因为身体不太好,所以调离到后勤组,不用吃苦了。

然后又到联队小工厂做中药厂药瓶的盖子，再到长虹汽车仪表厂去做汽车仪表。然后妈妈退休了就顶替妈妈去了缝纫组，回到了上海。84年底通过认识的人到了托儿所工作。回到上海办事处是82年年初了。我中学毕业后去崇明时，妹妹在读高二。妹妹现在在浦东证券大厦做清洁工。工资五六百元。弟弟在“文革”后参加了恢复的高考，后来考到了交大，在物理研究所专门搞卫星。就弟弟一个人读到了大学。弟弟的房子是弟媳宝钢分的，弟弟单位也分房子了，后来又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现在那两套房子出租了。妹妹的房子拆迁，分房子在浦东，她丈夫在单位当警察(保安)，1000多元钱的工资，生活也不是很好，混混。我觉得自己从小没大吃过苦。

问：是否介意谈一下您的婚姻生活？

程：我82年结婚，女儿10岁时离婚。以前老公在铁路里做杂工，他病退后回上海的。现在女儿和她爸不来往。爸爸也不喜欢她，所以就不来往。现任丈夫是95年结婚的，女儿和他关系什么的都蛮好。现在老公以前是做混凝土的，2000年底退休。现在浦东的房子空在那里，一开始我和现在丈夫的前妻的关系不好，和她儿子的关系也不好。他儿子不尊重我，我觉得我现在的丈夫的儿子要是尊重他的话，也就会尊重我！他（现在丈夫）儿子想要房子结婚，我没同意，后来他和他前妻出钱买了一套房子给儿子，现在儿子也不学好，也离婚了。

问：阁楼是原先就有的吗？

程：现在房子的阁楼是自己小时候加的，以前兄弟姐妹都住在阁楼上。这房子以前住7口人，5个住阁楼，2个住下面。现在是和女儿住下面，丈夫住阁楼上。住阁楼很苦的，冬天还好，夏天很热，下面空调的风吹不上去，热！主要是房子太

小了。

问：将来若分房有何打算？

程：现在如给分房子要去宝山。希望在市区。女儿快毕业了，以后工作最好在市区，就是说以后找朋友，如果在宝山区基本上找了宝山的了。房子住在市区的话比较方便，什么都有买。现在在这里虽然谈不上很好，但出去就有市场，就有公交车站、轻轨，交通是很方便的。现在这个房子下雨天就会漏雨，墙壁上石灰都脱落了，现在我们就用墙纸把它盖起来，不然看不得。但现在钱少买不起房子，住得远又觉得对女儿工作不便，还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医院、超市等，这里的生活还是比较方便。

问：对现在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

程：现在两个人加起来有2千多，供女儿上学也正好够了。女儿从中专考到大专，感觉也蛮好了。对女儿的现状比较满意。我对女儿很负责，现在为她吃苦，以后再享福。想得蛮开的。

采访人/贝 晋 董晓蕾

供养女儿读大学的工薪家庭

姓名：朱旺生

性别：男

年龄：43岁

籍贯：江苏扬州

文化程度：高中

职业：工人

婚姻状况：已婚

家庭成员：本人、妻子、女儿、父亲、母亲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中，2003年11月22日

语言交流：普通话

朱旺生的住房为两层，上下各1间房子，每间房子的大小约为30平米，厨房在房屋外，是自己搭建的。朱父和朱母住在下面的房子，朱旺生和妻子、女儿住在上面的房子。

问：老婆婆您今年多大了？

母亲：我今年67岁了。我老家南通，49年的时候家里穷，家里送过来的，当时有亲戚在上海海关上班，就过来住了。来上海时劳动局介绍我在地质厂工作，后来就一直做下去了，结婚生子就没有变过。

问：您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朱：我现在一个叫龙马城的公司里工作，它原先不叫这个名字的，以前叫装卸机械厂。现在在车间里面做个小组长，小组长比普通人多拿100多块钱吧，不过人际关系很复杂，我不是很想做的。在公司干了20年。我这个人没什么特别大的文化，习惯了，生长在这个地方，习惯了这个工作吧。

问：您每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朱：我们加班比较多，平时不加班的话1500块。去年我加班，最厉害的一个月，我将近拿了5000块吧。工作环境可以，很满足，加班多，领导好。没有白干的，只要你做了，比如说你没来，我帮你把活干了，你的钱就我拿。你干了钱就给你，钱是由领导上面拨下来的，加班一个月起码要加四天，整个状况就

是蛮好的，我自己也比较满意。

问：您工作地点离这儿远吗，平时都怎么去的？

朱：不远，平时都骑自行车，骑车大概半小时吧，不过我们厂大概要搬了，会搬得比较远。到时候有班车接送的。

问：您是党员吗？

朱：不是。

问：您跟您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朱：我们是同学，都是江苏扬州人。我们情况基本差不多，她的父母也只有她一个孩子。我们上学的时候住得很近的。她初中毕业，那时“文化大革命”。大概十八九岁她就开始工作了。她在上海铁路通讯工厂。我们同龄，我比她大几个月吧。

她现在买断了，买断了以后她就走了。我老婆刚好在开始买断之前，另外一个车间缺人，她就接过去。一直在搞线圈，只是换到另外一个车间里面。

问：“文化大革命”，你们都下乡了是吧。

朱：后来77届就开始不用下乡了，我80届。我大姐下乡了，二姐是在工矿里。

问：您觉得现在生活中您遇到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啊？

朱：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吧。拿这么一点钱，再加上两个老的，看病什么的，像我妈这种情况，有糖尿病……另外现在买房肯定是没有能力的，二手房也买不到，二手房你买多大？一室一厅，像老的我们不能扔下，把你养大了，我们自己去住一室一厅，两个老的怎么办？

问：你们家庭的钱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朱：我们这个钱主要是供女儿上学，我们现在给她请家教，把钱花下去以后呢，不懂的有老师问，我们两人不懂。请了好几门家

教，费用还是很大的。我女儿，你们没看到过啊。高一，考试的时候考了480分，区重点，我对她还是比较满意的。

问：您觉得现在居住的小区环境怎么样？

朱：很吵，你要是进来就会变坏的。

问：你们没想过换一个环境吗？

朱：谁不想住好的地方，谁不想条件好，你要有这个能力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国家有困难，我们这些人吃苦吃惯了。谁不想出去住在好的地方，改善一下，这个地方什么人都有，吸毒的、嫖娼的、偷东西的，这里可以反映出—一个地方整个问题。

问：那你们以后关于住房的打算是什么呢？

朱：等国家动迁改善吧。不是很清楚，我们也不希望谈，钱方面肯定谈不拢的，给我们一个人7万块钱，四个人28万，30万买房？我现在要求不是很高，能够买二手房的钱，哪怕我再出一点公积金，够了我就得了，我不要什么豪华的房子，我买不起，哪怕给我二手房。

我们没有想到买房，不会买，现在房价这么高，怎么买？我们现在不动了，以前想买房，我和我爱人说了，她不让我买，她害怕背债，背债以后人很不痛快，我们是农民出身，不像现在的人，没有这个经历，认为背债没关系。我们以前很本分的，不能今天吃了，明天没有了，要算好了的。我听我妈说，今天吃多少，明天吃多少，不能超过计划，算着吃。

问：给您多少钱您就走了？

朱：谈钱的问题，首先是父母安定，给我们—间房让父母先安定下来，随后我们小辈住旧点的、小点的没关系，我们无所谓，新房住不起，肯定是住不起，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动迁的房子太偏了肯定不行，离工作单位太远了。夫妻两个人，还要考虑到子女读书的问题，小孩来回的路上，安全都是隐患。如果读大学了就没问题了。

问：你们家里人一起过吗？

朱：我们和母亲都是自己吃自己的。我妈她在家时间比较长。这样菜可以口味不一样，她烧她的菜，我们烧我们的菜。和姐妹们会经常聚聚，有时谈谈，有时我到她们家去。她们住得蛮远的。

采访人/孙 哲 曹佳鸣

开小杂货店的一大家子

姓名：张强(丈夫)、樊燕(妻子)、小女儿

年龄：丈夫 73 岁、妻子 69 岁、小女儿 42 岁

籍贯：江苏靖江、江苏鉴湖

文化程度：夫妻文盲、小女儿初中

职业：夫妻退休、小女儿下岗

婚姻状况：均为已婚

家庭成员：本人、妻子，大女儿一家，大儿子一家，小女儿一家

居住时长：50 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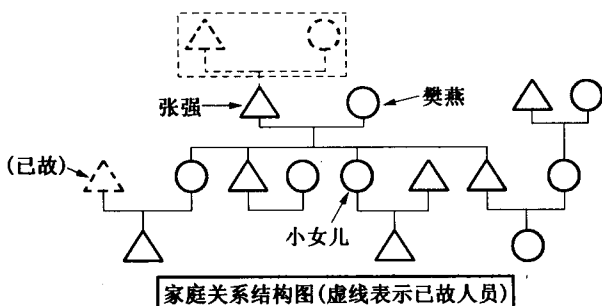
采访地点和时间：家门前的杂货店与客厅之间的过道上，2003 年
11 月 19 日、11 月 26 日

语言交流：家庭成员之间是江苏话、普通话；接受采访时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来上海 50 多年了，一家老小 12 口，原来都住在一起，居住面积大概 70 平方米，后来住不下，小儿子在外买了房子。老夫妻早年到上海后，开了一家小店，公私合营时并进了商场，夫妻二人就在商场站柜台。在上山下乡中，大女儿下放到了郊区的星火农场，并结了婚与丈夫一起在星火农场种地。后来樊燕病退，由大女儿回来顶替。不久，大女婿也调了回来。大女婿死于七八年前，大女儿也已病退 10 多年了，他们有个儿子在复读高三；小儿子曾去过一次新加坡做劳务，积攒了点钱买了房子。目前，夫妻二老已退休，子女则都下岗，一家主要靠开一家小店和两个老人的退休金过活。

第一次访谈：有个小的杂货店（约 2.5×1.3 平方米），访谈是在这里（实际上它兼客厅、仓库、餐厅等功能）进行的。杂货店前的路就是董家湾路，客厅没开灯，光线有点昏暗，门旁边有一台冰柜和一个冰箱，对面有一张八仙桌，上面放着一台 21 寸的彩电和一个锅。桌子旁边有个橱柜，放置着碗筷等。门右边一个架子有 2 米多高，上面摆满了各种货物。此外就是一把老式的竹躺椅和七张方凳。杂货店虽然很小，但借着白天的日光还是很亮的，卖的是各种饮料、方便面、零食。樊燕老人一直坐在杂货店中，边与我们闲聊边照看商店；老伴张强时而坐在客厅的躺椅上时而也走到门面的街边，在我们闲聊的过程中他会不时地插入说几句；小女儿在家中做家务，问到一些家里人的情况时她也会过来一起聊聊。

第二次访谈：我们到张家时，只有张强老人在家，我们就和他聊了起来，对第一次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我们作进一步了解。由于语言障碍，聊起来很吃力，我们经常要重复一遍他说的话，问一下是那样吗。樊燕老人回来后，她坐到旁边一张方凳上加入我们的聊天，但这一次她基本上是听我们聊，自己很少说话。



问：你们是上海本地人吗？

樊：不是的。老家是江苏苏北的，来上海有好多年了，50年了。

问：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来上海呢？

樊：来上海做事情。原来在江苏乡下种地。他家爸爸离家做生意，然后在上海买了房子，我们也就来做生意了。

问：一来上海就住在这吗？

樊：一来就住在这的。当时是茅草房子，上面盖点瓦，都是买的。后来重新盖的这房子，有20几年了，当时花了两千多块钱吧！那时东西便宜呀，地皮是自己的，不用去买，木材便宜，要不了多少钱，现在就不一样了。50多年前来这就一直住在这，没有动过。

问：奶奶，你们全家共有几口人呀？

樊：现在11个人。（注：张家应该有12个人，当访问员问这个问题时，她掐了指数算了一下，此处可能是算错。）儿子，媳妇，女儿，外孙子什么的，全部都住在这儿。三代人都住在这儿。

问：您有几个儿子呀？

樊：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是老二，一个是老四。都住在这边，这个通道后头都是我们家的。

问：那女婿住在哪儿呢？

张：女婿住在女婿家。我们家大女婿没有了。小女婿住在哪，那个我们不管。

问：那你们的孙子呢？

樊：嗯，一个孙女，两个外孙。

问：孙女是小儿子生的？

小女儿：小的生的，我弟弟生的女儿。外孙子是我姐姐生的，我生的是老二（第二个外孙）。

问：奶奶能谈一下您的子女的工作情况吧？

樊：工作呀，统统下岗，在家里。大女儿48岁，毕业后，先去星火农场工作了8年，回来了，到定西商场工作。星火农场，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晓得。她当时读书读到中学。现在可以读到大学、高中，那时读不起呀！毕业后就分配到了农场。后来我病退，就被顶替上来了。她当时去农场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大女婿是上海人，崇明的。他也是在星火农场的。当时在农场工作，住在农场里。后来姑娘顶替我上来了，到我的商店做。女婿也一起挂职调上来。上来了四十六七年了。他根据女方挂钩上来的，也是商店部门。他们是大集体。大女儿现在在家看店、做饭。要讨饭吃呀，没工资，下岗了。大儿子45岁，也下岗了，先前在杨浦造酒厂，没考上技术工人，做了两年多，后来造酒厂效益不好，就来店里帮帮忙，现在也没有工作，等于一家人全部下岗在家。就靠这个店吃饭了。

问：那小女儿呢？

小女儿：就是我呀。我今年42岁，在中兴街道中兴市政队工作的，做马路工。就是“摆巩石的”，马路上挖沟然后把自来水管子放进去。马路上挖沟，盖下水道的。我丈夫也下岗了。原

来他是跟我一个单位的，我们在单位里认识的。他不是上海人，是江苏鉴湖人。

问：那小儿子的情况呢？

樊：最小的儿子 35 岁，现在在家里，就开这个店，混在这里。初中毕业，下岗了在家开店，他是店主。下岗前他在中华造纸厂工作过。

问：奶奶，你们在江苏有没有读过书呢？

樊：没上过学，老早供不起子女上学。

问：您（转向张爷爷）在江苏读过书吗？

张：读了三年书，三年就是比不认识字稍微好点儿。

问：现在白天怎么都见不到您的两个儿子和小孩呢，是不是都出去了？

樊：儿子出去玩，去外面进货，没事情呀！小孩上学，所以也见不到。四岁的小孙女没上幼儿园。

问：那上学的小孩呢？

小女儿：我儿子上学，初三。大外甥也在上学，也就是我姐姐的儿子。我小孩 15 岁了，在闸北八中。姐姐的儿子也在读书。20 岁了，本来毕业了，成绩不好。考大学没考上，再读一年，明年考。

问：您是哪一年下岗的呢？

小女儿：1992 年。

问：奶奶，你们现在开店的生意怎样呢？

樊：现在到处都是店，也没生意的。平时少买点菜。还能怎么办呢，该吃 7 块钱的吃 5 块，该吃 5 块钱的吃 2 块，对吧，买点青菜一家吃。

小女儿：全是下岗没有工作的，没有钱拿的。

问：现在小孩读书，那小孩读书的钱从哪来呢？

樊：这个里弄有补助的呀！从里弄能拿 290 的补助。我是低保。

（过去拿了一样东西又过来了）我属于低保，他们属于下岗。

我是贴息保，到退休了拿退休工资。他们全下岗，也有就是拿得少，我是一分没有，到退休了拿退休工资。

问：你们居委会里有管劳动保障的吗？

小女儿：有的。现在劳动保障部是不管下岗的。下岗了就没有保障了，有保障就不会下岗了。现在下岗了就等着拿低保，然后等到退休拿退休工资。

问：奶奶，你们早上几时开门？

樊：早上 5 时就开了，晚上 12 点钟关门。一直开，没生意呀！睡得很晚了。老头子开门，我打烊。

问：那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平时都回来吃饭吗？

樊：回来吃饭的。中午要回来吃饭，晚饭也回来吃。

问：子女在家吃饭要交给你们钱吗？

樊：他们哪里有钱交呀，有钱才交，没钱不交。有些钱由老头子的低保工资抵消掉了。没下岗之前交的。

问：如果他们要钱急用，会不会找你们借一下呢？

樊：这个不好说。需要总还是要给他们的，现在店里哪有钱，店里连本带利才 200 多块钱。当时开这个店，办营业执照要下岗证，小儿子的下岗证交税要交 400 多块钱。营业税 300 块，地皮税 100 块钱。

问：爷爷，当时您父亲过来上海时具体是做什么的？

张：我父亲开店，我们过来时就在这个地方开店了。

问：您是哪儿人？

张：江苏靖江的。

问：您现在这个房子有多大呢？

张：房子平面30几(平方)。楼上楼下70几个平方。楼上住大儿子。小儿子在外面买了房子，在桃浦新村，他们结婚时就过去了。

问：平常他们过来吗？

张：来啊，每天都来。来吃饭嘛！我们供应他们饭(老人苦笑着说)。养儿子还得养一辈子，虽然他们成了家还是要靠我。来这边吃饭又不贴钱，他们都下岗啦！

问：他们买房子的钱从哪来的呢？

张：买房子的钱是老早他们出国在新加坡赚的，1994年去的。他们去新加坡做工做了两年多。回来就买了房子，买了两年了。那房子一百多个平方，住三个人还有他女的父母。媳妇是上海人。媳妇的父母在厂里做工。现在两个都退休了。

问：你们来上海以后，这房子修建了两次，是吧？

张：修建了两次。第一次早了，六几年翻建的。第二次是1989年。翻建时，钱是花得不多，木工是自己做的。门啊，窗啊都是自己弄的，这些都不用花钱。当时，材料是紧张的，柴火还要计划的，一个人只有几斤。花了两三千块。那时候什么都便宜，钞票值钱。木工、泥水浆工只有两块多钱一天。

问：现在住在这边的除了你和老伴还有谁？

张：大儿子，还有两个姑娘、女婿、两个外孙。当时，从江苏过来时，我们一家都过来。我先过来，然后女的也过来。解放以后过来的，49年解放，50年来的。孩子全部是在上海生的。

问：邻居您熟悉吗？

张：我不大讲话的，这边倒是有同乡，也不来往。

问：你们家有没有人是党员或团员？

张：没有。

问：有没有谁被评上先进劳模之类的？

张：没有。

问：您觉得你们居住的这一带环境怎样？满意吗？

张：环境还可以，一般性。平时买菜就在前面路边买，很方便的。

老早毛主席时候，门窗都不关，现在不同了。

问：你们平常去居委会那边开会吗？

张：老早是开会的，老早天天开会的。

问：那选举呢？每个人都去参加吗？

张：参加的，到里弄里去参加投票。

问：你们家有没有人被选举过呢？

张：没有。选举干部，哪有选举老百姓的。

问：您知道这个地方要动迁吗？

张：解放过后就说要拆，一直到现在都没拆。国家说要拆就拆，你不能不拆！国家说要过去就得过去，这不是我们老百姓说的算。这个地方要动迁的话，总得有地方住，你说是吧？国家不能让我们没地方住啊！

问：您愿意动迁吗？

张：总归要去的。你不去也不可能，国家说要拆，你能不拆吗？这边统统都拆了就你不拆？可以吗？你敢不拆？！

问：如果动迁，您希望能给你多大的房子？

张：总是要有个房间、有吃饭的地方、有地方烧饭这就行了。哪个不想要大点？越大越好啊，人嘛就是这样子的。

问：您想要房子还是想要补贴？

张：这个有国家的政策，不好说，你又不好超过国家的政策。他们也不好欺负我们，有我就拿，没有你也没办法。

问：如果动迁离市区很远，你们愿意去吗？

张：没办法的。动迁到郊区，车子来来去去，交通方便就行。我们又不逛街，过年过节也不逛，现在年纪大了，还逛什么街？没这个精神了。

问：你们平时在这个地方就是看看店，就不做其他的了？

张：平常在家里忙来忙去的，这就是活动啊。

问：你们现在有医疗保险吗？

张：有的，医保、劳保都有。我们两个老人都有医保，到退休了才有劳保。

问：这周围有没有民工居住？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地方有什么变化吗？

张：民工？有！附近民工多，这个地方最多的。他们在这个地方，有的做生意，有的打工。人多了，总是要变脏的。治安是差了，这些人都是外地的，没了工作，没了钞票吃饭，就是偷。

问：您还记得“文革”时期，你们家过得怎样？

张：“文化大革命”时候，过得还可以，就是天天开开会之类的，也没什么。当时我在商店里做，做到60岁退休。她做到45岁。她是病退，大姑娘顶替的她。

问：你们俩现在拿退休工资吗？

张：拿，七八百块。两个人一千多块。

问：全家其他人有收入吗？

张：没有，大女儿贴息保，儿子要上学。小女儿拿一百多块，儿子没拿钱。

问：现在这个店是谁去进货的？

张：我去进，有的打电话去跟他说就可以了。

问：这店里东西价钱，您都记得吗？

张：记得。我退休以后才开的，大概9年了。

问：您希望在这个小区里建些健身设施吗？

张：这个我们不管，我们不去。我们老百姓不管这个，要是老百姓说怎样就怎样，那还得了，这个要根据国家(的计划)来，国家是个大家庭。

采访人/赵璐 廖桂村

附 录

访问提纲、整理框架

(适当调整,注意维持口述者的原话和叙述脉络)

客观描述:

1. 受访者,访问时间,访问地点。
2. 住房描述(外部环境,内部结构)。
3. 受访者家庭结构(一起住的有谁)。
4. 语言:受访者与访员之间的交流语言、与家庭内部成员交流用语言。

口述内容(问答形式):

1. 移民史:原籍地、最初谁来、年份、为什么来、怎么来?居住地的变化。

2. 工作情况:来之前的职业、来沪后初职、在哪里工作?工作内容?工资水平?工作单位地点?

通勤时间?交通工具?工作单位性质?工作是怎么找的?后来职业的变化?变化后职业的基本情况?现在的职业情况?(若是退休的,则退休前最后一份工作。)

3. 社会参与：职务、单位、是否党团员、获得的荣誉(如劳模)
4. 家庭情况：
 - A. 婚姻：配偶的原籍地、对方的家庭背景(职业、如果是上海的，则问一下对方家庭住在哪里?)，结婚时间、初婚年龄。
 - B. 家庭人口变动情况：结婚、出嫁、生育子女情况，家庭成员年龄、学历(在什么学校上学?)。
 - C. 子女情况：年龄、受教育情况(在哪里上学、什么学校)、工作情况。
 - D. 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包括经济关系、生活关系、感情关系等。
 - E. 家庭生活史中的各种事件、细节等，如家庭成员是否有下放的情况?(何时、到哪里、何时返城、返城后的情况。)
5. 居住情况：最初房子类型、后来翻修情况、现在情况、居住人员变动情况、面积、里面设施、父母与子女是否混居、是否有出租。
6. 生活内容：休闲生活、团体参加情况等。
7. 生活目标：住房设想、生活期待、对子女的期待、希望或困惑等。
8. 现在的社区状况，生活环境、邻里交往等。
9. 现在与故乡老家的关系等。